

THE ANARCHICAL SOCIETY:

A Study of Order in World Politic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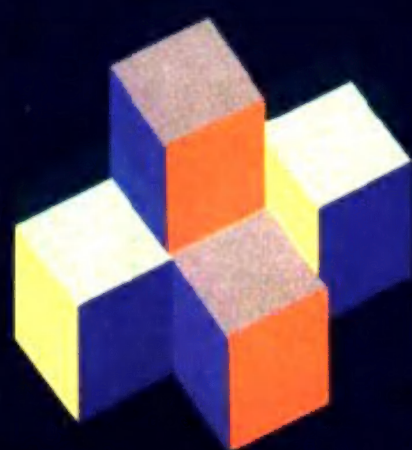
无政府社会

世界政治秩序研究

第二版

[英] 赫德利·布尔 著

张小明 译



<http://iask.sina.com.cn/u/1644200877> 此处有大量书籍免费下载!

仅供个人阅读研究所用, 不得用于商业或其他非法目的。切勿在他处转发!

水隐醉月

世界知识出版社

THE ANARCHICAL SOCIETY:
A Study of Order in World Politics

无政府社会

世界政治秩序研究

第二版

[英] 赫德利·布尔 著

张小明 译

世界知识出版社

Copyright © Hedley Bull 1977

Foreword to the 2nd Edition © Stanley Hoffmann 1995

Index © Mary Bull 1995, 2002

中文版版权 © 世界知识出版社 2003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无政府社会——世界政治秩序研究

[英] 赫德利·布尔 (Hedley Bull) 著; 张小明译.

北京: 世界知识出版社, 2003.11

(国际关系学名著系列)

书名原文: The Anarchical Society——A Study of Order in World Politics

ISBN 7-5012-2109-X

I. 无… II. ①赫…②张… III. 国际政治关系—研究

IV. D8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3) 第 080589 号

图字: 01—2002—0695

书 名	无政府社会——世界政治秩序研究 Wu Zhengfu Shehui——Shijie Zhengzhi Zhixu Yanjiu
责任编辑	袁路明 范景峰
责任出版	夏凤仙
责任校对	马莉娜
出版发行	世界知识出版社
地址邮编	北京市东城区干面胡同 51 号 (100010)
排 版	世界知识出版社电脑科
印 刷	世界知识印刷厂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本印张	787 × 1092 1/16 18 1/2
字 数	260 千字
版 次	2003 年 11 月第一版 2003 年 11 月第一次印刷
定 价	28.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国际关系学名著系列

专家委员会

袁 明 时殷弘 秦亚青
王缉思 阎学通 倪世雄

编辑委员会

姚东桥

编 委（按姓氏笔画排列）

王 勇 王 联 于铁军 张小明
潘成鑫 袁路明 周宇君 夏力宁

本书译者

张 小 明

总序

编译这套书，是我们多年的心愿。

二十多年前，中国国门打开。中国向世界开放，主要是向西方开放。西方的思想文化通过各种渠道涌入，这是中国近现代史上的又一次“西学东渐”。比起前几次“西学东渐”来，其规模和内容都扩大和丰富了许多。在众多的“西学”中，关于国际关系的西方学说占了一块相当突出的位置。这个现象很值得研究。追想前一次“西学东渐”，即上个世纪的“五·四”时期，很少有西方“国际关系学”进入中国。这与当时中国基本上还是听任列强宰割的国际地位有关。“救亡”都还来不及，何能奢谈“国际关系”？不过，尽管在那么困难的环境中，还是有一些介绍欧洲外交史的著作问世。武汉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还专门开设了国际研究课程。

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以来，“西学”中的国际关系学说得以在中国较大规模地传播，恐怕与美国的力量（亦可称其道“硬力量”和“软力量”的综合）和中美文化交流活跃这一现实有关。“西学”中的国际关系学说俨然就是美国的国际关系学说。“以美国为主”是这一次“西学东渐”的一大特色。

然而，美国并不是我们现在所接触的西方国际关系学说的发源地。三百多年前，在欧洲出现了近现代国际关系体系的基本框架时，美国尚未立国。北美还是英国的殖民地。稍后一些，当欧洲的一些思想家、政治家在构筑政治学和国际关系学说的一些基本理论时，美国还在忙于地理上的拓荒。当时美国人对世界的了解并不比闭关锁国的中国人多。

美国真正成为西方国际关系学说的重镇，其发展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因为欧洲已不是国际政治的中心舞台。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果是这

一中心舞台向欧洲的两侧转移。待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美国从欧洲“引进”了一批重量级的国际关系研究者和实践者，再辅之以雄厚的资金支持，“国际关系学”便在美国得到了真正的大发展。当然，这与美国的超级大国地位以及美国的全球战略需要有直接关系。这便是20多年前中国国门打开，又一次“西学东渐”时中国人面对的那种美国国际关系学派林立，文章汗牛充栋的蔚然大观。再到美苏“冷战”结束，美国成为惟一支配性的超级大国之后，其话语霸权在国际关系这一领域中就更加明显了。这一显然携带着巨大的历史惯性力量的现象，随着“全球化”，还在持续显现。

不过，于那些需要对世界有尽可能透彻了解的当代中国人，尤其是致力于学习国际关系的青年学子来说，要紧的是了解一些本源的东西，如西方的文明史，扩张史，国际关系史，以及背后的基本观念和思想，或谓陈乐民先生多次提醒的，要注意西方“精神的历史”。这种“精神的历史”当包括西方国际关系学说的本源性思考在内。这一本源性问题，实际上是西方学说的核心价值观。它们产生在欧洲，后来又被一代代美国学者们继承了。我想，这就是为什么刘同舜先生在为《当代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作序时，特别地指出“就核心概念的归纳和理论框架的锤炼而言，英国学派的‘国际关系’、‘国际社会’和‘世界社会’的哲学基础、历史底蕴和分析方法，较之‘主流’的现实主义、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似高出一筹”。

所以说，我们现在翻译出版的这一套书，是在介绍西方国际关系的“精神的历史”。这些书是西方学界认可的真正的“经典之作”，被作为“经典教材”一版再版，不断成为西方国际政治课堂中的必读书目，并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西方国际政治战略人士、外交家和学者。现在看到的国际关系的各种表象，西方大国的外交政策，战略考虑，其实都出于他们的“精神历史”的本源。西方的大学，包括美国大学的课堂，并不数典忘祖。他们讲授政治学理论和国际关系理论，亦多要从古希腊讲起。现任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管理学院院长的约瑟夫·奈是曾用了大工夫，把修昔底德的一部《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翻烂吃透了的。这是他们精神家园的最终皈依。我们要了解西方，不能不了解他们的精神家园。

西方国际关系学说中的核心观念究竟是什么？我们所编译的这套书

中做了比较透彻的介绍。应该说,介绍西方国际政治学说的核心观念,或本源性思考,是这套书的一大特色。中国读者和青年学生可以通过阅读这套书了解西方的这一领域学说的核心部分,如果仅仅停留在阅读一些介绍性的著作上是达不到这一点的。当然,介绍性的著作亦必不可少。

实际上,在知识的汪洋大海中,人很容易迷失。牛津大学国际关系讲座教授亚当·罗伯茨 1991 年在北京大学的一次国际会议上说,“我们都不应忘记以现代面目出现的思想体系常常不过是古老主题的变种”。为了加强他的观点,他还引用了法国政治活动家、思想家德·托克维尔的一段名言:

“有多少道德体系和政治体系经历了被发现、被忘却、被重新发现、被再次忘却、过了不久又被发现这一连续过程,而每一次被发现都给世界带来魄力和惊奇,好像它们是全新的,充满了智慧。之所以会如此,并不是由于人类精神的多产,而是由于人类的无知,这种情况简直令人难以置信。”

罗伯茨教授指出,德·托克维尔的讽刺性评论特别适用于国际关系领域。他并没有说明为什么会这样“特别适用”,但当我们读了这一套书后,倒是不妨去深想这个“百年命题”。

与此相关的,这套书的作者都是在西方被公认的“大家”或“大师级人物”。他们的共同点是多具欧洲背景。这与上面所提及的近现代国际关系史的发展是承接的。他们代表着欧洲从启蒙运动、工业革命并走上向全世界扩张道路的实践的理論思考。国际关系理论只能从实践中总结,而不能只在书斋中进行概念上的自我循环。这些作者对历史和现实的深切关注,是他们的著作能够站住脚的根本,即他们思考的出发点和归宿都是国际政治实践,而他们的贡献是将这些实践变成一种历史哲学。

复杂纷繁的世事一旦被透彻简洁的方式提高到哲学境界,它们便走出了粗俗和原始,便具有了知识美感。更何况作者们所提出的历史哲学命题对后人仍有意义。“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中国古人用诗的语言所表达的,也许就是这个意境。

担纲这一套书翻译工作的主力是中国国际关系领域中已具成就的中年学者,还有一批崭露头角的年轻学者。他们都有多次赴欧美日发达国

家深造和在外讲学、交流的经历。他们对中西政治文化的体悟，既来自于书斋，亦得之于实践。翻译原著，其实是一件十分艰苦的工作，绝不是粗通一些外文便可对付得了的；要编辑出版成书，也有种种不易。直至今日，大部分译稿都已脱手之际，译者仍对文稿中的一些专门用语苦思冥想。因为政治文化背景的不同，有时的确无法将西方大师们思考的神貌用完全相符的中文语词表达出来。“难哉译事”，难是难在“神”上，而非“词”上。但是，如上所说，这一批中青年学者都受过两种文化的教育，现在又都在中国的著名高校执教，他们在实践中交融了两种文化的优长，更深感要让年轻的中国学子们了解西方原著的必要。在他们的努力下，终于有了这一套书。这是我们要特别感谢他们的。

我们也要特别感谢世界知识出版社的领导和编辑。他们视野开阔，既看到了世界的过去，也想到了中国的未来。他们的良苦用心和勤恳敬业，是支持我们完成翻译这套书的重要精神支柱。

袁 明

2002年10月

第二版序言：重新思考『无政府社会』

今天，《无政府社会》一书已被普遍视为国际关系研究领域中的一部经典著作。这不仅是因为该书的内容，也是因为作者简洁、明快的文风。这本书也被看做是所谓的国际关系研究英国学派（British school）（或者英国人看待国际关系的方式）之最负盛名的代表作，出于自谦布尔不愿意被冠以“学派”的称号。此种分析国际关系的方式源于对国际关系的如下认识：国际关系是构成国际社会的国家间的一系列复杂的关系，而不只是“国家体系（system of states）”。

我们可能会自问：为什么如此重要的一部著作于1977年问世的时候，并没有在美国得到应有的重视呢？在美国，有关建立一个不同于外交史和国际法的国际关系学科的努力已经走得很远。答案就在于这本书所体现出来的“英国方式”（Britishness）与美国的主流方式不相吻合。以汉斯·摩根索为代表的现实主义者，从国家追求权力和相互竞争的角度分析国际关系。以肯尼思·沃尔兹（Kenneth Waltz）为代表的新现实主义者强调国际体系中的权力分布决定国家间的争斗是不可避免的。对他们来说，把重点放在社会（尽管是无政府状态）的做法是不可思议的。现实主义者和新现实主义者认为，在这样无休止的“战争状态”中所存在着的任何秩序，都是国家不断追求均势的产物。布尔用一章的篇幅来论述这些问题，但不认为它们包含了国际秩序的全部内容。然而，布尔的这本书也没能让另外一个（也是更古老的）美国国际关系理论流派即理想主义的斗士者们所满意。以伍德罗·威尔逊（Woodrow Wilson）为代表的理想主义者，试图对国家体系加以改革和赋予它道义色彩，有时甚至主张超越国家体系；他们以沮丧的目光看待战争和均

势，并以怀疑的目光看待外交；寄希望于建立富有效力和权威的国际制度。布尔的著作虽然也强调共同规则、共同制度和共同利益的作用，但是它坚决反对乌托邦主义，并且认同主权国家体系或威斯特伐利亚体系。这种看法让那些认为国家是导致无秩序的一个问题而非产生秩序的一种途径的人感到满意。布尔的著作对马基雅维利主义者和霍布斯主义者来说，“格劳秀斯主义”味道太重了，而对康德主义者和世界主义者来说，它的“国家主义”倾向又太明显了。

在本书出版大约 25 年之后，我们可以更清楚地认识它的重要性。这部书并不是作者的封笔之作，如果布尔不是英年早逝的话，他可能会发展其中的观点。我在这里想指出的是，本书在以下两个方面具有很重要的意义：第一，作为国际关系研究的一般方法。第二，作为理解当今国际体系的分析视角。

作为一般研究方法，《无政府社会》让我们关注“合作的因素和有规范的国家间关系”。布尔一方面告诉我们，可以从这样的角度来分析所有的国际体系（甚至是冷战两极体系也不例外，他在这一点上所表现出来的冷静与理智态度已被证明是完全正确的），另一方面他又小心地提醒我们，在国际体系中也存在着“战争的因素和国家为追求权力的斗争”以及“超越国家间鸿沟的跨国团结与冲突的因素”。他没有预先断定“国际社会”的因素到底有多重要：这属于实证研究的问题。把布尔同沃尔兹加以比较是很有意思的。两人都接受“无政府框架”：即国际关系乃自主国家间的政治，不存在一个凌驾于国家之上的共同权威。这也就是自助原则。因此，两人都强调权力分布特别是大国与小国间实力差别的重要性（布尔还继续区分了大国在自己势力范围内行为的不同类型）。但是，布尔的研究方法比沃尔兹更丰富。沃尔兹在讨论国际体系的时候，几乎只关注“战争状态”，未能走出二分法，即两极与多极体系。而布尔的方法则导向了基于每一体系“社会性”大小的类型学：这样一来，沃尔兹和雷蒙·阿隆所强调的有关两极与多极的区分就没有什么意义了。强国与弱国之间关系的性质，主要取决于体系中社会性的大小程度、规则的特征以及国家共同利益的内容。

布尔在考察国家间互动关系的时候，的确对诸如共同的关注点、共同的规则和共同的制度之类的东西而非权力关系很感兴趣。这就使他在考察战争的时候，不仅把战争看做是权力冲突的经常性后果，也把战争

视为创建秩序的可能手段，因为战争可以遏制麻烦制造者的野心与贪婪，有限战争毕竟是均势的工具。这也使得他从外交和国际法，而非均势和战争的角度，来考察秩序的格局（patterns of order）。

这样的研究方法具有两个优点。首先，它为国际体系研究重新引入了三个被沃尔兹自己的简化论所忽略的因素：跨国性观念（transnational ideas），它可以导致共同规范和共同利益；国际制度 international（institutions）；相互依存（interdependence）的产生（国家到底是以合作的方式还是以单边或冲突的方式来实现“自助”，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们之间的相互依存程度）另外，它也促使我们注意国家间的互动同国家的性质与制度之间的关系。换句话说，它不仅注意体系单位之间的权力分布，也考察单位本身。国际社会范围的大小（与跨国性社会相比较）取决于单位政治体系中的自由空间与政府规范之间的比例。国际社会的密度或者深度的大小取决于单位所具有的共同点的多寡。国际社会的性质或内涵取决于占据主导地位的观念、意识形态或文化。

这并不是说，布尔这种宽泛和笼统的研究方法没有含糊之处和问题。布尔在讨论秩序的时候指出，假设在社会生活的基本目标中存在共同利益的观念：秩序因此看起来应当属于和来源于他所说的“社会因素”。但是，诸如均势那样的格局，当它属于无意识和自私动机的产物时，也可以是“战争状态”的一部分，正如当它符合共同关注观念并被有意识地“加以设计”时一样，也可以是“社会”的一部分。也就是说，它既可以是霍布斯主义现象，也可以是格劳秀斯主义现象。国家间关系的两个方面——战争状态和国际社会——是很难区分开的。这有两个方面的原因。其一，“无政府问题”并不意味着所有人反对所有人的无休止的战争。出于追求自我利益的考虑，也可能导致合作共识的产生。在20世纪70年代，所谓的新自由制度主义者也论述过这个问题。其二，反过来看，国际社会的很多特征是很脆弱的，当国家的那些自我利益的考虑发生变化的时候，这些合作共识将会受到损害。

布尔在分析权力和国际社会的共同规则与共同制度之间的关系时，其论述是不甚清楚的，尽管他在冷静地分析秩序与正义（尤其是人权）关系的时候，对此做了一些解答。他没有深入探讨“共同利益”这个含糊不清的概念之含义，也没有解释共同利益到底从何而来（是外部制约的结果，还是内部压力的产物？）以及如何变得具有约束力？最主要的

是，布尔的这本书对有关国际社会如何形成的论述很少。我们需要对国际社会的形成有更多的了解。导致国际社会形成的因素可能既是相互依存的格局，也可能是战争状态，后者常常通过暴力方式创建一系列规则与制度。我们需要更多地了解国际社会的机制：因为观念、技术和商品的流动，都需要通过体系单位来进行，我们必须对霸权国家的作用和行为方式进行特别的研究。我们需要更多地了解国际社会的物质基础，或者是物质因素与共同价值观和文化所发挥的作用。布尔特别强调文化凝聚力的作用，但历史告诉我们，文化凝聚力是很脆弱的，它很容易被“战争状态”所摧毁。在国际关系中，社会性和战争状态何者占上风呢？这个问题因时间、地点和问题领域的不同而有不同的答案。这也是本书没有适当加以论述的一个方面。布尔的研究方法会引导人们提出这些问题，他本人在辞世之前已经开始回答其中的某些问题了。

《无政府社会》也提供了理解当代国际体系的一个分析方法——在当代国际体系中，经济相互依存程度在不断加深，共同规则和制度所构成的网络纵横交错，由于核恐怖，由于战争手段不适用于经济相互依存所导致的许多冲突，武力的作用正在下降。当今世界，国家依然是最主要的行为体，文化差异（即便它不一定导致“文明间的战争”）使人们怀疑国际社会的稳固性，这也对国际社会的规则构成挑战。“国际规制”（international regimes）的理论家们一直努力解释为什么追求自我利益的行为体也会寻求相互间的合作，布尔的著作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分析框架以理解这个问题。

然而，还有很多问题有待解答。首先，今天我们看到了一些布尔没有预见到和分析过的因素。本书基本上没有论及国际关系的经济层面，从这个意义上说，他同现实主义者，而非 18、19 和 20 世纪的自由主义者，有较多的共同点。一个国际性经济社会和跨国性世界经济已经出现在我们的面前，民间团体和个人是其中的主要行为体，而且由于通讯技术革命的缘故，决策不再是由政治权力中心和少数国家政治权威主导下做出的，其结果可能大大削弱国家的能力，限制国家的主权。我们现在难以像布尔所做的那样，把世界政治和秩序中的“跨国”因素同“国际”因素截然分开。而且今天我们所面临的问题，并不是设想的和令人琢磨不透的世界国家（world state），或是对国家体系刻意地加以改造，而是许多国家内部遭族群与宗教冲突，制度和资源的缺乏，以及不具备

合法性折磨和破坏所导致的虚弱不堪。从某种意义上说，所有的国际关系理论家都理所当然地接受了“国家体系”的概念，不管这个体系是处于冲突还是合作状态。他们在思想上一直习惯于若干国家构成的国家体系对帝国体系的这种两分法。如果走向崩溃和解体的国家数目大大增加，而国际社会又无力面对由此而产生的混乱局面，那么这将会导致什么样的结果呢？国际社会的规则和制度之作用是有限的，国家的共同利益目标一般被界定为在短期内保持谨慎的态度和避免介入纷争。

在考察当前的后冷战国际体系的时候，我们不能不思考布尔留下来的问题。在无政府环境中，国际社会到底能够发展到什么样的程度？国家体系和跨国领域中的社会因素能否，或在什么条件下，可以压倒与之相对立的因素？经济相互依存在这两个领域的重要性可以“溢入”冲突领域并减少冲突范围吗？或者仅只是二者的共存——或者，冲突也会对 xii 社会产生侵蚀作用吗？即便规制与制度的网络纵横交错，缺乏一个共同文化的全球性国际体系能否算得上是一个真正和强大的社会？当国家利用内部暴力、内部虚弱或者外部暴力、侵略行为挑战世界秩序，或者跨国社会自身的规制和制度导致动乱和无秩序状况的时候，世界秩序会是什么样子的呢？同样地，这些也是我们可以通过布尔的研究方法推导出来的问题。它们可以给研究国际关系的人提供丰富的研究课题。这表明，这部杰作所提出的范式，不管是对世界政治进行深入的实证分析，还是对探讨能否把道义问题引入对世界舞台行为者的分析来说（布尔认为这是一个很大、很难的问题，他拒绝对此进行“纯学理性”的探讨），都极具意义。此外，虽然布尔对国际社会的描述可能显得是粗线条的，但是与此相比，其他所有的范式看上去都是死胡同，或者都是独木桥。

斯坦利·霍夫曼

前言

在本书里，我努力系统地阐述有关国际社会的和国际秩序的观点，我也曾经在其他地方提及有关想法，但未对此做过系统的论述。

我在伦敦经济学院国际关系系时的同事，特别是曼宁（C. A. W. Manning）先生，曾给予我很大的帮助。我参加英国国际政治理论委员会的讨论已有数年，并且从中获益良多。我尤其要感谢马丁·怀特（Martin Wight），是他最早让我知道，国际关系也可以是一门学问，他在这个领域中的著述，用他自己的一个比喻来说，就像伦敦郊区的一座罗马式建筑。他写的东西，虽然出版的并不多，而且未得到应有的承认，但是一直给我以启迪。

我在书中的某些地方，借用了我在牛津大学时的老师哈特的思想。在书中的几个章节里，我批评了我的朋友、普林斯顿大学理查德·福尔克的观点。然而，我相信，了解他的观点，是研究当今世界政治所必需的。我对他的批评，也应该被视为对他的敬佩。我要特别感谢我的朋友与同事米勒（J. D. B. Miller）教授给予我的鼓励与批评。

这本书既不是缜密的理论思维的产物，也不是深奥的历史研究的成果。当我还是一名大学生的时候，就对《空间、时间与上帝》（伦敦麦克米伦出版公司1920年版）的作者塞缪尔·亚历山大（Samuel Alexander）的一句格言产生了很深的印象（我现在想，是印象太深了）。他说：“思考即研究”。我的书反映了通过认真思考就想解决庞大复杂问题的企图的局限。

第四章的内容曾经以题为《国际社会中的秩序与正义》的文章形式，发表在《政治研究》上（1971年9月，第19卷，第3期）。第八章的内容曾经以题为《战争与国际秩序》的文章形式，发表在阿兰·詹姆斯（Alan James）编辑的《国际秩序的

基础——C. A. W. 曼宁纪念文集》(牛津大学出版社 1973 年版)。感谢有关出版商允许我在本书中使用这两篇文章。

在学术上给予我最多帮助的是约翰·安德森 (John Aderson) 先生, 他于 1927 年—1958 年间担任悉尼大学哲学教授, 他比许多更有名气的人都要伟大得多。他同我在书中讨论的问题并没有直接的关系。然而, 他的思想与榜样却给他的许多学生包括我在内的观念的形成以最为深刻的影响。

赫德利·布尔

导言

本书旨在探究世界政治秩序的性质，尤其是分析由主权国家所组成的社会，世界政治秩序通过该社会的存在而得以维持。我努力为如下三个问题寻求答案：

第一，什么是世界政治秩序？

第二，在当今主权国家体系中，秩序如何得以维持？

第三，主权国家体系是否依然是通往世界秩序的一条可行的道路？

本书用三个部分分别讨论这三个问题。

我想在这里首先阐明一下我在探讨这一课题时在研究方法上的几个基本点，相信这会对读者有所帮助。首先，我在书中所关注的并不是整个世界政治，而只是其中的一个要素，即秩序。有时，当我们谈及世界秩序（或者这个世界的秩序）的时候，我们脑中所想到的往往是国家间关系的总和，是作为一个整体的国际政治体系。与之相反，我把秩序看做是一种性质，这种性质在任何一个时间或地点的国际政治中可能存在或不可能存在，或者说这种性质可能在较大或较小的程度上表现出来：秩序是与无秩序相对的。

当然，在国际政治中，无秩序的要素通常比有秩序的要素表现得更加明显。的确，有时人们认为（我觉得是错误的认识），在世界政治中根本就不存在着秩序，国际秩序或世界秩序只是人们希望（并为此而努力）今后某个时候将会出现的情势，但是它过去不存在，今天也不存在。我们应该记住，秩序至多只是世界政治中的一个要素。我想对此要素加以集中论述。所以，我在本书第二部分中分析诸如均势、国际法、外交、战争和大国等国际社会中的制度时，我所关注的是它们同秩序的关系，而非它们在整个国际政治体系所占据的地位。

其次，本书（在第一章）把秩序定义为一个现实的或者可能出现的情势，而不是一个价值、目标或目的。因此，本书没有断定，秩序是一个应当被加以追求的目标，甚至是压倒一切的目标。说某种制度或行为方式有助于世界政治秩序的维持，并不意味着此种制度应该被保留、这样的行为方式理应被效仿。xvi

的确，我同大多数人一样，很看重秩序。如果我并不认为世界政治秩序是一个应当被加以追求的目标，那么我就不会觉得本书有关秩序问题的讨论有什么价值。任何一个严肃的、涉及政治目标或价值观的理论，很难做到不对人与人关系中的秩序问题进行价值判断。

然而，正如我在第四章中所指出的那样，秩序并不是左右国际行为的惟一价值，它也不是必须被加以追求的、压倒一切的价值。例如，当今世界的一个现象是，富足的工业化国家关心秩序（或者是关心那种体现了它们自身价值观的秩序），而穷国或非工业化国家则关注公正的变革，这二者之间存在着矛盾。同样地，我们时常听到一个说法，即国际政治秩序应当从属于自由或自主。比如，反拿破仑联盟就认为自己是在为欧洲国家的自由而战，是在反对那个带来秩序但是损害自由的国际体系。今天，也经常有人说，在美国和苏联的势力范围内，秩序是在牺牲小国的自由和独立权利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

我们如果把秩序视为压倒一切的目标，那么就需要解释秩序同其他目标之间的关系。我不想做这样的事。要探讨世界政治中的正义问题，我还需要另外再写一本书，其分析视角可能与本书有所区别。我还没有注意到，而且也不会赞同这些不同的分析视角。本书只是研究世界政治中的秩序问题，而不是研究世界政治中的正义问题。当然，我在本书中会讨论世界政治秩序同正义或公正要求之间的关系。我也会分析，为了建立起世界政治秩序，有关公正变革的要求应该在多大的程度上得到满足。但是，这些有关公正的理论问题（对本书来说这有点离题），只是因为它们对于分析秩序问题来说是至关重要的，所以才在本书中被论及。

第三，我在书中所探讨的，只限于有关人类政治结构或制度的一些永恒话题，我避免讨论当今国际政治中的现实问题。人们常常说（有时是对的），国际秩序的前景取决于当今一些重大问题的结局。这些问题包括战略核武器的控制，美苏缓和的发展，遏制阿以冲突，避免世界性xvii

衰退，改革国际货币制度，限制人口增长，世界粮食供应格局的变化等等。不管今天这些重大问题的性质如何，它们都必须在现有的世界政治结构这个背景中得以解决。我针对这种政治结构及其变革，解答了三个有关秩序的基本问题。

第四，本书在分析世界政治秩序的时候，并不强调国际法和国际组织的作用，而是把秩序视为一个能够，而且实际上一直独立于国际法和国际组织而存在的东西。本书指出，秩序的维持确实有赖于规则的存在。在现代国际体系（与其他国际体系有所不同）中，具有国际法地位的那些规则，一直在维持秩序的过程中发挥着较大的作用。但是，为了解释国际秩序的存在，我们不能不承认那些并不具有法律地位的规则的作用。我们也应该注意到，那些不依赖于国际法律规则的国际秩序形式，将来可能出现，甚至在过去就曾经出现过。我想，不对这些秩序或者共存的规则加以综合考察，或者没有认识到国际法规则与那些不属于国际法但属于国际政治范畴的规则可以共存，便是我们今天分析世界政治方法的一个缺陷。

与此同时，本书采用的另外一个研究方法是，不侧重于分析国际组织，比如联合国及其专门机构，以及各种地区性国际组织。当然，本书在一些地方提到，这些国际组织在维持当今世界政治秩序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但是，我们不应该从国际联盟、联合国等国际组织中寻找世界政治秩序得以维持的基本原因。我们应当从先于这些国际组织而存在的国际社会的制度中寻找问题的答案。即使这些国际组织不复存在了，国际社会中的制度仍将继续发挥作用（尽管会以别的方式发挥作用）。

而且，我们在分析联合国及其它国际组织的作用时，最好不要从这些组织的正式目标、期望或大家对它们所寄予的希望出发，而应该从它们对更为基本的制度之构建作用的角度来思考问题。出于这点考虑，本书有关均势、国际法、外交、大国作用以及战争的章节谈到了联合国等国际组织。只有均势、国际法、外交、大国的作用以及战争等才是国际社会的有效制度，而国际联盟和联合国，用马丁·怀特的话来说，则是“假制度”（pseudo-institutions）。我同意这么一种看法，即由于相关文献汗牛充栋，人们对联合国的研究已经过滥，其结果是，学者们未能把注意力集中在对国际秩序的存在更为根本性的其他因素上。

最后，我写此书的目的是不是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案，也不是宣扬某种

形式的世界秩序构想，或者主张某种实现世界秩序的方式是合适的。我的目的，或者至少是我有意识的目标，却是对世界秩序及其前景做纯学理性的分析。

当然，我也不想表明自己的研究是“不带价值判断”的，说自己的研究“不带价值判断”是很荒唐的。像本书这样的研究，不可能不基于某种道义和政治的假设，不然的话，这肯定是徒劳的。政治领域的学术研究，必须考察和评论带有价值判断的假设，把提出道义问题和政治问题视为研究工作的组成部分，而不应当排除包含价值判断的假设。在对待这样的问题上，我同别人一样，无法采取超然的态度。但我相信，努力保持超然和冷静的态度是很重要的。而且我也知道，在世界政治研究中，某些方法比其他方法更为超脱和冷静。我也相信，研究工作本身是带着道义成分的，对各种政治制度和运动（不管是好的还是坏的）的研究也不例外。

目
录

第一部分 世界政治秩序的性质

第一章 世界政治秩序的概念 / 2

社会生活秩序 / 2

国际秩序 / 6

世界秩序 / 15

第二章 世界政治中存在着秩序吗? / 18

国际社会的思想 / 19

国际社会的现实 / 32

国际社会的局限性 / 41

第三章 世界政治秩序如何得以维持? / 43

社会生活秩序的维持 / 43

现代国家秩序 / 46

原始社会秩序 / 48

国际社会秩序 / 53

功能的和原因的解釋 / 59

第四章 世界政治中的正义与秩序 / 61

“正义”的含义 / 62

秩序与正义的相容性 / 68

优先考虑的问题 / 74

第二部分 当代国际体系中的秩序

第五章 均势与国际秩序 / 80

均势 / 80

均势的作用 / 84

均势在当今的作用 / 89

相互核威慑 / 93

相互核威慑与均势	/ 96
相互核威慑的作用	/ 98

第六章	国际法与国际秩序	/ 101
	国际法的性质	/ 101
	国际法的功效	/ 108
	国际法对国际秩序维持所起的作用	/ 111
	国际法的局限性	/ 113
	当代国际法	/ 115
	国际法的主体	/ 121
	国际法的适用范围	/ 122
	国际法的渊源	/ 124
	国际法学家的角色	/ 126
第七章	外交与国际秩序	/ 129
	外交	/ 129
	外交的功能	/ 135
	外交在当今的作用	/ 137
第八章	战争与国际秩序	/ 147
	战争	/ 147
	现代国家体系中的战争	/ 149
	当今的战争	/ 151
第九章	大国与国际秩序	/ 160
	大国	/ 160
	大国的作用	/ 164
	当今的大国	/ 182

第三部分 通向世界秩序的其他道路

第十章 当代国家体系的替代形式 / 186

国家体系的替代形式 / 186

超越国家体系 / 199

第十一章 国家体系会消亡吗? / 207

有体系, 但没有社会 / 207

有国家, 但没有体系 / 209

世界政府 / 210

新中世纪主义 / 212

世界政治体系 / 223

第十二章 国家体系已经过时了吗? / 228

和平与安全 / 229

经济和社会公正 / 233

人与环境 / 236

国家体系与世界秩序 / 238

第十三章 怎样对国家体系加以改革? / 240

大国一致: “基辛格模式” / 240

全球中央集权主义: 激进的救世主义模式 / 243

地区主义: 第三世界模式 / 246

革命: 马克思主义模式 / 251

国际社会的前景 / 252

第十四章 结论 / 255

索引 / 257

译后记 / 274

第 一 部 分

世界政治秩序
的性质

3 第一章

世界政治秩序的概念

我们研究世界政治秩序，首先要回答一个问题，即什么是世界政治秩序？我将先解释我所理解的一般意义上的社会生活秩序，然后进一步阐述国家体系和世界政治中的秩序之含义。

社会生活秩序

说一些放在一起的东西显得有秩序，其最简单和通常的含义是，这些东西按照某种格局而相互联系在一起，它们之间的关系不是随意性的，而是基于某个明确的原则。因此，书架上的一排书是有秩序的，而地板上的一堆书则是无秩序的。

但是，当我们谈到社会生活秩序并把它视为无秩序的对立面时，我们脑中所想到的并不是任何一种社会现象的格局或有序的排列，而是一种特定的格局。这是因为，虽然处于暴力冲突中的人或集团的相互行为也呈现出某种格局，但是我们只能把它称为无秩序的现象。处于战争和危机环境中的主权国家，其行为方式是有条理和有规则的。个人生活在霍布斯所描述的恐惧和不安全的自然状态中，可能也会不断按照某种方式行为，霍布斯认为实际情况就是这样的。然而，这些都是社会生活中无秩序而非有秩序的例子。

人们在社会生活中所寻求的秩序，并不是个人或集团相互关系中所呈现出来的格局或规律性，而是导致某种特定结果的格局，一种旨在实现特定目标或价值的社会生活安排。从这个意义上说，把一定数量的书籍按照作者姓名或主题加以整理，而不只是随意地把它摆成一行，那么这些书籍就是有秩序的。这就是奥古斯丁所阐明的有目的的秩序概念。他把秩序定义为“不同的组成部分处于自己的

最佳位置上，共同构成一个很好的布局”。^①我们在后面将会发现，这个定义有些问题。然而，由于它把秩序视为某种特定形式的格局，而非任何形式的格局，并且强调其所包含的目标或价值，因此它是我们界定秩序概念的第一步。

奥古斯丁的定义马上带出一个问题，即“好”和“最佳”的标准是什么？从这种有目的的意义上说，秩序只能是一个相对的概念。一种安排（比如书的排列）对于一个目的（如根据作者名字查找一本书）来说是有秩序的，而对于另外一个目的（根据主题查找一本书）来说却是无秩序的。由于这个原因，对于一套特定的社会安排是否代表着秩序这个问题，人们有不同的看法，相互冲突的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可能都代表着秩序。法国革命时期的旧制度或者今天西方世界和社会主义国家中的社会和政治体制，各自代表着“不同的组成部分所构成的布局”，根据不同的价值目标来判断，这些布局都是“好的”和“最佳的”。

虽然根据奥古斯丁的这种观点，秩序只是相对于特定的目标而存在的现象，但是在这些特定的目标中，有些却是基本的或主要的目标，因为它们在某程度上得以实现，不仅是这种或那种具体社会生活的一个条件，也是整个社会生活本身的一个条件。不管人们是否还追求其他什么目标，所有的社会都赞同这些主要和基本的目标，并且采取措施以实现这些目标。我们有必要特别提到三个这样的目标。第一，所有社会都努力保证人类生命在一定程度上免受导致死亡或身体伤害的侵害。第二，所有社会都努力确保信守诺言或履行业已达成的协议。第三，所有社会都在一定程度上保护财产所有权的稳定性，并且使之免受无休止和无限制的挑战。^②我认为，社会生活秩序指的是一种追求上述基本、主要或普遍的社会生活目标的人类行为格局。

由于这个定义在本书的分析中占有至关重要的地位，所以我有必要 5
对此做几点补充说明。该定义并不意味着这三个社会生活的基本价值——它们有时被称为生命、诚实和财产——包括了所有社会都追求的生活目标之全部内涵，也不意味着“秩序”这个词只是相对于这些价值

^① Augustine, *The City of God*, bk xix, ch. XII (Everyman's Library, 1950) p. 249.

^② 有关的论述文献很多，但哈特关于“简单的道理”构成“自然法学说的核心”的论述特别值得我们注意，参见：*The Concept of Law*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61) p. 194.

来说才具有意义。但是，它们的确是任何社会都追求的基本目标。

这三个目标可以说都是很基本的：如果一个由个人或集团组成的群体不反对暴力以保障成员的安全，不遵守协议，以及不确保所有权的稳定性，那么我们根本就不可能把这样的群体称为一个社会。另外，任何一个社会都是在上述三个目标得到某种程度上的实现这个前提条件下，才会确定群体的其他目标。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三个目标也是最主要的目标。如果人们不能避免死亡的威胁或他人的伤害，从而拥有一定的安全感，那么他们肯定无法把足够的精力和注意力用于追求其他的目标，而且也无法实现其他的目标。只有当人们普遍相信协议会得到履行时，他们才可能达成协议以促进人类在各个领域内的合作。由于人类的本性和占有物数量的有限性，只有当个人或集团可以对占有物拥有一定程度上的稳定与确定的所有权（不管是个人所有、集体所有，还是个人集体共同所有）时，社会关系才是稳定的。当然，正如休谟等人所言，社会对稳定的所有权的渴望是有前提的。如果个人追求物品的动机完全是利己的，那么他们根本不可能根据财产或所有权的规则对财产实现稳定的占有。相反，如果个人的动机完全是利他的，那么确立稳定的所有权也就没有什么意义了。同样地，如果人们想要的物品极其稀缺，财产权就不会起作用，而如果人们想要的物品极大丰富，那么也就没有必要确立财产权。但是，鉴于人类在一定程度上所具有的利己性以及人们所追求的物品之有限度的丰富性，所以确立稳定的所有权便成为主要的社会生活目标。这三个目标也具有普遍性，因为所有的社会似乎都很重视它们。

- 6 需要说清楚的另一点是，在把秩序定义为以追求上述三个基本或主要目标的人类行为格局或者“不同组成部分所构成的布局”时，我并不是说这三个目标优先于其他的目标，我也没有断定它们是应该被追求的或值得追求的目标。我的确认为，除非这些目标在某种程度上得到实现，否则社会或社会生活就不存在；追求其他目标的前提是这三个基本目标在一定程度上得到实现；事实上所有社会都追求这三个目标。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当这三个目标同其他目标发生冲突的时候，每个社会总是要优先追求这三个目标。实际上，在战争或革命时期，人们经常或者有时诉诸暴力、撕毁协议和破坏财产权，以追求自己的目标。这也可能是正当的行为。正如本书在导言中所指出的，秩序并不是决定人类

行为的惟一的价值，我们也不应该假定它优先于其他的价值。

本书不认为社会生活的基本或主要目标优先于，或者应该优先于其他目标，也不主张这些目标必须得以实现。我尤其不同意自然法学说倡导者的一个观点，即这些目标或其他基本的、主要的或普遍的社会生活目标对所有人来都是必须被加以追求的东西，支持这些目标的规则对所有人来说无疑都具有约束力。毫无疑问，我在这里所持的观点可以被看做是自然法学说的“经验性翻版”，即试图以不同时代的语言来描述社会存在的基本条件或主要条件。的确，自然法传统是帮助本书作者探讨问题的一个主要的理论思想。但是，我无意使自然法学说的基本思想得以复兴。

另外，我还必须说明我所定义的社会生活秩序同规则或基本行为准则的关系。人们有时从服从行为规则的角度，特别是从服从法律规则的角度，来界定社会秩序的概念。事实上，社会生活秩序同人类服从规则（如果不一定服从法律规则的话）的行为是密切相关的。在大多数社会里，由于存在有关禁止谋杀和攻击他人、惩罚违约行为和维护财产所有权的规则，所以行为模式（patterns of conduct）得以产生，其基本目标是反对暴力以维护安全、尊重协议以及稳定所有权。然而，我一直试图提出一个可以把规则概念排除在外的社会生活秩序的概念。正如本书第三章所指出的，在我看来，社会生活秩序原则上可以不依赖规则而存在，我们最好把规则视为普遍的和几乎是无所不在的构建人类生活秩序的手段，而不属于秩序概念本身的组成部分。

我也有必要谈谈本书所定义的社会生活秩序同各种社会法则（social laws）的关系。这里所说的社会法则并不是指规则或者基本的行为准则，而是指科学法则（scientific laws），或者是关于一类社会事件同另一类社会事件之间因果关系的一般命题。人们有时说，社会生活秩序指的就是社会行为符合科学法则的现象。或者更准确地说，有秩序的行为就是事先可以预知的行为，也就是行为符合在过去、现在和将来都适用的法则。我们再次看到一个事实，即这里所界定的秩序概念同行为符合法则（从而可以预测未来的行为）的现象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在一个人们不断追求基本或主要目标的社会情势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个现象，即行为格局是有规律的和可预知的，行为与法则相吻合，这就为预测未来的行为提供了一个基础。再让我们假定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为什

么人们很看重秩序呢？实际上我认为，不管是激进派还是保守派，人们都普遍看重秩序。至少其中的部分答案在于，他们希望人类行为都追求基本或主要的目标，从而具有较大的可预见性。但是，从科学法则或可预见性的角度来界定社会生活秩序的含义，这种做法会导致人们把社会秩序可能出现的后果同社会秩序本身相混淆。根据本书的定义，无秩序的行为也可能符合科学法则，从而使得其未来是可以预见得到的。大量的文献告诉我们，战争、国内冲突和革命具有循环反复的特征，这就说明无秩序的社会行为也可能符合科学法则。

国际秩序

我所说的国际秩序就是追求国家社会或国际社会的基本或主要目标的行为格局。在详细阐述国际秩序概念的含义之前，让我先解释国家(states)、国家体系(a system of states)、国家社会(a society of states)或国际社会(international society)的含义。

国际关系存在的前提是国家的存在，而国家则是拥有政府、对地球表面特定地区拥有主权以及具有一定数量人口的独立政治共同体(communities)。一方面，国家对其领土和国民享有内部主权，也就是说它在其领土内和国民当中享有最高的权威。另一方面，国家享有外部主权，也就说任何国家都不凌驾于其他国家之上，而是对外独立于其他国家。国家主权，包括内部主权和外部主权，都存在着规范和事实两个层面。一方面，国家声称自己在其领土内和国民当中享有最高权威，在其领土之外独立于其他国家。另一方面，国家在不同程度上，实际行使了最高权威和保持自己的独立地位。一个独立政治共同体，如果仅仅声称自己拥有主权（或者其他国家认为该独立政治共同体拥有这个权力），但实际上未能行使这种权力，那么它就不能被视为一个国家。

属于国家范畴的独立政治共同体包括城邦国家，比如古代希腊或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的城邦国家，也包括现代民族国家。在它们当中，有的国家的政府建立在王朝合法性原则的基础上，比如法国革命之前的近代欧洲国家，也有的国家的政府建立在民众或国民合法性原则的基础上，法国革命后的欧洲国家绝大多数属于后一类。有多民族国家，如

19 世纪欧洲的帝国，也有单一民族国家。有的国家领土分散，如西欧的海洋帝国，有的国家则是单一的地理实体。

然而，历史上很多独立政治共同体并不属于国家的范畴。黑暗时代的日耳曼人属于独立政治共同体，但其统治者只对所属民众拥有最高权威，而不对特定领土拥有最高权威。中世纪西方基督教世界里的王国与公国也不能被算作国家，因为它们在其领土内和民众中，并不享有最高权威，也就是说，不享有内部主权。同时，它们由于不能独立于教皇或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之外，所以也不享有外部主权。非洲、澳大利亚和大洋洲的某些地方在欧洲人入侵之前，有一些基于血缘或亲属关系的独立政治共同体，但是它们没有像政府这样的制度。如果从严格的意义上把“国际关系”定义为国家间的关系（relations of states）而非民族间的关系（relations of nations）的话，以上这些实体都处于国际关系范围之外。这些独立政治共同体之间的关系，可以被纳入更为广义的权力关系（relations of powers，国际关系只是其中的一个特别内容）的范畴之内，但不属于严格意义上的国际关系。^①

如果两个或两个以上国家之间有足够的交往，而且一个国家可以对其他国家的决策可产生足够的影响，从而促成某种行为，那么国家体系或国际体系就出现了。从这个意义上说，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国家可以同时存在，但不构成国际体系。比如，在哥伦布到来之前的美洲，存在着独立政治共同体，它们与欧洲的独立政治实体之间并不构成国际体系。又如，中国战国时期（公元前 481 年到公元前 221 年）的独立政治共同体，与同时期存在于希腊和地中海地区的独立政治共同体也不构成国际体系。

但是，当国与国之间进行经常性的交往，而且它们之间的互动足以影响各自的行为时，我们就可以说它们构成了一个体系。国家间的互动 10 可能是直接的，比如两个国家互为邻居，或者两个国家是追求相同目标的竞争对手，或者两个国家是共同事业中的伙伴。国家间的互动也可能是间接的，比如某个国家与第三国的交易对其他国家产生了影响，或者

^① 有关国际关系是权力关系中的特定内容的论述，见 Arthur Lee Burns, *Of Powers and Their Politics: A Critique of Theoretical Approaches* (Englewood Cliffs, N. J.: Prentice-Hall, 1968)。

是某个国家的行为影响了整个国际体系，从而影响了其他国家。举个例子说，尼泊尔与玻利维亚既不是邻国，也不是竞争对手或者一个共同事业中的伙伴（也许它们同属联合国会员国的事实是个例外）。但是，它们由于共同处于国家间的关系链而相互影响。国家间互动关系（国际体系依此而得以界定）的形式可能是合作，也可能是冲突，甚至可能是中立或者对对方的目标漠不关心。互动关系可能产生于政治、战略、经济和社会等各个方面的活动中（如今的国家间互动关系就是这样的），也可能只是存在于一个或两个方面的活动中。正如雷蒙·阿隆提出的有关国际体系的定义所暗示的，国家间互动关系足以使得有关独立政治共同体进行经常性的交往，而且这些国家也可能因此卷入一场大战之中。^①

马丁·怀特在对不同的国家体系进行分类时，把他所说的“国际性国家体系”（international states system）同“宗主国—国家体系”（suzerain-state system）加以区别。^②前者是由本书所定义的主权国家所组成的。而后者，需由一个国家声称自己对其他国家拥有主导权或最高权力，并且实际上拥有这种权力。罗马帝国同其周围未开化国家之间的关系，便是“宗主国—国家体系”的一种表现形式。拜占庭与其弱小邻国、阿巴斯王朝的哈里发帝国与其周围力量较弱的国家以及中华帝国和它的朝贡国之间的关系等等，也都属于这一类型的关系。在马丁·怀特所说的某些“国际性国家体系”中，总有一个国家努力成为主导国或霸权国。比如，在希腊的城邦—国家体系以及后来的希腊化王国体系中，就存在着无休止的争夺霸权的斗争。像中国同其朝贡国所组成的“宗主国—国家体系”与“国际性国家体系”之间的主要区别在于：在前者中，一个国家的霸主地位是长久和不可动摇的，而在后者中，霸主地位总是从一个国家转移到另一个国家，这种地位会不断受到挑战。

从本书的研究视角来看，只有马丁·怀特所说的“国际性国家体系”属于国家体系的范畴。在“宗主国—国家”体系中，比如中国与其朝贡国所构成的体系中，只有一个独立政治共同体即宗主国本身才拥有主

^① Raymond Aron, *Peace and War: A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London: Weidenfeld & Nicolson, 1966) p. 94.

^② 见 Martin Wight, *Systems of States* (Leicester University Press and 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 1977) ch. 1.

权，并不具备国家体系得以存在的一个基本前提条件，即同时存在着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主权国家。

马丁·怀特也区分了“基本的国家体系”和“从属的国家体系”。^①前者由国家组成，后者由国家体系（通常是宗主国—国家体系）构成。他所列举的有关“从属的国家体系”的例子包括：中世纪东派基督教世界、西派基督教世界和阿拔斯王朝的哈里发帝国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阿马纳时期的埃及、赫梯和巴比伦之间的关系。这样的区分可能有助于我们对整个世界政治结构进行宏观的历史分析，今天人们几乎还没有做这样的分析。如果我们仅仅把注意力放在严格意义上的国家体系之上，那么这种区分就没有什么意义了。如果由“从属的国家体系”所组成的体系包含着很多国家，而且这些国家之间有足够的交往和互动，那么这些国家就会一起构成了“基本的国家体系”。另一方面，如果相关的“从属的国家体系”并不包含国家，就像西方基督教世界那样，那么此类体系之间的相互关系只对研究世界政治理论的人来说是有意义的，而对研究国家体系的人来说则是毫无意义的。从本书的研究视角出发，我们只关注“基本的国家体系”。

“国际体系”这个词最近在国际关系研究者当中十分流行，这主要是因为莫顿·卡普兰的著述。^②本书作者和卡普兰一样都使用了这个词。但是，卡普兰的著述试图用体系的概念来解释和预测国际行为，特别是把国际体系视为特定的“行动体系”。^③本书与此不同，我所用的这个词只是指一个特定的国际集合体（international constellation）。

然而，应该指出的是，“国家体系”这个词在今天开始流行之前，¹²已有很长的历史，也有一些不同的含义。好像是普芬道夫在其1675年发表的小册子《论国家体系》（*De systematibus civitatum*）中最早使用了这个词。^④但是，普芬道夫所指的，并不是整个欧洲国家体系，而是该体系中的特定国家群体，这些国家都是主权国家，同时它们又一起组

① Ibid.

② 特别参考他的著作 *System and Process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New York: Wiley, 1957)。

③ 卡普兰把行动体系（a system of action）界定为：“与环境没有关联的一组变量，体现变量间的内在关系和独立变量与外部变量间外在关系的、理想的行为规律”。ibid., p. 4。

④ 我的这个认识得益于马丁·怀特著的 *Systems of States*。

成某个群体 (body), 比如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以后的那些日耳曼国家。虽然 18 世纪的一些作家, 比如卢梭和内特尔布拉德, 用“体系”这个词来指欧洲国家的集合体, 但是只有拿破仑时代的作家, 比如根茨、安西隆和希尔伦, 等等, 才在现代意义上使用了这个词。在那个时候, 法国力量的增长危及了国家体系的生存, 该体系面临着被一个世界帝国所取代的危险, 这些作家努力让人们认识到这个体系的存在和维持其生存的必要性, 他们不只是国家体系的分析家, 而且也是国家体系的同情者或倡导者。在他们的著作中, 最重要的一本是希尔伦所著的《欧洲及其殖民地的政治体系历史手册》(*Handbuch der Geschichte des Europäischen Staatensystems und seiner Kolonien*), 它出版于 1809 年。该书英译本于 1834 年出版的时候, 英语里才开始有了“国家体系”这个词, 该书的译者称这个词“不是地道的英文词汇”。^①

在希尔伦看来, 国家体系不只是本书所说的由相互之间有一些交往与互动关系的国家所构成的一个集合体, 它还包括一组变量与另一组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 这也就是卡普兰所说的“行动体系”。^② 希尔伦把国家体系视为“几个在地理上相邻以及在生活方式、宗教和社会发展程度上相似的国家, 以共同利益为纽带而构成的联盟”。^③ 换句话说, 他认为国家体系包含着共同利益和共同价值观念, 其基础是共同文化或文明。而且, 希尔伦也认识到国家体系是脆弱的, 其成员的行为既可维护, 也可摧毁该体系, 比如马其顿摧毁了希腊城邦国家, 继承了亚历山大帝国的希腊化国家体系随后为罗马所摧毁。的确, 正如希尔伦在该书 13 第一版和第二版序言中所写道的, 拿破仑事实上已经摧毁了欧洲国家体系, 他只是在书写该体系的墓志铭。这种有关国家体系的思想, 同本书所说的国家体系概念有着根本性的区别, 但是它比较接近我所说的国际社会这个概念。

如果一群国家意识到它们具有共同利益和价值观念, 从而组成一个社会, 也就是说, 这些国家认为它们相互之间的关系受到一套共同规则

① 见 A. H. L. Heeren, *A Manual of the History of the Political System of Europe and its Colonies*, Göttingen, 1809 (Oxford: Talboys, 1834) vol. I. p. v.

② 见本书第 9 页注③。

③ Heeren, *Manual*, pp. vii - viii.

的制约，而且它们一起构建共同的制度，那么国家社会（或国际社会）就出现了。如果说今天的国家构成了一个国际社会的话，那么这是因为它们具有某些共同的利益，或许还具有某些共同的价值观念，它们认为自己在相互打交道的时候受到一些规则的制约，必须尊重对方的独立地位，履行业已达成的协议，并且对相互使用武力的行为加以某些限制。与此同时，它们也互相进行合作以构建国际制度，比如国际法、外交机关、普遍的国际组织以及有关战争的惯例与公约等等。

从这个意义上说，国际社会是以国际体系为自己存在的前提条件的，但国际体系可以在国际社会并没有产生的情况下得以存在。换句话说，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国家可能通过相互交往与互动关系影响对方的思想与行为，但并没有意识到它们具有共同利益或价值观念，也不认为自己受到一套共同规则的制约或者为构建共同制度而进行国际合作。比如，土耳其、中国、日本、朝鲜和暹罗在成为欧洲主导下的国际社会成员之前，已经是欧洲主导下的国际体系的组成部分。也就是说，这些国家已经开始同欧洲国家进行交往，在战争和商业中同欧洲国家产生了明显的互动关系，但是它们并没有同欧洲国家一道确认相互间存在着共同的利益或共同的价值观念，不认为各自都受制于一套共同的规则，也不认为双方应该为构建共同制度而进行国际合作。土耳其在16世纪兴起的时候，就已经是欧洲主导下的国际体系中的一员，并且作为该体系的成员参加战争与同盟。但是在此后的300年中，欧洲列强和土耳其都明确否认双方拥有共同的利益或共同的价值观念，而且双方都认为，它们相互之间所达成的协议并没有约束力，它们也没有进行合作以构建把欧洲列强联合在一起的那种共同的制度。只是在1856年《巴黎和约》的签订以及克里米亚战争结束之后，土耳其才被欧洲国家接受为国际社会中的一员，而且它一直到1923年《洛桑条约》的签署之前，并没有在国际社会中取得了完全平等的地位。

同样地，虽然波斯和迦太基与希腊城邦国家同属于一个国际体系，但它们并不是希腊国际社会中的组成部分。也就是说，波斯（从一定程度上说还有迦太基）同希腊城邦国家产生了互动关系，它不管是被视为希腊城邦国家需要联合加以对付的外来威胁源，还是被当作能够干涉希腊城邦之间冲突的一个国家，都是影响希腊城邦国家战略考虑的一个关键因素。但是，希腊人把波斯看做是未开化的国家，认为它与希腊没有

共同的价值观念，希腊的价值观念体现在希腊的语言、泛希腊运动会或者阿波罗神殿协商会议之中。希腊人还认为，波斯不受希腊城邦国家所遵守的限制相互间冲突的规则之约束，不参加希腊城邦国家相互合作的制度形式——邻邦同盟（*amphictyoniae*），也没有加入“领事”（*proxenoi*）外交制度之中。

从16世纪到19世纪末，在欧洲国家同非欧洲国家的遭遇过程中，所有这些国家都是一个国际体系中的成员，它们相互之间在贸易、战争、媾和以及结盟等等方面，可能存在相互沟通、互派特使或信使以及签署协定等关系，但它们并不同属于一个国际社会。然而，这些形式的互动关系本身并不能表明一个国际社会的存在。国家之间的相互沟通、交换使节和签订协议，而没有共同的利益或共同的价值观念，以保证交往的实质性和长期不变的前景。也没有任何指导交往如何进行的规则的观念，没有有关各方在其继续生存利害相关的制度框架内合作的企图。西班牙同阿兹特克和印加帝国进行谈判，乔治三世派马嘎尔尼勋爵
15（Lord Macartney）去北京，维多利亚女王的代表同毛利酋长（Maori chieftans）、索科托苏丹（the Sultan of Sokoto）或者布干达的国王（the Kabaka of Buganda）签署协议等等，都不表明双方在互动中共同形成了有关国际社会的观念，具有相同的权利与义务。

我们并非总是很容易确定一个国际体系是否具有国际社会的上述特征：有的国际体系同时也是国际社会，而有的国际体系则显然不属于国际社会。我们常遇到这样的情况：国家间有关共同利益的观念是初步的和不确定的；国家对共同规则的认识是含糊不清的，以至于让人怀疑这些规则是否可以被称为规则；有关外交机关和限制战争的共同制度是不甚明确或处于萌芽状态的。我们很难回答诸如现代国际社会“始于何时”或者“它的地理范围有多大”这样的问题。

但是，某些国际体系显然也是国际社会。典型的例子包括：古希腊的城邦国家体系；从亚历山大帝国解体到罗马征服之间的这段时期内希腊化王国所构成的国际体系；战国时期中国的国际体系；古代印度的国家体系以及兴起于欧洲、如今遍及全世界的现代国家体系。

这些历史上出现过的国际社会具有一个共同特征，即它们都建立在一种共同文化或文明的基础之上，或者至少是建立在共同文明的某些要素的基础之上，这些要素包括：共同的语言；共同的认识论与世界观；

共同的宗教；共同的道德观；共同的审美观或艺术传统。这些共同文明的要素，通过两种方式促使国际社会得以形成。一方面，它们可以使得国家间的相互沟通和相互理解更为容易一些，从而促进共同规则和制度的产生与发展。另一方面，它们可以增强国家的共同利益的观念，从而使得它们具有共同的价值观念，并接受共同的规则和制度。本书在后面还将论述这个问题，作者认为 20 世纪的全球性国际社会同 16、17 世纪的基督教国际社会或者 18、19 世纪的欧洲国际社会有所不同，前者缺少一种共同的文化或文明（见第十三章）。 16

前面已经解释了有关国家、国家体系和国家社会的概念，现在让我们回到本节所提出的一个命题，即国际秩序指的是国际行为的格局或布局，它追求国家社会基本、主要或普遍的目标。那么，这些目标到底是什么呢？

首先，是维持国家体系和国家社会本身的生存。现代国家不管相互之间存在着什么样的分歧，它们都被团结在一种信念之下，即认为它们是世界政治中的主要行为体和权利与义务的主要承受者。国家社会努力使自己一直成为占据主导地位的世界政治组合（universal political organization）形式。国家社会的持续生存所面临的挑战，有时来自某个主导国家，如哈布斯堡帝国、路易十四时期的法国、拿破仑时期的法国、希特勒德国，也许还可以再加上 1945 年以后的美国，它们都有能力推翻国家体系和国家社会，并使之变成一个世界帝国。挑战也可以来自非国家行为体，它们试图剥夺国家作为世界政治主要行为体和权利与义务首要承受者的地位。那些超国家（Supra-state）行为体，例如 16、17 世纪的罗马教皇和神圣罗马帝国，还有 20 世纪的联合国（人们特别会想到联合国在 1960~1961 年刚果危机中所扮演的暴力角色），也对国家社会构成了威胁。在世界政治中起作用的某个国家内部的“次国家（Sub-state）”行为体，或者跨越领土边界的“跨国家（Trans-state）”行为体，也可以对国家在世界政治中的特殊地位或享有特殊地位的权力构成挑战。在现代国际社会的历史上，由宗教改革运动、法国革命和俄国革命所掀起的民众团结起来以推进革命或抵制革命的浪潮，便是重要的例子。

其次，是维护国家的独立或外部主权。所有国家都认为，国家参加国家社会的目的，主要是希望以此获得他国对自己独立地位的承认，特 17

别是获得它们对自己对所辖民众和领土享有的最高统治权的承认。这样做的主要代价是，每个国家必须承认其他国家具有相同的独立与主权地位。

国际社会事实上认为，维护国家独立的目标从属于维护国家社会本身独立的目标。这表现在，大国把自己看做是国际社会的庇护人，在塑造国际社会的过程中扮演着主要角色（见第九章）。因此，国际社会时常容许某个或某些国家丧失独立地位，比如从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的签订到1815年维也纳会议期间，一些欧洲的小国被大国以“补偿”和“均势”的名义瓜分和兼并。同样地，至少是在那些自视为国际社会庇护人的大国看来，国际社会也可以允许或鼓励通过建立势力范围、缓冲区或中立国等方式，限制小国的主权或独立地位。也就是说，它认为维护特定国家的独立地位应该服从于维持体系本身的生存这个目标。

第三，是以和平为目标。这里指的不是和平主义者或研究和平的理论家所梦想的那种普遍与永久的和平。历史经验告诉我们，普遍与永久的和平是不可能实现的，它不是国际社会应该认真追求的目标。我所说的和平是指国际社会成员之间没有爆发战争的状态，没有战争是国家间相互关系的正常状态，只有在特殊情况下和根据普遍接受的原则，这种正常状态才可以被破坏。

从这个意义上说，国际社会认为和平应该服从于维持国家体系本身的生存这个目标，因为它认为国家享有从事战争的权力。同时，国际社会也把和平看做是服从于维护特定国家的主权或独立地位之目标，因为它认为国家有权出于自卫或维护其他权利而从事战争。《联合国宪章》所使用的“和平与安全”的提法，就说明和平的目标是服从于上述其他目标的。在国际政治中，安全不仅仅指是“平安”（safety），平安既是客观的，也是主观的。国家所努力确保和维护的东西，不仅仅是和平，还包括国家的独立地位和确保此种地位的前提条件——国家社会的持续生存。正如我们已经提到过的，国家准备为了实现这些目标，而不惜使用武力或武力威胁。《联合国宪章》把“和平”与“安全”两个词放在一起，正是表明了一种判断，即安全的目标可能与和平的目标相冲突，在这种情况下，后者不一定占有优先的地位。

第四，就是本章一开始提出的国际社会所追求的一些基本或主要的

目标：对会导致死亡或身体伤害的暴力行为加以限制；信守承诺；依据财产规则使得所有权具有稳定性。

国际社会努力通过一些方式来限制暴力的使用。国家在国际社会中相互进行合作，以确保自己垄断使用暴力的权力，不让其他集团拥有此种权力。国家也同意对自己使用暴力的权力施加一定的限制，至少是同意不杀害对方的使节和信使，否则的话，国家之间的相互沟通就不可能得以进行下去。此外，它们也同意，从事战争要出于“正义”（just）的目的，或出于符合共同规则的“正义”的目的。国家也一直遵循这样一个原则，即战争要在一定限度内进行，这也就是“有限战争”的原则（the *temperamenta belli*）。

信守承诺的目标体现在“条约必须遵守”（*pacta sunt servanda*）这个原则上。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就如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国家只有在协议的基础上才可以进行相互合作，而协议只有在得到相互承诺的基础上，才能够在社会生活中发挥自己的作用。国际社会一方面迎合变革的要求和容忍违反条约的行为，另一方面又根据“情势不变”（*rebus sic stantibus*）的学说维护“条约必须遵守”的原则。

在国际社会中，稳定的所有权不只是体现为国家相互承认对方的财产权，更重要的是，它体现为国家相互承认对方的主权地位，承认对方19的管辖范围。事实上，国家主权的思想源于历史上有关特定领地和民众属于统治者的财产或世袭家产的观念。

上面便是现代国际社会和其他类型的国际社会所追求的基本和主要的目标。但是本书并不认为，它们包括了国际社会基本和主要目标的所有内涵，或者说这些目标不能通过其他方式得以实现。我也没有说这些目标应该被看做是正当行为的基础，从而使国际行为具有合法性。还应该指出的是，我们目前还只是在讨论“静态”的国际秩序，还没有涉及国际秩序的“动力”，我们只是阐述了国际秩序概念的含义，没有论述国际秩序在历史上得以形成和发展的过程。

世界秩序

我所说的世界秩序，指的是支撑整个人类社会生活的基本或主要的

目标的人类活动的格局或布局。国际秩序是国家间的秩序，而国家则是人的集合体，当然，聚合在一起的人不一定组成一个国家。而且人还可以通过不同的方式组成国家。有关国家间秩序的讨论包含一个更为深层次和意义较为深远的问题，那就是整个人类大社会的秩序问题。

在 19 世纪以前的人类历史中，并不存在着一个遍及全世界的单一政治体系。教会法（*canon law*）或自然法（*natural law*）的鼓吹者们所提及的人类大社会，实际上是一个想象中的社会，它只存在于上帝的眼里或者自然法的原则中，而不是一个事实上存在的政治体系。在 19 世纪下半叶以前，世界秩序仅仅是给世界某些地区带来秩序的各种政治体系的总和。

然而，从 19 世纪末、20 世纪初开始，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真正全球性的单一政治体系。全球范围的秩序不再只是产生地区秩序的各种政治体系的总和，也可称其为世界政治体系的产物。1900 年的世界秩序，虽然还是欧美及其海外属地、奥斯曼帝国、中华帝国和日本帝国、维持从撒哈拉到中亚地区独立地位的可汗帝国和苏丹帝国、未被欧洲影响所摧毁的非洲和澳洲原始政治体系等地区内部秩序的总和，但是它也是把上述地区连成一体并在世界范围内发挥作用的一种政治体系的产物。

第一个全球性政治体系的表现形式是全球性国家体系（*a global system of states*）。欧洲国家体系扩展到全世界并且演变为一个全球性的国家体系，这是导致世界各大洲政治体系互动关系的产生和我们所说的世界政治体系的形成之最主要的原因。这个过程的第一阶段，即欧洲国家扩张、兼并或统治世界其他地区的过程，开始于 15 世纪葡萄牙人的航海探险，终止于 19 世纪非洲被瓜分。第二个阶段在时间上同第一个阶段有些重叠，它始于美国革命，终止于现代非洲和亚洲反对殖民统治的革命，曾经被兼并或统治的地区摆脱了欧洲的控制，成为国际社会的成员。毫无疑问，使世界各个地区连成一体的力量不只是国家，它还包括探险家、商人、移民、传教士和雇佣兵，国家体系的扩展仅仅是社会、经济联系的范围扩大的一个方面。然而，这些事态发展所导致的政治结构却只是一个全球体系和国家社会。

虽然今天的世界政治体系是以国家体系或主要以国家体系的形式（我们在下面还将谈到，一个世界政治体系正在出现，而国家体系只是

其中的一部分)存在着的,但是从理论上说,世界秩序还可以通过其他世界政治组合形式得以实现。人们经常提出的一个问题是:其他世界政治组合形式是否更不利于世界秩序的维持?其他世界政治组合形式在人类历史上曾经出现过,但是它们不具有世界性。在人类历史长河中,国家体系并非是必然的产物。而且,我们有理由认为,今后可能会出现不同于国家体系的新的世界政治组合形式。在本书的第三部分,我们将探讨现存的国家体系是否会被新的世界政治组合形式所取代,新的世界政治组合形式是否更有助于维持世界秩序这样的问题。

我们需要在这里强调的是,本书所说的世界秩序同国际秩序有些不一样。整个人类的秩序比国家间的秩序范围更广、更重要、更基本,而且我认为前者在道义上优先于后者。

世界秩序概念比国际秩序概念的含义更广,这是因为当我们考察世界秩序的时候,我们所要关注的对象不仅包括国家间的秩序,而且还包括了国家内部的国内秩序以及涵盖了国家体系的世界政治体系的秩序。

世界秩序比国际秩序更重要、更基本,这是由于人类大社会的终极单位(ultimate units)不是国家,也不是民族、部族、帝国、阶级或政党,而是个人,个人是永存的、不会消失的,而人类的这种或那种组合形式则并非如此。现在是国际关系的时代,然而今后不管全球政治或社会结构是什么样的,世界秩序问题一直都会存在着。

最后,世界秩序在道义上优先于国际秩序。这涉及世界秩序的价值及其在人类价值中所处的地位问题,我在前面一直避免谈及这个问题,因为本书的第四章将就此进行讨论。然而,我需要在这里指出,如果对世界政治秩序做价值判断的话,那么我们所说的秩序就是指全人类的秩序,而不是指国际社会内部的秩序,我们必须把它当作具有重大价值的东西。如果说国际秩序具有价值的话,那么这可能是因为此种秩序有助于实现人类社会的秩序这个目标。

我们已经阐明了本书中所说的世界政治秩序的含义。我们现在需要回答的一个问题是：世界政治中存在着秩序吗？

或许今后有一天，世界政治秩序会表现为对世界社会或者全人类大社会的社会生活基本目标之追求。国家体系能够在多大程度上让位于这样一个社会，或者国家体系是否应该让位于这样一个社会呢？这便是本书后面将要讨论的问题。但是，我们还不能说，全人类大社会已经成为我们所要关注的东西了。在目前阶段，我们仍然习惯于认为，世界政治秩序包括国内秩序或者国家内部的秩序，以及国际秩序或者国家间的秩序。

毫无疑问，在某些国家内部存在着程度很高的国内秩序或者内政秩序。然而，人们通常认为，国际秩序只是一种愿望，它在现实世界中是不存在的，国际关系的历史只是无秩序或者争斗的历史。在很多人看来，国际秩序并不是以前就有的现象，它仅仅是未来可能出现的、理想的，为我们所期望的，或者应努力促其实现的国际关系状态。在那些研究国际秩序的人看来，国际秩序只是一个有关未来世界的构想，它体现了萨利（Sully）、克鲁斯（Cruce）、圣·皮埃尔（St. Pierre）以及其他和睦共处论者或者和平理论家的思想。

本书所持观点与此相反，作为当今研究的出发点，认为秩序是国际关系历史记录的组成部分；特殊地说来，认为现代国家已经形成并且还将继续形成不仅是一个国家体系，而且也是一个国际社会。为了论证这一观点，我将首先说明，在整个现代国家体系的历史中都贯穿有国际社会的思想，它反映在哲学家、政论家以及国家当权者的言论中。其次，我将努力证明在国际关系的现实中这个思想得到，至少是部分地得到了反映。我们从现实的国际行为

中可以找到国际社会思想的重要渊源。第三,我将指出,国际社会的思想作为国家实际行为的指南,是有其局限性的,而且根据国际社会的思想所建立起来的秩序也具有不确定和不完善的性质。

国际社会的思想

在现代国家体系的历史中,存在着三个相互竞争的思想传统:霍布斯主义或现实主义传统,它把国际政治视为战争状态;康德主义或世界主义(universalist)传统,它认为有一个潜在的人类共同体在国际政治中发挥着作用;格劳秀斯主义或者国际主义传统,它认为国际政治产生于一个国际社会之中。^①在这里,我将论述格劳秀斯主义或国际主义国际社会思想的要旨,及其同霍布斯主义或现实主义传统、康德主义或世界主义传统的区别。这三个思想传统分别代表着三种不同的有关国际政治性质的认识,各自提出一整套有关国际行为的主张。

霍布斯主义传统把国际关系描述为所有人反对所有人的战争状态即国家之间相互争斗的竞技场。从霍布斯主义者的视角来看,国际关系只是国家间的冲突,它类似于纯粹的分配游戏或者零和博弈(zero-sum games):国家的利益是相互排斥的。根据霍布斯主义者的观点,战争是最为典型的国际行为。因此,和平只是上一次战争后的恢复期和下一次战争的准备期。

霍布斯主义者的国际行为规则是,在同其他国家的关系中,国家可以 24 自由地追求自己的目的,不受任何道义或法律的限制。在这种观点看来,道义和法律的思想只在社会的背景中起作用,而国际生活不受任何社会的束缚。如果国家在国际政治中追求道义或法律目标,那么这只可能是一国自己的道义目标或法律目标。或者如马基雅维利所说的那样,国家是在一个道义和法律的真空中制定和实施对外政策,或者如黑格尔

^① 这种三分法来自马丁·怀特。这集中反映在其“国际关系中的西方价值观”一文中,见 *Diplomatic Investigations*, ed. Herbert Butterfield and Martin Wight (London: Allen & Unwin, 1967)。我的文章“马丁·怀特与国际关系理论——第二次马丁·怀特纪念讲座”进一步讨论了这种分类,见 *British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 II, no. 2 (1976)。

及其思想继承者所说的那样，国家只是自我声称要在对外政策中采取道义行为。根据霍布斯主义思想传统，小心谨慎或权宜之计可能是限定或限制国家行为的惟一规则或原则。因此，国家可能出于权宜之计而遵守协定，否则的话，则可能违背协定。

康德主义或世界主义传统属于另一个极端，认为国际政治的基本性质不是霍布斯主义者所说的国家间的冲突，而是跨越国界的社会纽带，它们把作为国家臣民或者公民的个人联系在一起。从康德主义者的视角来看，国际关系的主题只是在表面上呈现为国家间的关系，实质上是人类共同体中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这个人类共同体是潜在的，而不是现实的，一旦它变成现实，国家体系就将消亡。^①

世界主义者认为，在全人类共同体中，人们具有共同的利益，国际政治并不是如霍布斯主义者所说的纯粹的分配游戏或零和博弈，而完全是合作的游戏或非零和博弈。虽然国家统治集团之间存在着利益冲突，但这种冲突只是现存国家体系的表面与暂时的现象，全人类的利益应该是一致的。用康德的观点来分析，最典型的国际行为就是超越国家边界的意识形态冲突，它把人类社会划分为两个营垒——人类共同体的维护者和破坏者，具有真正信仰的人和持异端邪说的人，解放者和被压迫者。

- 25 康德主义者或世界主义者在国际道义的认识上，与霍布斯主义者持相反的观点。他们认为，在国际关系领域中存在着限制国家行为的道义规则，但这些规则所鼓励的并不是国家间的共处与合作，而是推翻国家体系，并用世界社会取而代之。康德主义者指出，人类共同体不仅仅是国际政治中的一个核心现实，它也是最高的道义目标。根据这个最高的道义目标的要求，我们可以无视那些维系国家间共处与交往关系的规则。除非出于权宜之计，我们不可相信异端邪说者的话，在上帝的选民和下地狱的人之间、解放者与被压迫者之间，是不会产生相互接受主权与独立权力这个问题的。

所谓格劳秀斯主义或国际主义传统，介于现实主义传统与世界主义

^① 在康德自己的论述中，显然存在着含糊不清的地方，他在《世界主义观点和世界历史观念》（1784）中所表述的世界主义思想同在《永久和平》（1795）中所持的观点有点不一致，康德在后一本书中主张建立“共和”国家的联盟。

传统之间。格劳秀斯主义者是从国家社会或国际社会的角度来描述国际政治的。^① 格劳秀斯主义者的观点同霍布斯主义者相对立,前者认为,国家并不是如角斗士那样在一个竞技场里争斗,它们之间的相互冲突受到了共同规则与制度的限制。但是,格劳秀斯主义者和康德主义者或者世界主义者不同,他们接受了霍布斯主义者的一个基本论点,即主权者或国家是国际政治中的主要实体,国际社会最直接的成员是国家,而不是个人。在格劳秀斯主义者看来,国际政治既不是国家间完全的利益对立,也不是纯粹的利益一致,它就类似一种博弈,一方面是分配性的,另一方面是生产性的。格劳秀斯主义者认为,从总体上说,最典型的国际行为并不是国家间的战争,也不是超越国家边界的横向冲突,而是贸易,或者更笼统地说,是国家之间的经济和社会交往。

格劳秀斯主义者提出,所有国家在相互交往中,都应该受到它们所组成的社会的规则和制度的约束。格劳秀斯主义者与霍布斯主义者不同,前者认为国家不仅受到谨慎小心或权宜之计规则的约束,也受到道义和法律原则的制约。然而,与世界主义者相对立的,格劳秀斯主义者认为,这些规则所鼓励的并不是推翻国家体系和用世界人类共同体取而代之,而是在国家社会中实现共处与合作的目标。 26

这些传统各自体现了不同的国际政治思想,它们相互之间没有什么很多的关联。各种思想模式在不同的时期里有不同的表述,与不同的问题和人们的关注点相联系。本书不想在这里深入探讨每个思想传统内部的联系与差别。我们在这里只是提到这么一个事实,即格劳秀斯主义者的国际社会观念一直包含于有关国家体系的思想之中,而且一般说来,它在过去三四个世纪里有所演变和发展。

基督教国际社会

在 15、16 和 17 世纪,当西方基督教世界的政治组合形式尚处于瓦

^① 我本人是在如下两个意义上使用“格劳秀斯主义”这个词的:(1)本书在这里把它视为关于国家社会的一个广义的概念;(2)用来描述概念的社会连带主义形式,它把格劳秀斯本人同 20 世纪的新格劳秀斯主义者连成一体,以反对法泰尔及后来的实证主义者所鼓吹的多元国际社会概念。见“The Grotian Conception of International Society,” in *Diplomatic Investigations*。

解过程、现代国家尚处于形成过程之中的时候，三种描述新的国际政治和倡导相关国际行为方式的思想模式开始初露端倪。一方面，马基雅维利、培根以及霍布斯等思想家认为，随着“基督教国家”（*respublica*）的消亡，新兴的国家会在社会和道德的真空中相互对抗。另一方面，罗马教皇和帝制的作家则极力维护教皇和皇帝的权威。还有一些思想家提出和上述两种学说相对立的观点，它们根据自然法的传统，声称君主们在当地享有最高的权威，独立于外部权威之外，它们的行为只受制于共同的利益和共同的规则。正如吉尔克所指出的：

27

中世纪的世界君主国的理念，同自然法学派思想家的思想毫不相干。它促使神圣罗马帝国的政论家们，不断发表那种陈腐的、虚幻的有关世界主权（*imperium mundi*）的言论，但也导致了新鲜的、有意义的国际社会的思想的萌芽……一方面，有的人倾向于使国际社会变成一个世界国家，并且根据共和政体的原则建立起一个超国家的权威；另一方面，那些坚决倡导主权原则的人，则完全反对任何一种把国家连为一体的自然共同体的思想。然而，这个坚守阵地和决定国际法前途的理论，始终坚持这么一个观点，即国家之间存在着自然法的纽带，虽然这个纽带并没有导致整体对部分的统治，但是它无论如何包含着一系列相互承认的社会权利与义务。^①

这个时期的自然法思想家包括维多利亚、苏亚雷斯、金泰利、格劳秀斯和普芬多夫，他们所设想的国际社会具有如下最基本的特征。首先，国际社会是建立在基督教价值观念基础之上的。毫无疑问，所有这些思想家都强调自然法思想是最重要的，它阐明了生活在任何地方的人所享有的权利与义务，这显然意味着基督教徒和其他人之间存在着某种社会纽带。正如维多利亚所暗示的，普遍的善意法则是联结美洲大陆西班牙人和印第安人的纽带。格劳秀斯指出，自然法是国际法的基本渊源，即使上帝并不存在，它也依然是有效力的。这就意味着，国际社会可能最终与基督教的原则相分离。天主教国家和新教国家寻求共处的基

^① Otto Gierke, *Natural Law and the Theory of Society 1500 to 1800*, trans. Ernest Barker (Boston: Beacon Press, 1957) p. 85.

本原则,无疑会导致世俗原则的产生。

但是,在这些国际社会理论家中,没有人相信基督教大国之间的关系与基督教大国同其他国家的关系一样,都是建立在相同的基础之上的。甚至是在格劳秀斯看来,在由自然法原则所维系的全人类这个较大的圆圈内,存在着基督教世界这个较小的圆圈,后者所遵循的是唯意志的神权法、世代相传的万民法(*ius gentium*)惯例与规则、教会法与罗马法。在维多利亚和苏亚雷斯这两位西班牙学者看来,自然法和神权法是密不可分的。在这个时期所签署的条约中总是包含着宗教的誓词。这个时候的基督教社会对外部大国,特别是奥斯曼帝国,怀有很强烈的格格不入的看法,认为奥斯曼帝国对基督教社会构成了真实和现实的威胁。 28

其次,这个时期的理论家没有明确告诉我们谁是国际社会的成员,也没有阐明成为会员的原则或者标准。在国家概念作为所有王国、公国、侯国以及共和国共同的政治形式而产生之前,一个主要或者完全由被称为“国家”的政治实体所组成的社会是不可能形成的。在维多利亚、苏亚雷斯,甚至是格劳秀斯的著述中,受国际法所约束的只是那些被称作“国家”(*civitates*)、“公国”(*principes*)、“王国”(*regni*)、“公民国家”(*gentes*)以及“共和国”(*republicae*)的政治实体。在这个时期,自然法学说是所有国际主义者提出和用以制约君主和共同体的规则之依据,它把个人而非人的集合体当作国家以及权利与义务的承受者。

第三,在这个时期流行的国际社会思想中,自然法具有头等重要的地位,它凌驾于今天所说的实证国际法之上,决定着约束基督教世界的君主和共同体的规则。在格劳秀斯看来,世代相传的罗马万民法规则和现存的条约法,比如中世纪形成的商业和海事法,只是对自然法的补充。君主和民众在相互交往中,之所以受到规则的约束,主要是由于他们都属于人类,因而都受制于自然法。早期的国际主义者强调自然法的做法,反映了他们的一种认识,即现存的、从西方基督教世界社会所继承下来的实证法与新的政治现实是不相适应的。他们希望通过祈求自然法,使得国际法摆脱现存惯例的枷锁,产生与新的现实相吻合的规则。

第四,这个时期所形成的国际社会思想所阐明的共处规则是很不成熟的,建立在有关世界社会的假设基础之上。自然法的理论家们没有完

29 全从罗马词汇万民法的含糊不清的语义中摆脱出来，这个词的现代含义是国际法或者国家间的法律，其最原始的含义是国家所共有的法律。

这体现在他们努力确立限制国际社会成员暴力行为的基本规则上。所有早期国际主义者的观点与托马斯主义传统相吻合，他们坚持认为，只有那些拥有正当权威的行为体，才可出于正义的目的，使用正当的手段从事战争。然而，他们的思想仅仅是接近了近代的学说，后者认为只有公共权威才可以从事战争，而惟有国家才能被算作是这样的权威。即便是格劳秀斯也不反对未经本国政府允准的对外国人的战争行为（private war），事实上，他在《海洋自由》（1609）一书中所提出的海上自由学说，正是来源于他本人对荷属东印度公司好战行为的辩护。他也没有明确提出这样一种观点，即有关正义行为和正当手段的规则不仅保护交战中的正义一方，也保护交战的另外一方。格劳秀斯在阐述限制战争的方式和阻止战争地理空间扩大的必要性时，深受世界主义或者社会连带主义思想的影响，后者认为正义一方的行为不应该受到任何的限制。除了金泰利之外，所有早期的国际主义者都很难接受如下一个观念，即把国家间的战争视为国际社会的一个制度，不仅是从“主观上”说，还是从客观上说，交战双方都可能具有正当的理由。

世界主义者的思想得到继承下来的事实，也从早期的国际主义者遵循协议神圣不可违背的规则中体现出来。他们都维护“条约必须遵守”（pacta sunt servanda）的原则，但是，他们参照私法中的契约条例构想出了条约。因此这个时期的人们普遍认为，条约只对签署条约的君主具有约束力，君主的继承人可以不受条约的限制；如果条约是在胁迫的条件下签署的，那么它同私人契约一样，并不具有效力；条约可以不顾任何情势不变的条款（rebus sic stantibus），依然保持着效力。具有长远眼光的金泰利对这些观点提出了质疑，格劳秀斯后来借鉴了他的思想，提出了一个重要思想，把条约视为特殊类型的契约。但即使是这些思想家，也还在某种程度上把条约与私人契约加以类比。

同样地，由于受世界主义者思想的影响，这些思想家未能明确提出
30 作为国际社会成员属性的主权概念，或者明确提出相互承认主权是共处契约中的基本内容。布丹所提出的主权概念（《共和六书》*Six livres de Republique*，1576）只是在很长一段时候以后才对国际思想界产生了影响。这样的思想痕迹还体现在苏亚雷斯的“理想共同体”（perfect com-

munity) 概念、格劳秀斯的“主权至上”(summum imperium) 观点或者人们对罗马法中有关所有权(dominium) 或者私有财产概念的使用上面。其中, 所有权或私有财产的概念意味着领土和人民是统治者的世袭财产, 君主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把它们用于物物交换。然而, 那个时期的思想家们还没有提出, 独立于外部权威之外、对自己的领土和人民实行全面的控制, 是所有国家的固有权力。

第五, 早期国际主义者提出的国际社会思想, 没有包括一整套来源于国家间相互合作的制度。一方面, 现存的“国际”制度或者“超国家”制度是那些颓废的帝国和教皇的统治制度, 而不是源于国家间相互合作或者国家意志的制度。另一方面, 国家之间相互合作的传统还没有被认为可以取代这些制度。

因此, 早期的国际社会理论家们, 都为后来被称为“国际法”的这个国家社会的核心制度的发展, 做出了自己的贡献。但是, 正如我们在前面所了解到的, 他们并不是主要根据国家的实际行为来确定国家间的法律, 他们对自然法和神权法的关注, 必然妨碍国际法发展成为一个有别于道德哲学和神学的、独立的学科。

外交制度实际上产生于这个时期。15 世纪起源于意大利的常驻使节制度, 在 16 世纪的时候已经流行于阿尔卑斯山以北的地区, 并传播到彼得大帝时期的俄国。该时期的理论家分析了这个新制度及其相关的行为规则。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金泰利在 1584 年发表的《论使节制度》(*De Legationibus*), 该书最早对使节不可侵犯的原则进行了系统的论述。格劳秀斯也提出了使节“治外法权”的概念。但是他们没有分析导致外交代表制度得以发挥作用的国家之间的合作, 也没有讨论这个时期已经出现的一些政府首脑之间的“高峰会议”, 二者都是国家社会存在 31 的部分表现。

在这些理论家中, 也没有人论述均势概念, 或者在阐述国际社会思想的时候提到这个概念。事实上的均势制度, 即有意识地制止任何国家获得主导地位的企图, 开始产生于反对菲利普二世的联盟之中, 而且维持均势是 1648 年《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的一个不言自明的目标, 该条约标志着哈布斯堡王朝建立起世界性统治的企图彻底破灭。然而, 只是在很长时间以后, 也就是说直到反对路易十四斗争的时候, 均势才在国际理论中被确认为国际社会的一个制度, 而且较早时期为该理论发展做

出贡献的各个作者（比如 Guicciardini, Commynes, Overbury, Rohan），属于独立的历史和政治评论领域中的学派，他们的观点并没有被吸收到国际社会的自然法理论之中。

不仅如此，这些理论家们也没有提出有关大国及其在国际社会中的作用之思想。他们确实认为统治者是分等级的，这样的等级地位取决走向没落的世界社会的地位与惯例，而不是从相对权力（它是 Rohan 和 Bolingbroke 等著名作者讨论这个时期大国关系的依据）或者国家社会赋予某些大国的特殊权力与义务的角度加以考虑的。

欧洲国际社会

在 18 和 19 世纪时候，西方基督教世界的痕迹已经基本上从国际政治的理论与实践消失，国家经过从王朝国家或专制主义国家到民族国家或民众国家的发展，其地位已经完全得到确立，一整套现代国家间的行为惯例业已形成，并且得到人们的研究，国际社会的思想具有一种不同的表现形式。随着自然法让位于实证国际法，政治理论家和法学家的思想开始与历史学家的思想相统一起来，后者努力记录国家体系以及推动该体系运行的政治家之行为方式。我们在讨论这个历史时期国际社会思想的时候，既要关注政治理论家和法学家的思想，也要关注历史学家的思想，这样的学者包括宾刻舒克、沃尔夫（Wolff）、法泰尔、摩塞尔（J. J. Moser）、伯克、冯·马尔滕斯（von Martens）、根茨、安西隆、希尔伦、兰克、卡斯尔雷（Castlereagh）、菲利莫尔、格拉德斯通（Gladstone）以及索尔兹伯里（Salisbury）。

从价值观念或文化看，这个时期的理论家所论述的国际社会，属于欧洲国际社会，而不是基督教国际社会。“欧洲”一词已经开始被使用，例如它出现于下述著作的书名中：阿贝·德·马伯里（Abbe de Mably）在 18 世纪 40 年代发表的《欧洲公法》（Droit public de l'Europe），J.J. 摩塞尔在 18 世纪 50 年代发表的《最新欧洲万国法研究》（Versuch des neuesten Europäischen Völkerrechts）。伯克在 18 世纪 90 年代指责法

国革命政府处死国王的行为违反了“欧洲公法”。^①

伴随着欧洲特色的国家社会思想的形成,产生了有关欧洲与其外部世界存在着文化差异的观念:欧洲列强在相互交往中所遵循的行为准则,不适用于它们与其他较为弱小的国家之间的关系。这种文化差异的观念,正如我们前面所提到过的,已经存在于基督教国际社会的时期,而且也存在于希腊城邦国家的认识之中,希腊城邦国家认为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有别于它们同波斯以及迦太基之间的关系。但是,基督教国际社会思想的排外性,受到了自然法学说的抑制,因为自然法学说声称任何地方的人都具有相同的权利和义务。然而在欧洲国际社会时期里,自然法思想的影响力已经走向衰落,从而导致此种抑制作用的减弱。到19世纪的时候,实证法学派的正统国际法学说是,国际社会就是欧洲社会,非欧洲国家只有在符合欧洲人所定的文明标准之后,才能被允许加入其中。土耳其是第一个通过这种“考试”的国家,根据1856年《巴黎条约》第8条,她被允许加入“公法和欧洲一致”(the public law and concert of Europe)。

18和19世纪的理论家所阐述的国际社会思想,在有关哪些集团和实体为国家社会的成员这个问题上,克服了早期思想家认识模糊不清的弱点,明确提出了一个原则,即国际社会是一个由国家所组成的社会。但是,也有人对此原则加以限定,正如韦斯特莱克所指出的,虽然国家 33 是国际社会的直接成员,但个人却是国际社会的终极成员。法泰尔干脆把“万国法”解释为“关于国家的权利与相应义务的学问”。^② 根据所有国际社会的成员均属于被称为“国家”的特定政治实体、不符合这个标准的实体则不是国际社会的成员这种认识,我们可以推导出这个时期的国际社会思想所具有的其他基本要点:所有成员都具有相同的基本权利,成员之间相互承担义务,国际社会的规则与制度产生于成员的意志,像东方的王国、伊斯兰世界的酋长国以及非洲的部族等等那样的政治实体则应该被排除在国际社会之外。

^① 见“Third Letter on the Proposals for Peace with the Regicide Directory of France,” in *The Works of the Right Honourable Edmund Burke*, ed. John C. Nimmo (London: Bohn's British Classics, 1887)。

^② E. de Vattel, *The Law of Nations* (1758), Introduction, translated by Carnegie Institute (1916) p. 3.

在美国和法国革命之前，这些国家基本上都属于世袭的君主制国家，而且马丁·怀特所说的“国际合法性原则”就是王朝的原则：也就是说，到底谁能成为国际社会的合格成员，对领土或民众的主权如何从一个政府转移到另外一个政府，以及如何规定国家的继承等等问题，都是由王朝原则所决定的。在美国和法国革命之后，曾占主导地位的“国际合法性原则”已不再是王朝原则，它让位于民族或大众原则：也就是说，人们普遍认为，这类问题应该根据民族或人民的权利，而不是根据君王的权利，加以解决。^① 通过王室婚姻来获取领土的方式，已经被全民公决的方式所取代，世袭原则已经让位于民族自决原则。国际合法性的民族或大众原则对实际事态发展的影响，并不比早些时候的王朝原则或君主统治原则要多，但这些原则确实是行为合法性的依据。

- 34 18 和 19 世纪的国际社会理论家们开始根据实证国际法，而不是自然法，寻找约束国家行为的规则。更笼统地说，他们所关注的并不是有关国家应该如何行为的抽象理论，而是那些日益增多的习惯法与条约法。他们可以援引近代的例子来替代苏亚雷斯和格劳秀斯著述中所使用的古代或中世纪的例子。有关国家体系以及大国兴衰的历史著述，特别是拿破仑战争后德国人的著述，是新的政治原理和学说的源泉。

这个时期的理论家们在阐述共处规则的时候，可以不受从中世纪继承下来的世界主义或社会连带主义思想的束缚，而且能够关注无政府社会的特殊性质。“万国法”（law of nations, droit des gens, Volkerrecht）这个词开始同“自然法”完全分离，而在过去这两个词是密不可分的。“万国法”明确指的是国家间的法律，而不是国家所共有的法律。边沁在 1789 年发表的《道义与法制原则导论》一书中，使用了“国际法”（international law）一词，从此“国际法”取代了“万国法”（law of nations），它标志着这种转变过程的结束。

因此，这个时期所确立的限制暴力行为的规则，不同于早期自然法学派的相应观点，前者明确表明，只有国家才具有在国际政治中使用暴力的合法权利。这个时期的理论家则认为，战争对当事双方来说可能都是正义的行为。我们从中可以推导出一个论点，即战争仅仅是一种政治

^① Martin Wight, "International Legitimacy,"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vol. IV, no. 1 (May 1972).

冲突,正义问题应该被排除在国际法之外,国际社会无力解决这个问题。因此,这些理论家所提出的限制战争的规则,对交战双方都给予了同等的保护。宾刻舒克和法泰尔所确认的中立原则,即限制战争地理范围的扩大,要求对当事双方采取不偏不倚的态度,它同格劳秀斯的学说是相对立的,后者认为必须支持正义的一方。

于是,这个时期的理论家在面对“条约必须遵守”这个规则的时候,完全可以不用把条约同私人契约相类比,他们可以确定一个政府所签署的条约对其继承者具有约束力,条约即使是在胁迫的情况下签订的,也是具有效力的。不仅如此,在19世纪的时候,最早由金泰利提出的、条约只有在情势没有改变的条件下才具有效力的这个国际法原则,开始被普遍认可,而且人们也广泛接受另外一个论点,即应该由各个当事方来确定情势是否改变。有的人认为,这个原则会导致国际社会陷于无法无天的境地,但是在19世纪的实证主义者看来,它指明了一条既可以保证条约在历史进程中具有生命力、又考虑到变革力量的途径。

同样地,这个时期的理论家可以确定主权是所有国家的属性,相互承认主权是维持国家体系内共处局面的一个基本原则。他们也能够从中推导出诸如互不干涉、国家相互平等和尊重各自的基本权利与国家的国内管辖权等原则。在这个时期的某些法学家看来,主权观念同有关“国家的自然权利”以及维护自己生存权利的学说是密不可分的,这实际上是对“国际社会”思想的否定。然而,这种有关主权是否为国际法规则所赋予的权利之思想,前后并不一致。

最后,在18和19世纪,人们认为国际社会具体体现在某些制度上面,它们反映了成员国之间的相互合作。国际法被视为一套特别的规则,它来源于现代国家的合作,应该成为有别于哲学和神学的独立学科。国际法也被认为应同适用于跨越边界事务的国际私法有所区别,所以它在19世纪的时候就有了“国际公法”的名称。卡里尔雷斯以及其他外交理论家的著述阐述了外交制度在国际社会中的作用,认为维也纳会议确认了外交制度的作用,该会议的最后议定书也做了相应的规定,使之与国家主权平等的原则相统一。维持均势被看做是整个国际社会应当自觉追求的目标;标志着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结束的《乌得勒支条约》(1713年)提出了维持均势的目标,维持均势的原则被吸收进了以

- 36 法泰尔的著作《万国法》(1758)为代表的主流国际法思想之中,并导致一批历史和政治巨著在拿破仑时期问世。人们普遍认为,维持均势的原则是国际社会赖以生存的前提,一些人认为它具有法律效力。例如,菲利莫尔在其著作《国际法评论》(*Commentaries Upon International Law*, 1854-61)中声称,出于维持均势目的而进行的战争或干涉行为是合法的。与此相类似的是,兰克在其著名的文章中所论述的“大国”概念,以及有关大国特殊权利与义务的提法,表述了一种将国家按权力大小划分等级的思想,以此取代旧的按世袭地位或者惯例划分等级的观念。一国地位的高低取决于该国的相对权力和国际社会的意志,该思想正式反映在作为维也纳会议解决方案的“欧洲一致”观念之中。

世界性的国际社会

在20世纪,国际社会的思想如同在16和17世纪一样,受到了挑战。一方面,两次世界大战以及国际社会向欧洲以外地区的扩展,增强了霍布斯主义或现实主义国际政治思想的影响力。另一方面,康德主义者或者世界主义者,也由于如下的事态发展而深受鼓舞:人们努力超越国家体系,以便从本世纪的冲突与混乱的困境中摆脱出来;在俄国与中国爆发了革命,它们导致了共产主义与反对共产主义的全球性跨国联合学说的广为流行。我们或许可以说,20世纪的国际社会思想更接近于国家体系初期的国际社会思想,而不那么像18和19世纪流行的那种国际社会的思想。

- 20世纪的国际社会不再被认为只是欧洲的国际社会,而是被视为全球范围的或世界范围的国际社会。19世纪80年代的苏格兰自然法学家詹姆斯·洛里默,在其著述中表达了当时的正统思想,即把人类分为文明的人、未开化的人以及野蛮的人三类。欧洲和美洲国家属于第一类,它们是国际社会的正式成员。亚洲的独立国家,如土耳其、波斯、暹罗以及中国等等,属于第二类,它们是国际社会的准成员。其他地方属于第三类,它们虽然有权获得“自然或人类的承认”,但是处于国际
- 37

社会的范围之外。^① 我们有必要顺便在这里提一下，洛里默的分法实际上同当今社会科学家的看法是类似的，后者把人类分为现代社会、传统社会以及原始社会。

今天，非欧洲国家在国际社会中已经占绝大多数，联合国成员几乎包括了世界上的所有国家，人们基本上已经摈弃了有关国际社会必须以某种特定文化或文明为基础的观念。即便是这种观念的一个表现，即《国际法院规约》把文明国家所共有的法律列为国际法的渊源之一，也已经处于很尴尬的境地。然而，我们应当记住，如果说当今的国际社会有一个文化基础的话，那么它指的并不是真正的全球文化，而是所谓的具有“现代性”的文化。如果我们提出什么是具有现代性的文化这个问题，那么这是很难回答的，除非我们说它指的就是占主导地位的西方大国的文化。（本书第十三章将进一步讨论这个问题。）

另外，只有国家才是国际社会的成员，这是法泰尔时代不容易质疑的一个观点，它克服了格劳秀斯时代人们相关认识的模糊性与不准确性，但是持这种认识的人在 20 世纪已经开始从原先的立场上有所后退，不那么深信不疑了。人们普遍认为，从法律和道义上说，今天的国家同国际组织、各种超越国界的非国家行为体以及个人（体现在纽伦堡和东京战争罪行法庭以及《世界人权宣言》上）一样，都是国际社会中的权利与义务的承受者。虽然人们对于这些不同的法律与道义行为体何者更为重要，或者它们相互之间存在着什么样的关系等问题，并没有一致的认识，但是法泰尔有关国际社会只是由国家所组成的思想，已经开始受到了很多人的批评。

20 世纪的国际社会理论，也偏离了 18 和 19 世纪法律和历史实证主义的思路，它所关注的对象不再是作为国际行为规范渊源的现行惯例，³⁸ 而是自然法原则或者某些自然法原则的当代表现形式。国际社会思想家在对国际关系进行政治和法律分析的时候，主要依据的并不是国家间现实的合作行为，而是国家应该遵循的行为准则，比如《国际联盟盟约》、《凯洛格—白里安公约》以及《联合国宪章》所阐明的那些原则。

与此同时，世界主义者或社会连带主义者有关共处规则产生方式的

^① James Lorimer, *The Institutes of the Law of Nations* (Edinburgh, 1883), vol. I, pp. 101 - 103.

论点，重新开始有了市场。人们再次倾向于把战争划分为正义和非正义的战争，并且试图抑制“侵略性战争”的爆发，认为不应该对国家在战争中所使用的手段加以限制。同样地，《国际联盟盟约》和《联合国宪章》所包含的“集体安全”原则也表明，中立国家对交战双方应该采取不偏不倚的态度这个原则也受到了否定。

在 20 世纪，人们强调改革与完善国际社会，这导致国际联盟、联合国以及其他普遍性的国际组织，被视为国际社会的主要制度，而其他那些在维持国际秩序中发挥至关重要作用的制度则遭到冷落。于是，出现了反对均势思想的威尔逊主义学说，批评外交制度并主张以国际管理（international administration）取而代之的论调，以及重新采取格劳秀斯时代盛行的那种把国际法与国际道义或国际改良（international improvement）不加区分的立场。

国际社会的现实

然而，上述国际社会的思想与现实相吻合吗？继承了格劳秀斯主义传统的哲学家、国际法学家以及历史学家的理论是否反映了政治家的思想？假如政治家口头上说自己重视国际社会及其规则，那么这是否意味着国际社会及其规则影响了政治家们的决策呢？如果国际社会的思想在 39 国际形势相对缓和的时期（比如 18 和 19 世纪的较长时期内）确实起到某些作用，那么它在宗教战争、法国革命和拿破仑战争、本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中，是否已经销声匿迹了呢？比如说，希特勒德国和斯大林俄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进行生死搏斗的时候，这两个国家是否认为自己受到共同规则的制约，并且应该为建立共同的制度而进行合作呢？假如基督教国际体系以及后来存在于 16 至 19 世纪的欧洲国际体系属于国际社会的话，那么随着这种体系的扩展和具有广泛的世界性，联结这个社会的纽带会不会由于承受过大的张力而最后断裂呢？我们应该把当今的国际政治视为一个国际体系，还是一个国际社会呢？

社会要素

我认为,虽然社会要素只是现代国际体系中的一种要素,而且人们有时很难确定它是否存在,但是它的确一直存在于现代国际体系之中,今天依然如此。事实上,霍布斯主义、康德主义以及格劳秀斯主义传统分别表述了现代国际体系的三种要素:国家之间的战争与争斗;超越国家边界的跨国联合与冲突;国家之间的合作与有规范的交往。在国家体系的不同发展时期,在不同的地理区域内,以及在不同国家和政治家的政策之中,某一种要素可能会处于主导地位,左右着其他两种要素。

于是,有人可能会说,在17世纪末和18世纪的贸易与殖民战争(主要当事国是荷兰、法国与英国)中,与海上权力相联系的贸易垄断权和对殖民地的政治控制权,是有关国家所追求的目标,战争状态是主导性的要素。在《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签署之前的,在标志着国家体系第一个阶段的宗教战争中,在欧洲人受到法国革命和拿破仑战争强烈震撼的时候,以及在当代共产主义大国和反共产主义的强国之间的意识形态较量中,跨国联合与冲突的要素是最主要的,这不仅体现在新教徒团 40 体实现革命性的跨国联合、民主或共和的力量支持法国革命以及共产国际诞生等上面,也表现在耶稣会、国际正统主义以及反共的杜勒斯主义的反革命联合上面。在19世纪的欧洲,在拿破仑战争后的革命主义与正统主义的较量时期,以及在本世纪导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大国冲突之中,国际社会的要素可能是占主导地位的。

国际社会的要素一直存在于现代国际体系之中。这是因为,有关国家的共同利益、国家遵循的共同规则以及国家所创立的共同制度之观念一直都在起作用。绝大多数国家在绝大多数的时候,都尊重国际社会的共处原则,比如相互尊重主权、协定必须得到遵守以及限制使用暴力的规则。同样地,绝大多数国家在绝大多数的时候,参与如下共同制度的创建:国际法的形式与程序,外交代表制度,承认大国的特殊地位,以及开始产生于19世纪的普遍性国际功能性组织,例如国际联盟和联合国。

“国际社会”思想有着现实的基础,虽然它有时难以被确定,但始终是存在着。导致整个国际体系卷入漩涡的大规模战争的爆发,影响了

这种思想的可信性，促使思想家和政治家转向霍布斯主义者所提出的观点和开出的药方，但随后，世界又进入了一个和平时期。国家间和政治派别间的意识形态冲突有时会导致斗争的双方摒弃国际社会的思想，而肯定康德主义者的观点，但随后又会出现一个国际社会思想复兴的和解时期。

甚至，即使是在大规模战争或者意识形态冲突的高潮时期，虽然处于纷争中的国家可能表示摒弃国际社会的思想，认为自己和对方不处于一个共同的社会框架之内，但是国际社会的思想并没有因此销声匿迹，它继续影响着国家的行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当中的同盟国与轴心国，都不把对方视为一个共同的国际社会的成员，而且不采取合作的行动以创建共同的制度。但是，我们不能说国际社会的思想在那个时期已经不能够影响国际关系中的国家行为了。同盟国家在相互之间的交往以及同中立国的关系中，继续遵循国际社会的一般规则，德国、意大利和日本也是如此。同盟国和轴心国都坚持认为，对方作为国际社会的成员，应该遵守有关战俘的日内瓦公约，尊重敌方的战俘。实际上，同盟国和轴心国基本上都遵守了这样的公约。

与此类似的是，在冷战最激烈的时期，美国和苏联总是称对方为异端邪说者或者无赖国家（heretics or outcasts），否认对方和自己同属于一个国际社会。然而，它们并没有断绝外交关系，没有否认对方拥有主权，没有否定双方应该遵循共同的国际法，也没有主张把联合国分裂成两个敌对的组织。不管是在西方阵营，还是在共产主义阵营，都有人主张双方应该达成妥协，认为双方具有共同的利益，并且重申了宗教战争时期用以促进和解的原则，即“统治一个地方，也就控制了当地的宗教”（*cuijuss regio, ejus religio*）。因此，即使国际政治处于霍布斯主义者所说的战争状态，或者康德主义者所说的跨国联合状态，国际社会思想也依然是国际政治现实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在战争为和平所取代、意识形态冲突让位于缓和之后，为国际社会的重建奠定了基础。

比较一下国际社会中的国家间关系和不包含任何社会要素的独立政治共同体之间的关系，有助于我们更清楚地认识国际社会要素得以持续存在下来的现实。成吉思汗时代的蒙古侵略者同蒙古人所征服的亚洲及欧洲人民之间的关系，没有受到一个双方都遵循的、用于处理相互关系的共同规范的制约。成吉思汗的征服行为的确有蒙古人自己的道义思想

依据：成吉思汗相信自己获得了统治世界的上天旨意，认为世界上的人不管是否已经处于蒙古人实际统治之下，都是蒙古帝国理所当然的臣民，那些不向蒙古帝国皇帝屈服的人民就是在反抗神授的秩序，向他们发动战争是蒙古人的权利与义务。^①然而，这并不是那些被蒙古人征服、在某些情况下被蒙古人灭绝的人民的思维观念。

西班牙征服者面对阿兹特克人和印加人的时候也是如此，他们相互之间缺少共同的规则与制度。西班牙人曾经就他们对印第安人负有什么义务这个问题发生过争论：征服印第安人的依据到底是教皇的世界领有权（*imperium mundi*），基督教君王传播信仰的义务，还是因为印第安人没有遵守友善的规则？^②然而，维多利亚等学者所提出的印第安人所享有的权利，只是来自西班牙人所承认的规则体系，而不是来自印第安人自己也认可的规则体系。西班牙人和印第安人可以承认双方都属于人类，并且进行谈判和达成协议。但是，这些交往行为是在缺少一个共同的规则与制度框架的背景下进行的。

欧洲与伊斯兰世界漫长的交往史进一步说明了这个问题。只要现代国际社会被等同于基督教国际社会或者欧洲国际社会，那么伊斯兰世界就一直被看做是一个未开化的区域，基督教君主就负有联合起来对抗伊斯兰世界的义务。当然，他们实际上并不总是这么做。与此相对应的是，在伊斯兰教思想中，世界被划分为服从真主意志的地区（*dar - al - Islam*）和尚未皈依的战争地区（*dar - al - Harb*）。与非我族类的国家共处是可能的，可以互派使节、签订条约和缔结同盟，上述关系受制于某些规则，但这些规则只对穆斯林具有约束力。伊斯兰国家和非我族类的国家不属于一个共同的社会，后者的存在只是暂时的，伊斯兰教国家和非我族类的国家的共处，只是前者最后同化后者这个过程中的一个阶段而已。 43

或许有人会说，虽然敌对共同体具有相同国际社会理念的个案，同敌对共同体不具有相同国际社会理念的例子的确不一样，但是这并没有

① 见 Igor de Rachewiltz, "Some Remarks on the Ideological Foundations of Chingis Khan's Empire", *Papers on Far Eastern History*, 7 (March 1973)。

② 例如，参见 Francisco de Victoria, "De Indis et de Jure Belli Relectiones," trans. J. P. Bate, in *The Classics of International Law*, ed. E. Nys (Washington: Carnegie Institute, 1917)。

什么实际意义，现代国际体系中的国家只是在口头上谈论共同的国际社会而已。因此，正如格劳秀斯所指出的，对于一些声称自己拥有与他国交战的正当理由的国家来说，这个正当的理由只是借口而已，它们的真正动机是别的东西。格劳秀斯把战争的理由分为两种，一种是“正当的”（justifiable）理由，即坚信自己是在从事正义的事业，另外一种只是“劝导性的”（persuasive）的理由，即把从事正义的事业当作借口。^①

但问题在于，那种需要为发动战争寻找借口的国际体系，与不需要为发动战争寻找借口的国际体系是否没有根本性的区别呢？至少那些声称自己具有正当理由的国家，即便它们在决策的时候并没有考虑到这个理由，它们对国际秩序所构成的威胁，比没有声称自己有正当理由的国家对国际秩序所构成的威胁要小一些。声称自己有正当理由的国家，即使它自己根本就不相信这个理由，至少承认自己必须利用其他国家所接受的规则，来向它们解释自己的行为。当然，人们对于规则及其在具体情况中的运用有不同的认识，但这些规则不是可以随意被改变的，它们限制了那些制造战争借口的国家之政策选择范围。而且，制造借口本身也意味着，这个肇事国家通过违背共同遵循的规则和发动战争所导致的暴力行动，其危害程度相对来说要轻一些。如果一个国家没有任何理由就发动战争，或者只是根据自己的信念来解释战争行为，比如蒙古人认为自己获得了上天的旨意，或者西班牙征服者相信教皇的世界领有权，那么这个举动就是公然蔑视了其他国家以及国家间相互关系的行为规范。

格劳秀斯认为，虽然国际社会受到了只是以“劝导性的”而非“正当的”理由从事战争的国家之威胁，但是那些甚至连“劝导性的”理由都没有而发动战争的国家，对国际社会所构成的威胁更大。他把没有任何理由而发动的战争称为“野蛮人的战争”。^② 法泰尔把那些不以任何借口发动战争的人称为“没有人性的魔鬼”，国家应该团结起来制止他

^① Grotius, *De Jure Belli ac Pacis*, trans. Francis W. Kelsey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25) II, xxii, 2.

^② Ibid.

们的行为。^①

无政府社会

人们经常认为，无政府，意即没有政府或统治的事实，否定了国际社会的存在。毫无疑问，主权国家不同于生活在主权国家内的个人，它们不受制于一个共同的政府，在这个意义上说，存在着戈兹沃西·洛斯·迪金森所说的“国际无政府状态”。^② 现代人在讨论国际关系的时候，一再提到这么一个论点，即无政府状态导致国家无法一起组成一个国际社会，只有当它们同意服从于一个共同权威的时候，这样的目标才可以实现。

这种论点的主要理论依据，是把国际社会同国内社会相类比。也就是说，把国内社会中的个人同国家相类比，并由此认为，国家如同个人一样，用霍布斯的话来说，只有当它们慑服于一个共同的权力时，才能够组成一个有序的社会。^③ 就霍布斯本人及其思想的继承者而言，这样的类比就等于说，国家或者君主如同个人一样，如果没有共同的政府，那么就处于自然状态或者战争状态之中。霍布斯本人或者霍布斯主义学派的其他思想家绝不会认为，国家间的社会契约会导致国际无政府状态的终结。与此相对应的是，主张建立世界政府的人走得更远，他们不仅赞同自然状态的思想，而且认为国家间的社会契约会导致在世界范围内建立起类似于国家内部秩序的那种世界秩序。

认为国家在国际无政府状态中不可能组成一个社会的观点有三个弱点。第一个弱点是，现代国际体系与霍布斯所说的自然状态并不完全一 45 样。霍布斯描述君主之间的关系，只是为了解释和说明在人们中间建立起政府的必要性。在论述人们在无政府情势中如何生存的时候，霍布斯提到了内战的经验、某些美洲部落的生活以及国际关系中的事实：

① Vattel, *Law of Nations*, III, iii, 34.

② 见 *The European Anarchy* (London: Allen & Unwin, 1916) 以及 *The International Anarchy* (London: Allen & Unwin, 1926)。

③ 参考我写的“Society and Anarchy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 *Diplomatic Investigations*. 本书的这个部分包含了这篇文章的一些内容。

就具体的个人说来，人人相互为战的状态虽然在任何时候都从来没有存在过；然而在所有的时代中，国王和最高主权者由于具有独立地位，始终是相互猜忌的，并保持着斗剑的状态和姿势。他们的武器指向对方，他们的目光互相注视；也就是说，他们在国土边境上筑碉堡、派边防部队并架设枪炮；还不断派间谍到邻国刺探，而这就是战争的姿态。^①

根据霍布斯的论述，缺少一个共同权力使大家慑服的情势具有三个基本特征。首先，没有工业、农业、航海业、贸易，或者人类生活其他方面的改善，因为人们把自己的力量与创造才能，都用于抵御别人的威胁、维护自身安全上。其次，法律和道义规则是不存在的：“是与非以及公正与不公正的观念在这儿都不存在……这样一种状况还是下面情况产生的结果，那便是没有财产，没有统治权，没有‘你的’、‘我的’之分；每一个人能得到手的东西，在他能保住的时期内便是他的。”^②最后，自然状态就是战争状态：战争“不应该被理解为实际的战斗，而是在整个没有和平保障时期中众所周知的意向”，它是“每一个人反对每一个人的战争”。^③

上述第一个特征在国际无政府状态中是找不到的。缺少一个世界政府，并不妨碍工业、贸易的发展和人类生活其他方面的改善。实际上，国家并不会因为抵御别人的威胁、维护自身的安全而耗尽自己的力量与创造才能，其居民的生活也并非表现为孤独、贫困、卑劣、野蛮以及短命；他们不一定把资源都用于战争和军事中，以至于破坏自己的经济基础。相反，国家的武装力量通过抵御外来的进攻和维护国内的秩序，为国内的经济的发展创造了条件。缺少一个世界政府与国际经济相互依存是不相抵触的。

不仅如此，霍布斯所说的自然状态的第二个特征，即缺少是与非的观念以及缺少财产权的观念，显然也是同现代国际关系不相吻合的。在

① Thomas Hobbes, *Leviathan* (Everyman's Library, 1953) ch. 13, p. 65. (这段译文引自(英)霍布斯著：《利维坦》，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96页——译者注。)

② Ibid., p. 66. (这段译文引自《利维坦》中译本第96页——译者注。)

③ Ibid., p. 64.

发端于欧洲并且后来扩展到全世界的国家体系中，国际行为中的是与非观念一直具有重要的地位。

在霍布斯所说的自然状态的三个特征中，惟有第三个特征，即战争状态以及每个国家敌视他国的意向，可能存在于现代国际关系之中。主权国家，即使是在和平时期，无疑也具有同他国交战的意向，因为它们都在准备战争，把战争视为自己始终面对着一个选择。

第二个弱点是，它是建立在有关个人和团体之间而非国家之间的秩序条件这一错误的假定基础之上的。惧怕一个最高政府，显然并不是现代国家内部秩序的惟一条件。如果我们不考虑诸如相互利益、共同观念或者普遍意志以及习惯或者惰性等等因素，那么就无法充分理解为什么人们可以在现代国家中建立起社会秩序了。

既然如此，为了比较国际关系和那种想象中的人与人之间在订立契约前所处的自然状态，我们或许不应该求助于霍布斯的观点，而应该求助于洛克的思想。洛克所说的自然状态是一个没有政府的社会，实际上这很类似于国际社会。现代国际社会如同在洛克所说的自然状态一样，缺少一个能够解释和执行法律的中央权威。因此，社会中的每个成员必须自我做出判断和实施自己的决定。因为在这样一个社会中，每个成员都是自己行为的裁决人，那些试图执行法律的人不一定总是能够占上风，此种社会中的正义标准具有赤裸裸和不确定的性质。然而，这样一个初级形式的社会生活同一个缺少任何社会生活要素的环境相比较，还是具有很大的区别的。 47

第三个弱点是，它忽视了把国际环境与国内环境加以类比这种做法的局限性。国家毕竟与个人大不相同。即使我们可以说政府是维持人与人之间的秩序的必要条件，我们也有充分的理由认为，国家之间的无政府状态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以容忍的，而个人之间的无政府状态则是不可容忍的。

我们在前面已经提到，国家不同于霍布斯所说的自然状态中的个人，前者没有把自己的能量都耗费在追求安全上、从而使国内居民处于悲惨的境地。霍布斯本人认识到了这一点，他在论述拥有主权的最高统治者总是保持一个“战争姿态”后进一步指出，“但由于他们用这种办法维持了臣民的产业，所以便没有产生伴随特定个人的自由行动而出

现的那种悲惨状况。”^①那些认识到自己国家与其他国家处于自然状态中的最高统治者，在自己的领土范围之内为生活的改善和发展创造了条件。

不仅如此，国家也不像个人那么容易遭受暴力攻击。斯宾诺沙回应了霍布斯观点，他指出“在自然状态中，两个国家相互之间的关系与两个个人相互之间的关系是一样的”，同时他还补充说，“但有一个例外，即国家可以捍卫自身安全、避免被他国所奴役，而处于自然状态中的个人则没有这种能力。因为个人每天都要睡觉，经常为身体或精神上的疾病所困扰，而且最终会老死；此外，他总要遇到各种麻烦，而国家可以抵御这些麻烦和保障自己的安全。”^②处于自然状态中的个人不能使自己免遭暴力攻击，这种攻击会导致个人的突然死亡。然而，一群人通过组成国家，可以使得自己获得了抵御外来威胁的手段。一个国家对另外一个国家的军事进攻，它所带来的后果不同于一个人杀害另外一个人。因为单单一个行为就可能导致某个人突然死去，而人一旦死去，是不能复活的。然而，战争只是在有的时候才会导致被征服的人民走向肉体上的灭绝。

- 48 现代历史证实了克劳塞维茨的观点，即“从结局来看，战争从来就不是绝对的”，战败可能是“一个暂时的、可以医治的创伤”。^③不仅如此，过去的战争即使在理论上可以导致交战一方或者双方的民众遭受肉体上的毁灭，但单靠一个行动的瞬间打击是不可能达到这个目标的。克劳塞维茨认为，战争不是一次性和瞬间性的打击，而总是由一连串个别的行为所组成的。这就告诉我们，独立政治共同体之间的暴力不同于个人之间的暴力。^④只是在核武器和其他军事新技术发展的背景之下，我们才可以提出这样的问题：现在的战争，用克劳塞维茨的话来说，是否既不能“在结局上是绝对的”，又不能“表现为一次性和瞬间性的打击”呢？而且，是否当今国家所面临的暴力是否因此不带有与总是带给个人

① Ibid., p. 65.

② Spinoza, *Tractatus Politicus*, III, ii, in *The Political Works of Spinoza*, ed. A. G. Wernham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58) p. 293.

③ Carl von Clausewitz, *On War*, trans. Jolles (Modern Library Edition, 1943) pt I, ch. I, p. 8.

④ Ibid. pp. 7-8.

的后果相同样的后果?

有关国家不同于个人在暴力攻击面前那么脆弱的观点,得到另外一个事实的证明;尽管国家易于受到有形的攻击,但这对不同国家来说并不是都一样的。霍布斯依据下述论点来阐述自然状态:“自然使得人在身体和脑力上都是平等的,(于是)最弱的人有足够的力量杀死最强的人。”^①在霍布斯看来,正是由于每个人的脆弱程度是相同的,所以无政府状态是不能容忍的。但是在现代国际社会,大国和小国始终是不一样的。大国在小国的进攻面前所表现出来的脆弱程度,比小国在面对大国进攻时所表现出来的脆弱程度要小。只是由于核武器扩散到小国,以及世界上可能出现很多的核国家,人们才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是否会在国际关系中出现“最弱的国家有足够的力量消灭最强大的国家”这样的情况呢?

因此,从个人无法建立起一个没有政府的社会,来推论君主或者国家无法在无政府状态中建立起一个国际社会,这样的看法是错误的,这不仅是因为在缺少政府的情况下个人关系实际上存在着某种程度的秩序,而且也由于国家不同于个人,更有能力建立起一个无政府的社会。把国际环境与国内环境加以类比仅仅是一种类比而已;国家可以建立起一个没有政府的社会这个事实,反映了国家所处的环境之特殊性。

49

国际社会的局限性

我们从前面的论述中可以看出,现代国际体系也是一个国际社会,至少国际社会一直是在国际体系中起作用的一个要素;国际无政府状态的事实并不能否定国际社会的存在。然而,我们也有必要了解无政府的国际社会的局限性。

由于国际社会只是在现代国际政治中起作用的三个基本要素之一,它总是同另外两个要素,即战争状态和跨国联合或冲突,相互进行竞争,因此从国际社会为国际政治中的惟一或者主导性的要素这个视角来解释国际事件,肯定是错误的做法。一些人就犯了这样的错误,他们在

^① Hobbes, *Leviathan*, p. 63.

讲话或者著述中，把欧洲一致、国际联盟或者联合国视为相关时期国际政治中的首要因素；认为国际法的作用只是把国家维系在一起，没有看到国际法也是国家追求利益的工具和实现跨国性目标的手段；声称维持均势只是维护国家体系的方式，不是某些大国扩大势力范围的手段；只把大国描述为“负有重大责任的国家”或者“绝对不可缺少的国家”，没有看到大国也是很大的掠夺者；只把战争视为违背法律或者捍卫法律的行为，不认为战争也可以被用来实现特定国家或跨国集团的利益。国际社会的要素无疑是真实的，但战争状态和跨国性的团结与分裂也是客观的事实，过于强调第一个要素，或者否定第二和第三个要素，都是错误的做法。

不仅如此，我们不能因为国际社会导致在国际政治中产生某些秩序的事实，就对国际社会的存在产生骄傲自满的态度，或者认为人们针对国际社会秩序所发表的不满言论都是毫无根据的。现代国际社会秩序是
50 不稳定和不完善的。证明现代国际社会已经导致了某种程度的秩序，并不意味着其他形式的国际结构不可能更有效地导致世界政治秩序的产生。

我们已经解释了世界政治秩序的含义，并且阐明在现代国家体系中存在着一定程度上的世界政治秩序。我们下面将要探讨的一个问题是：世界政治秩序是如何得以维持的？ 51

社会生活秩序的维持

上文已经论述，在所有的社会中，秩序是一种旨在追求社会生活基本或主要目标的行为方式。从这个意义上说，秩序是由下面几个因素所维系的：在追求那些基本或主要目标的过程中所形成的共同利益观念；规定行为模式的规则；使这些规则发挥效力的制度。

在任何一个社会中，秩序的维系都需要有一个前提，即在其成员间，至少是在那些政治上很活跃的成员间，形成了追求基本或主要目标的共同利益观念。于是，人类面对暴力的时候所表现出来的脆弱性以及使用暴力的倾向性，促使人们形成了有关限制暴力的共同利益观念。人们在物质需求上的相互依赖，促使他们产生了尊重协议的共同利益观念。财富有限度的丰富性和人类有限度的利他主义倾向，导致人们承认他们在确保稳定的占有权这个问题上具有共同的利益。这种共同利益观念的产生，可能是畏惧心理的产物，也可能是理性的深思熟虑的结果，即认为人们在追求社会生活的基本目标或主要目标时应该受到同等的限制。在某些情况下，它体现为有关个人或团体相互认同，把对方的利益视为应该被追求的目标，而不认为对方的利益只是实现 52 目标的手段；也就是说，它可能体现了一种共同的价值观念，而不是共同的利益观念。

这种在追求社会生活基本目标过程中所形成的

共同利益观念可能是模糊和初步的，而且其本身并不能明确告诉我们哪些行为同这些目标相一致，哪些行为与这些目标不相吻合。但是，规则可以起到这样的作用。规则就是要求或者准许某一类人或者团体以特定方式行为的一般指令性原则（general imperative principles）。任何社会秩序的维持，不仅需要有一个有关建立起秩序或避免无秩序状态的共同利益观念，而且需要有规定秩序行为的规则。因此，反对使用暴力的规则确保安全目标得以实现；协定必须得到遵守的规则确保了协议的稳定性；公共或私有财产权必须得到尊重的规则有助于实现稳定的占有权。这些规则的表现形式可能是法律、道义、习惯或仪式，也可能只是操作程序（operating procedures）或“游戏规则”。

原则上说，社会生活秩序的建立可能并不需要借助于规则。比如，人们可能因为条件的制约而采取有秩序的行为方式，从而仅仅通过条件反射作用，使自己的行为与社会的基本目标相一致。在这种情况下，规定人们行为方式的规则并不是不可缺少的。而且，在很小的社会（比如家庭或者氏族）中，享有最高权威的人士可能并不需要什么规则，因为他只需要自己单独发布命令，要求或者允许某些人干某些事情，而避免借助一般的指令性原则。因此，我们有必要区分社会生活秩序和有助于秩序的建立与维持的规则。正如本书前面所提到的，从遵守同社会生活基本目标相一致的行为规则这个角度来定义社会生活秩序，有可能把导致秩序的一般原因误认为秩序本身。（见第一章）

我们也有必要注意马克思主义者的一个观点，即规则并不是社会所有成员追求共同利益的工具，而是在社会中居统治地位或主导地位的成员追求自我特殊利益的手段。这是一个极具洞察力的论点，它阐述了所有规则的社会功能，尤其是指明了法律规则的功能。显然，规则制定者的特殊利益与价值观念渗透在所有的社会规则体系当中。由于在制定规则的过程中，社会成员影响力的大小是不一样的，因此历史上任何一个规则体系，都是主要服务于在社会中居统治地位或者主导地位的成员的利益，而不是主要服务于社会其他成员的利益。

虽然我们在研究规则在国际社会以及其他社会中的功能时，有必要注意到这个极具洞察力的论点，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研究规则的社会功能就没有意义。社会主导成员的特殊利益体现在制定规则的方式上。因此，有关限制使用暴力、确保协议得到履行以及财产所有权等等规则

中，都反映了那些社会主导成员的意志。然而，人们普遍认为，对暴力的使用必须实施某些限制，协议必须得到执行，以及确立某种形式的财产权规则等等，并非只是体现某些社会成员的特殊利益，也符合了所有社会成员的共同利益。那些试图改变现存秩序的社会成员的目标，并不是要建立一个不限制暴力的使用、不要求协定必须得到遵守以及没有财产权的社会，而是要改变这些规则的地位，使之不再服务于现存社会主导成员的特殊利益。

但是，规则本身只是头脑建构的产物。它们只是在具有效力的时候，才在社会生活中发挥自己的作用。规则具有效力，这并非表现为它们在任何情势中都得到所有相关的人或者团体的遵守；相反，有效力的规则有时并不被人们所遵守，而且如果实际的行为和规定的行为必须完全相一致的话，那么规则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但是，一个规则要在社会中具有效力，它就必须某种程度上得到遵守，而且为规则所适用的所有人（甚至是那些执意要违背规则的人）所顾及。

从这个意义上说，规则不仅仅是头脑建构的产物，它也具有社会效力，其部分原因在于社会中存在着具有下述功能的制度。下面所列出的制度的功能可能并不全面，而且它们可能并非在任何情况下都是确保规则具有效力的至关重要的因素。然而，下面这些东西是必须具备的： 54

(1) 规则必须是制定出来的，也就是说它们必须被加以制订和公布，以作为社会的规范。

(2) 规则必须被加以传达，即它们必须被加以说明和宣传，使得规则所适用的人群了解其内容。

(3) 规则必须得到实施，在规则必须得到遵守的情势中，需要采取相关的行为。比如，在现代国家中禁止或者限制使用武力的规则，其效力依赖于国家采取措施以建立和维持警察、监狱、法院以及司法部门等等机关。

(4) 规则必须得到解释？有关规则的含义、两个相互冲突的规则之间的关系以及是否存在着违反规则的情况等等问题必须加以确定，从而使得规则能够指导实际的行为。

(5) 如果要使得规则具有效力，那么就应该最大限度地得到强制性的执行，违背规则的行为要受到某种惩罚，惩罚的形式可能是胁迫、

制裁，或者只是受到同样规则约束的其他人或者团体也采取拒绝遵守该规则的行为。

(6) 要使规则所适用的个人或者团体承认规则具有合法性。规则必须具有合法性，这样社会成员才会承认其效力，或者接受规则所包含的价值观念。如果规则具有合法性，那么其效力就不需要依赖于制裁或者强制性措施。

(7) 规则必须能够适应需求和环境的变化——必须要有废除或者修改规则并且以新规则取而代之的途径。

(8) 规则必须得到“保护”，避免社会事态的发展妨碍规则有效运行。在任何一个社会中，有效规则的维护所依赖的条件，并不是规则本身所能够确保的，它们会导致整个规则体系的瓦解。^①

现代国家秩序

55 在现代国家中，存在着能够使基本的社会规则具有效力的一个制度或者一套相互关联的制度，这就是政府。政府与现代国家内的其他制度的区别在于前者具有使用武力的能力。一方面，它实际上所拥有的武力相对于其他团体所拥有的武力来说，是占据绝对优势地位的。另一方面，它几乎垄断了合法使用武力的权利：除了某些未加说明的自卫权利之外，社会成员只承认政府有权使用武力。对于政府来说，武力的使用必须具有合法性，这和政府应该拥有占据绝对优势地位的武力一样，都是至关重要的。政府强制性权力的这两个方面是密不可分的，因为政府丧失合法性的结果，可能导致政府不再拥有占据绝对优势地位的武力，无法对抗反对派的联合武装力量。叛逆团体十分清楚这种相互关系，所以它们努力在民众当中否定政府使用武力的合法权利，同时用自己的武装力量反对政府的武装力量。

政府通过自己的下述各项功能，确保社会基本规则在现代社会中具有效力。这些并非政府所特有的功能；个人和团体也可以具有这些功

^① “保护”规则的概念或许带有为违背规则的行为寻找借口的意味，或者是把个人置于规则之上，但是我找不到更好的词。

能。然而，政府的这种作用是至关重要的。

(1) 政府制定规则。这并不是说政府总是规则的创立者或者倡导者，而是指政府认可或者批准社会规则。在现代国家中，这个制定规则的过程会导致一整套特别规则的产生，我们将这一套特别规则称为“法律”。在现代国家里，制定规则通常是立法机关的功能，但是制定规则或者立法功能不仅仅是立法者才具有的，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也有这样的作用，行政机关通常是把法律变成命令，司法机关则通常是解释法律，而不是制定法律。

(2) 政府让那些受规则约束的人了解规则。政府通过公布法规条例和司法判例，处罚违法者以强制执行规则，以及警察缉拿、威慑或者惩罚违法者的工作等等，在社会中传播把规则视为法律规范的观念。

(3) 政府也实施规则或者使规则具有效力，把一般性原则变成要求特定个人必须做某些事情或者不能做某些事情的规定。这通常是执行部门的功能，但并非特别的部门才具有这样的功能，政府中的其他部门通常也能起这样的作用。

(4) 政府可以解释规则，主要是通过它的司法机关来解释有关规则的适用范围、规则的含义以及规则之间的相互关系等等疑问。

(5) 政府也可以通过使用或者威胁使用警察和军队，以及利用法院的制裁措施，来强制执行法律。具体法律规则的效力可能并不需要依赖于明确的制裁措施，但法律体系作为一个整体，需要借助于政府的强制力。

(6) 政府可以通过影响教育和大众信息，借助政府领导人的号召力，把自己作为社会价值观念的象征性化身，以及塑造有助于民众承认规则具有合法性的政治文化，从而使得规则合法化。

(7) 政府也可能通过立法机关废除或修改旧法律、制定新法律，行政官员执行法律，以及法官重新解释法律的含义，使得规则适应变化了的环境和要求。

(8) 政府通过它所采取的政治行动来确保规则在社会中继续发挥作用，以发挥“保护”规则的作用。使用武装力量镇压叛乱行动或者击退外国的人侵，就是这种“保护”功能的体现。同样地，政府也可以采取安抚政治失意者、消除社会或经济不满情绪、压制死硬的煽动分子、修补社会的裂痕以及同敌对势力实现和解以防止社会的分裂等措施，来对

规则施加“保护”。

- 57 上述形形色色的政治行为具有一个共同点，即它们都不是直接通过确认或者执行规则，而是通过影响、塑造或者控制社会环境，让规则持续发挥作用，达到维持秩序的目的。这一系列政治行为不仅不受规则的制约，而且是规则得以发挥作用的前提。

原始社会秩序

现代国家秩序在很大程度上说是政府的产物；国家间的秩序则不是这样的，因为国际社会是一个无政府的社会。然而，原始社会（*primitive stateless society*）也处于“有秩序的无政府状态”（*ordered anarchy*）之中，我们有必要探讨一下这两类社会在建立和维持秩序中的异同点。

在20世纪的人类学家开始关注原始社会之前，人们对这类社会一直没有加以实际的观察和系统分析，惟有政治理论家注意到梅因、梅特兰等历史学家对原始社会做过一些大体上属于猜测性的描述。^① 20世纪人类学家所确认的原始社会，包括苏丹南部的努尔（the Nuer）、西丁卡（the Western Dinka）和曼达里（the Mandari），尼日利亚北部的塔棱西（Tallensi），乌干达的布旺巴（Bwamba），乌干达和刚果的卢格巴拉（Lugbara）以及多哥的孔康姆巴（Konkomba）。这些社会都没有政府，而且缺少中央政治制度，如立法、行政和司法机关。据说其中一些社会根本就没有专门的政治角色；虽然一些个人或者集团，比如家庭或家族以及村落的首领，扮演了政治角色，但是这些角色与他们所扮演的其他角色通常没有什么区别。外来的研究者们对这些个人或者集团在政治管理、地方事务、血缘关系或者仪式典礼方面的角色加以区分，但这

① 比如 M. Fortes and E. E. Evans-Pritchard, *African Political System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40); John Middleton and David Tait (eds), *Tribes Without Rulers, Studies in African Segementary Systems*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1958); and I. Southall, "Stateless Societies," in *Encyclopaedia of the Social Sciences*, ed. David L. Sills (New York: Free Press, 1968). 我也从如下一篇精彩的论文中获益良多: Roger D. Master, "World Politics as a Primitive Political System," *World Politics*, vol. XVI, no. 4 (July 1964)。

样的区分可能在这些社会本身的文化中毫无意义。

与此同时,在这些社会中显然存在着某种秩序,也就是说社会成员的行为符合基本的社会共处目标。规则在影响此种行为中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而且规则的效力取决于制定规则、传播规则、实施规则、解释规则、强制执行规则、使规则合法化、让规则适应社会的变化以及“保护”规则等等维护秩序的功能。但是,在缺少一个中央权威的情势中,只是集团(比如血缘集团和地方集团)才具有这些功能,原始社会通常是这样一些集团所组成的。 58

规则不是由中央权威制定出来的,而是来自血缘集团或者地方集团相互关系的实践,它们体现在“习惯”之中,并为道义和宗教信仰所确认。习惯或者先例在中央集权政治体系中自然也是规则的一个来源,但它在原始无国家社会中是规则的惟一源泉。

个人行为与这些规则相一致的结果,是通过环境制约和惯性、“道义”制裁(比如公众奚落和公众谴责)、仪式性或超自然的惩罚行为(诸如部族长老的诅咒)来实现的。在单一文化社会中,特别是在较小的单一文化社会中,通常仅靠这些约束性措施就足够了。

如果这些约束性措施不足以阻止或者惩罚违背规则的行为,那么社会中的集团就要采取“自助”行动,自己判断是否存在违背规则的行为,并且采取强制性的措施来执行规则。例如,血缘集团或者地方集团中的一位成员遭到杀害,这可能促使该集团采取报复性行动,杀死凶犯或者凶犯所属集团中的一个成员。如果两个集团之间的关系很密切,双方可能都认为报复行动是合法的,这样一来,问题就很容易得到解决。否则的话,双方就会因为对行为合法性的认识而产生争端,并且可能根据主观的自助原则,展开持久的争斗。

由于两个集团都是从维护本集团利益的角度来解释规则和事件的,因此它们的判断很可能带有片面性。不仅如此,由于它们实际上所具有的强制执行规则的能力,取决于自己所拥有的军队数量和使用武力的意志,所以规则的强制执行情况肯定是很不确定的。但是,采取自助的行为并不意味着蔑视规则和有关集团陷于霍布斯所说的自然状态中,它实际上反映了体系的运作方式,即这些集团发挥了解释、运用和强制执行规则的作用。此外,它们在这样做的时候,也受到限制自助行为本身的规则的制约。 59

这些集团使用武力来对付它们所认定的违法规则的行为，这是被社会所认可的合法行为。自助并非每个社会成员或者集团普遍享有的权利，惟独那些有资格使用暴力的集团才享有这样的权利。它们所使用的（合法的）武力只能被用于对付侵犯合法权利的行为。不仅如此，武力的使用是要受到限制的，比如使用武力必须遵循报复手段要同犯罪行为相称的原则。

原始社会的自助原则，除了以惩罚性的制裁措施执行规则之外，也具有罗杰·马斯特斯所说的另外两个功能：它们起到“团结社会群体和维护是与非的法律和道义标准”的作用。^①它们不仅通过鼓励一个群体对一个外部群体采取暴力行为，来维护自身的内聚力，而且通过对某个违背规则的行为采取强制性措施，来表明规则本身的重要性及其持久效力。

原始无政府社会和国际社会在维持秩序方面，显然具有重要的相似之处。在两种社会中，虽然缺少一个拥有占据优势地位的军队和垄断合法使用武力权利的中央权威政府，但是某些秩序要素还是得以保存下来。而且，维持秩序的目标都是通过特定集团（原始社会中的血缘集团和地方集团，国际社会中的主权国家）发挥确保规则具有效力的作用来加以实现的。在现代国家中，政府具有这样的功能，但是并非惟独政府才具有这种功能。在原始社会以及国际社会中，秩序依赖于一个基本原则，该原则指明或者暗示特定集团具有这样的功能。在两种社会中，处于政治领导地位的集团可以合法地使用武力来维护自己的利益，而其他的个人和集团则需要寻求拥有特权和处于政治领导地位的集团的保护，
60 自己不能使用武力。

不管是在原始无政府社会，还是在国际社会中，政治特权集团本身即使在暴力斗争的时期，也受到一整套公认的规范原则的约束。但是，在暴力斗争期间，这两种社会可能会出现规则体系崩溃、社会四分五裂的情势，我们最好把那些相互冲突的部族或者国家视为一系列相互较量的社会，而不是一个单一社会中的组成部分。最后，在原始无政府社会和现代国际社会中，还有一些规则体系之外的因素在发挥作用，它们制约着政治特权集团。这些因素包括相互威慑或者对无限制冲突的恐惧，

^① Masters, "World Politics as a Primitive Political System," p. 607.

习惯或者惯性的力量,维持一个合作体系的长远利益等等。

然而,国际社会和原始社会之间的区别也是很大的。首先,两种社会的政治特权单位有很大的差别。国际社会中的国家是主权单位,它们享有对自己的公民和领土的最高管辖权。相反,在原始社会中享有政治特权的血缘集团或者地方集团,则不具有这种排他性的权力。

一个血缘集团不一定对本集团内的个人运用排他性的权威。在一些原始社会中,血缘集团是由一些派系组成的,而且总是处于分化与融合的过程中。血缘集团中的某些派系可能联合成一个更大的派系。这些派系单位在某个方面可能是相互竞争的,而当它们联合起来后,各自就变成一个更大派系中的从属单位。这种不断变化的分裂与融合的过程,体现了人们所说的原始社会中的“互补对立原则”。在原始无政府社会中,两个政治特权单位在追求某些目标的时候是相互对立的,而在追求其他目标的时候则是相互联合的。于是,一方面,每个单位都介入冲突之中,这足以使各个单位形成一种认同观念和维持单位内部的凝聚力,另 61 一方面,单位之间的冲突关系与某种程度的合作关系是相互交错在一起的。

原始无政府社会中的政治特权单位也不享有对特定领土的排他性管辖权。亨利·梅因爵士指出,原始社会中的政治联合只是源于血缘关系,不是因为共同占有一块领土。现代人类学家否定了这一看法,他们声称原始社会的基础既是血缘,也是领土。^①然而,在原始社会中具有维持秩序功能的血缘集团,对一块被明确划定和认可的领土并不享有排他性的权利。

由于原始社会中的政治特权集团对个人和领土不具有主权,他们和自己所属的民众和所处的领土只具有非排他性的关系,因此它们同国际社会的成员相比,具有较少的自主生存能力、内向性格以及自尊心。

第二个方面的区别在于,现代国际社会,特别是当前的国际社会,呈现出文化上的多样性,而原始无国家社会则表现为高度的单一性。我们所说的社会文化,指的就是社会的基本价值观念体系,它是人们思想和行动的前提。所有的原始社会似乎都依赖于一个共同的文化;无国家

^① 见 Schapera, *Government and Politics in Tribal Societies* (New York: Watts, 1956), ch. 1. 有关梅因的观点,见 *Ancient Law* (London: John Murray, 1930), p. 144。

社会似乎特别依赖于一个共同的文化。福特斯和埃文斯—普里查德在研究非洲体系的基础上，得出一个有待证实的结论：虽然一个中央权威可能把多样性文化中的民众融合在一起，但是文化上高度的单一性是无政府结构的必要条件。^①但是，主权国家社会——或者人们有时所说的容他性的社会，它在今天已经是一个包容全人类的政治结构——是一个最为典型的文化多样性的社会。

第三个方面的区别在于，原始社会不仅依赖于文化上的单一性，而且也依赖于文化中所包含的宗教信仰。福特斯和埃文斯—普里查德写道：“社会体系呈现出一层神秘的色彩，表现为一个不容批评或者修正的神权价值观念体系……这样一来，社会中两个派系之间（比如努尔和塔梭西之间）的战争或者纠纷，就被神权观念限制在一定范围之内。”^②相反，国际社会属于世俗的现代世界中的一部分，世俗的现代世界形成于基督教教会和宗教权威瓦解之后。在过去的三个世纪里，人们试图利用自然法、国家行为惯例、国家利益或者“需求”以及“文明国家”共有的法律等，确立具有合法性的国际社会规则，但是这些东西在产生社会凝聚力方面所起的作用，都不及宗教权威，因为它们总是受到人们的质疑。国际社会的道义基础可能不像原始社会的道义基础那样脆弱，不会像撒哈拉以南的非洲体系和大洋洲体系那样，经受不了基督教文明和伊斯兰教文明的冲击。相反，它具有较大的接受新观念挑战的能力，并且可以在某种程度上保持社会发展的延续性。然而，国际社会道义基础的社会影响力，却不如巫术或者宗教价值观念体系的社会影响力那么大。

最后，国际社会的规模远远大于原始社会。努尔是福特斯和埃文斯—普里查德所研究的最大规模的原始社会，但其人口和面积分别只有30万人和2.6万平方英里，而国家社会包含全人类和遍及整个地球空间。

归纳起来说，上述几个方面的区别表明，原始无政府社会所具有的增强社会凝聚力和社会团结的力量远大于国际社会。原始社会由于社会政治单位不那么具有排他性和自尊性，文化上呈现出单一性，规则的基

① Fortes and Evans-Pritchard, *African Political Systems*, p. 10.

② Ibid., p. 18.

础为巫术和宗教理念,以及社会规模较小、成员关系比较密切等等,所以在缺少政府的情势下,仍然具有很高程度的社会凝聚力。而国际社会秩序的维持,既缺少政府的作用,也缺少这样的社会凝聚力。

国际社会秩序

即便国家之间缺少共同的利益观念、共同的行为规则或者共同的制度——换句话说,即便它们只组成一个国际体系,而不组成一个国际社会,世界政治秩序的维持也要首先依赖于某些偶然性事实。比如说,即便国家之间没有共同的利益观念,或者它们没有去规范和规定共同的利益,均势也可能偶然地产生于国际体系之中。均势出现后,它可能有助于限制暴力行为,维护政府在本国的最高权威。然而,不管是在国际社会,还是在其他类型的社会中,秩序不仅仅是这类偶然性事实的产物,它也是共同利益观念、规则和制度的结果。共同利益观念基于社会生活的基本目标,规则限制维持这些社会生活基本目标的行为,制度有助于这些规则具有效力。

1. 共同利益

说X符合某人的利益,只意味着X是这个人追求某个目标的手段。X是否为追求某个特定目标的手段,这要依据于客观事实。但是,如果要判断X是否符合某个人的利益,我们不仅要看X是否为这个人追求特定目标的手段,也要看这个人实际上正在追求的目标到底是什么。我们由此可以看出,利益的概念并不能告诉我们某个人正在做什么,或者他应该做什么,从这个意义上说它是一个空洞的、没有指导意义的概念。我们要想知道一个人正在做什么或者应该做什么,就必须了解这个人所追求的目标到底是什么,或者他应该追求什么目标,而利益这个概念本身并不能提供这个问题的答案。

因此,“国家利益”准则本身并无助于我们解释国家的行为和指明国家应该如何行为——除非我们知道国家所追求的具体目标,比如安全、繁荣、意识形态目的,等等。不仅如此,国家利益的界定也不是客

观的，因为国家的目的或者目标是特定决策者的认识的产物。它也无助于我们把一国对外政策中的道义或意识形态目标同非道义或非意识形态目标加以区分，这是因为，既然 X 可以充当一国追求道义和意识形态目标的手段，那么它也可以符合该国的国家利益。

然而，如果国家的目标是很确定的、普遍认可的，人们只是对于以何种手段实现目标这个问题存在着分歧，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国家利益的概念是有一定意义的。说一个国家对外政策的基础应该是追求国家利益，这就意味着国家所采取的任何行动都应该是某个理性行动计划中的组成部分。因此，基于国家利益的对外政策，不同于盲目推行既定政策或者轻率地对事件做出反应的做法。基于国家利益思想的政策，也不同于基于部门利益的政策，不同于基于某个国家集团（如同盟或国际组织）利益的政策。把国家利益当作一个准则，至少可以让我们关注国家而非其他集团（比国家大的集团，或者比国家小的集团）的目标。

维持国际社会秩序的第一步是，国家之间形成一个追求社会生活基本目标的共同利益观念。不管这些国家所追求的具体目标是否大不相同或者相互冲突，它们都很看重这些基本目标。国家之间之所以形成共同利益观念，这可能是由于它们担心暴力行为不受限制、协议不可靠以及独立或主权地位无保障等等后果。这也可能源于国家的理性考虑，即国家愿意在对等的基础上限制自己的行动自由。另外，这还可能由于国家认为这些基本目标本身就很重要，它们不仅仅是追求自身目的的手段，也就是说，这可能既体现了共同的价值观念，又体现了共同的利益。

2. 规则

在国际社会中，如同在其他社会一样，旨在追求社会生活基本目标的共同利益观念本身并不能明确地告诉我们，哪些行为符合这些基本目标。这正是规则所具有的功能。这些规则可能是国际法、道义准则、习惯或者先例，也可能只是操作规则或者“游戏规则”，后一类规则不是通过正式的协定而产生的，甚至没有在文字或者口头上得到表述。规则的形成常常历经这样一个过程：刚开始的时候是操作规则，然后成为先例，接下来又变成道义原则，最后被纳入法律文件中。很多规则的形成

都经历了这样一个过程，它们现在已经包含在有关战争法、外交和领事人员地位以及海洋法的多边条约或者公约中。

这些规则数量很多，它们都处于变化、发展过程之中。我们下面只论述在维持国际秩序中发挥作用的三套规则。

第一套规则，我们可以称之为当今世界政治中的基本规范性原则。这套原则认同国家社会的思想，否定世界帝国、世界人类共同体、霍布斯的自然状态或者战争状态等等理念，它是有关人类政治组合的最高规范性原则。作者在本书的其他章节中强调指出，国际社会的思想并非历史的必然产物，它在道义上也不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不仅如此，这个思想即便是在当今时代，事实上也无法完全左右人类的思维与行动。相反，它总是处于同其他原则的相互竞争之中。然而，如果要在世界范围内确立起秩序，那么上述其中一个基本的理念就必须处于明显的优势地位；如果各种世界政治组合原则处于相互纷争之中，那么世界秩序是建立不起来的。

一方面，国际社会思想把国家视为国际社会的成员或单位，它们能够完成一些政治使命，包括确保基本规则发挥效力。也就是说，它排除了那些认为只有国家之外的集团（比如凌驾于国家之上的世界权威或者国家内部的派别集团）才具有这种政治作用的观点。另一方面，国际社会思想把国家间的关系视为社会成员之间的关系，它们都受到共同规则和制度的约束。也就说，它否定那种认为世界政治只是战争舞台或者战争状态的观点。

这个基本的或生就的国际秩序原则预先假定在一般国家的行为当中。旨在确保自己作为世界政治的主要行为体的地位，并且为此相互进行合作，否认超国家或次国家集团获得这种地位等国家的日常行为正体现了国际秩序的基本原则及其核心作用。这一原则包含在一系列国际法的基本准则之中。因此，国家是国际法中的权利和义务的载体，惟独它们才享有使用武力以确保国际法具有效力的权利，国际法来源于国家的意志，它表现为惯例或条约，这个学说一直处于主流地位。然而，这个原则先于国际法而产生；它体现在有关法律、道义、惯例、操作等等所有的规则当中。它不是一个静止的原则，而是一直处于发展过程中。在国际社会的初始阶段，它不得不面对着那些主张个人和集团（而不是国家）在世界政治组合中占据主导地位的思想之挑战。今天，它依然面临

着这样的挑战。

第二套规则，我们可以称之为“共处规则”。上述基本原则阐明谁是国际社会的成员，而这些共处规则规定了国际社会成员实现共处的基本条件。首先，它们包括一系列在世界政治中限制使用暴力的规则。这些规则规定只有主权国家才享有合法使用暴力的权利，而其他行为体则不具有这样的权利，还规定只有特定的、被称为“战争”的暴力行为才是合法的使用暴力的行为，惟独主权国家才可以从事战争。其次，这些规则试图对主权国家合法从事战争的理由和目标加以限制，例如要求发动战争必须有正当理由，就像国家体系初期的自然法学说所宣称的那样；或者要求必须在采取诸如《国际联盟盟约》所规定的其他特定程序之后，才可以发动战争。另外，这些规则试图限制主权国家从事战争的方式，例如要求战争的手段必须与战争的目标相称，不能伤害非战斗人员，不要采取不必要的暴力手段。不仅如此，这些规则还通过规定中立国和交战国相互关系中的权利与义务，努力阻止战争地理范围的扩大。

还有另外一些规定合理的行为方式的共处规则。“条约必须遵守”这个基本原则有时被看做是国际法的一个基石，有时被当作国际法的第一原则，它确立了国家间达成协议的前提条件。从属性或限制性规则所关注的问题包括：对异邦或非我族类的国家是否要讲信用；协定在情势发生变化之后是否依然有效以及由谁来判定情势是否发生变化，以武力强加给它国的协定是否具有效力，条约缔结一方在什么情势之下可以不承担义务，依据什么原则来解释协定，新政府是否或者在多大程度上应该承担前任政府的义务等等。

共处规则也包括那些有关巩固各国对其民众和领土的控制权或管辖权的行为规则。这套规则的核心内容是，各国都有义务相互尊重对方的主权或者对其领土和民众的最高管辖权。我们可以从中引申出一个规则，即国家不能强行干涉别国的内部事务。另外，所有国家在享有共同的主权权利这个意义上说都是相互平等的。

第三套规则被用来规范国家间的合作，不管这种合作是全球性的，还是有限范围内的，合作的目标高于或者超越共处目的。其中包括促进政治和战略合作或者社会和经济合作的规则。本世纪里出现的有关国家在经济、社会、通讯和环境问题上进行合作的法律规则，就表明了合作规则的重要地位，本书后面还将对此加以论述（见第六章）。

这类规则所规定的行为并不合乎国际生活的基本目标或主要目标,而是合乎那些更进一步的或者从属的目标,这些目标表明国际社会成员已经就一系列广泛的超越共处的目标达成了共识。尽管如此,只要国家之间相互进行合作,并且就这些更为广泛的目标达成了共识,从而加强 68 共处的框架,这些规则就有助于国际秩序的维持。

作者在这里不对这三套规则进行详细的论述,也不讨论有关如何解释这些规则或者调和规则间相互冲突的问题。我在这里也不说明其中哪些规则属于法律规则,哪些属于道义规范,哪些属于惯例或者操作规则,不分析这些规则的演变与发展的历史过程。我在这里只想指出,广泛的、变化中的规则或准规则(本书前面提到的只是其中部分重要规则),使得国际社会对共同利益的认识从模糊变成明确。

3. 制 度

在国际社会中,主要是作为国际社会成员的主权国家发挥着使规则具有效力的作用,它们在这样做的时候,既缺少一个最高政府的帮助,又不能借助成员之间的团结一致。在现代国家内部,有一个最高的政府来发挥这样的作用。在原始社会中,团结一致的政治特权集团具有这样的功能。在这个意义上说,国家本身就是国家社会中的主要制度。

因此,国家通过认定规则,发挥了制定规则或者立法的作用。普遍适用的规则,比如共处规则,产生于习惯或者先例,它在某些情况下得到多边公约的确认。仅仅适用于某些国家群体的规则也可能产生于习惯或者先例,比如当今大国所创立的避免危机与管理危机的操作规则,但它们也可能是由明示的协定或者条约所规定的。

国家利用自己的官方语言来传达规则,就如同它们声明自己尊重关于国家主权的法律原则、关于民族自决的道义原则、关于大国不应该干涉对方势力范围的操作规则时一样。但是,它们也通过自己的行动来传 69 达规则,表明自己认可或者否定某个规则的有效性。由于传达规则的权利掌握在国家手中,而非掌握在一个独立于国家之外的权威的手中,所以国家往往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对规则的含义加以曲解。

只要规则的附属条款是由国家来执行的(比如当国家是条约的保存国、中立地位的担保国或者争端的仲裁国的时候),或者由对国家负责

的国际组织来执行的（比如负责实施国际邮电和通讯协定的国际组织，或者负责其他事务的国际组织），国家就发挥着实施规则的作用。

每个国家都自己解释有关法律、道义或者操作规则。甚至是对于法律规则来说，国家也是依赖自己的法律顾问来加以解释的，没有一个独立的权威来解决国家在规则的解释上所存在着的分歧问题。道义或操作规则的解釋更加不确定。

由于缺少一个中央权威，国家承担了强制执行法律的责任，它们可能采取自助的行为，包括使用武力，根据操作规则、道义规则或者法律规则来维护自己的权利。由于国家经常不能采取有效的行动来维护自己的权利，所以规则的强制执行情况是不确定的。由于国家之间存在着较少的共识，或者它们较难做到团结一致，所以国家自己所采取的自助行为或者强制执行规则的行为，经常得不到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可。

国家承担着使规则合法化的任务，即促使规则的重要性获得广泛的认可，国家为此在世界政治中运用说服与宣传的力量。在当前，使规则合法化的一个重要方式是，国际会议和国际组织对规则加以认可。

70 国家肩负着改变操作规则、道义规则和法律规则，或者使它们适应变化了的情势之任务。但是，国家不得不在缺少一个有权废除旧规则和制定新规则的世界性立法权威机关的情况下完成这项任务，而且国家之间经常不能就规则是否应该改变或者如何改变的问题达成共识，这也增加了完成上述任务的难度。国家改变规则的方式是，用自己的语言和行动表明，它们不再赞同旧的规则，主张以新的规则取而代之，从而修改习惯或者先例的内容。相互尊重彼此势力范围的操作规则为大国所遵守，但是如果这些大国通过自己的言行表明，它们不再遵守这项规则，或者认为该规则所适用的范围或情势已经发生变化，那么这项规则就被废除或者修改了。有关民族自决的道义原则，即国家应该是民族国家的规则，是通过战争和革命，而不是通过立法权威制定法律，取代了王朝合法性的原则。法律规则的变更，有时是由于多边公约或者条约的签订，有时是因为国家存心违背或者蔑视规则，表明自己不再赞同这些规则。换句话说，让规则适应环境的变化，是维持秩序过程中的一个步骤，但它常常伴随着混乱。

最后，国家也承担着所谓的“保护”规则的任务。只有在国际政治体系条件允许的情况下，支撑国际社会秩序的规则才能发挥作用。尤其

是，只有当国家之间依然存在着一个共同利益观念，国家努力把这个观念变成明确的行动指南时，规则才可以发挥作用。“保护”规则的功能包括国家为了创造或者维持确保规则得到尊重的条件而可能采取的所有措施。

“保护”规则首先指的是国家所采取的如下一些传统的外交行为和战争行为：维持国际体系的总体均势（在今天表现为核大国之间的相互核威慑）；缓和或者遏制意识形态冲突；解决或者缓和利益冲突；限制和控制军备与武装力量，以维护国际安全；对不满现状的国家所提出的公正变革之要求，采取同情的态度；确保实力较小的国家承认或者默许大国具有特殊的权利与责任。 71

这些有关“保护”规则的措施并不是由共处规则或者国际法所阐明的。实际上，国家所采取的某些“保护”规则的措施可能同国际法发生冲突。“保护”共处规则的行为本身就是其他规则所规范的对象，这些规则包括均势规则、外交规则以及大国特殊地位规则。

国家在发挥这些作用的时候，会在不同程度上根据国际社会的制度相互进行合作。这些制度包括：均势、国际法、外交机制、大国管理体系以及战争。我们所说的制度并不一定指组织或者管理机制，而是指一整套用于实现共同目标的习惯和惯例（practices）。这些制度并不否定国家在国际社会中具有核心的政治地位，也不充当国际体系的中央权威代理机构。它们只是表明国家在发挥各自政治作用过程中可以相互进行合作——同时它们也是支撑这种合作的手段。这些制度象征着国际社会的存在，表明国际社会不只是所有成员的总和，也说明成员之间在发挥自己的政治作用时所进行的相互合作具有实质性和持久性，并且有助于成员避免忽视共同利益。本书第二部分将探讨过去和今天这些制度在维持国际秩序中所起的作用。

功能的和原因的解释

本书的一个中心思想是，前面所提到的规则和制度在维持国际秩序中具有积极的功能或者扮演着积极的角色。本书这种陈述的含义只是说这些规则和制度是国际秩序直接产生结果的原因的一部分，它们是国际

72 秩序得以产生的必要条件与充足条件之一。本书并不想采用“结构—功能主义”的其中所使用的“功能”和“角色”等词汇具有不同的含义。

“结构—功能主义”的解释，说这些规则和制度实现维持国际秩序的“功能”，这可能被认为它意味着国际社会为了自己的生存具有某些“需求”，规则和制度是被用来实现这些需求的。如果我们进一步假设这些需求的实现对于国际社会的生存是至关重要的，而且没有其他的途径来实现这些需求，那么当我们说这些规则和制度具有这些功能的时候，就等于我们赞同这些规则和制度。

本书无意为国际社会中的共处规则或者那些确保共处规则具有效力的制度寻找存在的理由或依据。首先，本书认为，秩序并不是国际政治中惟一的价值目标，它也不是一个压倒一切的价值目标。因此，即使我们接受了“结构—功能主义”的解释，认为国际社会中现有的规则和制度对国际秩序的维持是至关重要的，我们也不能因此认为那些规则和制度会得到认同。

其次，不管“结构—功能主义”的思路对于分析其他社会多么具有说服力，这种分析方法在被用来解释国家社会的时候，其解释力可能会令人质疑。“结构—功能主义”分析方法的基本思路是，把社会作为一个整体或者统一体加以分析，从整体主导部分的视角来解释社会内部的事态发展，从部分对实现整体需求所起的作用这个角度来描述每个部分的性质与目的。

国际社会并不具有这种整体性和统一性，所以这样的分析方法是不适合的。本书认为，社会仅仅是国际政治中一系列相互竞争的要素之一，因此把国际政治描述为一个社会只是道出其中的部分真相。分析国际社会的规则和制度在整个国际社会中所具有的功能，可能使得我们忽视了国际政治的其他方面，即它也表现为战争状态，或者表现为一个由
73 个人和集团而非国家扮演主要角色的政治舞台。

第三，“结构—功能主义”分析方法，即便是用于分析比国家社会更具有整体性的其他社会，其基本的解释力也并非不容置疑。这些社会，比如现代民族国家或者原始社会，虽然表现出很高程度的社会共识和团结，但是它们也包含着反社会或者非社会力量，我们难以用一个试图把所有社会事态都归结于社会整体框架的产物之理论来对它们加以解释。

第四章

世界政治中的正义与秩序

秩序不仅仅是世界政治中的一个现实的或可能 74 的状态或者状况，它一般也被视为一种价值。但是，秩序并不是影响国际行为的惟一一种价值，它也不一定是压倒一切的一种价值。比如，今天人们经常认为，西方大国以维护秩序为自己的政策寻找合法依据，申明秩序是自己主要关注的东西，而第三世界国家主要关心的则是如何在世界共同体中实现正义的目标，甚至愿意为此不惜付出无秩序的代价。阿里·马兹瑞教授是当今少有的对该问题进行过深入思考的国际关系学者之一。他曾经说过，西方大国是《联合国宪章》的主要炮制者，它们把和平与安全当作联合国的主要目标，把改善人权状况当作次要目标，而非洲和亚洲国家正致力于把这样的先后次序颠倒过来。^①

我会在本书的后面论述马兹瑞教授的这个观点到底具有多大的准确性。本章旨在提出一些更深层次的有关人类价值的先后排序问题，它们是当前西方大国和亚非国家采取不同政策的根源，也是过去产生这类冲突的基本原因。我将特别分析有关秩序和正义相互关系的不同观点。为此，我会探讨如下一些问题：

- (1) 世界政治中的正义指的是什么？
- (2) 世界政治中的秩序和正义具有什么样的关系？秩序和正义是相互对立的政策目标， 75 还是相互支持的政策目标？它们在多大程度上是相互矛盾的，甚至是完全相互排斥的？
- (3) 如果秩序和正义是两个相互矛盾的政策目标，那么何者应该优先呢？

^① Ali Mazrui, *Towards a Pax Africana* (London: Weidenfeld & Nicolson, 1967).

我们在讨论这些问题的时候，面临着陷入主观判断或者提出政策主张的危险。而且，如果认为可以寻找到有关这些问题的权威性或者完美的答案，那么我们就太天真了。然而，只要避免做出主观判断和提出解决的办法，我们至少可以搞清楚这些问题，更深刻地理解回答这些问题的各种不同视角。

“正义”的含义

正义这个词不同于秩序，我们最终只能对它的含义进行个人或者主观的界定。我个人并不想界定世界政治中的正义行为应该是什么，也不想就判断正义行为的标准进行哲学上的分析。我的出发点仅仅是这样的：人们有一些关于世界政治中的正义的思想或者理念，根据这些思想或者理念而提出来的主张，在事态发展过程中具有某种作用。

显然，有关正义的思想属于道义思想的范畴，它认为人类行为本身就有对错之分，它们不仅仅是实现目标的手段，人们必须追求正义。因此，追求正义的考虑必然有别于法律上的考虑以及出于谨慎小心、追求利益或者身不由己的考虑。

我们在思考正义问题的时候，有必要记住下面几点区分。^①首先是普遍正义和“特殊”正义的区分，前者指的是普遍的善良行为或者正当行为，后者指的是某种特定的正确行为。“正义”这个词有时是与“道义”或者“德行”相通用的，比如我们说某个行为是正义的，就意味着我们认为这个行为在道义上是正确的。然而，人们经常认为，正义思想只是道义思想范畴内的一个组成部分，当我们说追求正义就应该牺牲仁慈，或者说国家在处理相互关系的时候能够做到公正，但是不能够做到慈爱时，就有这样的含义。人们经常指出，正义特别指的是平等地享有权利，或许还包括做到公正和对等；不管权利的实质内容是什么，正义

^① 有关普遍与特殊正义、形式与实质正义、算术与相称正义、相互与分配正义之间的相互区分之论述，在亚里斯多德的著述中都可以找到。有关当代人对此问题的分析，见 Morris Ginsberg, *On Justice in Society* (London: Heingmann, 1956) 和 John Rawls, *A Theory of Justic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2)。

要求表现为必须对两个不同的人一视同仁，使得他们同等享有这些权利。

世界政治中的正义要求通常表现为：它们要求消除特权或者歧视，要求在强国和弱国、大国和小国、富国和穷国、黑人国家和白人国家、核国家和无核国家或者战胜国和战败国间权利的分配或应用上的平等。我们有必要区分从平等地享有权利这个特殊意义上所说的“正义”和通常与“道义”相通用的“正义”。

其次是“实质”正义与“形式”正义的区分。前者承认那些规定某些政治、社会或经济特殊权利和义务的规则，后者则承认，不管规则的实质内容是什么样的，对同样的人同样地实施这些规则。要求“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即要求法律规则公正地或者平等地适用于所有的个人或者阶层，从这个意义上说，就是要求“形式正义”，尽管这类要求在涉及所有规则时，不管是法律的，还是非法律的都会出现：同样的人群应当被以同样的方式加以对待在任何特定意图的规则中都必须体现。世界政治中的正义要求通常就是要求形式正义：某个法律规则，如每个国家不得干涉他国的内部事务；或者某个道义规则，如所有民族都享有自决权；或者某个操作规则或游戏规则，如大国应当相互尊重对方的势力范围等等，应该公正或者平等地适用于相关的两个国家。

第三是“算术正义”（arithmetical justice）和“相称正义”（proportional justice）的区分。前者指的是同等的权利和义务，后者则意味着，权利和义务可能是不平等的，它们是根据所追求的目标而进行分配的。平等可能被设想为同一类的人或者集团具有相同的权利和义务。但显而易见，这个意义上的平等经常并不符合正义的其他标准。比如说，由于个人和集团的能力或者需求有时不一样，所以一个规定这些个人和集团具有相同权利与义务的规则，很可能造成更大的不平等；正如亚里斯多德所写道的，“当平等的人被不平等地对待，或者不平等的人被平等地对待的时候，就会产生不公正的事实。”^① 马克思所说的“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原则，就体现了一种在公正分配财富上“相称正义”高于“算术正义”的思想倾向。在世界政治中，某些基本的原则与义务，如国家的主权独立的权利和国家互不干涉内部事务的义务，被普

^① Laws, bk VI.

遍认为同等地适用于所有的国家，这就体现了“算术正义”，而一国在战争或者报复行动中使用武力必须与该国所受到的伤害相称，这个原则可以说体现了“相称正义”。

第四种区分同前面一种区分密切相关，这就是“相互”或者“对等”正义同“分配”正义或者以整个社会的公益或共同利益为目标的正义之间的区分。“相互”正义表现为通过交易或者讨价还价的过程确认各自的权利与义务，某个个人或者集团承认其他人或集团的权利，换取其他人或者集团承认自己的权利。如果个人和集团的讨价还价能力是平等的，那么这个对等的过程可能导致我们所说的“算术正义”或者同等权利。相反，“分配正义”不是产生于社会成员之间的讨价还价过程，而是产生于整个社会出于追求公益或者共同的利益所做出的决定。显然，从这个意义上说，“分配正义”可能经常导致“相称”正义而非“算术”正义。例如，社会要求富人比穷人交纳更多的税，强壮的人比体弱的人干更多的活。当今的世界政治基本上是一个国家相互冲突与合作的过程，而国家只具有最初级的追求全世界共同利益的观念，因此世界政治中的正义属于“相互”正义，而非“分配”正义的范畴。在国际事务中，有关正义问题的斗争主要表现在，主权国家通过提出相互对立的主张，自我确定哪些权利和义务需要得到承认，以及它们应该如何被加以实施。但是，“分配”正义的思想在世界政治的辩论中也有作用，它体现了这么一种观念，即要通过把经济资源从富国转移到穷国来实现正义目标。

我们在使用上述分类方法的时候，有必要搞清世界政治中的哪些行为体具有道义权利或义务。我们在这里或许可以把正义区分为：国际正义或者国家间的正义；个人正义或者人类正义；全球正义或者世界正义。

国际正义或国家间正义

我所说的国际正义或国家间正义，指的是那些赋予国家和民族以权利与义务的道义规则，比如所有的国家不分大小、种族结构以及意识形态倾向，都同等地享有主权的权利，或者所有的民族都同等地享有民族自决的权利。当然，国家的权利可能会同民族的权利相冲突，从而使得

国家间正义并不等同于国际正义：民族自决的原则一直被用来破坏国家的主权完整性，它现在甚至对很多国家构成了威胁。然而，由于在当今世界上存在一个广泛的共识，即国家应该是民族国家，大多数国家（甚至是所谓的多民族国家）的政府都坚持认为自己的国家属于民族国家，所以国家间正义和国际正义的思想具有某种程度上的一致性。

由于国家是世界政治的主要行为体或者角色，所以国家间正义是我们通常所讨论的世界事务中的正义之主要内容。每个国家都坚持认为，本国具有一定的法律和道义上的权利和义务：它声称自己的政策在道义上是正确的，因而也是正当的（“普遍正义”），要求得到其他国家的平等或者公正的对待（“特殊正义”）；它主张自己具有主权或者独立的道义权利（“实质正义”），而且也认为这个权利为自己和其他国家所共同享有（“形式正义”）；它主张国家在相互关系、贸易机会以及国际会议的表决中享有同等的待遇（“算术正义”），同时要求根据国家的生产规模决定一国向政府间国际组织所应负担经费的数目（“相称正义”）；它承认其他国家所拥有的权利，以此换取其他国家承认自己所享有的权利（“相互正义”），但它也可能（至少是在口头上）表示要维护地区共同体或者世界共同体的公益或者共同利益（“分配正义”）。 79

个人正义或者人类正义

我所说的个人正义或者人类正义，指的是赋予个人以权利和义务的道义规则。人类正义的思想曾经以自然法学说的形式出现，其形成显然早于国家间正义或者国际正义的思想，它或许为后者提供了基本的理论依据。也就是说，国家和民族最初之所以被认为具有某些权利和义务，就是因为个人具有某些权利和义务，而国家的统治者是个人，民族是个人的集合体。但是，国家间正义和国际正义的思想到18世纪的时候产生了变化，从此它们开始与个人正义或者人类正义的思想不相干了，权利和义务被认为是属于一个抽象的国家而非国家的统治者，属于一个被称为民族的集合体，而民族不只是组成民族的个人之总和。

在这样一个权利和义务直接属于国家和民族的体系中，人类权利和义务的思想依然存在，但具有反传统的倾向。人类权利和义务的思想不仅不再是国际正义或国际道义思想的理论依据，而且对国际社会本身构

成了潜在的颠覆性威胁，因为它挑战了 18 和 19 世纪实证派国际法学家
80 的一个论点，即国家是国际法的惟一主体，个人只能是国家间协议的客
体。国家间共处的基本原则，即相互承认对方的主权管辖权，意味着各
国政府间就本国公民的权利和义务问题达成了某种默契。向外国政治难
民提供避难权利的惯例，《大西洋宪章》、《联合国宪章》以及《世界人
权宣言》等文件主张承认人类的道义权利，政府之间在对待战俘、改善
经济和社会福利等领域就维护人权采取切实的合作态度，等等，对这种
默契产生了侵蚀作用。然而，有关个人义务的思想在国际政治中会产生
这么一个问题，即个人的义务和个人对国家的义务常常发生冲突——例
如纽伦堡战争法庭所面对的德国士兵和政治领导人所承担的义务问题，
以及美国士兵和政治领导人对发动越南战争所承担的责任问题。^① 另
外，有关个人权利的思想在国际政治中也会产生一个问题，即当个人和
集团的权利在本国受到侵害的时候，其他国家是否可以出面保护他们的
权利呢？比如，西方强国是否能够出面维护东欧国家公民的政治权利，
非洲国家是否能够出面维护南非黑人的权利，或者中国是否能够出面维
护东南亚华人少数群体的权利呢？如果按照某个方式来解答这些问题，
那么国际关系将会陷于混乱状态，甚至国际社会本身也会走向瓦解。因
此，在当今时代，国家的代表们在讨论个人权利和义务的时候，采取了一
种沉默的态度。这是因为，如果某个国家内部的个人享有其他国家或者
国际组织所主张的那些权利的话，那么该国的权威将受到限制；如果
某个国家内部的个人对本国国境之外的事业或者运动承担义务的话，那
么该国就不能指望他们效忠自己。

全球正义或者世界正义

除了有关国家间正义（或者国际正义）以及人类正义思想之外，我
81 们还应该了解第三种思想，我们可以称之为全球正义或世界正义的思
想。这种思想试图阐明什么是对整个世界社会或者想象中的世界社会来
说是正确的和有益的东西，它认为所有的个人都属于世界社会的一部

^① 见 Telford Taylor, *Nuremberg and Vietnam, an American Tragedy*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70)。

分, 个人的利益应该服从于世界社会的整体利益。这种有关追求世界共同利益的主张, 不同于那种声称全世界的所有个人都具有自己的权利与义务的观点, 因为它认为, 这些个人已经组成或者应该组成一个社会或共同体, 个人的权利和义务是由这个社会或共同体的共同利益或者公益所限制或者决定的, 这就好像国家内部的个人的权利和义务在过去是一直由国家的利益、绝大多数公民的意愿或者普遍意志所限制或决定的。这种正义思想既是“相称的”, 也是“算术的”, 既是“分配的”, 也是“相互的”。

这样一种有关世界共同利益的观点, 它所关注的并不是国家社会的共同目标或者共同价值, 而是由个人组成的整个人类社会的共同目标或者共同价值。如今很多人在自己的言论或者著述中都表达了这种观点, 似乎现在已经存在着一个全球社会或世界社会。因此, 很多人在讨论战略和军备控制问题的时候认为, 核大战不仅会给国际社会带来灾难和对个人权利造成侵害, 而且也会威胁整个人类的生存或者人类文明的存在。人们在讨论把资源从富国转移到穷国这个问题的时候, 他们有时所主张的终极目标并不是让穷国富裕起来, 或者促使穷人过上较好的生活, 而是使人类社会个体成员之间的财富分配变得更加公平, 或者使得整个人类社会的发展达到最起码的富裕标准或者福利标准。人们在讨论生态或者环境问题的时候所特别关注的东西, 并不是国家间的相互合作或者个人的权利与义务, 而是人类应该如何团结起来以共同应对某些生态或者环境方面的挑战。

如果说在当今以国家为主要行为体的世界政治环境中, 国家间正义或国际正义的思想在日常辩论中占据主导地位, 而人类正义的思想占据次要地位的话, 那么全球正义或者世界正义的思想几乎就没有任何地位。所谓的具有共同利益的世界社会或者共同体根本就不存在, 它只是 82 一种理念或者神话, 这种理念或许在今后某一天会具有很大的影响力, 但迄今为止它还不具有这种影响力。整个人类作为一个大的政治集合体, 并不具有产生和表述整体利益的手段, 也不具有政治社会化和政治动员的手段, 而拥有这些手段则被认为是政治体系的特征。如果说人类的整体利益得以形成和被加以表述, 而且政治社会化和政治动员的过程改变了世界政治体系, 那么这一定是主权国家社会的机制之产物。例如, 我们如果想知道世界作为一个整体在诸如军备控制、人口与资源的

分配或者环境保护等等问题上具有什么样的共同利益，那么就必须了解主权国家及其所主导的国际组织的观点。

的确，在当今世界上，有不少人自称是“宇宙飞船的地球”或者“这个处于危险境地的星球”的共同利益的代言人。然而，不管这些个人的观点具有多少说服力，它们并不是产生于任何一种追求利益和调和利益的政治过程。由于这些个人的观点并没有得到这样一个政治过程的认可，所以它们在帮助我们理解人类共同利益时所起的作用，甚至还不如主权国家（即便是非民主国家或专制国家）发言人的观点，因为主权国家的发言人所代表的至少不只是他们自己。非政府团体的发言人（比如军备控制、经济发展或者环境问题的专家组织）也不具备这样的权威，虽然他们的言论可能在某些问题上具有权威性，但是只有得到某个政治过程所认可的那种权威，才可以界定什么是人类的共同利益。

然而，如果我们因此认为我们主要应该通过了解国家或者政府间国际组织的观点来界定什么是世界的共同利益，那么这也是一种错误的看法。一个国家所信奉的普世性（universal）意识形态显然是从属于该国的特殊利益的，国家间所达成的协议是讨价还价和妥协的产物，而不是追求人类共同利益的结果。

秩序与正义的相容性

显而易见，现存的国际秩序的框架不利于上述那些颇有说服力的正义主张。在当代国际舞台上，不仅存在着马兹瑞教授所提到的主要关心维持秩序的国家和首先关注公正变革（必要时可以牺牲秩序）的国家之间的冲突，而且存在着由国家体系和国家社会提供秩序的理念同其他形形色色的追求世界政治正义的理念之间的固有矛盾。

毫无疑问，任何形式的正义，惟有在某种秩序的背景之中才能成为现实。而且只有当存在着一个在某种程度上确保社会生活的基本或者主要目标得以实现的行为格局的时候，我们才可以追求更进一步的或者从属的目标。虽然国际社会只是提供了某种最起码的秩序背景，但这却正在为国家平等地享有各种权利铺平道路。不仅如此，目前的国际社会正通过诸如联合国及其专门机构这样的全球性国际组织，在维持最起码的

秩序或者共处目标之外，追求更大的目标：它信奉国际正义（或者国家间正义）以及个人正义（或者人类正义）的思想，甚至赞同把资源从富国转移到穷国的主张，从而在某种程度上追求世界正义；而且它促进各国政府在多个领域内进行合作，以促进这些理念成为现实。

然而，首先，国际秩序框架十分敌视那些追求全球正义或者世界正义的构想。假如人们接受世界共同利益这个理念的话，那么他们就必须考虑下面一些问题：世界各国应该如何依据人类的整体利益调整自己的移民政策？哪些国家或者地区最需要资金，哪些国家或者地区最不需要资金？如何根据共同的、优先考虑的目标来规范世界各国的贸易与财政政策？全世界上什么样的国内和国际暴力冲突的结果最符合人类的整体利益？

这些自然属于政府所能左右的问题，而且除非人类社会发生巨大的 84 变革，政府是不会放弃这种支配权的。政府是人类特定群体利益的庇护者，这种地位也使得它们难以联合起来追求世界的共同利益。人们有时指出，援助国通过援助和贸易促使世界经济水平的整体水平得到提高，这便是人类共同体利益的思想被加以接受的表现。比如，肯尼思·博尔丁就声称，由于资源从富国转移到穷国完全是一种单向的或者非对等的行为，所以这就意味着富国认为自己和穷国同属于一个共同体。“如果 A 给予 B 某些东西，并且不要求得到回报，那么我们就可以说 B 是 A 的‘一部分’，或者说 A 和 B 都是一个更大的利益体系和组织体系中的组成部分。”^① 人们或许会指出，人类共同体的理念相对于其他思想来说，是一种比较好的、有关资源转移的理论依据。例如，西方一些国家有时宣称，援助穷国是为了维护秩序或者促进稳定（从维护西方偏好的价值观念的意义上说），或者说是为了阻止穷国反抗富国。又比如，在穷国中间流行这么一种说法，即富国只有通过援助穷国才可以补偿其过去所犯下的罪行。但是，我们不能确定人类共同体的理念是否真的是实现大规模资源转移的动力，或者富国把资源转移到穷国确实是为了把自己在第三世界的介入程度降到最低水平，或者说富国这样做主要是出于使自己对穷国的主导地位和剥削地位永久地维持下去，从而有损于穷国

^① Kenneth Boulding, "The Concept of World Interest," in *Economics and the Idea of Mankind*, ed. Bert F. Hoselitz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65), p. 55.

的利益。

世界正义或者全球正义的理想只有当存在着一个世界社会或者全球社会的情况下，才可以成为现实。有关世界正义的主张旨在改变国家体系和国家社会，因而具有革命性。如果出现一个能够同时实现秩序和正义这两个目标的世界社会或者全球社会的话，那么世界正义可能最终会
85 与世界秩序相一致。但是，在国家社会和国家体系的背景中追求世界正义的理想，这种行为会同维持现存秩序的做法相冲突。

国际秩序的框架也敌视人类正义的主张，后者在当今世界政治中具有很大的影响力。国际社会关注人的权利与义务，而有关人的权利与义务的观念可能会对特定人群所认同的国家构成挑战。但是，国际社会除了有选择地或者以某种变相的方式对人类的权利与义务的思想给以支持之外，还努力阻止这种观念挑战国家的主权。假如国际社会真正地把人类正义摆在第一位，把国家间的共处摆在第二位——马兹瑞教授认为这便是非洲和亚洲国家的主张，例如《联合国宪章》应该优先关注人权而不是维持和平与安全——那么就会陷于一个人们对于人权的含义以及各种权利的先后排序缺少共识的境地之中，其结果只能导致国际秩序受到损害。在这个问题上，国际社会——我认为它包括非洲和亚洲国家（我的看法和马兹瑞教授不同）——表明了自己的立场，即国际秩序的地位高于人类正义。我相信，非洲和亚洲国家同其他国家一样，在同自己密切相关的问题上，会首先关注国际秩序，而不是首先关注人类正义，同西方国家或者苏联集团的国家相比，它们更不愿意看到整个国际共处结构遭到破坏。

在当今国际秩序框架中实现人类正义理想的努力还遇到另外一个障碍。人类正义问题之所以能够在世界政治议程中占据显著的地位，就是因为某些国家的政策。人们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听到对德皇战争罪行的指控，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又见证了德国和日本领导人和军人因战争罪行而受到审判和惩罚。然而，我们并没有看到美国、英国和苏联的领导人和军人受到审判和惩罚，从表面上看，他们所犯下的蔑视人权的罪行似乎与戈林、山本之流所犯下的罪行不相上下。这并不是说对战争
86 罪犯加以国际惩罚的思想是不正当的或者不明智的，而只是说这种思想是以一种有选择的方式被加以实施的。上述那些人以及其他人士被胜利者送上审判台，就是权力政治的一个产物。

同样地，我们之所以听到有关保护生活在南非的非欧洲人士的人权之呼声，甚至可能看到这些人士因此得到了援助，就是因为黑非洲国家和其他国家采取了把该问题提到桌面上来的政策，这就好像我们过去之所以听到有关维护生活在土耳其苏丹国内的基督徒权利的呼声，就是因为某些欧洲大国采取了支持这种做法的政策。但是，黑非洲国家的非洲人、苏联的知识分子、中国的西藏人、印度的那加人或者印度尼西亚的共产党人等等却较少得到国际上的支持，这是因为主要的国家集团没有采取保护他们权利的政策。国际秩序并不对人权提供普遍的保护，而只是有选择地保护人权，这种选择并非取决于个案的重要性，而是受制于国际政治的风云变幻。

还有一个更深层次的障碍。即使是由于国际政治的风云变幻，国际社会允许采取实现人类正义目标的行动，这样的行为并不能直接影响到每个人，而是要通过主权国家的中介作用来发挥影响作用，主权国家会出于维护自己的目的来左右这样的行为。让我们举个例子来加以说明。把资源从富国转移到穷国是为了实现世界经济公正的目标。这一行动过程的最终道义目标是改善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贫穷国家的物质生活水平。但是，有关的援助国和国际组织并非把资源直接转移到这些国家的个人手中，而是给了这些国家的政府。正如朱利叶斯·斯通所指出的，这样一来，这些国家政府就可以决定按什么标准把资源分发给个人，它们或者自己随意分发，或者干脆就不分发。在斯通看来，有关资源转移的行为建立在一个没有道明的假定的基础之上，即他所说的“正义选区”（justice constituency）的实际倡导者和受益者并不是个人，而是政府。^① 援助国对受援国政府分配援助资源的方式或者根本就不分发这些资源的做法所产生的疑虑，显然是阻碍外国提供援助的一个重要因素。尽管如此，我们也不能不同意斯通的结论，即虽然目前的资源转移并不 87 能实现我所说的人类正义，但是鉴于当前国际社会的性质，这是一种不可避免的情况：援助国和组织除非违背最根本的共处原则，否则就不能决定受援国政府分配资源的方式（尽管它们有时可以提出分配援助资源

^① Julius Stone, "Approaches to the Notion of International Justice," in *The Future of the International Legal Order: Trends and Patterns*, ed. C. Black and Richard A. Falk, vol. I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69).

的条件)。

如果国际社会极其敌视世界正义的观念，只能对人类正义的思想采取有选择的和模棱两可的支持态度，那么它对国家间正义或者国际正义的理念基本上也是采取抵制态度的。正如我在前面已经提到过的，国际共处结构本身依赖于那些规定国家权利与义务的规范或者规则——它们并不一定是道义规则，而是程序规则或者游戏规则，在某些情况下，现代国际社会的规则是由国际法所表述的。世界正义的思想看上去似乎与国际社会的结构相冲突，人类社会的理念可能威胁国际社会的基础，而国家间正义或者国际正义的思想则可能增强国家间共处协约的效力，因为它给国家所必须遵循的、开明的利己准则和法律准则增添了一个道义基础。

然而，国际秩序是通过那些与最基本的、普遍接受的国际正义原则完全相抵触的手段得以维持的。我并不是说今天有的国家和民族被剥夺了道义权利或者未能承担自己的道义责任，或者国家在享受权利、承担义务上面临着极大的不平等或者不公正的情况。这自然是目前的状况，但实际上过去一直就是这样的，这是任何一个社会的正常状况。我想指出的是，那些支撑国际秩序的制度和机制在发挥有效作用的时候——本书的第二部分将分析它们的作用——必然违背一般的正义理念。

88 例如，我们可以看看均势制度在维持国际秩序中所起的作用。这个制度是违背人们通常所信奉的正义理念的，这是因为：它允许对一个试图占据主导地位的国家发动战争，尽管这个国家并没有对他国造成法律或者道义上的伤害；它主张为了均势利益，可以对小国实行吞并或者瓜分，从而牺牲小国的利益；当今的“恐怖平衡”加大了人类走向毁灭的危险。尽管如此，这个制度不管是在过去还是现在，在维护国际体系的秩序中都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或者让我们看看另外一个制度即战争的作用。战争在维持国际秩序中也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它强制执行国际法、维持均势以及导致公认的公正变革。但与此同时，战争也可能是践踏国际法准则、破坏均势、阻止公正变革以及导致不公正变革的手段。不仅如此，这个手段一旦被加以使用，不管是被用来追求正当的目标还是不正当的目标，它很可能会按照自己的逻辑发展下去，不再成为那些战争发动者的手段，而是使他们陷入一种意想不到的境地。

让我们再来看看国际法。国际法承认现状，没有提供一个可以根据当事国的意志来改变法律的立法程序，因而面临着要求变革和以正义的名义违背法律的压力。不仅如此，在法律遭到违背以及因战场上胜利（而不一定是正义一方的胜利）而出现一个新的情势的时候，国际法承认这一新的情势是合法的。马兹瑞写道，国际法谴责侵略行为，但一旦侵略行为获得成功，国际法就不再对它进行谴责了。国际法和国际正义之间的冲突是难以解决的，因为法律承认一系列由武力或武力威胁所造成的既成事实，而且承认在胁迫情势中签署的条约也具有效力。

不仅如此，同很多人在这个问题上的粗浅认识相反的是，国际法迁就国际政治的倾向，并不是某个聪明透顶的国际法教授的杰出工作或者国际法委员会的某个巧妙的报告就可以克服得了的，它是一个不可医治 89 的毛病。我们有理由认为，虽然国际法的这个特征同基本的正义目标相矛盾，但是它对国际法发挥作用至关重要。假如国际法不再具有这个特征，那么它就将脱离国际社会的现实，从而不可能发挥任何的作用。

或者让我们来看看大国的特殊地位在维持国际秩序中的作用。大国通过维持地区性的霸权体系（其秩序是通过自上而下被强加的），以及经常采取合作态度来左右全球均势、把共同的意志强加给别人，从而为国际秩序的维持做出自己的贡献。然而，大国在维持国际秩序的时候，是以损害较小国家和民族的权利为代价的，处于苏联霸权阴影之下的东欧国家以及处于美国霸权势力范围内的加勒比海地区国家就受到了这样的不公正待遇，不公正的做法还被写入了《联合国宪章》中，该宪章所阐述的集体安全制度的运行是不能损害大国利益的。当大国进行讨价还价并达成损害小国利益的协议时，小国总是要受到不公正的对待。

在我们前面所定义的抽象的秩序和各种意义上的正义之间，并不存在着一个普遍对立的局面。换句话说，存在着这样一个社会，它既包含一个追求社会生活基本或主要目标的行为格局，又使得国家和个人可以为了世界的共同利益，去追求更进一步的或者从属的公正目标或者平等目标。我们没有绝对的理由认为，这样一个社会是不可能成为现实的，或者说我们不可能同时追求世界秩序和世界正义。然而，维护国家社会内部秩序的规则和制度，同世界正义的主张（意味着破坏国家社会）、人类正义的主张（除了有选择的和有限的方式之外）以及国家间正义和国际正义的主张是相冲突的。

优先考虑的问题

90

既然国际社会的框架不利于那些形形色色的正义思想，那么旨在实现这些理想的举动会对国际秩序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各种意义上的世界政治中的正义目标之实现只能以国际秩序的破坏为代价吗？如果是这样，那么秩序和正义何者应该被优先加以考虑呢？

我们可以把有关这些问题的答案归纳为三个典型的论点。第一个是保守派的或者正统派的观点，它承认在世界政治中，秩序和正义这两种价值之间存在着固有的矛盾，而且认为秩序应该优先于正义——在国际社会中，我们最多只能看到“最起码的秩序”或者共处，对“最佳的秩序”的追求会导致共处赖以生存的基本共识不复存在。

第二个是革命派的观点，它也承认维持当今国际秩序框架和实现正义目标是相互冲突的，但认为正义是最重要的价值：为了实现正义，可以不惜让地球遭受毁灭。然而，革命派并不相信地球真的会毁灭，他们只是希望经过一个暂时的以及或许是区域性的混乱阶段之后，会重新建立起一个能够实现他们所期望的公正变革的秩序。非洲大陆的某些黑非洲人、阿拉伯世界的阿拉伯民族主义者、早期的布尔什维克以及后来的中国人就具有这样的观念。

第三个是自由主义者或者革新主义者的观点，它一直是西方对外政策思想中的重要内容。它不认为秩序和正义在世界政治中必然发生冲突，它努力寻找能够把两者加以调和的途径。比如，它倾向于把消除不公正的状况视为加强国际秩序的正确手段：通过消除种族隔离制度或者“殖民主义的最后残余”，使黑非洲国家更好地融入“和平与安全”体系之中；通过让世界上的贫困人民获得经济公正的权利，从而避免富国和穷国之间发生暴力冲突。它也认为在某些情况下，可以通过促成共同意志或者达成共识的过程实现正义目标，声称那些试图通过破坏秩序来实现正义的举动会产生负面效果，主张促使“秩序”和“正义”的倡导者继续在一个道义体系的框架内共存和相互调和。

显然，维持秩序和推动世界政治公正变革这两种主张并非相互排斥，它们有时是可以相互调和的。所有维持世界政治秩序的规制要想长

久地存在下去，都需要在某种程度上满足公正变革的要求；因此开明的、追求秩序目标的行为也必须考虑正义主张。同样地，有关公正变革的主张也需要考虑到维持秩序的目标；因为已经发生了的变革只有被纳入某个维持秩序的规制之中，才能具有可靠性。

不仅如此，假如当事各方达成共识，那么公正的变革有时也能够成为现实，而且在这种情况下，国际秩序的基础不会受到损害。伴随非洲和亚洲民族从欧洲帝国统治中获得解放而来的是暴力和混乱，那些为民族解放而奋斗的人士有意识地把正义置于秩序之上。但是，宗主国政府有秩序地把权力移交给殖民地的过程也发挥了一定的作用。而且，即便所有的当事方并没有达成共识，假如有足够的证据表明国际社会作为一个整体支持它所认可的公正变革，特别是所有的大国达成了这种共识，那么变革就可能发生，而且它只会导致局部和暂时的混乱，整个国际秩序不会因此受到损害，甚至还会因此得到加强。毫无疑问，如果国际社会不仅在维持秩序上，而且在追求国际正义、人类正义，甚至在追求世界正义上，达成了共识，那么它在维持最起码的秩序或者共处局面上就处于一个更加有利的地位。

如果人们对于正义的含义没有形成共识，以及正义主张与共处原则 92 相互抵触，那么国际秩序和公正变革的要求就会发生冲突。

举个例子说，如果在联合国内形成共识，包括所有的大国达成一致的意见，支持对南非采取军事干涉行动，以强制执行在人口中占多数的黑人的民族自决权和支持黑非洲人享受自己的政治权利，那么我们就可以认为这样的干涉行动不会危及国际秩序，它甚至会通过增强国际社会在道义上的团结而加强国际秩序。在缺少这种共识的情势中，主张进行外部军事干涉就意味着秩序要服从于国际正义和人类正义上的考虑。联合国安理会的黑非洲国家成员自 1963 年以来一直宣称，种族隔离制度不仅侵犯人权，也威胁世界和平。不管这样的论点作为《联合国宪章》的一种法律推定或者一个政治策略到底有多大意义，它掩盖了一个意图，即干涉的倡导者试图威胁和平，他们的动机不是维护和平，而是追求正义。

印度 1961 年以武力从葡萄牙人手中夺取果阿，印度尼西亚 1962 年在西伊里安采取军事行动，也是以所谓公正变革的借口破坏和平的例子。很有意思的是，这些个案和有关在南非采取军事干涉行动的主张一

样，其借口除了追求正义之外，还包括维持秩序。在果阿这个个案中，克里什那·梅农（Krishna Menon）为印度的行为辩护说，印度必须对葡萄牙的入侵行动做出反应，因为自从1510年葡萄牙侵占果阿以后，印度便不断面对着外来入侵的威胁。同样地，印度声称自己在1971年对东巴基斯坦的干涉行动，是对“人口侵略”所做出的反应。因此，革命派也努力适应国际体系的主流行为模式。

如果在国际社会尚未就正义问题形成共识的情况下提出正义的主张，那么有关维持现存秩序或者最起码的共处局面的共识就会受到冲击。这样一来，国际社会就会面临着如何在秩序和正义之间确定孰先孰后的问题。

我在本书中努力避免给“秩序”这个词下一个“令人信服的定义”，以免对作为人类目标的秩序做出先入为主的价值判断。另一方面，我实际上坚持认为，秩序是人类事务中值得加以追求的或者有价值的东西，它是世界政治中的一个焦点（*fortiori*）。

社会生活秩序是应该被追求的东西，因为秩序是实现其他价值的条件。除非存在着一个追求基本的、主要的和普遍的社会生活目标之人类行为格局，否则不可能实现特定社会更进一步的、从属的或者特定的目标。国际秩序，或者国家社会内部的秩序，是国家或者民族国家间正义或者平等的条件；如果没有国际秩序，也就没有诸如国家平等和独立的权利或者各民族有权决定自己命运的权利这样的东西。同样地，世界秩序或者人类大社会中的秩序，是实现人类正义或者世界正义的条件；如果暴力行为得不到抑制、人们未能享有最起码的安全保障，财产的稳固占有规则得不到尊重，那么谈论实现个人的政治、社会和经济公正目标，或者根据世界共同利益公平地分配负担与奖赏，就毫无意义了。

因此，秩序在世界政治中不仅是值得被追求的目标，而且也有理由优先于其他目标（比如正义）的。但我们不能因此认为，秩序在任何情况下都是优先于正义的。事实上，秩序和正义的思想都是价值观念体系的组成部分，是所有世界政治行为体手中的辩解工具。革命秩序的倡导者期望新秩序将巩固革命成果。秩序的维护者之所以采取捍卫秩序的立场，部分原因在于他们认为现存的秩序从道义上说是令人满意的，或者说它没有必要被加以破坏。秩序和正义孰先孰后的问题，总是会被有关的当事方根据特定个案的是非曲直加以解释。

此外，我们在分析特定个案的是非曲直的时候，如果没有就现存秩序中是否或者在多大程度上存在着不公正的现象做出一些判断，那么就不能宣称秩序优先于正义。为什么我们认为现存秩序是有价值的呢？马兹瑞写道：“归根结底，和平的重要性是派生出来的。从根本上说，和平之所以重要是因为‘人的尊严和价值’是很重要的。”^① 那些为了反对殖民主义、种族主义或者争取经济公正目标而愿意破坏国际秩序的人士，之所以得出他们的结论，是因为他们对正义和秩序做出了自己的判断。

不仅如此，国际秩序的框架本身很牢固，能够经受以追求“正义”为名的暴力攻击行为的冲击。例如在当前，核和平使得世界安全没有受到正义的民族解放战争（非核战争方式）的破坏，国际和平或者国家间的和平使得世界安全没有受到正义的国内暴力行为的破坏。

我们也必须记住，我们可能难以确定世界上是否存在着支持公正变革的共识，而且以公正变革为目的的、针对现存秩序的暴力攻击，或许会起着改变现有共识的作用。有的时候，正是争取公正变革的斗争本身导致一种支持此种变革的共识之产生，而这种共识在斗争刚开始的时候是并不存在的。比如在今天，我们或许可以说，国际社会具有一个共识，即殖民国家对其附属地领土拥有主权是不合法的，为了民族解放的目标而进行的反对殖民国家的暴力斗争则是正义的。但是这种共识在反对殖民主义斗争的初期是不存在的，如果说它现在已经存在的话，那么它便是反对殖民主义斗争的产物。这样一来，虽然世界政治秩序是值得追求的东西，是实现其他价值的条件，但是我不应该把它视为压倒一切的价值，而且我们不能因为某个特定制度或者行为方式有利于秩序的维持，就认为该制度是合适的或者这样的行为方式应该被加以采纳。

^① Mazrui, *Towards a Pax Africana*, p. 137.

第 二 部 分

当代国际体系
中的秩序

第五章

均势与国际秩序

我准备在这一章中探讨以下几个问题：

- (1) 什么是均势？
- (2) 均势是如何维持国际秩序的？
- (3) 均势有助于维持当今的国际秩序吗？

均 势

我们在这里采用法泰尔为“均势”（balance of power）所下的定义：“一种任何一个大国都不享有主导地位 and 不能对他国发号施令的事态”。^① 人们在使用均势这个词的时候，通常会想到军事实力，但实际上它也指世界政治中的其他种类的权力（power）。法泰尔所说的这种事态，会以一些不同的方式出现。

首先，我们必须区分简单均势与复杂均势，前者指的是两个大国之间的均势，后者指的是涉及三个或者三个以上大国的均势。简单均势的例子包括16、17世纪法国与哈布斯堡王朝的西班牙/奥地利之间的冲突以及冷战时期的美苏冲突。复杂均势的一个表现形式是18世纪中叶的欧洲局势，当时存在着法国、奥地利（已经同西班牙分离）、英国、俄国以及普鲁士等几个大国。复杂均势的另外一个例子便是当今的世界政治，世界上的权力中心除了美国和苏联之外，还增添了日本和西欧联盟则分别是第四和第五个潜在的权力中心。然而，历史上从来没有出现过单纯的简单均势或者绝对的复杂均势之情势。在简单均势的情势中总是存在着某些对

^① Vattel, *Droit des Gens*, bk III, ch. ii, section 47, text in J. B. Scott, *The Classics of International Law*, *Le Droit des Gens* (Washington: Carnegie Institute, 1916), p. 40.

事态发展的影响力虽然很小，但并非微不足道的其他大国。^① 复杂均势的情势可以表现为外交上的同盟，例如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六国均势演变成三国同盟和三国协约之间的对立。

简单均势要求双方的实力必须是均等的或对等的，而复杂均势则不然。在三个或者三个以上大国相互争斗的情势中，大国之间的权力分布极度不均等，但这并不一定导致最强大的一方处于主导地位，因为其他国家可能联合起来抗衡这个国家。

在简单均势的情势中，处于劣势地位的一方惟有依靠增强自身的内在力量（在 18 世纪是增加领土和人口，在 19 世纪是发展工业和增强军事组织，在 20 世纪是提高军事技术）才能获得权力。因为在复杂均势的情势中，处于劣势地位的大国可以通过吞并或瓜分其他国家，或者与其他国家结盟，来增强自己的力量，人们通常认为复杂均势比简单均势更加稳定。^②

其次，我们必须区分整体均势和局部均势，前者指的是在整个国际体系中不存在着一个占主导地位的国家，后者指的是一个地区的均势或者体系中某个部分的均势。在当今世界的某些地区，比如中东、印度次大陆以及东南亚，或许可以说存在着局部均势；而在另外一些地区，比如东欧和加勒比海地区，存在着一个大国占据主导地位的局面。这两种情势都没有否定一个事实，即在整个国际体系中存在着整体均势。

我们不能把整体均势和局部均势的区分同主导均势和从属均势的区分相混淆。当今的美苏均势（有时被称为“核心均势”）是世界的主导均势，而中东、印度次大陆和东南亚的局部均势则是从属于它，因为前者对后者的影响大大超过后者对前者的影响。有时，构成主导均势的大国会直接介入从属均势之中，比如苏联和美国现在成了中东均势的构成要素。伯克看到了主导均势和从属均势之间的区别，他把 18 世纪末的英国、法国和西班牙之间的关系称为欧洲的“核心均势”，它制约了

^① 用莫顿·卡普兰的话来说，历史上所有的“两极”体系都是“松散的”，而不是“紧密的”。见 *System and Process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ch. 2。

^② 比如昆西·赖特的观点，见：Quincy Wright, *A Study of War*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64) 删节本，p. 122。

“北方均势”、“德意志均势”和“意大利均势”。^①然而，主导均势只是一种特殊的均势，它不等同于整体均势或者整个体系的均势。

第三，我们应该区分主观均势与客观均势。说人们普遍认为不存在着一个国家在军事上占据主导地位的事态是一回事，说没有一个国家事实上占据主导地位则是另外一回事。有时候人们所普遍相信的两个当事方之间大体上的军事力量均衡，并不能反映后来事态发展所揭示出来的“真实”地位。例如，在1939年—1940年冬天的欧洲，人们普遍认为同盟国和德国之间的军事力量对比是均衡的，然而1940年春天发生的、持续几个星期的战事就表明，事实并非如此。法泰尔所说的均势的前提是人们普遍相信均势的存在，但这不足以证明均势是客观存在的。假如（我们以简单均势为例）一个国家事实上并不处于可以轻易击败另外一个国家的优势地位，但是人们却普遍认为这个国家处于这样一种地位，那么该国就能够（用法泰尔的话来说）对另外一个国家“发号施令”。维持均势的问题并非仅指确保军事力量均衡的存在，它也指确保人们相信均势的存在。战场上获胜的重要意义，可能不在于它影响了未来战事的结局，而在于影响了人们对未来战事结局所产生的信念。从这个意义上说，1940年德国在西欧战场上所取得的胜利，并不表明人们原先所说的均势没有“真正地”存在过，它只是导致了一个德国霸权取代均势的新形势。

100 然而，如果说主观认识是均势得以存在的必要条件的话，那么它并不是充足条件。如果一个大国实际上处于可以轻易击败其邻国的地位，但人们却普遍认为这个大国受到了其邻国的制衡，那么这就意味着作为均势基础的这种认识很快就会被证明是错误的。如果均势不是建立在一个国家抵制他国攻击行为的真实意志和能力的基础之上，而是依靠虚张声势和装腔作势，那么它很可能是脆弱的和不能长久存在的。

第四，我们必须区分偶发的均势和人为的均势。偶发的均势不是有关当事方有意促成的结果。人为的均势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是一方或双方政策的产物。

我们不能把偶发的均势和人为的均势之间的区别同“随意选择的”

^① Burke, "Third Letter on the Proposals for Peace with the Regicide Directory of France," p. 441.

均势政策和“别无选择的”均势政策之间的区别相混淆。一些声称均势是有意识的行为之产物的作者坚持认为，面对一个潜在的主导性大国威胁的国家可能无法采取有效的制衡措施。例如，伯克、根茨和希尔伦等作者生活在拿破仑时代，处于具有革命性的法国进行对外扩张、欧洲均势可能崩溃的阴影之中，他们呼吁采取抵抗法国的政策，同时强烈地意识到欧洲的其他地区可能无法抵制法国的扩张，这就好像古代世界无法抵制罗马帝国扩张势头一样。^① 这些作者与卢梭和阿诺德·汤因比等人有所不同，后者把均势视为有关挑战和反应的历史法则之结果，根据这个法则，均势一旦受到威胁，必然会产生抵制这种威胁的抗衡力量。^② 前一类思想家强调挑战均势的行为可能并不会引起反应，而后一类思想家则认为，挑战必然导致反应，但是两者都把均势视为人为的而非偶发的现象。

我们可以把纯粹的偶发均势想象为这么一个时刻，即两个相互进行殊死搏斗的大国所处的斗争僵局，而双方的目标都是彻底地消灭对方。¹⁰¹ 人为均势则意味着，至少有一个当事方并不是努力扩大自己的绝对实力，而是极力限制对手的相对实力。这就要求估计敌手的军事力量，并因此判断自己的军事力量水平到底是比对手高，还是与对手相当，或者比对手低。这便是在国际政治体系中的“理性”国家（即国家的行为是前后一致的，他们追求既定的目标）所通常采取的态度。但是，人为的均势概念包含着多种可能性。

人为均势的最主要表现形式是两个大国之间的均势，各方都采取阻止对方获得军事上的主导地位的政策。另外一种更为复杂的表现形式是三个大国之间的均势，一个大国不仅通过增强自己的军事力量，而且也通过与较弱的大国进行联合，来阻止一个大国取得主导地位，这个政策被称为“保持均势”。这种形式的均势政策和古代世界的做法很相似，正如大卫·休谟所指出的，波里比阿描述了叙拉古的希尔罗之政策，即

① Ibid.; Friedrich von Gentz, *Fragments on the Balance of Power in Europe* (London, 1806); and Heeren, *A Manual of the History of the Political System of Europe and its Colonies*.

② 见 J. - J. Rousseau, *A Project of Perpetual Peace* (London: Danderson, 1927); and Arnold Toynbee, *A Study of Histor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35 - 59), vol. III, pp. 301 - 302.

站在迦太基的一边，同罗马抗衡。^①

第三个表现形式是维持整个国际体系均势的政策。该政策基于这么一个假定，即一系列相互作用的大国构成一个单一的体系或者力场。它也以一个世界外交体系的持续存在为前提，该体系使得有关大国可以获得体系中所有国家的动机的情报，以及获取这种信息的手段。维持整个国际体系均势的政策好像是起源于15世纪的意大利，而且它随着常驻使节制度的传播而得到发展。它同有关欧洲政治构成一个单一体系的概念一样，只是在17世纪的时候才深深地根植于欧洲思想体系之中。^②

102 还有另外一种均势思想，即把均势视为一种事态，它不仅是特定国家防止在整个国际体系中出现霸权国家的有意识的政策的产物，也是整个体系刻意追求的目标。这种思想意味着，国家可能为了维持均势这个共同的目标而相互间进行合作，比如在现代世界就不断出现旨在反对潜在主导国家的大同盟。它也意味着，每个国家不仅应该采取行动，挫败他国确立主导地位的企图，而且也应该承担不破坏均势的责任。也就是说，它包括自我约束和他人制约这两个方面。有关维持整个国际体系均势应该成为体系中所有国家的共同目标之思想，起源于17世纪和18世纪初的欧洲，它是反对路易十四大同盟思想的组成部分，被写在1713年的《乌得勒支条约》序言中。

均势的作用

在现代国家体系中，均势的维持可以说具有三个历史性的作用：

(1) 国际体系的整体均势的存在，可以防止国际体系因为征服行为而演变成一个世界帝国；

(2) 局部均势的存在，可以防止一个地区主导国家吞并或者支配特定区域的国家，从而维护这些国家的独立地位；

^① 见 David Hume, "Of the Balance of Power," in *Essays Moral, Political and Literary*, vol. I (London: Longmans, Green & Co., 1898)。

^② 赫伯特·巴特菲尔德爵士令人信服地指出，有关维持整个国际体系均势的学说并非如休谟所说的那样起源于古代世界，而是来源于现代世界的经验。见 "The Balance of Power," *Diplomatic Investigations*, p. 133。

(3) 整体均势和局部均势的存在, 为国际秩序赖以生存的制度(外交、战争、国际法以及大国管理) 发挥作用创造了条件。

有关均势可以在维持国际秩序中发挥积极作用、均势是政治家们追求的有价值的或者合法的目标之思想, 在 20 世纪遭到了很多人的批评。目前, 批评均势思想的论点主要包括: 均势概念含糊不清或者没有意义; 从历史上总结出来的有关均势的通则没有得到证明或者无法得到证明; 该理论建立在所有国际行为都是为了追求权力这种观念的基础之上。在 20 世纪初, 特别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以及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 均势学说的批评者并没有宣称均势概念是含糊不清或者无法加以证明的, 而是指责追求均势的行为对国际秩序的维持没有什么积极的作用, 而是有消极的作用。他们特别指出, 维持均势的努力是战争的一个根源, 它以牺牲小国的利益来满足大国的利益, 它导致国际法遭遇蔑视。下面我先讨论后一类的批评性论点。

试图建立均势的努力并非总是能够导致和平局面的维持。然而, 均势的首要作用并非维持和平, 而是维持国家体系本身。当战争是约束一个潜在的主导国家之惟一手段的时候, 均势的维持要求进行战争。但是, 我们可以认为维持和平只是均势的从属目标。稳定的均势(即均势可以持续下去) 可能有助于消除发动预防性战争的动机。

维持均势的原则无疑对大国有利, 对小国有害。大国间的均势经常是通过瓜分和兼并小国得以维持的: 1648 到 1914 年间, 欧洲国家数目急剧减少, 这正是由于大国努力兼并小国并且遵循补偿的原则以达到维持均势的目的。其结果是, 均势原则经常被指责为等同于大国集体扩张, 其典型的个案就是奥地利、俄国和普鲁士在 1772 年瓜分波兰。根茨和伯克等人声称, 瓜分波兰的行为偏离了真正的均势原则, 因为真正的均势原则要求尊重所有国家的独立地位, 不管它们是大国还是小国。他们是从理想主义和教条主义的角度来理解均势概念, 从而曲解了其基本内容。瓜分波兰的行为并非偏离均势原则, 而是均势原则的运用。(本书第九章将进一步探讨这个问题)

从弱国受到侵害的角度来看, 均势是一个野蛮的原则。然而, 我们并不能因此否认均势在维持国际秩序中所起的重要作用。主导均势优先于从属均势, 整体均势的重要性大于局部均势或者特定地区的均势, 这 104 便是均势原则的逻辑。如果强国对弱国的侵害是不可避免的, 那么最好

从国际秩序的角度来处理问题，即此种行为不应该挑起大国间的战争。

均势原则的一个悖论是，一方面，均势的存在是国际法得以发挥作用的基本前提，另一方面，必要的维持均势的措施经常违背国际法的规则。显然，占据主导地位的国家会倾向于无视国际法的规则。正如法泰尔所说的，主导国家处于“向他国发号施令”的地位。国际法的基本规则，即那些有关主权、不干涉、外交豁免等等的原则，其发挥作用有赖于“对等”原则的效力。如果一个国家处于主导地位，那么该国就可能无视其他国家的权利，而不用担心这些国家会采取对等的措施。因此，必须确保国际法规则得到遵守，而不只是寄希望于主导国家自愿遵守法律。这导致奥本海等国际法学家得出一个结论，即“我们从万国法发展史中获得一个最根本的教训就是，只有当国际大家庭成员之间存在着均势的时候，万国法才可以存在”。^①

然而，尽管国际法规则的存在有赖于均势的存在，但均势的维持经常要求违背这些规则。有关允许使用武力或者武力威胁的国际法规则，用格劳秀斯的话来说，只是用来“医治已经遭受的创伤”。只有当存在着侵犯法律权利的事实时，一个国家才可以合法地对另外一个国家使用武力。然而，均势的维持要求使用武力或者武力威胁来应对另外一个国家的侵害力量，而不管该国是否违背法律规则。旨在恢复均势的战争，旨在威胁维持均势的战争，以及旨在抗击第三国侵害力量（不管该国是否违背法律规则）、对另外一个国家的内部事务进行军事干涉的行动，会导致均势的要求与国际法的规则发生冲突。秩序的要求被认为是优先于国际法规则的，它们也被认为是优先于小国的利益与和平的维持。

令人注意的是，在今天，虽然“均势”这个词比过去任何时候都被更广泛地用来讨论国际关系，但是在学术研究中已经不大被使用了。这表明，学者们讨厌这个意思含糊不清、捉摸不定的时髦词汇，并且对国际秩序的建立有赖于均势的维持的结论，以及所有国家的外交政策都是旨在追求权力的论点等，都持怀疑态度。

“均势”这个词可以有很多种含义，人们常从不同的意义上使用这

^① L. Oppenheim, *International Law*, 1st ed. (London: Longmans, 1905), vol. 1, p. 73.

个词，难以判断其确切的意思。^① 然而，像 18 世纪的冯·贾斯蒂、19 世纪的科布登以及当今的某些政治学家那样指责均势概念是毫无意义的，^② 这的确是错误的做法。“均势”并不是惟一个遭受此种指责的词，其他被滥用的词如“民主”、“帝国主义”以及“和平”等等也是如此。均势这个词的广为流行，正表明它所传达的思想是很重要的。我们不能抛弃“均势”这个词，但是需要小心地界定它的含义，并且前后一致地使用这个词。

我们可以说均势的维持确实有助于国际秩序的维持吗？主导性大国总是会利用自己所处的地位“对他国发号施令”吗？地区性主导国家总是威胁其邻国的独立地位、全球性主导国家总是威胁国家体系的生存吗？

大国的领导人很含蓄地否定了这样的观点，他们认为自己的德行和善意足以维护其他国家的权利。富兰克林·罗斯福认为，美国的“睦邻政策”维护了拉丁美洲国家的权利。现在美国和苏联认识到需要限制对方的权力，而且声称这样做不仅对两国有利，也对整个国际社会有利。然而，它们并不认为自己的权力需要受到相应的制约。

康德有关宪政国家（constitutional state or Rechtsstaat）的思想是这种观点的一种表述形式。宪政国家由于其统治者的权力受到内部力量的制约，所以它在国际舞台上具有良好的品行，而专制国家则不具有这种品行。因此，康德主张建立起一个宪政国家的联盟，并且最终使之主导整个国际政治，但他没有认识到这样的联盟也会滥用权力。^③ 20 世纪 60 年代初，人们所提出的有关北美和西欧国家联合成一个大西洋共同体的主张，就沿袭了康德的思路：其倡导者们没有认识到这样一个联盟可能会对其他国家构成威胁，或者其他国家会联合起来，共同对付该联盟。

① 有关对这个词多重含义的重要论述，见 Wight, "The Balance of Power," *Diplomatic Investigations* 和 Inis L. Claude, *Power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62)。

② 见 J. H. von Justi, *Die Chimäre des Gleichgewichts in Europa* (Altona, 1758); and Richard Cobden, "Russia," in *Political Writings* (London: Ridgeway, 1867 and London: Cassell, 1886)。

③ 见 I. Kant, *Perpetual Peace*, trans. H. O'Brien (Liberal Arts Press, 1957)。

阿克顿的观点与此针锋相对。他认为，权力本身会导致腐败。也就是说，不管处于主导地位的国家具有什么样的意识形态、制度、德行或者善意，这种主导地位本身会对其他国家构成威胁，遏制这种威胁不能靠协定或者法律，只能靠抗衡的力量。^① 有关制衡的宪政制度并不能防止国家犯错误，权力的腐败作用不只体现在统治者身上，也体现在整个政治制度上。坚守德行的统治者在邪恶力量占上风的时候经常被不守德行的统治者所取代。芬伦对此做了精辟的论述：

人们切不可指望一个超级强国会严守中庸之道，亦不可奢望它会将自己的强大摒弃不用而仅想得到它在最衰弱的情况下也能得到的东西。即使一个君主极善于利用自己的好运，这种奇迹也将随着其统治的结束而告终。君主们天生的野心、幕僚们的阿谀奉承，以及各国国民整体的偏见——所有这些都不允许人们相信：一个能够征服其他民族的民族会永久地按兵不动。^②

107 人们之所以批评有关均势可以维持国际秩序的学说，有时是由于他们认为均势学说是“权力政治”理论的组成部分，该理论声称追求权力是所有国家共同的、头等重要的对外政策目标。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前面所讨论的均势学说和“权力政治”理论一样，具有相同的弊病。

有关国家在任何一个国际体系中都会倾向于追求均势的学说，的确是来源于这种“权力政治”理论。如果一个国家对均势构成挑战，那么其他国家必定会极力阻止该国的行为。这种观点的前提是，所有国家都极力使自己的权力最大化。但是，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国家总是处于这么一种状态，它们必须选择到底是利用自身的资源和能力维持或者增强自己在国际舞台上的实力地位，还是利用这些资源和能力追求其他目标。防务开支规模应该多大，是否提供对外援助，外交代表机关扮演什么角色，在面对特定的国际事态时是否介入战争、参加同盟或者国际组

① 见 Lord Acton, *Lectures on Modern History*, ed. J. N. Figgis and R. V. Laurence (London: Macmillan, 1910)。

② *Oeuvres choisies de Fénelon*, tome IV, quoted in Charles Dupuis, *Le Principe d'équilibre et le concert européen* (Paris: Perrin & Cie, 1909), pp. 26 - 27.

织，或者就国际争端表明自己的态度等等——这些都是一国在讨论外交政策时会面临的问题，有关增强一国实力地位的政策建议有可能不被采用，而且经常不被采用。一些具有扮演主要角色潜力的国家——我们会想到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的美国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实现经济复苏目标的日本——却宁愿扮演相对次要的角色。我并不认为在国际体系中会不可避免地产生追求均势的倾向，国家只有在必须维持国际秩序的时候，才会去维持均势。国家经常有可能并不遵循均势的要求。

均势在当今的作用

显而易见，在当今国际政治中所存在着的均势，和其他时期的均势一样，扮演了维持国际秩序的角色。如果我们要说当今均势的特点，那么它指的就是，自从20世纪50年代末以来，在国际政治中存在着一个新现象，从某些方面上看它是一种特殊形式的均势，而从另外一些方面上看，它又是一种与均势截然不同的现象。这个新现象就是相互核威慑。我将在本章的最后一节里分析相互核威慑的含义及其与均势的关系。

从任何国家都不在整个国际体系中处于主导地位这个意义上说，在当今世界中显然存在着一个整体均势。这个整体均势的主要特征，在50年代表现为简单均势（尽管不是一个纯粹的简单均势），在60年代处于过渡状态，在70年代表现为复杂均势。至少在亚太地区，中国必须与美国和苏联一样被视为一个大国；而日本是潜在的第四个大国，联合的西欧可能会成为第五个权力中心。然而，有关当前存在着一个复杂均势或者多边均势的论点导致了一些误解，我们有必要消除这些误解。

当我们说这三个或四个大国之间存在复杂均势或多边均势时，这并不意味着这些大国的实力是均等的。在一个由两个大国所主导的体系中，只有当有关大国之间的实力对比大致均等的时候，才可能出现均势或者没有一个国家居主导地位的情势。而在三个或者三个以上大国所构成的体系中，均势的产生并不需要大国之间的力量对比均等，因为力量较弱的国家可以通过与他国的联合来抗衡力量较强的国家。

另外，当我们说存在着一个复杂均势时，这并不意味着所有四个大

国都拥有相同的实力或者影响力。毫无疑问，在国际政治中，国家的行为是在“众多棋局”中进行的。在战略核威慑棋局中，美国和苏联是顶尖高手，中国是初学者，而日本根本就没有什么地位。在常规军事力量棋局中，美国和苏联还是主要的棋手，因为它们有能力在世界上的很多地方部署常规军事力量，中国是一个次要的棋手，因为其武装力量只能部署在自己的邻近地区，而日本只是一个无足轻重的棋手。在国际金融、贸易和投资棋局中，美国和日本是主要的棋手，苏联是一个较为次要的棋手，而中国则是一个相对来说无足轻重的棋手。毫无疑问，在意识形态影响力的棋局中，中国是一个出色的棋手。

然而，这些棋局是步步相关的。在国际政治中，贸易或者投资上的有利地位可能被用来获取军事安全领域上的优势地位；战略核威慑上的弱小地位可能限制一国在其他领域内的选择空间。我们可以从各种棋局间相互关联的性质，提出国际政治中的综合实力或者综合影响的概念，并依此判断到底是存在着均势的局面，还是存在着一国居主导地位的状况。综合实力是很难被精确地加以量化的：国家实力中的战略、经济和政治—心理因素的重要性既是不确定的，也是处于变化之中的。但是，一国在综合实力上的相对地位，无疑会影响该国与他国的讨价还价能力，因此我们需要综合实力这个概念。

不仅如此，当我们说当前的大国关系是一种复杂均势时，它并不意味着这些大国相互之间保持着等距离的政治关系，或者它们具有充分的外交活动空间。在作者写作本书的时候，美苏之间和美中之间存在着缓和关系，而苏中关系则不然。虽然日本对美国保持着一定的独立性，并且改善自己与苏联、中国的关系，但是它在战略和经济上同美国所保持的关系之密切程度，超过日本同任何其他国家之间的关系。虽然四个大国在这个时期所具有的外交活动空间多于简单均势时期，但是其外交活动空间仍然是有限的，尤其是双方持续的紧张对峙局面使得两个共产党国家之间无法进行切实的合作。

我们也不能不指出，当前的复杂均势并不是建立在有关大国全面合作或者协调一致的基础之上。美国、苏联、中国和日本没有达成任何一个以维持整体均势为共同目标的基本共识，而欧洲大国在《乌得勒支条约》中表述了这种共识。这些国家也未能就建立避免危机或者控制危机的规则体系达成基本共识（本书的第九章将深入探讨这些问题）。

当前的均势不完全是上文所界定的意义上的偶然均势，因为在阻止任何一个国家占据主导地位的政策中，美国、苏联和中国所表现的“理性”追求中存在着某种人为的因素。同时还可以说，在美苏就维持相互间的均势这个共同目标而达成的协议中，至少是在限制战略武器协定中，也包含着人为因素。但是，从所有三个或四个大国都把均势作为自己的目标这个意义上说，并不存在着人为的均势，因为只有美国明确地把均势视为自己的目标。也没有证据表明，这样的均势意味着大国本身会进行自我约束，而不是相互约束。

美国和苏联就危机的避免和控制以及对战争的限制，制定了一些共同接受的规则。然而，在这些领域中并不存在着一个大国间的、基本的规则体系。不管是在中苏关系中，还是在中美关系中，都不存在着两个全球性大国之间的那种基本的规则体系。由于缺少这样一个基本的规则体系，所以我们不能说除了大国间的均势之外，还存在着旨在管理这种均势的大国一致的局面。

最后，当今的复杂均势并不是建立在均势的主要参加国具有共同的文化之基础上，而18和19世纪的复杂均势的基础就是当时欧洲大国具有共同的文化（本书第十三章将进一步分析这个问题）。在18和19世纪的欧洲国际体系中，共同的文化是维持均势局面和促进大国合作的一个因素，共同的文化不仅指那种有助于增进相互沟通的共同思想传统和理念，也指那种有助于缓和双方利益冲突的共同价值观念。正如我们将在后面进行论述的，美国、苏联、中国和日本具有一些共同的理念，¹¹¹但是在它们之间找不到过去欧洲大国之间那种共同的文化纽带。

上述所有五个方面的误解都源于一个事实，即在当今人们的思维中，均势的思想往往与欧洲的均势体系（特别是19世纪欧洲的均势体系）相混淆。一般说来，欧洲的均势体系具有如下特征：五个主要大国（英国、法国、奥匈帝国、俄国以及普鲁士—德国）的实力大体均等；各国的实力可以用军队的数量来加以衡量；这些国家之间在政治上保持同等距离的关系，具有最大限度的外交活动空间；这些国家达成了有关游戏规则의普遍共识；这些国家具有共同的文化。

19世纪的欧洲体系是否确实具有上述全部特点，这或许是一个值得商榷的问题。实际上，五个大国之间的实力对比在不同时期里是极不均等的。英国的海上权力和金融权力与大陆国家的陆上权力是不一样

的。外交活动空间受到来自神圣同盟、三国同盟和英法“自由同盟”的意识形态上的制约。我们必须认识到,19世纪的欧洲均势体系只是均势现象的一种表现形式而已,在历史上的很多时期和很多地区都存在过均势现象,当我们说今天存在着一个复杂均势体系时,它并不意味着这种复杂均势体系具有19世纪欧洲模式的特征。

当今的均势似乎同前面一节所提到过的历史上的均势一样,对国际秩序的维持具有三个方面的作用。第一,整体均势防止国家体系因征服行为而变成一个世界帝国。均势得以维持下去,没有一个大国采取以武力建立世界政府的行为(见本书第十一章)。

第二,局部均势有助于维护某些特定地区内国家的独立地位,确保
112 它们不被一个地区主导国家所兼并或者统治。今天,中东、印度次大陆、朝鲜半岛以及东南亚半岛国家的独立地位便有赖于当地的局部均势。与此相反,苏联在东欧、美国在中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享有主导地位,这就使得那些地区内的国家不具有通常意义上的独立地位。我们不应该认为局部均势的存在是任何地区的国家享有独立地位的必要条件。否则的话,我们就会忽视政治共同体观念在两国关系中所起的作用,即地区的主导国家可能在某种程度上尊重弱小邻国的独立地位,比如美国尊重加拿大的独立地位,英国尊重爱尔兰的独立地位。我们也必须认识到,某个地区内的国家是否享有独立地位,这可能并不取决于该地区内的大国关系是否处于均势状态,而可能取决于外部大国在地区均势中所起的作用。例如,假如说今天的以色列和它的阿拉伯邻国处于均势状态的话,那么这是因为外部大国在该地区发挥了自已的作用。

第三,当今的整体均势和局部均势为国际秩序赖以生存的其他制度发挥自己的作用创造了条件。国际法、外交制度、战争以及国际体系的管理等等,确保了任何一个大国在力量上都不占据主导地位。所有这些制度要发挥作用,取决于其他国家会采取对等行动挫败一个国家违背规则的行为。然而,一个在整个国际体系或者特定地区中占据主导地位的国家,可能会蔑视国际法,不遵守规则和外交关系准则,剥夺对手以战争捍卫自身利益和权利的能力,或者无视所有大国都应该相互礼让的惯例。

相互核威慑

自从 20 世纪 50 年代以来,在国际政治中存在着另外一种制度或者准制度,这就是相互核威慑。从某些方面上看,相互核威慑是均势的一个特定形式,而从另外一些方面上看,它与均势有别。我将在本节里分析下面一些问题:

- (1) 什么是恐怖均衡或者相互核威慑?
- (2) 相互核威慑与均势有多大的关系?
- (3) 相互核威慑对国际秩序的维持起着什么样的作用?

为了回答第一个问题,我们首先需要界定威慑的含义,然后界定相互威慑的含义,最后界定我们所关心的相互核威慑的含义。

我们说国家 A 以威慑手段阻止国家 B 做某件事,这就意味着:

- (1) 国家 A 威胁国家 B 说,后者如果采取某种行动,那么将受到惩罚或者遭受损失;
- (2) 否则的话,国家 B 可能采取那种行动;
- (3) 国家 B 相信国家 A 具有兑现威胁诺言的能力和意志,并且因此认为不值得采取那种行动。

只有同时满足上面三个条件,我们才能说威慑是成立的。首先要满足第一个条件,即威慑国家必须对被威慑国家发出威胁。例如,假设苏联之所以不敢攻击美国,是因为苏联相信美国会采取报复行动,使苏联遭受难以承受的惩罚,但美国实际上并没有威胁说要惩罚苏联,那么我们就不能说美国以威慑手段阻止了苏联的攻击。威慑国家必须向对方发出威胁,这样我们才能判断结果是否为威慑者所造成的。

要满足的第二个条件是,受到威胁的国家有可能采取威慑国家不希望它采取的那种行动。假如苏联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可能攻击美国,那么即使美国发出要惩罚苏联的威胁,而且苏联也没有采取攻击美国的行动,我们也不能说苏联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它受到威慑。然而,我们应该指出,一个国家制定威慑政策的原因,可能并不是因为被威慑的国家当前具有向该国发动攻击的动机。比如说,美国制定旨在遏止苏联进攻的政策,是为了使得在美国国内产生一种美国可以免遭外来进攻的安全

观念，或者是为了阻止苏联产生攻击美国的动机（尽管并没有证据表明苏联当前具有这样的动机）。

第三个条件是，除非受到威胁的国家相信发出威胁的国家具有能力和意志兑现自己的威胁诺言，从而断定自己本来要采取的行动是不合算的，否则的话，该国就没有受到威慑。威慑国发出的威胁在被威慑国看来必须是“可信的”；必须由被威慑国来判断该国本来试图采取的行动是否合算。威慑国家所发出的威胁是否使得被威慑国家放弃原先试图采取的行动，其结果因条件的不同而有所不同：这取决于被威慑的国家（或者国家领导人）希望通过做某件事达到什么目的，或者判断不做这件事会遭受什么样的损失，以及如何看待威慑国家不希望自己所做的那件事情之重要性，等等。由于这个原因，我们不能说存在着一个绝对的、足以遏止某个国家做某件事的“损害程度”。

以威慑手段阻止其他大国的攻击行为，一直是国家极力运用武力所追求的一个目标。核威慑的特别之处在于，它被国家视为最重要的政策目标，因为国家不愿意在实战中使用核武器。威慑政策或威慑战略一直分别在下述三个方面发生着演变：威慑敌手的行动选择范围；威慑在政策构想中的优先地位；确保威慑发挥作用的军事力量。

因此，美国的政策目标是：以威慑手段阻止苏联对美国发动核攻击；阻止任何针对美国的攻击行为；阻止针对美国或者其盟友的核攻击；阻止任何针对美国及其盟友的攻击行为。这有时被称为是在“有限威慑”和“无限威慑”之间的选择。

威慑一直被视为核武器政策的惟一目标（“纯粹威慑”），或者是
115 “威慑加防务”（比如 1957 年的英国国防白皮书），或者如同在罗伯特·麦克纳马拉担任美国国防部长的后期，人们强调把威慑同其他目标（如“减少损失”）结合起来。

一个国家为了威慑其他国家，不只使用核武器，也可以同时使用核武器与常规武器。也就是说，国家既可以采取单一的、大规模的威胁行为，也可以采取一系列分级的威胁行为。这就是西索尔（Siessor）的“大威慑”（great deterrent）和布扎德（Buzzard）的“分级威慑”（graduated deterrents），或者是杜勒斯的“大规模报复”（massive retal-

iation) 和麦克纳马拉的“灵活反应”(flexible response)。^①

相互威慑是指两个或者两个以上大国相互阻止对方做某件事的一种事态。从广义上说,它可能是大国以多种威胁手段相互阻止对方采取多种行为的一种事态。这些行为和威胁不一定带有核性质,也不一定带有军事性质。威慑国所发出的威胁不一定具有报复性质;大国可能由于害怕遭受常规武器或者核武器的报复性攻击,而不敢使用化学武器来攻击其他国家,或者它们可能由于害怕遭受经济报复,而放弃采取军事攻击行动。然而,我想在这里重点考察相互核威慑这种相互威慑的特殊形式,它指的是两个或者两个以上大国以进行核报复的威胁,来阻止对方蓄意采取核攻击行为。

就我们所说的“均势”事态来说,相互核威慑的情势可能在两大国之间的简单关系中,或者在一个由三个或者三个以上大国组成的更为复杂的关系中形成。目前存在着美苏之间的相互核威慑,中苏之间和中美之间的相互核威慑正处于形成过程中。有人可能认为,在英国和苏联之间以及在法国和苏联之间也存在着这种关系。三个或者三个以上大国之间的相互核威慑关系是几对相互关联的双边关系的总和,而不是所有双边关系的产物。就均势事态来说,相互核威慑的局面原则上既可能在全球范围内形成,也可能在地区范围内形成。假如核武器的扩散范围很广,足以使每个国家都可以使用威慑手段阻止他国发动核攻击,或者如 116 果(这更可能是一种假设)所有国家都被集合在现有的“核保护伞”下面,那么就可能出现一个整体的相互核威慑情势,这就是莫顿·卡普兰所说的“单位否决体系”(本书第十一章将对此进行深入分析)。^② 在当今世界上只存在着局部的相互核威慑关系。

就均势来说,相互核威慑情势的出现既可能是偶然因素的产物,也可能是人为因素的结果。美苏核威慑关系形成于 20 世纪 50 年代末,它是各方努力威慑对方的产物,如果说不是双方争取核战略优势的产物的话。军备控制倡导者的一个核心思想是,偶然出现的均势情势只有通过刻意的合作行为才能得以维持:假如按照其自身的逻辑或者势头发展的

① 要了解这些概念,见 Morton H. Halperin, *Limited War in the Nuclear Age* (New York: Wiley, 1963)。

② 见 Kaplan, *System and Process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pp. 50 - 52。

话，那么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的战略核竞赛就会损害相互核威慑，军备控制领域的合作旨在维护战略核威慑关系的稳定。^①

相互核威慑与均势

有关人为的相互核威慑的思想，在某些方面类似于人为均势的思想，但它们在其他一些方面却是有所区别的。首先，两个大国之间的相互核威慑关系只是双边均势关系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双边均势关系包含国家权力的所有要素，核力量仅仅是其中的一个要素。在两个大国之间的均势关系中，一个大国具有对另外一个大国发动核攻击的能力，相互核威慑关系的建立是双边均势关系得以形成的一个必要条件。但它不是一个充足的条件。在当今，正如我们已经提到过的，苏中之间以及美中之间似乎正在形成相互核威慑关系，也有人认为法苏之间和英苏之间也存在着相互核威慑关系。但是，没有人认为，在上述任何一对关系中，相关的两个国家具有同等的实力。

第二，在简单的情势或者两个大国之间关系的情势中，均势得以产生的前提是双方具有相等或者均等的军事力量，而相互核威慑关系的产生并不需要这样一个前提。相互核威慑关系的产生，只要求每个大国具有足够的核攻击能力，以阻止另外一个大国发动核攻击。对每个大国来说，需要一直保持能够对敌手造成最低程度的、难以承受的伤害之攻击力量。假如一国所拥有的核力量不能给敌手造成这种程度的伤害，那么这样的核力量就不足以对敌国产生威慑作用。如果一国所拥有的核力量给敌手造成的伤害会超过这种程度，那么该国所拥有的核力量就显得过于强大，尽管可能用其他战略标准来衡量，保持这个水平的核力量是必要的，这些战略标准包括：减少伤害程度，把威慑力量的保护对象“扩大”到自己的盟友，或者增强本国在危机期间的讨价还价过程中的外交地位。

^① 我在下面著述中论述了这个问题：*The Control of the Arms Race* (London: Weidenfeld & Nicolson, 1961) ch.2; 和“Arms Control: A Stocktaking and Prospectus,” in *Problems of Modern Strategy*, ed. Alastair Buchan (London: Chatto & Windus, 1970)。

两个大国之间相互核威慑关系的确立并不需要以核力量均等为前提,这体现在美苏两国的关系之中。从两个超级大国之间开始形成相互核威慑关系的50年代初到60年代末这个期间,美国在战略核力量的各个方面,如战略核运载工具(洲际弹道导弹、潜射弹道导弹以及远程轰炸机)的总量、核武器的总当量以及可用于发射的核弹头的数量等等,都明显地对苏联保持着优势地位。60年代末,苏联在某些方面曾获得了与美国平起平坐的地位。也许可以说,美国战略“优势”地位的丧失,使得它失去了外交上的有利地位,而且导致均势发生了有利于苏联的变化。然而,它本身并没有损害相互威慑关系,虽然战略核力量均衡发生了变化,但是相互威慑关系并没有发生变化。

在前面所提到的涉及三个或三个以上国家的复杂均势关系中,均势的维持并不要求有关国家拥有相等或者均等的力量,因为同盟协定可以抵消这种力量不均等的局面。在复杂的相互核威慑情势中,比如在目前正处于形成过程中的苏美中三边关系里,同盟的安排或者临时的合作也可能发挥作用。比方说,美苏联手威胁中国,会损害中国核报复威胁的可信性,而美国或者苏联是无法单独做到这一点的。同样地,美中联手威胁苏联,可能使得中国可以威慑苏联,否则的话中国自身阻止苏联进攻的威慑能力是值得人们怀疑的。法国理论家安德列·博福里曾经指出,在西方存在着华盛顿、伦敦和巴黎三个独立核决策中心的事实,增强了西方阻止苏联发动进攻的威慑力量。^①但是,多边相互核威慑关系中的同盟之作用,不同于旨在维持复杂均势的同盟之作用,前者所关心的依然是保持足够的核威慑力量,而不是联合两个国家的军事力量以防止出现一个主导国家。 118

第三,虽然均势从根本上说是一个客观的现象,但是相互威慑关系基本上是一个主观的现象。我们前面所说的“均势”,指的是事实上不存在一个主导国家的事态,而不仅仅是大家相信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占据主导地位的理念。相反,相互核威慑关系基本上是一种认识的产物,即各方都相信对方具有能力和意志发动对敌手造成足够程度的伤害之报复行为。从理论上说,两个大国可以依靠虚张声势而非真实的能力和意志,来阻止对方发动核攻击。

^① André Beaufre, *Dissuasion et stratégie* (Paris: Armand Colin, 1964).

罗伯特·麦克纳马拉强调指出，美国只有具备真正的实施核报复行为的意志以及拥有实现“确保摧毁”的能力，其威慑政策才能够具有效力。^① 这似乎就是美国的实际政策，那种靠虚张声势而非真实意志与能力的核威慑政策可能要冒很大的风险。然而，真实的意志与能力并不是相互威慑思想的组成部分。麦克纳马拉的观点即使是正确的，它也只是说明，具备进行报复的真实意志与能力，对于让对手相信这种意志和能力来说是至关重要的。

119 第四，均势的主要作用是维持国际体系的生存和维护国家的独立地位，和平局面的维持只是其副产品，而相互核威慑的主要作用就是维持核和平。

相互核威慑的作用

相互核威慑关系目前显然只是存在于美苏关系之中，它可以说发挥着如下的作用：

(1) 它使得有关国家把核战争视为“非理性的”外交政策手段，从而有助于维持核和平，至少是维持了美苏之间的核和平。

(2) 它有助于维持两个主要核大国之间的和平关系，两国都由于担心冲突的升级，而不愿意直接介入非核冲突之中。它也维持了两个大国的盟友之间的和平关系，因为两个大国约束了自己盟友的行为。

(3) 它通过稳定主导均势，即两个全球大国之间的均势，从而维持了国际体系的整体均势。这样一来，相互核威慑关系间接地发挥了维持整体均势的作用：它维持了国际体系的生存和维护了国家的独立地位，为国际秩序赖以存在的其他制度有效地发挥作用创造了条件。

虽然相互核威慑有助于维持核和平，但是我们也应该了解其局限性。首先，相互核威慑只有当处于稳定的状态，也就是说，只有当它具有内在稳定性的时候，才能使得核战争被视为“非理性的”政策手段。光是两个敌对国家手中掌握有核武器本身并不会导致“恐怖平衡”，恐怖平衡的局面也不会因为核武器的存在而自动得以维持下去。从理论上

^① 见 Robert S. McNamara, *The Essence of Security* (New York: Harper & Row, 1968)。

说,如下一个或者两个技术发展的结果,可能会使得相互核威慑关系受到损害:一方或者双方获得保护城市和人口免遭战略核打击的有效防御手段;一方或者双方获得解除对方战略核报复武装的手段。当事方在政治和心理方面所产生的变化,即威慑国家缺少威胁对方的决心和意志,威慑国家无法让对方相信自己具有实施报复行为的能力和意志,以及被威慑的国家认为自己值得采取冒险行动等等,都会损害相互威慑关系。120

第二,尽管相互核威慑关系得以维持,而且蓄意的核战争被视为非理性行为,仍然可能因为意外事故或者判断错误而发生核战争,因为相互核威慑关系本身并不能够消除意外事故或者判断错误。本书不讨论哪些措施可能消除意外事故或者判断错误,我在这里只想提出一点,即核大国单方面或者联合采取行动,以减少因意外事故或判断错误而发生战争的可能性,或者对已经发生的战争加以控制,这些都不属于维持相互核威慑关系的措施。

第三,相互核威慑关系虽然得以维持和使得核战争不太可能发生,但是它无法限制或者控制已经发生了的核战争。人们长期以来批评“单纯威慑”这个单方面的战略政策无法回答这样一个问题:“假如威慑失败了,到底怎么办?”人们也指责有关军备控制的安排建立在一个错误的观念基础之上,即战略核力量上的相互核威慑是一个可以“自我充分实现”的目标。“单纯威慑”不管是在战略上,还是在军备控制上,都是一个不能充分实现的目标,依此提出的主张可能不仅无法防止核战争的爆发,而且有碍于控制已经爆发了的核战争。

第四,有关相互核威慑是导致核和平的一个根源之思想,过于依赖人的行为是“理性的”这个假定。当我们说一个行为是理性的时候,这只是指该行为具有内在的一贯性,与既定目标相一致。实际上并不存在着完全受“理智”而非“激情”所主导的、所有人都会采取的“理性行为”这样一种东西。当我们说一个政治家有意让自己国家遭受破坏或者毁灭是“非理性的”时候,我们只是指这个行为与政治家们通常应该追求的目标不相吻合。这并不意味着政治家们将来不会采取这种行为,或者他们在过去从来就没有采取过这种行动。121

第五,当我们说相互核威慑有助于维持和平局面的时候,我们并非赞同这么一种观点,即国际冲突的两个当事方拥有核武器的事实有助于增强国际安全。我在其他场合中曾经提出,如果我们可以回归无核世界

(实际上这是不可能的), 国际安全将会得到增强, 尽管发生战争(其潜在的毁灭性比较小)的可能性更大。^① 我也反对那种认为核扩散会增强国际安全的论调。^② 然而, 生活在一个核技术不可能消失和核武器已经扩散到其他国家的国际体系中, 我们必须承认核大国之间的相互核威慑关系具有积极的作用。

第六, 相互核威慑关系的维持不利于把国际秩序建立在长远的、更为积极的基础之上。主要大国之间的和平关系建立在各方发出摧毁或者破坏对方市民社会的威胁之上, 这正是把对方当作人质来维护自身安全的做法的当代表现形式, 它表明国际社会中的共同体观念是很弱的。由于这个原因, 一些军备控制理论家主张把战略军备政策和战略军备协议建立在防御而非威慑的基础之上, 而且全球性的大国甚至在达成有关确认相互核威慑关系的谅解(比如 1972 年 5 月的《莫斯科协定》)时, 也不愿意明确表明这是它们相互理解的基础。

① 见 *The Control of the Arms Race*, ch. 5.

② *Ibid.*, ch. 9.

第六章

国际法与国际秩序

我在本章中要探讨以下几个问题：

122

- (1) 什么是国际法，以及国际法对国际行为有多大的影响？
- (2) 国际法对国际秩序的维持有多大的作用？
- (3) 在当今特殊的环境中，国际法对国际秩序的维持有多大的作用？

国际法的性质

国际法可以被看做是对世界政治中的国家及其他行为体在它们彼此交往中具有约束力和法律地位的一组规则。这个定义受到某些权威人士的质疑，所以我们有必要对它加以进一步的解释。

我提到的这个定义把国际法视为一组特定的规则。一些国际法学家否认国际法是一组规则，而是把它视为一个特定的社会过程。这种观点最初来自美国的“现实主义法学派”（legal realism），它如今被表述在国际法耶鲁学派的著述中，特别是在迈尔斯·S. 麦克杜格尔的著述中。^① 麦克杜格尔和他的学派坚持认为，法律应当被看做是一个社会过程，更确切地说是一个决策的过程，它既有权权威性，也具有效力。他们反对那种把法律视为“一组规则”的思想，因为在他们看来，这个具有权威性和效力的决策过程不仅仅是已有的一组规则的实施，它还受到社会、道义和政治考虑的影响。他们还认为，这些社会、道义和政治目标应该在法律决策中起着核心的作用。他们声称，把法律界定为“一组规则”的观点，限制了社会、道义和政治考虑在法律决策

123

^① 见 Myres S. McDougal 和 Associates 的 *Studies in World Public Order*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60)，尤其是其第一章。还可以看 Rosalyn Higgins, "Policy Considerations and the International Judicial Process," *International and Comparative Law Quarterly*, vol. 17 (1968)。

特别是司法裁决中发挥作用的范围。

规则是普遍适用的、必须遵守的规定。一组规则指的是一组普遍适用的、必须遵守的规定，它们在逻辑上相互关联，以至于具有相同的结构。宣称一个国际法规则（或者一个国内法规则，或者一个道义规则，或者一个游戏规则）是有效力的，就等于说这个规则在某种程度上得到另外一个规则的验证。因此，论证国际法和论证其他任何种类的规则一样，就是从规范的层面，而非从实证的或者事实的层面进行推论。

但是，从国际法规则事实上影响着世界政治行为这个意义说，国际法规则是社会现实的一部分。的确，如果一组规则不存在于社会现实中，而只是存在于规范的层面上，那么它们是不会让我们感兴趣的。从这个意义上说，耶鲁学派国际法学家和其他人士所表述的有关法律是“一个社会过程”的观点是正确的。而且，我们也可以进一步认为，在国际法和国内法领域，事实上的法律决策的社会过程，并不是一个纯粹的实施现有法律规则的过程，而是体现了一系列法律规则“之外”的因素的影响，这些因素包括法官、法律顾问以及法学家的社会、道义和政治观念。不仅如此，在法律决策中具有相当重要地位的社会、道义和政治原则并非源于法律本身。

然而，如果我们完全不把法律视为一组规则的话，那么这样的法律思想是很难让人理解的。在规范的层面上，有关法律效力的论证可能只涉及社会、道义和政治考虑，而不包括法律规则的内容，但如果完全抛开法律规则的内容，那么所有的法律推论都是毫无意义的。在事实的层面上，如果我们把法律决策视为一个有别于其他决策过程的特殊的社会过程，那么我们就必须承认这个过程的主要特征就是形成与一套商定的

124 法律规则有关决策的意图。

前面所阐述的国际法概念，把国际法视为制约国家以及国际政治中的其他行为体之间相互关系的一组规则。在19世纪，人们普遍认为，不管其他行为体——比如个人、非国家集团和国际组织——事实上可能在国际政治中起着多大的作用，惟有国家才是国际法的主体，个人、非国家集团和国际组织这些行为体只是国际法的客体。然而，当今很多国际法学家把个人、非国家集团以及国际组织看做是和国家一样的国际法主体，也就是说，这些行为体不只是受到国际法规则的制约，它们也具

有国际法规则所赋予的权利和义务。

按照上面的定义,国际法被看做是一组具有**法律地位**的规则。毫无疑问,存在着一些国家和国际政治中的其他行为体承认对自己具有约束力的规则。从这个意义上说,存在着一个国际社会。但是,这些规则或者它们当中的某些规则到底是否具有法律地位,这是一个具有争议的问题。

在整个近代历史上,传统的看法极力否定国际法具有“法律”地位,其理由是,法律的一个基本特征就在于它是制裁、武力或强制的产物。这种传统看法源于霍布斯观点,即“缺少共同权威的地方,就没有法律”。^① 约翰·奥斯汀对此提出过一个非常有名的论点,即法律是“主权者的命令”(command of the sovereign),由于在国际社会中不存在着一个主权者,把国际法视为“法律”的观点是不正确的,国际法只是“具有积极作用的国际道德”。^② 汉斯·凯尔森所阐述的现代法律学说继承了奥斯汀的法律观点,并对它做了重要的修正。凯尔森认为,法律有别于其他种类的社会规则(比如基于超自然惩罚的宗教规则以及基于自愿服从的道德规则),它是一种“强制性的命令”(coercive order)。^③ 125 从凯尔森的视角来看,法律规则的基本特征就是,它规定一个不法行为(或者违背规范的行为)应该得到惩罚或有灭绝危险的灾祸。

虽然奥斯汀的观点有值得商榷的地方,但是它却道出了一个事实,即不管国际法是否能被称为“法律”,国际法与国内法有一个根本性的区别:现代国家的国内法得到了政府权威的支持,包括政府使用和威胁使用武力的权力,而国际法则得不到这样的支持。

然而,我们不能因此认为,国际法不应该被称为“法律”。有两个派别的理论家反对这种否定国际法具有法律地位的观点。一派理论家声称,虽然国际法是在缺少一个世界政府的环境中发挥作用,但是它仍然以制裁、武力或强制为基础。另外一派理论家承认国际法不是建立在强制的基础之上,但是他们质疑必须从强制性的角度来给法律下定义的假设。

① Hobbes, *Leviathan* (London: Blackwell, 1946), ch. 13, p. 83.

② John Austin, *The Province of Jurisprudence Determined*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1832, and London: Weidenfeld & Nicolson, 1954), lecture VI.

③ Hans Kelsen, *The General Theory of the Law and State*, trans. A. Wedberg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46).

前一个派别的重要代表人物是汉斯·凯尔森本人。凯尔森接受奥斯汀把法律视为“强制性的命令”之基本观点。他进一步指出，确立“共同体垄断武力的使用权”是法律的特征，从这个意义上说，如果在一个存在着法律秩序的地方发生了使用武力的情况，那么它要么是违背法律的行为，要么是代表共同体所采取的强制行为。但是，他认为，国际法是一种“强制性的命令”，它所依赖的是非集中化的制裁，而不是集中化的制裁。

凯尔森认为，在国家内部中，法律是由中央权威来执行的。相反，在国际社会中，法律的执行则是由社会的个体成员依据自助的原则采取制裁行为。制裁行为包括报复行动和战争。不只是违法行为的直接受害国可能采取这样的制裁行为，其他国家也可能采取制裁行为来帮助受害国。以执行法律为目的的报复行为或战争行为，属于代表共同体而采取的行动。

凯尔森的论点是，国际法犹如某些原始法律体系（其中制裁是由普遍接受“以血还血”原则所认可的），强制的基本要素是由该社会各个体成员诉诸自助来维护其权利的意志和能力所表现出来的。他指出，自助原则也存在于国内社会之中。在国内社会中，虽然法律的实施主要依赖于“集中化的”国家强制性机制，但是个人也保留某些基本的自卫权利。凯尔森也承认，国际社会可能包含着某些集中化的强制性机制，比如国际联盟和联合国的集体安全机制。因此，国内法和国际法的区别在于，前者属于“相对集中化的法律规则”，后者属于“相对非集中化的法律规则”。然而，在两种法律规则中，都包含着“共同体垄断使用武力的权力”的因素。^①

国际法在国际社会中的效力实际上依赖于自助的措施。在缺少一个具有主导权力的中央权威的情势中，某些国际法规则的确是依靠自助措施（比如国家使用武力或武力威胁）来发挥作用的。如果一个国家遭受攻击或者攻击的威胁，或者其独立地位受到威胁，而且它使用武力来进行自卫，那么我们就不仅可以说这个国家在捍卫自己的合法权利，而且也可以说该国没有别的途径来维护这些权利。虽然每个国际法规则的效力并非依赖于强制性的自助行为，但是国际社会作为一个整体，可能依

^① Ibid. ch. VI.

赖于自助行为。由于这个原因，国际法在国际社会中的效力与均势的作用（见第五章）密不可分。只有当权力以及使用权力的意志在国际社会中处于这么一种分布状态，以至于国家在遭受侵害的时候至少可以捍卫自己的某些权利的时候，国际法规则才会受到尊重。

然而，尽管国家采取报复和战争的行为往往有助于维护法律的尊严，这并不意味着国家采取报复和战争行为的主要动机就是为了执行法律。国家出于各种政治动机而诉诸武力，这些动机包括：追求物质利益；对其他国家的恐惧；希望其他国家接受一种信仰或者观念（见第八章）。有关侵害他国权利的行为应该受到纠正或者惩罚的观念，或许并非其中的一个动机；即使是其中的一个动机，它也可能仅仅是诸多动机中的一个，而不是最重要的动机。¹²⁷

不仅如此，即便国家通过诉诸武力可以捍卫国际法所规定的权利，或者维护法律的权威，我们也可能很难证明这是整个国际社会的共识。凯尔森观点的主要问题在于，国际社会在具体的个案中，无法就断定战争中的哪一方违反法律、哪一方站在国际共同体的一边达成共识。根据凯尔森的观点，已经爆发了战争要么是违法行为，要么是制裁行为。只是在这个意义上说，国际社会中存在着“共同体垄断武力的使用权”。但是，不管法律分析是否总能证明战争要么是违法行为，要么是强制执行法律的行为，我们不可否认一个事实，即整个国际社会从来就没有普遍接受这样的解释。对于冲突中哪一方是正义的这个问题，国家常常没有一致的认识。在哪一方代表共同体、哪一方属于违法者这个问题上，国家之间可能存在着严重的分歧，或者它们都把战争视为纯粹的政治问题。19世纪实证主义的国际法学家认为，法律不要试图去区分战争中的正义与非正义的当事方。这正说明，国际社会在此问题上的确没有形成共识。有关国际法是依赖制裁制度的、非集中化的强制性命令之思想是一个神话，它与现实并不相符合。^① 另外一个捍卫国际法乃真正的“法律”的观点之方式，就是质疑霍布斯及其思想继承人的观点，即法律同制裁、武力或强制是分不开的。有关法律规则依赖于制裁的观念来自国内法。我们或许可以说，制裁并非是法律规则的一个必要特征；有

^① 我曾经在下面一篇文章中论述过这个观点：“The Grotian Conception of International Society,” in *Diplomatic Investigations*。

关法律是强制性的社会命令的思想能否完全适用于国内法体系，这本身就是值得怀疑的。

例如，H. L. 哈特就指出，把法律视为“依靠威胁的命令”之观点，在很多方面与国内法并不相吻合。在所有种类的法规中，刑法最接近于那种依靠威胁的命令，但两者依然是有所区别的，因为刑法不只是适用其他人，它也适用于制定该法律规则的人。各种有关规定司法判决或立法权力、确立或变更法律关系的国内法律规则，都不能被视为依靠威胁的命令。有些法律规则在产生的方式上不同于命令，因为它们并不是产生于某种指令。最后，哈特声称，我们如果认为主权者只是习惯性地服从规则，而不受任何法律的约束，那么就无法解释现代法律体系的延续性。^①

哈特指出，法律体系的特征并不在于存在着一个能够运用武力来维护规则的政权，而在于“基本规则与从属规则的结合”。基本规则是指那些要求人类应该或不应该采取某些行为的规则，比如有关限制暴力、信守诺言以及保护财产权的规则。从属规则指的是那些有关规则的规则：它们不强制规定人们的义务，而是赋予人们权力以“提出新的基本规则，取消或者修改旧的规则，或者以各种方式确定它们的影响范围或者规定它们的作用”。^② 它包括那些有关确立立法、行政或者司法权力的规则。

哈特提到，设想一个只有基本规则的社会的存在是可能的，对原始社会的研究表明，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然而，他指出，这样一种纯粹的基本或者“非正式”规则结构是具有某些缺陷的，消除这些缺陷的办法就是用从属规则或者有关规则的规则，来补充基本规则结构。

在只有基本规则的地方，“社会赖以生存的规则不会构成一个体系，它们仅是一系列相互独立的标准，它们除了都得到特定人类集团的认可之外，缺少共同的特征。”^③ 这样一来，如果有人对规则产生了异议，那么在这样的社会中并没有解决这种分歧的程序。这一缺陷，即“不确定性”，可以用哈特所说的“承认的规则”来加以消除。这些规则“会

① 见 Hart, *The Concept of Law*, p. 77.

② Ibid. p. 79.

③ Ibid. p. 90.

特别指明一个规则所具有的某个或者某些特征必然意味着，它是一个集团的规则，并产生社会压力，使之得到遵守”。^① 这样的特征可能不仅表现为权威性的规则文本或者条文，它还被记载于某个书面文件上，¹²⁹ 或者被雕刻在某个纪念碑上。或者在一个复杂的社会中，这个特征可能表现为，规则是由某个特定机构所颁布的，或者它们是在长期实践中为人们所遵守的惯例，或者它们的产生与司法判决有关。正是由于存在着这样的规则或者承认的标准（根据哈特的理论，它等同于凯尔森法学理论中的“基本规范”），我们才可以说一整套规则构成了一个法律体系。

不仅如此，如果只有一套基本规则，那么这些规则必然带有静止的特性，我们就会缺少通过取消旧规则或者采纳新规则、从而让规则适应变化了的环境之手段。

这样一个社会所知道的惟一的规则变化方式，就是缓慢的发展过程，当初被视为随意性的行为方式变成了习惯性或者通常性的行为方式，然后又变成了强制性的行为方式，这种僵化的过程开始还为大家所关注，后来就被熟视无睹了。^②

另外一种从属规则，即“变革的规则”，可以消除这种缺陷，它使得个人或者机构可以采纳新的基本规则和废除旧的规则。

那种依赖基本规则的简单形式的社会所存在的第三个缺陷，就是“分散的社会压力不足以维护规则”。在每个社会中，都会产生是否应该违反某个特定规则的争端，但在缺少解决该问题的权威手段的情况下，这样的争端很可能永远都得不到解决。消除这个缺陷的药方，就是第三种从属规则，即“裁决的规则”，它使得个人能够判断一个基本规则在特定的个案中是否已经被违背，并且制定相应的程序。

哈特把基本规则和从属规则相结合的法学思想，使得我们可以摒弃那种认为法律同制裁或惩罚分不开的观点。然而，它并没有为我们解答国际法是否可以称为“法律”这个问题。因为我们所说的国际法显然就是哈特所说的一套基本的规则。国际社会具有这样一些规则，它们被普

① Ibid. p. 92.

② Ibid. p. 90.

- 130 遍认为具有法律地位，要求国家以及其他行为体应该或不应该如何行为。但是，我们不可能找到承认的规则，来明确判断这些规则是否为体系中的一部分，以及它们在体系中的相互关系是什么样的。我们也不可能找到变革的规则，让任何机构根据环境的变化来确定，在一个特定的个案中是否发生了违背规则的行为。

哈特本人并没有因此否定国际法具有法律地位。他没有试图用有关法律是基本规则与从属规则结合的思想，为法律下一个毫无争论余地的定义，而是接受了“国际法”这个词汇的创始人边沁的观点，即国际法规则同法律是“十分相似的”，使用国际法这个词是合理的。^①

那些否认国际法具有法律地位的观点，有助于我们理解国际法的某些特征，特别是它同国内法的区别（类似于原始社会的法律）。然而，把国际法视为“法律”的观点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而且有关该问题的争论并非是无用的或者无意义的。国际法作为行为惯例，事实上同国内法有很多共同之处。两者的语言和程序是很相似的。现代法律既包括国际法，也包括国内法。那些关注国际公法以及国际私法的行为体，即政治家及其幕僚、国内和国际法庭以及国际会议，都承认国际法规则就是法律规则，并以此作为自己的行为基础。假如国际法规则所规定的权利和义务仅仅具有道义或礼仪的地位，那么这些行为体的所有行为都是不存在的。正是由于国际法规则具有法律地位（尽管这在理论上可能还有问题），才使国际行为的主体有可能在国际社会的运行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国际法的功效

在界定完国际法的含义之后，现在让我们来探讨一下国际法对国家实际行为的影响。规则本身只是理性建构的产物。如果我们要说国际法规则是影响国际生活的重要因素，那么我们就必须证实国际法规则的确具有一定功效，也就是说，规则所要求的行为同国家以及国际政治中的其他行为体的实际行为之间，具有某种程度上的吻合性。

^① Ibid. p. 231.

为了证实国际法规则的功效,我们并不需要证明实际的行为和规则所要求的行为是完全一致的,也就是说,不存在着规则受到蔑视的情况。任何法律规则体系并非从不遭到蔑视。事实上,如果实际的行为和要求的行能够完全一致的话,那么规则就根本没有存在的必要。由于这个原因,社会并没有制定要求其成员呼吸、进食和睡觉的规则,而是制定了要求他们不能杀戮、偷盗或者撒谎的规则,不管是否有禁止这类行为的规则,社会中的某些成员都会这么去做。

问题在于国际法规则是否得到足够程度上的遵守(不可能准确判断被遵守的程度),以此证明我们是否应该把国际法规则视为国际政治中的重要因素,特别是,它是否为维持国际秩序的手段。一直存在着这么一个学派,不管它是否反对把国际法称为“法律”,总是认为这些规则是不存在的,或者它们最多只是现实的国际关系行为中的一个微不足道的因素。

在实际的国际行为和国际法规则所要求的行为之间,无疑存在着很大程度上的一致性。如果我们可以,而且很有必要对国际法规则被遵守的情况做定量分析的话,那么其结论很可能就是,大多数国家在绝大多数的时候都遵守普遍接受的国际法规则。任何一个国家,只要它至少同另外一个国家和平相处,发展外交关系,进行货币、商品和人员的交流,或者缔结协定,就必然要遵守国际法规则。

132

在特定情况下,法律规则会遭到违背或者蔑视,但这样的情况本身并不能证明国际法是没有效力的。首先,一国违背某个特定的国际法规则的同时,还遵守其他的国际法规则,甚至在过去也遵守如今被违背了的规则。例如,德国在1914年入侵比利时,违背了1839年的条约(比利时中立化)以及有关条约必须得到尊重的国际法规则,但是它继续遵守其他的国际法原则,并以此作为处理自己同其他国家关系的基础。而且德国在其他情况下,继续在言行上遵守条约不可违背的规则。

其次,违背条约的行为本身有时包含着遵守所违背的规则之成分。违背规则和遵守规则之间的区分并非总是那么一目了然的,当权者往往最后总是用“是”或者“不是”这样的答案来判断是否发生违背规则的行为,但是得出此种答案的判断过程可能带有不确定或者武断的成分,这不仅表现在对规则的解释上,也表现在对事实的认识上。在现实中,一个国家实际上对特定国际规则所采取的态度,从完全遵守规则的一个

极端，到完全违背规则的另一个极端，存在着一个选择的范围。违背一个协定的行为可能是对另外一方某个行为的反应，目的在于维护该协定的某个部分，或者保留恢复该协定的可能性。

第三，违背某个规则的国家经常努力表明自己（以及其他国家）依然受该规则的约束。在某些个案中，违背规则的国家可能会否认自己违背了规则。例如，纳粹德国声称自己在1936年使莱茵河地区重新军事化的行为所违背的协定，由于其他当事方的违约行为早已失效，或者说德国是在协定失效后才采取行动的。在其他的个案中，比如德国在1914年侵犯比利时的中立地位，或者美国在1960年承认自己的U—2飞机侵犯了苏联的领空，违背规则的国家可能承认自己违背了规则，但是声称自己之所以这么做，是出于某些至关重要的原则。即使这些国家援引了“必要性”或者“至关重要的利益”的原则，它至少也表明了这些国家承认需要为自己的行为做出某种解释。

一套规则不具备效力的一个更为明显的表现是，不仅实际的行为和规定的行为不相一致，而且当事方不承认义务本身具有效力或者约束力，比如当事方刻意援引不同的和相互矛盾的原则，或者不加考虑地蔑视规则。不加考虑地蔑视规则——这是由于对规则缺乏了解，或者不同意这些规则得以产生的根据——是那些不承认存在着一个共同的国际社会的集团的典型行为。我们可以从历史上国际社会中的国家成员同游离于国际社会之外的政治实体之间的关系中，找到这样的例子（本书第二章讨论了其中一些例子）。在现代国际社会的历史中，时常出现追求革命性变革的国家故意拒绝接受国际社会的所有或者某些法律规则的行为，比如布尔什维克俄国蔑视有关国家继承的国际法规则，或者当代某些非洲和亚洲国家蔑视殖民主权（colonial sovereignty）和外国财产权利的合法性。但是，这些有关故意拒绝接受国际法规则的例子，只是代表了这些规则暂时和局部地失效的情势，并不意味着整个国际法律体系崩溃了。

那些贬低国际法的人尽管指责国际法毫无效力，这显然是错误的观点，但他们有关尊重法律并非等同于服从法律的观点又是颇有道理的。国际法的存在是一个社会现实，以至于其规则在很大程度上都得到了遵守，但我们不能因此认为国际法是世界政治中的一个强有力的施动者或者推动力。

国家遵守国际法的部分原因在于习惯或者惰性，它们总是愿意在既定原则的框架内行动。如果国家是有目的或者有意识地服从国际法的¹³⁴话，那么这是由于三个方面的动机。第一，国家服从国际法可能是由于这么一个事实，即国际法规则所规定的行为被认为是很有意义的、必须执行的或者有义务执行的，它是某个更为广泛的价值观念体系的一部分，或者是追求这种价值观念的手段。主要由于这类原因而被遵守的规则，有时被称为“国际共同体法”（the international law of community）。第二，国家服从国际法可能是由于受到某个试图执行协议的大国之惩罚或者惩罚威胁。主要由于这类原因而被遵守的规则有时被称为“国际权力法”（the international law of power），比如战败国接受和约，并且在自己的实力处于虚弱状态的时候不去否定战争的裁决。第三，国家之所以服从国际法，可能是希望其他国家采取对等的行为。基于此种相互利益观念的协议和原则有时被称为“国际互惠法”（the international law of reciprocity）。它包括国际法最基本的原则，比如相互尊重主权、坚守诺言以及战争法规。^①

有人认为国家只是出于不可告人的目的才服从国际法，或者它们只是在国际法对自己有利的时候才会这么做。这种看法似乎否认国际法得到了国家的尊重。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国际法的重要性并不依赖于国家以牺牲自己的利益为代价来遵守国际法原则，而在于国家经常从自己的利益考虑出发来看待和服从国际法。

国际法对国际秩序维持所起的作用

国际法对国际秩序的维持起了什么样的作用呢？国际法的第一个作用就是把主权国家社会的观念视为人类政治组织的最高规范性原则。这就是本书第二章所说的当今世界政治的基本原则或根本原则。在当今现代国家体系中，人类大社会之所以有秩序，正是因为以下原则获得了普遍的¹³⁵认可：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人口和领土，并且拥有各自的管辖范

^① 有关这三个方面的论述，见 Georg Schwarzenberger, *The Frontiers of International Law* (London: Stevens & Son, 1962), ch. 1.

围，但所有国家又都遵循一套共同的规则。国际法通过表明和阐述这个原则和否定其他原则——比如霍布斯主义者有关国际政治中不存在着约束国家间相互关系的规则之观念，或者有关人类在世界正义的基础上组成一个世界国家的思想，或者有关建立一个由某个特定民族或者种族占主导地位的世界帝国之观点——确定了一套特别的、在现阶段决定人们思想与行为的观念，从而防止产生无休止的争端与无限制的冲突。

作者在本书的其他地方强调，从理论上说，人类大社会的秩序可能通过主权国家社会之外的途径得以实现，因为主权国家社会并不是历史的必然产物，也不具有道义上的神圣性。假如人类按世界国家、世界帝国或其他的原则组织起来的话，那么法律可能就会把这样的原则视为最高和基本的原则。但是，存在着一系列相互竞争的、与全球范围内的秩序相抵触的世界政治组合原则，欧洲在宗教战争时期就面临着这种局面。因此，法律在维护世界政治秩序中所起的第一个作用，就是确认所有这些相互竞争的世界政治组合原则中的某一个原则为最高的规则。

国际法对国际秩序的维持所起的第二个作用，就是阐述国家以及国际社会其他行为体相互共处的基本规则。这些规则（我们在前面已经讨论过）涉及三个基本的方面：有关限制国家和其他行为体之间暴力行为的规则；有关这些行为体之间协议的规则；有关主权和独立的规则（见第一章和第三章）。

国际法的第三个作用，就是帮助动员国际社会行为体遵守国际社会的规则，这不仅包括前面所论述的基本的共处规则，也包括本书第二章和其他章节所论述的合作规则及其他规则。我们已经知道，虽然国家的实际行为在某种程度上与国际法所规定的行为是相一致的，但是尊重国际法并不是导致这种一致性的主要推动力。由此可见，那种认为国际法
136 对国际秩序的主要贡献在于它限制了国际行为之观点，显然是错误的。政府会在一定程度上尊重法律义务，它们不愿意因为无视法律义务而损害自己的名誉，同时，它们在大多数的时候都是为了实现自身利益才会签署协定的。然而，当法律义务同自己的重要利益和目标发生冲突的时候，政府经常蔑视这些法律义务。

但是，除了国际法通过约束国际行为来确保国际社会的规则得到遵守之外，其他重要因素，比如有关当事方接受协议所基于的目标或价值观念，受到一个强国的惩罚，以及互惠利益等等，也促使国际社会的行

为体遵守国际法。上述其他重要因素是独立存在于法律义务之外的，如果没有它们的作用，法律义务是无效力的。但是，国际法框架有助于使这些因素发挥作用，来促使国际社会行为体遵守协定。尤其是，国际法为国家提供了一个可以表述自己在相关问题上的意图之渠道，使得国家可以相互了解对方的未来政策，阐明协议的性质，包括协议的有效范围和限定条件，以及让协议带上庄严的色彩，从而使得当事方期望该协议长久存在下去。

国际法的局限性

虽然国际法对于国际秩序的维持能够发挥上述作用，但是我们也有必要注意到，国际法的作用是有局限性的。首先，国际法并非国际秩序的一个必要的或者关键的条件。国际法固然对国际秩序的维持起了重要的作用，然而从理论上说，国际法所具有的这些功能也可能通过其他方式得以实现。一组道义规则或者超自然规则也可能确立国家社会观念的核心地位、阐明基本的共处规则、提供保证协定得到遵守的手段。¹³⁷历史上的某些国际社会——希腊的城邦国家体系，亚历山大去世以后而兴起的希腊王国体系，古印度的国家体系——都没有国际法律制度。近代国际社会之所以把国际法当作自己的一个制度，只是历史的偶然结果，它是从原先的一元体系，即西方基督教世界演变而来的，而且在这个体系中，法律观念——体现在罗马法、神权法、教会法以及自然法之中——占据显著的地位。国际法在当今国际社会中的地位使得它具有独特的作用。由于国际社会的核心规则被认为具有法律地位，而不仅仅是具有道义地位，因此有关国际法具有约束力的观念是特别强大的，而且有关国际规则从原则上说只有一个权威性的解释（尽管由于缺少权威性的“裁定”规则，我们可能难以发现这样的解释）之观念也是根深蒂固的。

第二，国际法本身不足以产生国际秩序。除非具备其他条件，否则国际法不具有任何的功能。如果不在某种程度上存在着一个国际社会的话，国际法就不能够把国际社会的观念确定为最高的规范性原则，并使之获得承认。只有当国家实际上在某种程度上相互承认对方的生存利益

时，国际法才能够通过阐明基本的共处规则，为国际秩序的维持做出自己的贡献。国际法调动国际社会中遵守规则和协议的因素之作用，需要具备一个前提条件，即这些因素存在于国际社会中。即便如此，国际法本身也不能够像“以法律实现世界和平”或者“通过世界法律走向世界和平”构想所阐明的那样，成为维持秩序或者和平的工具。国际法约束规则和禁止规则的增多或作用的“加强”，可能通过动员其他因素或者让这些因素引起人们的注意，从而增进国际秩序。但是，假如我们在不具备这些因素的前提下，企图制定有关秩序或和平的法律，那么这样的做法只会导致国际法无力完成维护和平的使命。

138 第三，国际法或者国际法的某个特定解释，事实上有时会对维持国际秩序的措施产生阻碍作用。这典型地表现为国际法与维持均势的必要措施之间的冲突。国际法的规则和维持均势的要求之间的冲突体现在几个方面。一个方面是预防性战争问题。国际法的大多数解释都把预防性战争视为非法行为，声称如果一个国家对另外一个国家没有造成法律上的伤害，那么后一个国家对前一个国家宣战的行为就是非法的。然而，按照本书第五章所提到的均势原则，如果一个国家相对实力的增长对均势构成威胁，那么其他国家可以对该国发动战争，尽管这个国家并没有对他国造成法律上的伤害。

这两套原则相互冲突的另外一个表现方面是对侵略性战争进行制裁的问题。在意大利入侵埃塞俄比亚的时候，国际法学家普遍认为，意大利的战争行为违背了《国际联盟盟约》所规定的义务，而且国际联盟呼吁成员国制裁意大利，并且英国、法国和其他成员国应当执行制裁的决定。但是，从均势的角度来看，制裁的结果只会导致意大利投入德国的怀抱，这会损害英法与德国之间的均势。这样的冲突在1939年俄国入侵芬兰时也反映出来，当时英国和法国必须进行一个选择，要么把俄国视为“侵略者”，并对它采取行动，要么与俄国进行合作，以对付德国。

国际法和均势规则相互冲突的最后一个表现方面涉及干涉的问题。国际法的大多数解释主张一国不得对他国的内部事务进行强制性或独裁性的干涉（尽管也有人主张，如果受到当地政府的请求，其他国家可以出面干涉，以反对该国所受到的外部干涉行为）。然而，人们经常指出，
139 从整个国际社会力量的分布方面考虑，均势规则要求对一个国家的内部事务进行干涉，以便确立某个大国在该国的影响，或者抵制另外一个大

国对该国的影响。

人们想到了各种解决此种冲突的办法。一种办法是，试图把均势规则吸收到国际法中。另外一个办法是，限制国际法的适用范围，把均势问题和其他维持秩序的规则都划入不受法律制约的“权力政治”之范畴。我在这里不想探讨能否或者如何解决这种冲突的问题，只是想让大家注意到，国际法对国际秩序的贡献是有限度的。

第四，我应该在这里指出的是，国际法是实现目的的手段或者工具，而不是秩序本身，而且国际法可能同国际秩序相抵触。比方说，法律手段有时被用来促进世界政治中的正义目标——国际正义、人类正义或者世界正义——这样的目标可能会破坏国际秩序（见第四章）。法律是实现各种政治目的的一种手段，而追求正义只是这些目的中的一个目的。

当代国际法

国际法对当今特殊环境中的国际秩序之维持具有什么样的作用呢？国际法专家指出，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国际法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国际法的变化涉及四个方面。一是国际法主体，或者说受国际法制约的实体。二是国际法适用范围，或者说国际法所适用的对象。三是法律的制定过程。四是国际法学家的作用。

就国际法主体来说，人们的认识似乎已经从根本上偏离了 19 世纪实证主义者的学说，实证主义者认为国际法（用奥本海的话来说）“仅仅是国家间的法律”。^① 现在人们普遍认为，个人是国际法的主体，纽 140
伦堡和东京战争罪行法庭的宪章、1948 年的《世界人权宣言》、1966 年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和《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1950 年的《欧洲人权公约》等等都是明证。很多权威人士把如下一些团体视为国际法的主体：联合国以及其他世界性或者准世界性的政府间国际组织；地区性政府间国际组织；非政府间国际组织，如专业和

^① Oppenheim, *International Law*, vol. I, ch. 1.

科学团体、非盈利性基金会以及跨国性经济组织。^①

某些人士声称，由于国家不再是惟一的国际法主体，它们现在同个人以及其他团体一样都是国际法主体，所以过去的国际法正在逐渐变成世界共同体法（the law of world community）。于是菲利普·杰塞普写道，国际法正过渡到“跨国法”（transnational law），或者说是变成规范跨越国家边界的所有行为或者事件的法律，不管这样的行为是国家的、个人的、国际组织的、公司的，还是其他团体的。^② 威尔弗雷德·詹克斯提到了“人类共同法”（the common law of mankind）的出现，帕西·科尔贝论述了从国际法到“世界法”（world law）的演变。^③

至于国际法适用范围的变化，很显然，自从二战结束以来，有关规范经济、社会、通讯和环境问题的国际法规则大大增多，而以前的国际法主要关注政治和战略问题。国家行为领域的扩大，加上非国家行为体在世界政治中的重要性之提高，导致国际法更多地关注经济问题（这体现在联合国经济和社会理事会、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粮农组织以及其他组织的活动上）、社会问题（这体现在世界卫生组织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工作上）、交通和通讯的
141 管制问题（国际电信联盟或者国际民用航空组织）以及最近出现的有关人与自然关系的管理等方方面面的问题。

国际法适用范围的扩展使得罗林提出，传统的“国际自由法”（international law of liberty）正在演变成当代的“国际福利法”（international law of welfare）。在罗林看来，“国际自由法”是由富裕的欧洲国家组成的小集团所制定的，旨在根据自由国家的行为模式，调和国家间的自由权利。相反，“国际福利法”表明国家增加了对经济生活的干预，也反映了处于大多数地位的非欧洲国家以及不富裕的国家在国际社会中

① 比如见 Myres S. McDougal, Harold D. Lasswell and W. Michael Reisman, "The World Constitutive Process of Authoritative Decision," in *The Future of the International Legal Order*, ed. Richard A. Falk and Cyril E. Black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69), vol. 1. 另外见 C. Wilfred Jenks, "Multinational Entities in the Law of Nations," in *Transnational Law in a Changing Society, Essays in Honour of Philip C. Jessup*, ed. Wolfgang Friedmann, Louis Henkin and Oliver Lissitzyn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72)。

② 见 Philip C. Jessup, *Transnational Law*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56)。

③ 见 C. Wilfred Jenks, *The Common Law of Mankind* (London: Stevens & Son, 1958); and Percy E. Corbett, *The Growth of World Law*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1)。

影响的增大，这些国家在国际阶级斗争中挑战自由法。他写道：“世界共同体注定要变成一个福利共同体，正如民族国家已经变成福利国家一样。”^① 沃尔夫冈·弗里德曼（Wolfgang Friedmann）写道，从某种意义上说，从“国际共处法”（international law of coexistence）到“国际合作法”（international law of cooperation）的演变，既体现了国际法吸纳欧洲以外的新国家之“水平”发展，也反映了国际法规范新领域内的国际行为之“垂直”发展。^②

人们也普遍认为，国际法的制定过程或者国际法得以产生的渊源发生了变化。自从19世纪以来，国际法学家的主流观点是，国家的同意（consent）——不管是包含在国际公约或者条约、普通法或者特别法中的明示的同意，还是包含在国际习惯法中的暗示的同意——才是国际法惟一的、真正的渊源。《国际法院规约》第38条提出了国际法的四个渊源：不论普通或特别国际协议，确立当事国明白承认之规则者；国际习惯，作为通例之证明而经接受为法律者；一般法律原则为文明各国所承认者；司法判例及各国权威最高之公法学家学说，作为确定法律原则之补助资料者。

前面所列举的第三和第四个渊源是否为有效力的国际法，似乎值得 142 讨论，因为在某个问题上发生争端的国家可能并不承认国际法院的判决，或者我们可能难以确定这些国家是否承认判决。但是，《国际法院规约》把第四个渊源只是视为决定法律的“补助”方式；其他三个源泉则被看做是主要渊源，它们根植于国家的对外实践中；在实证主义者看来，《国际法院规约》本身就是这么一个文件，其效力来源于签字国的明示的同意。

有关国际法只是来源于国家同意的学说，一直在同16到18世纪的主流学说进行辩论，后者认为国际法来源于自然法。在20世纪，以布赖尔利和劳特派特为代表的一些人试图使自然法为国际法渊源的观念得

^① B. V. A. Röling, *International Law in an Expanded World* (Amsterdam: Djambatan, 1960), p. 83.

^② Wolfgang Friedmann, *The Changing Structure of International Law* (London: Stevens & Son, 1964).

到复兴。^①同时也产生了很多新的理论，它们抛弃了过时的自然法学说，声称除了国家的同意之外，还有其他的国际法渊源。其中，在目前最有影响的是“社会连带主义”理论。这种理论的特点是，它们极力否定自然法是国际法的渊源，认为有效力的国际法只来源于国家的实践中，它们声称有效力的国际法不仅来源于国家所同意的那些规则，也来源于整个国际社会得以实现团结和产生共识的那些规则，尽管某些国家并不承认这些规则。

因此，理查德·福尔克指出，“显然存在着一个国际法律义务的基础从同意向共识转变的趋势”，共识（consensus）指的是“绝大多数的意见、国际观念的趋同、占主导地位的认识，它是一种高于简单多数的意见、低于全体一致或者普遍认识的东西”。^②福尔克想到的主要例子是联合国大会在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问题上所表现出来的共识。福尔克称，国际社会要想有效地运行，就应该获得把这种共识变成法律规则的立法权威，为此可以不顾一些主权国家的反对意见。他特别强调指出，国际法院应该确认共识为国际法的一个渊源。^③但是，他并没有说国际法律义务的基础从同意到共识的转变是值得称赞的现象，而只是认为它是当前出现的趋势。

从社会连带主义的视角来看，关键的问题是联合国政治机构的法律地位，尤其是联合国大会决议的法律地位，联合国大会的决议被视为国际社会团结一致或者具有共识的证据。传统的实证主义理论认为，联合国大会的决议只是建议，不具有法律约束力。社会连带主义者则极力证明这些决议具有法律地位或者具有某种重要性。人们一般不说联合国大会是一个世界立法机构，它的决议可以成为世界性的法律。但是人们经常认为，那些多次以绝大多数票通过的决议以及具有特别庄重意义的决议，或者（如苏联学者有时提到的）那些得到两个主要的社会经济体

① 见 J. L. Brierly, *The Basis of Obligation in International Law*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58); and Hersch Lauterpacht, *International Law and Human Rights* (London: Stevens & Son, 1950)。

② Richard A. Falk, *The Status of Law in International Societ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0), p. 177.

③ Ibid. ch. 5.

系, 以及三个主要政治集团支持的决议, 应该具有法律地位。^① 在这派学者中间, 观点较为温和的人士认为, 这样的决议虽然不具有法律约束力, 但是它们对于立法过程是很重要的, 或者说影响了立法过程。罗莎琳·希金斯在其重要的著作《通过联合国政治机构发展国际法》中指出, 总的来看, 联合国大会的决议是“习惯法的重要渊源”。^② 威尔弗雷德·詹克斯最清楚地表述了社会连带主义者的观点。他指出, 现在的国际法义务的基础是“国际共同体的意志”。^③ 詹克斯认为, 过去人们对于具有约束力的国际法的渊源之认识一直是不甚明确的, 因为“国际法目前只发展到这么一个阶段, 以至于我们只能根据经验和现有的可能性对它进行理论上的解释, 有关国际法律义务基础的分析只有从历史、逻辑以及目的论的角度上进行, 才是令人满意的”。^④ 在他看来, 在我们这个时代, 国际共同体的意志已经成为国际法律义务的基础。 144

最后, 国际法学家的作用发生了变化, 他们在国际法领域中起着重要的作用。根据目前依然在英国以及西欧占主导地位的传统实证主义观点, 法官、法律顾问以及法学家的作用就是表述国际法规则, 这种表述是准确的和客观的, 不受非法律的价值观念如道义、社会以及政治价值观念选择的影响。这种传统的观点并不否认对法律的解释具有道义、社会以及政治的影响, 或者认为考虑这些影响是十分必要的。但是, 传统实证主义者坚持认为, 在道义、社会以及政治观念之间的选择, 不应该决定国际法学家对现有法律内容的解释。

然而, 现在有一批影响很大的国际法学家(他们主要是美国的国际法学家, 但不只是美国的国际法学家)表明这么一个观点, 即国际法学家现在是, 而且应该是“以政策为导向的”, 也就是说, 他们必须要在道义、社会以及政治价值观念之间做出选择。那些信奉这种学说者的认识基础, 是早期“现实主义法学派”的一个论点, 即所谓的“非法律的考虑”, 事实上总是影响着法官、法律顾问以及法学家对法律内容的解

① 见 E. McWhinney, *International Law and World Revolution* (Leyden: Sijthoff, 1967), ch. 4.

② Rosalyn Higgins, *The Development of International Law Through the Political Organs of the United Nation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3), p. 5.

③ 见 C. Wilfred Jenks, *Law, Freedom and Welfare* (London: Stevens & Son, 1963), ch. 5.

④ Ibid. p. 83.

释。因此，“以政策为导向的法学”之倡导者们认为，在任何一个案例中都存在着国际法律决策的因素。^①但是，他们也指出，明确国际法学家扮演法律制定者的角色，而不仅仅是扮演法律的应用者和解释者的角色——而且用理查德·福尔克的话来说，把法律从“逻辑与教条束缚的神话”中解放出来——会使得国际法学家处于一个可以为国际法的发展做出建设性与创造性贡献的地位。^②在他们看来，我们必须把法律放在一个社会背景中加以考察，不能抽象地看待法律，法律要对社会背景的变化做出反应，它必须是动态的，而不应是静态的。国际社会缺少一个可以改变法律的立法权威，这妨碍了专业的国际法学家在解释法律的时候注意到价值观念的变化。

145 二战后国际法在上述四个方面的变化，是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的。它们使得某些国际法学家得出结论说，国际法不仅发生了变化，也有所进步：从约束国家的法律演变成了世界共同体的法律；从仅仅关注国家间共处的法律演变成为关注世界共同体中人类经济、社会和环境合作的法律；从一种无法阻止某些无法无天的国家蔑视世界共同体共识的法律，演变成一种使这种共识具有约束力的法律；从一种被静止地和机械地加以解释、与世界共同体观念的变化不相干的法律，演变成一种被动态地和创造性地加以解释、与观念的变化密切相关的法律。

然而，国际法的这种“进步”是否体现为国际法在维持国际秩序中的作用增大了呢？马丁·怀特曾经指出，在人们过分颂扬国际法和夸大其作用的时期，国际现实往往也是最为混乱的，而当现实的国际关系相对有序的时候，人们对国际法作用的评价却最为低调：

国际理论（至少是其主要的表现形式——国际法）常常同外交行动唱反调……当外交中充满极端和不择手段的行为时，国际法便以自然法的面目出现；而当外交养成某种合作的习惯时，国际法则死抱着实证主义法学的信条。^③

① Higgins, "Policy Considerations and the International Judicial Process."

② Richard A. Falk, "McDougal and Feliciano's Law and Minimum World Public Order," *Natural Law Forum*, vol. 8 (1963), p. 172.

③ Martin Wight, "Why Is There No International Theory?" in *Diplomatic Investigations*, p. 29.

国际法学家所说的国际法在我们这个时代所取得的“进步”，是否意味着国际法更强烈地同国际政治的现实唱反调呢？不管人们如何回答这个问题，我们不可轻易认为，国际法的这些新变化增强了国际法在维持国际秩序中的作用。

国际法的主体

146

国家不再是国际法的惟一主体这个观念的传播，只有当它伴随着国家就其他国际法主体的权利与义务达成共识，而不只是就国家的权利和义务形成共识的时候，才可能是国际法在维持国际秩序中的作用增大的表现。过去国家无力就个人以及组织（如教皇国和帝国）的权利与义务达成共识，这使得它们在欧洲国际社会的形成时期得出这么一个结论，即秩序最好建立在以国家为惟一主体的国际法体系之上，那些会引起争议的有关个人和集团的权利与义务的问题，应该被排除在该体系之外。

当前有关确立个人在国际法中的权利与义务的试探性努力，事实上并不表明人们已经就个人的权利与义务之内容以及如何确保此种权利和义务的维护和履行达成了共识。在这种情况下，有关人类权利与义务的讨论既是国家间紧张关系的结果，也是国家间紧张关系的原因：对人类权利与义务的讨论导致了纽伦堡和东京战争法庭的设立，它们是同盟国与轴心国紧张关系的产物；有关苏联人权问题的讨论是冷战的一部分；有关南非黑非洲人的权利之讨论，是反对帝国主义的国家同其对手间斗争的组成部分。

有关国际法确认人类权利和义务的观点如果过于极端的话，那么它将对人类应该生活在一个主权国家社会中的原则产生颠覆性的影响。这是因为，假如个人的权利在世界政治舞台中可以得到伸张，并高于他所属的国家的权利，而且我们在规定个人的义务时可以不顾及他作为国家的臣民或者公民的地位，那么国家作为凌驾于公民之上并有权要求公民效忠自己的主权者之地位将受到挑战，主权国家社会的结构将处于危险的境地。主权国家社会将因此有可能被世界共同体的组合原则所颠覆。同样地，有关国际组织或者所谓超国家机构是国际法主体的论点，也包

- 147 含着颠覆国际社会的种子，因为它倾向于主张以一个或者一系列国际组织或超国家机构取代主权国家，充当世界政治舞台上的权利与义务的主要承受者（repositories）。

这样说并非意味着主张在国际法中确定人类权利与义务的做法是很不幸的以及不受欢迎的，否则的话，我们就会犯把秩序视为惟一的或压倒一切的价值之错误（见第四章）。我只是想表明，当前有关人类权利与义务的国际讨论，更多地反映了无序而非有序的状况。

国际法的适用范围

国际法的适用范围扩大到经济、社会、通讯以及环境问题领域，表明国际法在维持国际秩序中的作用增大了，因为它提供了应对国际秩序所面临的新威胁之手段。在这些领域中，一国政策对他国影响力的增大，是国家之间冲突和无序的一个根源，国际法律规则无法遏制这样的冲突。如果国际法不扩大自己的适用范围以应对这些事态的发展，那么国际秩序所面临的因经济、社会、通讯以及环境领域内相互依存程度的加深而产生的威胁就会更加严重。

然而，国际法律规则在这些领域内的发展本身并不意味着，国际法的作用在其传统上优先关注的领域内得到了加强。有关“国际共处法律”已经演变成“国际合作法律”的观点意味着，前者具有了更为坚实的基础，它是后者赖以存在的前提。如果我们看看“国际共处法律”的现状，那么显然就会发现，实际情况并非如此。

- 148 我们只需要看看“国际共处法律”中有关限制暴力的内容就够了。有关当前国际法在限制暴力上的作用得到加强的观点，主要是依据《联合国宪章》的一个原则，即国家使用武力或者武力威胁的行为是非法的。伊恩·布朗利的观点最为典型：

在过去半个世纪中，世界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容忍战争以及把战争视为一种决斗，一种解决私人恩怨的手段的法律规制被那种对国家诉诸武力的权限施加极大限制的法律规制所取代。自1928年以来，在《凯洛格—白里安公约》、《萨维德拉·拉马斯公约》、

“史汀生主义”、1928—1942年间的国家行为习惯、惩罚轴心国的战争、《纽伦堡宪章》、联合国大会所确定的原则以及《联合国宪章》等一系列文献的共同作用下，对国家使用武力追求自身利益建立起了一道断然禁令。^①

由于20世纪一系列限制国家使用武力的规定被纳入实证的国际法当中，其中最新的有关规定体现在《联合国宪章》中，所以现在的国际法体系显然已经不同于19世纪的国际法体系了。当然，这样的差别并非特别大，因为我们知道，在19世纪的时候，国家认为自己诉诸武力的权利受到了道义的限制，而且对当今有关限制武力的规定之解释，比起对过去的道义原则之解释来说，几乎同样不确定和带有主观性。

但是，很显然，制约国家诉诸武力的主要因素并不是国际法，而是战争代价的不断增大（特别是核毁灭的危险）和战争收益的不断减少（见第八章）。限制国家诉诸武力的法律可以说是动员了这些反对使用武力的因素：国家通过遵守诸如《联合国宪章》所阐述的禁止使用武力的规定，表明了自己不使用武力的动机，相互保证不诉诸武力，放弃过去那种有关主权国家享有使用武力特权的观念。

149

然而，当今的国际法在动员反对诉诸武力的因素时，受到了严重的限制。这样的法律规则显然与实际的国际行为是相矛盾的。尤其是，规则不仅禁止使用武力——使用武力的情况经常发生，特别是发生在世界的某些地区和存在于某些时期——而且也禁止进行武力威胁；而武力威胁的现象在当代国际关系中是屡见不鲜的。国际法原则和其他维持国际秩序措施是相矛盾的，这最明显地表现在《联合国宪章》之中。《联合国宪章》禁止国家进行武力威胁，但相互核威慑关系却是当今世界总体和平的基础。不仅如此，这样的法律规则是如此的模棱两可和不甚准确，以至于它起不了什么指导作用。比如，禁止使用武力和武力威胁的规定，同有关国家可以出于自卫的目的，以及在得到一个具有合法权限的国际机构的授权、收到一国要求干涉内战的邀请以及其他的原因，而

^① Ian Brownlie, *International Law and the Use of Force by States*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63), p. 424.

使用武力保护他国的例外情况，显然是相互矛盾的。^①《联合国宪章》有关禁止使用武力和武力威胁的规定，不适用于国家出于防御的目的使用武力或者联合国自己的集体安全行动的情况，而且大多数的联合国成员国，特别是共产党国家和第三世界国家坚持认为，非防御性的战争，只要它属于正义的“民族解放战争”的范畴，就是合法的使用武力的情势。

如果说当代国际法只是对国家使用武力的倾向起着有限的限制作用的话，那么在其他方面，国际法在限制暴力中所起的作用显然是下降了。正如前面所提到的，国际法试图通过规定主权国家垄断合法使用暴力的权力，来限制国际社会中的暴力行为。然而，在我们这个时代中，主权国家对合法使用国际暴力的垄断权，显然受到了来自两个方面的挑战。一方面是非国家的政治集团采取了所谓的“低级的”或者“恐怖主义的”国际暴力行动。另一方面是国际组织认为自己具有使用暴力的权力。

150 还应该指出的是，国际法传统上试图限制从事战争的方式——例如主张国家在战争开始前要进行宣战，在战争结束时要签订和约，而且战争中的暴力行为不应该针对非战斗人员。众所周知，这些传统原则——尽管其中的一些内容被表述在《红十字会公约》中而得以延续下来——在当今是不被重视的，法律和战争方式完全是互不相干的。如今，对战争行为的限制有赖于默示协约和国家采取自我约束的政策，传统的法律制约作用很小或者根本就没有任何的作用。1961 和 1963 年的《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和《维也纳领事关系公约》强化了有关保护外交人员免受暴力侵害的国际法。但是，我们在这两个公约问世之后所看到的，却是一个外交豁免权多次受到侵害的现实。

国际法的渊源

所谓共识取代同意成为国际法基本渊源的变革，看上去似乎有助于增强国际法在维持国际秩序中的作用。这是因为，当国际社会中的绝大

^① Ibid. pp. 432ff.

多数成员赞同某个特定规则或者行为方式具有法律地位的时候，对这种法律地位的承认就不会因为某个不听话的国家或者国家集团的反对而受到否定。假如绝大多数或者压倒多数的国家的观点代表了“国际共同体的意志”，这似乎就增强了国际共处法和其他国际法规则的地位。

根据相互矛盾的同意学说与共识学说所提出的问题实在是太复杂了，很难在这里得到全面的论述。然而，我们可以提出几个基本论点。在本书中被称为共处规则的那些规则的作用在于维持国际社会的秩序，但是在通常的情况下，国际社会无法就这些规则之外的很多问题形成共识。例如，有关使用武力的规则用于遏制和限制战争，但在如何判断战争中的哪一方是正义的问题上，国家并不具有共识。有关国际协议的规则旨在确保协议得到尊重，但是国际社会对于某个特定的协议是否令人满意这个问题上并没有共识。有关维护国家的管辖权、反对干涉他国内部事务的规则旨在确保国家相互尊重对方的主权，但是国家之间通常无法在区分正当的干涉行为和不正当的干涉行为这个问题上形成共识。

假如国际社会真的在道义和政治上团结一致，对战争、条约或者干涉行为是否具有正义性这样的问题产生共识的话，那么接受共识的学说就很可能有助于增强国际法在维持国际秩序中的作用。然而，如果事实上并不存在着这样的共识，国际社会分裂为一些相互竞争的集团，其中一个集团声称自己代表着这种共识，那么秩序的利益就无法得以实现。其结果是，源于共识假设的规则得不到遵守，传统的规则（否认存在共识）也将受到损害。

我们或许能以有关限制暴力的规则为例子来对此加以说明。如前所述，这些规则试图通过规定主权国家垄断使用暴力的权力、限制主权国家使用武力的权力、限制战争的方式以及阻止战争范围的扩大等等，来限制国际关系中的暴力行为。然而，格劳秀斯主义者或者社会连带主义者主张，国际法应该区分正义战争与非正义战争，把战争视为执法者和违法者之间的较量，其主要目标不是限制战争，而是使得战争中代表正义事业的一方获得胜利。在诸如埃塞俄比亚危机以及朝鲜战争这样的事件中，国家实际上没能就哪一方代表正义的事业这个问题达成广泛的共识，但与此同时，有一方声称自己代表着整个国际社会，并且把对手视为违法者，结果并不是前者击败后者，而只是限制暴力的规则受到了

损害。

就国际共识确定一个规则或者行为方式的法律地位之观点来说，关键的问题在于是否或者在多大的程度上真正地存在着这样的共识。有关国际法渊源为国家的共识或者团结的学说，与国家同意的学说一样，试图保证国际法和国家的实际行为习惯之间具有密切的关系。的确，从某些方面来看，共识学说和同意学说之间的区别并不是很大。如果像同意学说的支持者们有时所坚持的那样，鉴于新诞生的国家还没有通过签署条约来表示自己对国际法的赞同，或者我们很难证明国家是否同意某个特定的规则，或者国家曾经同意某个国际法规则，但后来又改变自己的态度，那么这样一来，同意往往包含“默示的同意”，国家可能受到它们所没有明确同意的规则之约束。^① 如果像某些共识学说的倡导者所说的那样，只有当绝大多数的国家具有共识，或者体现了主导大国和主要政治及经济集团的意志，并且可以证明这一点的时候，共识才能成为国际法的渊源，那么共识理论就不可能加剧国际社会中主要行为体之间的冲突。

然而，我们必须看到，某些国际法学家之所以喜欢共识学说，并不是因为它有助于同国家实际行为习惯相一致的国际法规则之发展，而是由于该学说同他们自己对国际秩序或国际正义的认识相吻合。从这一点上说，有关国际法来源于国家的共识或者“国际共同体的意志”之学说，并非旨在加强实证的国际法，而是企图让自然法学说趁虚而入。

国际法学家的角色

- 153 有关国际法学家所扮演的角色就是对法律进行动态的、创造性的，而非静态的、机械的解释之学说，表面上看似乎有助于增强国际法在维持国际秩序中的作用。如果法官、法律顾问和法学家不认为自己的行为只是客观地解释昨天的国际法，而是不受限制地使昨天的国际法适应变化了的社会、道义和政治价值观念，这不是意味着国际法正在变成一个

^① 有关对同意学说的一些令人信服的批评，见 Brierly, *The Basis of Obligation in International Law*, ch. 1.

更有效的维护世界秩序的工具了吗？但是，假如国际法学家们如此关注国际关系的社会学、伦理学和政治学，而忽视他们过去所扮演的重要角色，即解释现有的法律规则，那么其结果必然导致国际法在国际关系中的作用下降。

但是，法官、法律顾问和法学家在解释现有法律规则的时候，事实上总是受制于他们对社会、道义和政治问题的认识。不但如此，国际法学家在解释法律的时候把这些非法律的因素考虑进去，这种做法不仅是不可避免的，也是值得称赞的。我们在面对着两种相互冲突的法律解释时，常常无法单纯根据法律的标准来进行选择，正如罗莎琳·希金斯所说的，求助非法律的原则本身就是“法律过程的组成部分”。^①而且，国际法和国内法一样，法官、法律顾问和法学家显然有时也会运用自己的决断权，在解释法律的时候把变化了的社会、道义和政治信念加以考虑，以使法律适应环境的变化。

然而，如果具有法律地位的国际行为规则和不具有法律地位的行为规则之间不再有区别的话，那么国际法就无法作为特定的规范体系而存在下去。假如国际法专业人士不再把解释和注释现有的国际法律规则作为自己的主要工作，而是去讨论国际关系的社会学、伦理学或者政治学，那么国际法学家们是无法做出自己的独特贡献的。

当今某些国际法专业人士事实上就具有这种倾向。有人认为，国际法不是一个规则体系，而可以被看做是“一个权威决定的过程”，或者“社会工程的一个工具”，这种学说否定了国际法的主要关注点，使得国际法不再成为国际研究的一个独立的分支。按照这种逻辑，在两种法律解释之间做选择，只是归结为在两种道义和政治价值观念中间进行选择，比如在迈尔斯·麦克杜格尔的“冷战”价值观和理查德·福尔克的激进的全球救世主义之间进行选择。^②

前面所考察的国际法的最新发展并不意味着国际法在维持国际秩序中的作用得到增强了。国际法日益关注个人的权利和义务，正是国际共识减少而非增加的一个表现。新的“国际合作法”的出现，不是由于

① Higgins, "Policy Considerations and the International Judicial Process", p. 62.

② 有关这一点的论述，见我写的文章 "International Law and International Order," *International Organisation*, vol. 26, no. 3 (Summer 1972)。

“国际共处法”得到加强，而是因为“国际共处法”受到削弱。一些国际法学家认为，把共识而非同意视为国际法渊源的倾向，表明国际法理论与现实的国家行为习惯相脱节。某些国际法专业人士不再把注意力放在解释现有的法律，而是热衷于宣扬非法律的价值观念，其结果会导致国际法不再是一个独立的社会科学学科。

国际法在当今的作用可能并不是使得国际社会中的秩序因素增加，而是在国际秩序面临着特别大的压力时，帮助维持现存的国际秩序框架。当前，由于共产主义国家和非共产主义国家之间的意识形态分歧，以及国家社会向欧洲或者西方以外的地区扩张，国际社会中的共识已经减少了。共产主义国家和非共产主义国家，欧洲文化传统范围内的国家和欧洲文化传统范围外的国家，共同遵守某些国际法规则，有关海洋法、外交与领事法以及条约法的国际公约就是明证，这有助于在共识减少的时期，维持一个共同框架中的某些因素。从某种程度上说，全球国际体系中的所有国家所正式同意的国际法，依然发挥着其传统的作用，即：把国家社会的理念确定为世界政治的运行原则，阐明共处的基本规则，并促使其他规则与这些规则相一致。

我在本章中将讨论如下几个问题：

156

- (1) 什么是外交？
- (2) 外交如何为国际秩序的维持做出贡献？
- (3) 外交对当今国际秩序的维持具有什么样的作用？

外 交

“外交”这个词主要有三种解释：

(1) 国家和其他世界政治实体之间通过官方代表并且以和平的方式进行交往之行为。这是对该词最为广义的解释，本书采用这一解释。

(2) 职业外交官处理国际关系的行为。例如，《牛津英语词典》使用了哈罗德·尼科尔森爵士为“外交”所下的定义：“外交是通过谈判来处理国际关系；是大使和使节调整和处理这些关系的方法；是外交官的专业和艺术。”^① 当大使和使节在处理国际关系中的作用大大下降的时候，这种解释就显得过于狭窄了。

(3) 国家之间以通常所说的“外交”方式，即机智、巧妙的方式，处理相互间关系的行为。这就是欧内斯特·萨道义爵士为“外交”所下的一个著名的定义：“外交是运用智力和机智处理各独立国家的政府间的官方关系，有时也扩大到独立国家和附庸国之间的关系；或者更简单地说，国家之间以和平手段处理相互关系的行为。”^② 当然，这只是萨道义所认为的外交应该具有的特点，而不是对现实外交

157

^① Harold Nicolson, *Diplomac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0) p. 15.

^② Sir Ernest Satow, *A Guide to Diplomatic Practice*, 4th edn. (London: Longmans, Green & Co., 1957), p. 1.

的概括：外交官可能并不机智灵敏，但他们依然是外交官。

本书作者采用第一种解释，它让我们把注意力放在那些代表国家或者其他获得认可的政治实体的个人在世界政治中处理国际关系的行为。当某人试图在两个国家间的关系中扮演某种角色时——比如贝特兰·罗素在古巴导弹危机中给肯尼迪总统和赫鲁晓夫主席发电报——不管这是否影响了事态的发展，它都不属于外交行为。外交是担任官方代表的个人处理国际关系的行为，也就是说，国书或者其他代表地位和象征地位的证明在外交中极具重要性。战争也是通过官方代表而采取的国际关系行为，但是外交官和士兵有所不同，前者只使用和平的手段。

外交不仅仅指国家的对外官方关系，也指其他在世界政治中具有地位的政治实体的对外官方关系。联合国、诸如国际劳工组织那样的其他世界性国际组织以及地区性国际组织等等，可以说也在从事外交活动。一些政治集团，比如作者在写作本书时所存在的那些致力于民族解放运动的政治集团，它们虽然没有被普遍承认为国家，但是在世界政治中具有一定的地位，有时也任命自己的代表，同各国以及其他类似的集团进行谈判。萨道义的定义承认附属国家也可能从事外交活动，而且毫无疑问，过去在欧洲国家和欧洲国家不承认其具有国家地位的一系列实体之间，存在着外交关系。

传统的外交关系主要表现为主权国家之间的官方关系。我们如果把主权国家之间的外交规则和程序运用到涉及到其他实体的外交关系，那么会遇到很大的、不确定的问题。所以 1961 年召开的旨在编纂世界外交国际法法规的维也纳外交关系与外交豁免会议，把议题限制在传统的国家间的外交关系，而不考虑有关国际组织的外交关系问题。^① 但显而易见，国家之外的、世界政治中的其他行为体，同国家之间及它们自己之间也有着外交关系。

一位作者不接受那种把外交限定为国家间关系的有关外交的定义，而认为外交指的是“通过代表机构和采取和平的手段处理国际法主体之间相互关系的行为”。^② 这个定义有一个问题，即：在有关什么是国际

① 见 Philippe Cahier and Luke T. Lee, "Vienna Conventions on Diplomatic and Consular Relations," *International Conciliation*, no. 571 (January 1969).

② Michael Hardy, *Modern Diplomatic Law*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1968).

法主体这个问题上，人们的分歧是很大的。不仅如此，一个没有被普遍承认为是国际法主体的政治实体可能在世界政治中具有自己的地位。一个政治实体之所以在世界政治中具有一定的地位，有时是因为国家承认它具有权力地位，或者是由于国家支持它争取这种权力地位。

最早的外交形式是在两个独立政治共同体之间传递信息。拉格纳尔·纽姆林在其有关原始社会或者史前共同体外交形式和外交制度的研究著述中指出，最初的外交形式是一个原始部落或者集团派遣一位信使或使者到另外一个邻近的部落，使者带有信使杖或其他相当于国书的东西。^①今天，我们在分析外交的时候，要记住外交的如下几个特征：

(1) 外交既包括一国对外政策的制定，也包括该国对外政策的执行。政策制定包括对有关国际环境信息的收集与评估，以及对各种政策选择的比较与权衡。政策执行包括让其他国家的政府和人民了解自己已经制定了的政策，而且在合适的情况下通过说理，但有时也通过武力威胁或其他种类的惩罚行为，争取他国政府与人民采取合作的态度，或者不反对该项政策的实施。

(2) 外交关系既有双边性质的，也有多边性质的。双边外交关系通常是国家之间或者政府之间的关系，但是在当前，它也包括“人民”之间或者政治体系之间的关系。在过去某个时期里，一国的大使在另外一个国家的宫廷中代表自己的君主。现在的大使则根据所有合法的国家都是民族国家这个主流观念，代表本国的人民。而且，今天的大使还在不干涉驻在国内部事务这个原则基础上，不仅影响所在国的政府，也努力影响所在国的“人民”，人民是国家政治生活中的活跃因素。

多边外交的形式可能表现为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国家所参加的会议，或者是常设会议，即国际组织。国际会议和国际组织的重要性主要不在于它所导致的多边外交活动，而在于它为双边外交所创造的机会。真正的多边外交是三个或者三个以上的国家一起努力解决某个问题的行为，比如联合国大会。一个国家与它所属的一个国际组织之间的外交联系，包含着既非双边、又非多边的成分。英国驻联合国大使不仅同其他联合国成员国的代表打交道，也通过联合国的秘书处及其他机构同联合国本

^① Ragnar Numelin, *The Beginnings of Diplomacy: A Sociological Study of Inter-tribal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0) p. 124.

身打交道。假如联合国或者其他国际组织在世界政治中处于主导地位，以至于一国同它的关系比该国同其他国家的关系更为重要——正如一位中世纪德意志君主同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关系比他同其他君主之间的关系更为重要——那么这就意味着国家体系开始消亡了，并为一个截然不同的世界政治秩序所取代。

(3) 外交可能是临时性的，也可能是制度化了的。某些外交往来，比如欧洲人第一次同美洲原住民相遇，完全是出于传递信件或者进行某个商业交易活动的目的，而不属于持久的关系，或者说没有为双方所共同接受的规则和惯例所规范。当今主权国家之间的外交接触是制度化了的，因为这种外交关系的维持不是出于特定的商业目的，而具有持久关系的性质，它建立在大家所普遍接受的规则和习惯的基础之上，其中某些规则和习惯具有法律地位。

我们从前面所提到过的拉格纳尔·纽姆林的论述中可以清楚地看出，在这个意义上说，甚至是原始人之间的外交接触也经常是制度化了的，他们根据源于神话和宗教的规则，互派信使和进行谈判。现代国际体系中的外交关系制度化过程经历了如下几个重要的发展阶段：15 世纪在意大利出现了常驻使节制度并在 16 世纪传播到整个欧洲；在路易十四时期，外国使节的治外法权得到了法律上的承认；在 18 世纪出现了外交团；在 1815 年的维也纳会议上，欧洲国家达成了关于按照国家平等的原则确定外交使团位次的协议；19 世纪末，土耳其、中国、日本、朝鲜和暹罗被纳入欧洲外交体系之中；1961 年的《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使得传统的国与国之间的外交习惯成为世界上的国家所普遍接受的法律规则，并且获得了业已摆脱欧洲帝国统治的新兴国家的赞同。

(4) 最后，我们有必要区分国际关系中的“外交”关系和“领事”关系。两者的基本区别在于，前者为两国政府之间的官方关系，后者为两国公民之间的私人关系。然而，我们往往很难对两者加以明确的区分。现在的外交使团经常履行领事职能，而领事馆也经常履行部分“外交”职能——例如它们通常被用来观察驻在国某个地区的政治形势，这样一来，我们就更难区分外交关系和领事关系了。在上个世纪末和本世纪初，许多国家还保留独立的领事机构，如今出现的倾向是将外交机构与领事机构合二为一。

毫无疑问，外交的前提条件是存在着一个国际体系，也就是说，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的国家作为体系的组成部分进行互动。假如世界是由相互之间完全隔绝的政治共同体所组成的，那么外交关系是不会产生的。¹⁶¹同样地，假如世界的不同组成部分虽然相互接触，但是屈服于一个中央权威，那么部分之间的外交关系也是不存在的，因为最重要的政治关系是各个部分与中心之间的关系，它们属于服从的关系。

而且显而易见，外交，至少是当今高度制度化的外交，其存在的前提条件不仅包括存在着一个国际体系，也包括存在着一个国际社会。只有国家接受了复杂的规则和惯例，互派外交使团才可能成为现实。派遣使团的国家接受本国外交官不干涉驻在国内部事务的原则。接受使团的国家保证外交官享有外交豁免权、使节的通讯权利不受限制，而且承担保护使团不受他人伤害以及协助使团开展工作的义务。

虽然当今的外交制度要以存在着一个国际社会为自己存在的前提，但是国际社会的存在并不以外交制度的存在为前提。这些外交制度的发展很缓慢、很不确定，而且在国际社会的不同发展阶段，有不同的表现形式。例如，常驻使节制度必须等到某些条件出现以后才得以产生。正如巴特勒和麦科比所写道的：

因为这要求存在着一批强大和独立的国家，在外部它们不受野蛮征服的严重威胁，在内部也不处于建立任何世界专制政府的危险之下。而且它还假定彼此具有相似的宗教、制度和语言，并且相互之间保持着密切的政治与商业联系。^①

大使不得干涉驻在国的内政是当今国际法的一项重要原则，但是这个原则并不是产生于常驻外交使节制度的初期，它之所以产生只是由于驻在国政府反对使节的干涉行为，比如伊丽莎白女王分别在 1572 年和 1584 年驱逐西班牙的德斯皮斯公使和门多萨大使。甚至在 18 世纪的时候，还发生过很多大使在驻在国煽动抵抗行动和反叛行为的事件。巴特勒和麦科比写道，“这些事件所导致的行动与其说是证明存在着相互矛¹⁶²

^① Sir Geoffrey Butler and Simon MacCoby, *The Development of International Law* (London: Longmans, Green & Co., 1928) p. 74.

盾的惯例，不如说是证明了正确程序的认识是逐步形成的。”^①

卡里尔雷斯对外交及其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做了迄今为止最为重要和最具有概括性的分析。卡里尔雷斯曾经为路易十四效力，其著作《论与君主谈判的方法》于1716年出版。^②卡里尔雷斯思想形成之时，正值路易十四寻求欧洲霸权的企图受到遏制后，欧洲的复杂均势刚刚浮现的时期，那时，原先互不影响的各国家即将走到一起形成欧洲国际体系。

因此，卡里尔雷斯的一个中心思想就是，所有国家都需要进行谈判（他没有使用“外交”这个词），谈判具有永久性和普遍性。他认为，每位君主不管是在战争时期还是和平时期，都需要向所有邻近或者遥远的大国长期派驻使节，以便随时进行谈判。

为了理解国家为什么永远需要开展外交活动和进行谈判，我们必须认识到欧洲国家是被各种必要的商业往来联系在一起的，以至于它们可以被看做是单一共和国中的成员，任何一个国家中发生的重大变革，必然危及其他所有国家所享有的和平环境。最小的主权国家所犯的错误，无疑可能挑起所有大国之间的矛盾，因为所有大国都需要发展与小国的关系，希望与不同的国家，包括小国，建立起友好关系。^③

卡里尔雷斯指出，谈判不仅具有永久性和普遍性，而且具有专业性。他着重指出好的谈判家的匮乏，这如同缺少好士兵，外交从业人员也缺少固定的规则。在他看来，最好不要从牧师（因为教会同主权者是相互独立的）、军人（因为谈判家应该是和平人士）或者律师（因为律师的方法缺少灵活性）等人士中寻找谈判家。谈判本身就是一门艺术。163 “它要求谈判家具有洞察力、敏锐感和灵活性。它要求谈判家拥有很强的理解力和广博的知识，尤其需要有准确和深邃的辨别力。”^④

① Ibid. p. 80.

② Francois de Callières, *On the Manner of Negotiating with Princes*, trans. A. F. Whyte (University of Notre Dame Press, 1963).

③ Ibid. p. 11.

④ Ibid. p. 9.

卡里尔雷斯认为，职业外交官不管是对于实现君主或最高统治者的目标，还是实现所有欧洲君主所属的“单一共和国”之目标，都扮演着建设性和创造性的角色。它的作用在于确保统治者的利益高于统治者的情感，而不是情感在同利益的较量中占上风。他批评罗汉在其著作（*De L'interest des princes et des estats de la chrestiente*, 1638）中所表述的一种观点。罗汉声称，君主统治人民，利益统治君主。卡里尔雷斯指出，“君主及其大臣们的情感经常支配他们的利益。”^① 谈判家的任务就是以理智和说服的手段，使君主的行动建立在对自我利益的真实了解的基础之上，而且判断出国家之间所存在着的共同利益。

作为“完美大使”的个人应该根据理智而非情感行事，而且在执行对外政策的时候要努力使情感服从于理智。这种观点同17世纪兴起的理性主义有着密切的关系，尤其体现了这么一个观念，即国家的正确目标是追求国家利益，而不是国家的荣誉或信念。本书作者在书中的某个地方（第三章）否定过这么一种观点，即国家或者民族具有“真正的”或者客观的利益，它们有别于主观认知的利益，人们可以用自己的理智认识客观的利益。然而，理性的确存在于行为之中，它具有内在的一贯性，并且与给定的目标相统一。外交理论是从坚守理性原则的角度来阐明“完美大使”的角色，而且现代的外交传统体现了这种行为模式。

外交的功能

外交对于维持现代国家体系内的秩序，具有如下功能：

首先，外交促进国家和其他世界政治实体政治领导人之间相互进行沟通。如果没有沟通，就不可能有国际社会，也根本就不会有国际体系。因此，外交官最基本的功能就是充当信使。外交官有效发挥这种作用的前提条件——最基本的外交惯例或者制度，即特使享有免遭接受国杀害或者胁迫的豁免权——便应运而生了，它是历史上所有的国际社会共同拥有的东西。

^① Ibid. p. 47.

外交的第二个功能是协议的谈判。假如没有协议的谈判,虽然也可能产生国际关系,但是只会出现政治共同体之间持续的相互敌对关系。只有当事方的利益(可能不同)在某一点上得到重合,而且当事方认识到这种重合的时候,当事方之间才可能达成协议。外交在国际体系中到底能够发挥多大的作用,这取决于国家在多大程度上把对外政策理解为理性地追求国家利益的手段,从理论上说,一个国家的利益在某些方面同其他国家的利益是相重合的。如果外交只是执行一个世界权威的指令,支持正确的信仰对抗异端邪说,或者追求利己的目标而不考虑他人的利益,那么外交就没有任何的作用。

外交的第三个功能是收集外国的情报或者信息。每个国家的对外政策都要建立在了解有关世界事态发展的信息的基础之上。各国在试图不让别国了解到有关自己的信息时,也努力主动散布一些信息。比如拜占庭在某个时期不允许外国使节到自己的首都去,而且把他们禁闭在堡垒之中,让他们无法了解到什么情况,但同时又向他们展示自己的军事力量。当今的大国试图不让敌手了解到有关自己军事能力的信息,但同时又向敌手提供一些经过挑选的军事信息,以便对敌手产生“威慑”作用。外交官在情报收集方面一直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国家愿意有选择地向他国提供信息的做法,最明显地体现在武官制度上,该制度开始出现于19世纪初期。^①有关国际政治就是力量的角逐场之思想,特别是有关政治家始终关注均势之思想,产生于17世纪末和18世纪初,这表明有关各国事态发展的信息无时不有,外交具有卡里尔雷斯所强调的永久性和普遍性的特征。

外交的第四个功能是把国家间的摩擦所产生的影响减少到最低限度。摩擦是物体近距离相互接触结果。由于不同的政治共同体具有不同的价值观念、关注对象以及敏感程度,所以国际关系中总是存在着摩擦,即使在具有广泛的共同利益和保持着密切、友好关系的国家之间,也总是存在着摩擦。这样的摩擦一直是国际紧张和动荡局势的一个根源,它可能同有关当事方的“真实的”利益没有多大关系。

最大限度地减少摩擦以及消除摩擦所产生的影响,这便是外交的重要功能之一。正是由于外交的这个功能,萨道义把外交界定为“智力和

^① 见 Alfred Vagts, *The Military Attaché*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67)。

机智的运用”，而且我们把“外交方式”用来描述人们在日常生活中机智灵活地处理问题的方式。

外交官，或者“完美外交官”，通过惯例与外国官员打交道，以及利用自己对本国政策的影响，最大限度地减少国家间的摩擦。他在同其他国家的代表打交道的时候，遵守语言上的习惯。他在追求或者维护本国利益的时候，心里总是想着自己的目标，并且只使用那些有助于实现目标的语言，避免使用那些表露自己或者国家的自豪感与自负心理的言词。他总是试图采取理智或说服的方法，避免采用欺负和威胁的手段。他努力证明自己所追求的目标同对方的利益是相一致的。他倾向于谈论“权利”而非“要求”，并且表明这些权利来自两国所共同坚持的规则或者原则。他试图从共同享有的利益和共同承认的原则这个框架中找到自己所要追求的目标，这个框架是有关当事方之间关系的共同基础。 166

尼科尔森和其他人认为，外交官为了增强信任，应该做到诚实。这种论点是有说服力的。同时，也存在着这么一种情况，即外交官为了最大限度地减少摩擦，需要避免明确承认僵硬的现实，避免“直言不讳”。由于这个原因，外交官的活动与国际政治的学术探讨活动之间存在着固有的矛盾。

最后，外交发挥着象征国际社会存在的功能。外交官，甚至是最初的信使，是存在着一些受到国家以及国际体系中的其他实体尊重的规则的显著体现。当今在各国首都中存在着外交使团，这是国际社会要素在国际关系中发挥作用的一个具体表现。

外交在当今的作用

如果说过去外交在维持国际秩序中具有上述功能，那么今天它是否依然具有这些功能呢？假如我们采用本章最开始所阐述的第一种以及最为宽泛的有关外交的定义，那么没有人会说外交对国际秩序的维持已经不起作用了。然而，如果从有关外交的第二种定义（即外交是职业外交官处理国家间关系的行为）来看，有的人就会认为外交对于国际秩序的维持已经毫无作用。

那些认为外交对于国际秩序的维持已经没有什么作用的人可能指出，自从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职业外交官，或者至少是19世纪那样的职业外交官，在国际政治中的作用已经下降了。首先，常驻大使及其领导的外交使团在处理国际事务中的作用已经下降。政府首脑和部长们经常同外国政府直接打交道，政府特别代表团出访外国，以及（在某些问题上）政府在国外所设立的、不受大使管辖的其他常驻使团等等，都限制了大使的作用。比如，美国驻一些国家的大使不仅要同自己的外交班子一起工作，也要同经济援助使团、军事援助顾问团、中央情报局的代表、财政部、和平队等其他很多政府部门的人员以及美国军事基地或设施的人员一起共事。

一些观察家预言，如果两国间的交往很多，而且双边关系十分密切——如同英国和美国之间的关系——那么常驻外交使团制度可能最终会消失。在过去，两国之间没有外交关系一般是由于两个原因：两国之间的交往很少或者不重要；两国相互敌视，以至于不能够互派大使。换句话说，外交关系存在的前提，是有关国家之间保持着某种最低限度的双边交往。如果英国和美国政府不再通过各自驻华盛顿和伦敦的大使处理双边关系，那么我们或许可以说，常驻使节制度就没有什么意义了。

根据这种观点可以得出一个推论，即：只要双方之间的交往事务需要常驻使节来处理，或者双方依然保持着某种程度上的敌对关系，常驻使节就将继续发挥自己的作用。因此，一方面，英国驻华盛顿大使馆将会变得是多余的，另一方面，英国驻莫斯科大使馆则不会变成多余的，它可以促进英苏关系的性质发生变化。约翰·加尔通和马里·鲁奇的思想更进一步。他们写道，政府与政府之间的双边外交将大大减少，这种双边外交主要被用来处理敌手之间的关系，而且“将来的双边外交有可能成为相互敌视而非相互友好的表现。”^① 其次，主要由于国际组织的增多，本世纪的双边外交相对于多边外交来说，其作用已经有所下降。尤其是在西方发达国家之间，许多重要的外交问题至少在某种程度上是通过多边外交得到处理的：在北大西洋公约组织（NATO）的框架内处理防务问题，通过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或者世界银行处理贸易

^① Johan Galtung and Mari Ruge, "Patterns of Diplomacy," *Journal of Peace Research*, no. 2 (1962) p. 127.

和开发援助问题，在十国集团的框架内解决货币问题，欧洲经济共同体 (EEC) 的国家通过该组织处理相互间以及同外部世界的经济关系。 168

当然，多边外交重要性的相对提高，并不意味着职业外交官的作用下降了。其中一个原因在于，正如前面所提到过的，国际会议和国际组织为双边外交以及真正的多边外交创造了机会，而且前者通常比后者更加重要。另外一个原因在于，通常是由职业外交官来处理真正的多边外交事务。多边外交的出现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职业外交官工作性质的变化，而不说明他们的作用下降了。但是，这也反映了另外一个变化，下面将对此进行分析。

第三个变化是，自从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职业外交官在国际政治中的关注点之重要性有所下降。这个关注点就是卡尔里雷斯所说的“谈判”和萨道义所说的“相互关系的处理”：通过“运用机智和智力”，认清各国的利益并尽可能使它们得到调和。一方面，机智地处理相互关系的重要性已经让位于“政治战”、“宣传外交”或者“侮辱外交”。另一方面，它的重要性也让位于一种大概可以称为“国际技术管理”的行为，虽然机智和智力在这样的行为中有发挥作用的空间，但是该行为主要关注的不是国家间不同利益的调和，而是最大限度地促进双方的某种共同利益。

萨道义所说的国家间相互关系的处理被“政治战”所取代的情形，是国际社会处于共识水平很低的阶段之通常特征。这样一个阶段开始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更具体地说，它开始于 1917 年，当时刚刚加入战争的美国和刚刚处于革命洪流中的苏联，都要求废除旧的外交。当两个人进行会面以处理相互关系的时候，有两点十分值得注意。其一，每一方都在与对方打交道：一方发言时，对方便是听众。其二，两人都至少假定双方可能存在着共同的利益。他们各自的利益当然是不相同的，每一方只关心实现自己的利益。然而，他们都认为，双方之间存在着，或者 169 无论怎么说可能存在着某种共同点，发现这种共同点就是他们的目标。今天，在两个国家的代表举行会晤的时候，这两个条件都是不具备的。看上去有关当事方似乎是在向对方阐述自己的观点，实际上他们是在对第三方发表言论，以争取第三方站在自己的一边。而且他们完全否认在双方之间存在着共同点，每一方都认为，为了实现自己的目标，就必须彻底地击败对手。正如尼科尔森所指出的，这样的人不是在处理两国间

的相互关系，而是在进行一个口头辩论，这就好像希腊城邦国家的特使之所作所为。

尼科尔森在其著述中指出，旧外交的衰落是件令人遗憾的事情。^①在他看来，“条约公开”的原则相对于旧外交来说的确是个进步，它使得议会可以控制对外政策，而且防止国家缔结在一战前以及一战中所签署那种秘密条约。然而，他坚持认为，条约的缔结必须公开的原则排除了谈判的可能性，因为谈判从来就是秘密地进行的，而且这已经直接导致了法西斯国家、共产主义国家同它们的手之间的对抗，在这样的对抗中，外交让位于“政治战”。

尼科尔森的观点的问题在于，它没有考虑到国际环境的变化使得新外交成了任何一个国家都需要加以使用的手段。其中一个变化，即尼科尔森所提到过的公众舆论和民主国家的立法机构介入对外政策领域，也就是过去在大多数国家中不问时事的大众表现出了政治上的积极性，这使得所有的政府都要面对国内和国际的听众，要向他们解释本国对外政策的合法性与合理性。另外一个变化是欧洲大国之间缺少了一种共识。根据这个共识，欧洲国家虽然有时相互进行激烈的争斗，但是至少都承认对方的生存权。由于国际冲突不再受国际礼让观念（根据这个观念，所有国家都有自己的合法地位）的制约，以及所有国家都必须借助大众的舆论或者情感为自己的对外政策寻求支持，“辩论外交”（forensic
170 diplomacy）是一种有效的政策工具，它是国际秩序总体条件恶化所产生的后果，而不是导致国际秩序总体条件恶化的原因。

在国际关系的某些领域中，外交让位于政治战，而在国际关系的另外一些领域中，外交则让位于国际技术管理。外交适用于这么一种情势，即有关国家或其他政治实体在追求各自不同的利益时，具有某些共同的利益。如果国家看不到共同的利益，或者国家认为它们的利益完全一致，那么这样的情势必然损害外交。在这些情势中，国家追求自身利益的手段，不是相互进行谈判或者讨价还价，而是相互进行合作以实现共同利益的最大化。他们所面对的共同问题不属于调和不同利益或要求的政治或外交问题，而是旨在发现最有效地实现特定目标的手段之技术

^① 见 Nicolson, *Diplomacy; and The Evolution of Diplomatic Method* (London: Constable, 1954)。

问题。

我们很难在国际关系中找到国际技术管理完全排挤外交方法的例子。而且我们也不应该认为最好把国际问题视为国际技术管理问题，而不是外交问题。把国际问题仅仅视为技术管理问题，通常只会掩盖一个真实的情况，即国家具有不同的利益，而且必须首先在通过讨价还价过程确认共同利益之后，才能考虑如何使共同利益最大化的问题。

尽管如此，技术管理还是在一系列领域中介入了国际生活。这样的例子包括：北约内部讨论战略或安全问题，发达国家之间谈论国际开发援助问题，以及欧洲经济共同体内部讨论经济事务。^①显然，当前很多有关人类生态或环境问题的讨论都属于旨在使人类利益最大化的技术问题，而不属于调和不同利益的外交问题。

所有这些所导致的结果是，在一些国际问题的讨论中，调解人或谈判家让位于技术专家，即军事、经济、社会、教育、科学以及生态领域的专业人士。国际组织由于其常设性，体现了国家希望在某个特定的领域中存在着一个利益共同体的意愿，它也证明这种发展趋势的确是存在着的。

最后，外交制度，即保证外交关系得以进行和发挥作用的规则与惯例，其作用在本世纪已经下降了。毫无疑问，基本的外交制度经历 20 世纪的国际动荡之后得以继续存在下来，而且单单从法律的角度上看，可以说他们还得到了加强。世界上的国家增加到 140 个，它们都被纳入外交体系之中，没有一个国家正式否定这种机制。冷战和反对西方帝国主义的斗争并没有导致整个外交体系的瓦解，甚至在这些冲突中，主要的政治集团在处理相互关系的时候也没有完全否定外交制度。与此同时，1961 年的《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和 1963 年的《维也纳领事关系公约》，为来自各个主要政治集团的国家所签署和批准。这两个条约标志着国际法的重大发展，它们把许多过去的习惯法规加以编纂，并使之成为成文法规，同时让许多欧洲传统之外的国家接受这些源于欧洲的外交规则。

但是，与外交规则或者外交制度在法律形式上得到加强和发展相伴

^① 特别见 Eugene·R. Black's plea for a corps of development diplomat's in *The Diplomacy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0)。

的是违反外交制度事件的增多。在冷战时期的西方国家与共产党国家的关系中，时常发生外交官滥用特权的事件，尤其是外交官从事间谍活动，导致有关国家竞相宣布对方的外交官为不受欢迎的人。接受国未能遵守使馆不受侵害（*ne impediatur legatio*）的原则，外国的使馆遭遇窃听，发生了针对使馆的“自发的”示威活动，当地政府没有提供警察保护。共产党国家对外交官的活动范围施加了限制。在冷战期间，西方国家和共产党国家之间几乎没有领事关系。很多相互敌对的国家断绝了外交关系，或者无法建立外交关系。20世纪60年代发生过外交使团受到有形攻击的事件，包括使馆受到彻底破坏的事件，其中最有名的事件发生在印度尼西亚和文化大革命期间的中国。这个时期还发生过外交官遭受绑架的事件，绑架成为一个新的危及外交官人身安全的威胁，接受国的政治斗争使得外国外交人员的人身安全受到威胁。

上面有关职业外交官的作用下降或者职业外交官作用的性质发生变化之表现，并非说明职业外交官已经不能对国际秩序的维持发挥重要作用。职业外交官的作用下降，可能既是本世纪国际秩序条件恶化的一个原因，也是本世纪国际秩序条件恶化的一个结果。如果我们思考前面所论述过的外交在维持国际秩序中的作用，那么显然就会发现，外交的所有这些作用原则上都可以通过现有外交机制以外的方式得以发挥。然而，我们同样也十分清楚，传统的外交机制是世界上所有国家的共同财富，虽然它的某些作用有所下降，但是它将适应国际环境的变化，并继续发挥自己的积极作用。

沟 通

即便没有职业外交官所起的中介作用，国家以及世界政治中的其他行为体的政治领导人也会不断进行相互沟通。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国家领导人可以直接进行会晤，国家之间也可以通过官员和特别代表进行沟通，这些沟通都不需要通过外交官来进行。国家之间互递信息，也可以不需要个人作为媒介，而可以通过信件、电报、无线电、电话或者电传来进行。在出现邮政、电报、无线电和电视之前，使者或信使是不同政治共同体相互进行沟通的必要条件。在20世纪60年代，一些重要国家的首脑相互间建立了“热线”联系，在他们看来，快捷、直接的沟通在

危机中的作用是特使所无法取代的。

然而，沟通不仅仅是互递信息，信息必须得到理解和解释。信息除了传达情报，也必然表露情绪和意图。信息的含义取决于信息的相关背景条件：信息的传送人和接收人，传递信息时的环境，以往在同样问题上的信息互换情况。信息的重要性既可能存在于它所包含的内容，也可能存在于它所忽略的内容，它在传达同一个思想的时候有意选择某种措辞，而不使用另外一种措辞。 173

外交官是进行准确、精确沟通的专家。他们不仅仅是信使，还是善于在国际对话中捕捉和传递微妙信息的专家，而且他们的作用不只是传递信息，还要判断应该用什么样的语言表述信息，确定在什么样的场合以及向什么样的人传递信息。有利于现代外交官的一个事实是，在一段时期内，只有一种语言被较多地用作外交语言：18世纪中叶以前是拉丁语；18世纪中叶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前是法语；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基本上是英语。除了语言本身之外，某些外交界通用的措辞习惯也有助于外交官在进行沟通的时候最大限度地减少误解。由于外交官了解互换信息的人之个性，以及他们所处的环境，所以他们精通于用合适的言辞表述和传递信息，以及解释所收到的信息。

谈 判

国家之间就达成协议而进行的谈判可以不通过职业外交官来进行。比如，我们知道，两国政府常常绕开常驻大使进行协议的谈判，谈判工作通过国家政治领导人或外交部长的直接会晤、由非外交官的官员所参加的会议（例如技术专家参与某些技术协议的谈判）来进行。

但是，我们不能因此得出一个错误的结论，即认为现在的职业外交官对于协议谈判已经没有什么重要作用了。通常都是在职业外交官进行一个较长时间的试探、考察和对相关对策和方案的研究，以及完成初步谈判的工作之后，国家首脑或外长才能够最终达成协议。不仅如此，职业外交官具备了专门的谈判技巧与技能。如前所述，协议谈判的前提是 174 两个当事方认识到双方的利益既不相同，又可能在某个方面重合。谈判的艺术就是确定共同利益领域，并且运用理智和说服的手段让当事方了解这一点。这门艺术的运用，需要了解有关当事方如何认识自己的利

益，了解一方的利益与另一方的利益之区别。它要求外交官在考虑方案的时候富有想象力，同时运用技巧和经验表述和提出方案。它要求准确和精确的沟通。如果谈判可以私下进行、不受各种不同的考虑和效忠对象的干扰，而且谈判人员都来自职业外交界，相互信任和尊重，那么这将极大地推动谈判工作的进展。

情 报

在有关外国情报的收集与评估方面，职业外交官只是众多从事这项工作的人员之一。在历史上的某些时候，职业外交官是有关外国情报之惟一的或至少是主要的来源，现在的情报也可能来自新闻界和其他大众媒体、学者与作家、私人访问者、专门的情报人员以及诸如航空与卫星照片那样的技术手段。人们经常指出，职业外交官从一些国家发回来的报告要么不如新闻记者报道那么及时，要么缺少学者分析的深度。人们有时抱怨现在职业外交官写的报告太多、太长。

尽管如此，职业外交官在收集特定种类的情报方面依然具有自己的独到之处，这样的情报对于处理国际关系来说是十分重要的。它是有关一国政治领导人在当前及将来的认识与政策的情报。它是有关领导人个性的知识，而不是有关决定一国长远政策的力量与条件之知识。它是有关当前形势及其可能的发展趋向的知识，而不是有关过去形势发展模式之知识。它来源于职业外交官与驻在国政治上层人士的日常个人交往，这种交往有时会使得职业外交官无法全面地了解所在国的社会。

这样的知识本身可能具有误导作用。外交机关不仅需要了解主要政治人士的个性，也要研究外国社会的整体情况；不仅需要分析当前的形势，也要了解延续不变的基本情况和长远的发展趋势。职业外交官并不是后一类知识的最佳来源。然而，国家间关系的日常处理往往依赖于有关外国政府领导人的个性、政治命运以及相互间的联合与竞争之情报和建议，有时只有职业外交官才是这类情报的最佳来源。

最大限度地减少摩擦

从理论上说，即使没有现代的外交制度，我们也可能在国际关系中

最大限度地减少摩擦；有些外交官的个人在国际交往中可以运用智力与机智，这正如外交官则有可能做不到这一点一样。但是，职业外交官一直努力使自己适应这样的角色，遵循有关扮演该角色的独特传统与惯例。

很长时间以来，现代人有关“完美大使”素质的著述，经常强调那些职业外交官为了最大限度地减少国家间的摩擦所应当具备的素质。卡里尔雷斯认为，完美的谈判家应该同时具备幽默、镇定和耐心的个性，而且谈吐大方、和蔼可亲、彬彬有礼。尼科尔森则指出，完美的谈判家应该镇定自若、自制力强、富有耐心以及脾气温和。这些忠告只是描述了那些有助于使摩擦最小化的行为，并没有告诉我们外交家应该在什么样的条件下具备这些品质，或者他们应该服务于什么样的目的。令人感到惊奇的是，这些忠告在过去的几个世纪中基本上没有发生什么变化。 176

象征的作用

除了职业外交官之外，世界性国际组织，特别是联合国，也象征着国家社会的存在，更进一步地说，它象征着人类政治组合形式中存在着团结一致的因素。但是，外交机制的象征作用是十分重要的。

国家间的外交关系并不是国家相互承认主权、平等、独立以及其他权利的一个根源，但它们是国家相互承认对方权利的前提条件和具体表现。各国首都中的外交使团不仅体现了外国的存在，而且体现了国际社会的存在，它提醒驻在国政府和人民，本国的政策必须符合国际社会的规范。

职业外交官本身就是国际社会思想的捍卫者，维护和加强国际社会符合他们的利益。R. B. 莫厄特在其著述中论述过职业外交官的“同僚”（collegiality）：那些离开自己国家、在外国城市中工作、与外国职业外交官密切交往的职业外交官们，为一个共同观念所联结在一起。^① 自从19世纪中叶以后，职业外交界的团结精神有所减弱。其原因在于，在19世纪中叶，国家的数量比原来有所减少，所有重要国家都是欧洲国家，“君主国际”（the international of monarchs）的存在是外交活动的背

^① R. B. Mowat, *Diplomacy and Peace* (London: Williams & Norgate, 1935).

景，以及上层人士通过聚会的习惯保持着密切的关系，不同国家的外交官因而具有共同的贵族文化纽带，而且被血缘和婚姻关系所联结在一起。但在全球国际体系中，由于国家的数量较多，它们之间的差异较大，国家较难以把自己看做是一个共同文化的组成部分，所以外交机制的象征作用可能就显得更加重要了。（本书第十三章将讨论“外交文化”的概念）今天，来自各个地区、各种文化以及不同信仰和发展阶段的国家，都愿意遵守源于过去欧洲那种常常显得奇怪、陈旧的外交程序，这是国际社会思想在世界上被普遍接受的明显表现之一。

第八章

战争与国际秩序

我们或许不应该把战争视为国家社会的一种制度。但从战争是一种根深蒂固的、旨在追求共同目标的行为模式这个意义上说，战争过去一直是、今天依然是国家社会的一种制度。我将在本章中讨论如下几个问题：

- (1) 什么是战争？
- (2) 战争在历史上的现代国家体系中对于国际秩序的维持发挥了什么样的作用？
- (3) 战争在当今的国际政治中具有什么样的作用？

战争

战争是政治单位所进行的、相互之间的有组织的暴力行为。如果暴力行为不是以一个政治单位的名义进行，那么它就不属于战争。战争中的杀戮行为同谋杀行为的区别在于，前者具有代理人的、官方的性质，政治单位对作为自己代理人的杀手之行为负有象征性的责任。同样地，如果以政治单位的名义所进行的暴力行为不是针对其他政治单位的，那么它也不属于战争。国家处决罪犯或者打击海盗的暴力行为是针对个人的，因此它不属于战争。

我们有必要区分两种战争。一种是较为意义上的战争，它指的是任何政治单位（包括部族、古代帝国、封建公国、现代国家内部的集团）所采取的暴力行为。一种是较为严格意义上的战争，它仅仅指主权国家所采取的、国际间或国家间有组织的暴力行为。在现代国家体系中，只有严格意义上的战争或者国际战争才是合法的，主权国家一直垄断着合法使用暴力的权力。这经历了两个发展阶段。179 第一个阶段是区分官方战争和私人战争，前者是由

公共权威组织授权的，后者则没有这种授权，并且需要被加以消除。第二个阶段是产生了一种观念，即惟有国家才是具有使用暴力权力的公共权威组织。有关战争是主权国家之间有组织的暴力行为这个现代战争概念的形成，是限制或者制约暴力过程的产物。在现代世界中，我们习惯于把国家间的战争视为国家间的和平之对立物，但在历史上，国家间战争之外的选择，往往是更为普遍的暴力行为。

我们也需要区分物质意义上的战争和法律或规范意义上的战争。前者指的是事实上的敌对行为，后者指的是符合某个法律或规范标准的、观念上的事态，例如它是由有法定资格的当局所承认或宣布的一种事态。物质意义上的战争常常不属于法律意义上的战争：1945年以后所发生的大多数战争都被战争的当事方冠以别的名称。一方面，在没有发生事实上的敌对行为的时候，可能存在着法律意义上的战争，比如在实现停火和缔结和约之间的那段时间里，就存在着法律意义上的战争。如果我们是在法律意义上讨论战争，那么战争与和平之间的区别就是绝对的：这也就是格劳秀斯所表述的“战争与和平之间无中间状态”（*inter bellum et pacem nihil est medium*）的思想。另一方面，物质意义上的战争有时很难同和平区别开来。在这两种事态之间存在着一个逐步升级的过程：封锁行动什么时候变成一种暴力行为？反叛集团什么时候具有政治单位的性质？

然而，我们尽管可能区分事实上的战争与观念上的战争，不能因此错误地认为，事实上的战争完全可以独立于观念上的战争而存在。在任何一场我们称之为“战争”的敌对行为中，不管是法律规范或规则，还是其他规范或规则，总是发挥着自己的作用。那些人从事敌对活动的行为，都受到一个观念的推动，也就是说，他们介入一个被称为“战争”的行动中，这个行动是一种有别于和平的事态，在战争中采取某些种类的行为是合适的，比如他们扮演着某一政治集团的代理人角色，而另一些人必须被视为敌对集团的代理人。规范或规则尽管可能被抽象地加以考虑，但是，它们也是战争物质现实的一部分，对规范或规则的考虑要求当事人注意自己的行为同被认可的规则相吻合。

最后，我们应该区分理性、明智或有目的战争与盲目、冲动或习惯性的战争。克劳塞维茨把战争定义为“旨在强迫我们的敌人服从我们的意志的行为”，这个定义反映了当时深受国家理性主义学说影响的欧

洲人的主流战争观念。克劳塞维茨是在拿破仑时代结束之后得出这个论断的，即使是从当时欧洲的经验来看，他的这个结论也只是告诉我们应该如何进行战争，而没有准确地描述实际上的战争是如何进行的。战争经常并不是服务于理性或明智的目标，原始部落把战争作为一种仪式来进行，基督教骑士和萨拉森（阿拉伯帝国）骑士通过战争来宣扬骑士精神，现代国家在历史上通过血腥屠杀和征服行动来检验自己的凝聚力和认同感。

现代国家体系中的战争

我们或许可以从国家个体、国家体系以及国家社会这三个不同的视角来考察战争的作用。

从国家个体的角度来看，战争似乎是政策的工具，是追求国家目标的一种手段。毫无疑问，一个国家之所以介入战争，并不总是有意追求某个目的，国家在某些时候是由于偶然事件或者错误判断而陷入战争，也可能是因为君王发怒或大众情绪激化而走向战争。而且，显而易见，有关国家在 1914 年 8 月—9 月间介入战争的时候，的确有意通过战争来追求某些具体和特定的目标，但是战争本身的进程有时使得交战国及其最初确立的目标都发生了变化。尽管如此，有关战争是一个有效的政策工具之观念一直存在于国家体系的历史之中。我们不管是从黎塞留抑制哈布斯堡王朝权力的战争、腓特烈二世旨在使普鲁士成为一个大国的战争、英格兰抢夺法兰西帝国殖民地的战争、俾斯麦统一德国和确立德国在欧洲霸主地位的战争，还是从同盟国所进行的，旨在击垮轴心国的战争中，都可以找到有关战争有时可能达到预期目标的例子。

从国际体系（国家通过互动而建立起来的结构或者力场）的角度来看，战争似乎在任何时候都是塑造体系之基本的、决定性的因素。正是战争和战争威胁决定某些国家到底是生存还是死亡，崛起还是衰落，边界依旧如故，还是发生变更，民众到底是受这个政府统治，还是受那个政府统治，争端到底是得到解决了，还是悬而未决，用什么样的方式来解决争端，以及国际体系是处于均势状态，还是受一个国家所主导等等。战争和战争威胁并不是决定国际体系结构的惟一因素，但它们是基

本的决定因素，以至于我们用来描述体系的词，如大国和小国，同盟和势力范围，均势和霸权等等，除非从战争和战争威胁的角度来加以认识，否则是难以被理解的。

从国际社会的角度，也就是从国家体系所接受的共同价值观、规则和制度的角度来看，战争具有双重性。一方面，战争是国际社会无序状况的表现，国际社会自身破裂的威胁于是开始促成一种所有人反对所有人的纯粹敌对或战争状态。因此，国际社会关注限制和遏制战争，把战争限定在国际社会自己所制定的规则的范围之内。另一方面，战争作为国家政策的工具和决定国际体系结构的基本因素，是国际社会需要加以利用以实现其目标的一个手段。具体来说，从国际社会的角度来看，战争是执行国际法、维持均势以及促进人们对普遍认为正当的国际法进行变更之手段。国际社会所制定的规则和制度，体现了两种战争观念之间的较量：一种观念是把战争视为对国际社会的威胁，它必须被加以遏制；另外一种观念则把战争视为国际社会可以用来实现自己目标的手段。

国际社会不得不限制国家介入战争的权利。允许国家以任何理由和毫无限制地对他国发动战争，意味着否认国家受到共同规则和制度的约束。国际社会通过四种方式限制国家发动战争的权利。第一，正如前面所提到过的，它规定只有主权国家可以发动战争。第二，它通过传统的战争法规等手段，对战争的方式加以限制。第三，它通过中立法规定中立国和交战国的权利与义务，极力限制战争地理范围的扩大。第四，它努力通过正义战争学说的影响（在国家体系产生的初期）和诸如《国际联盟盟约》、《凯洛格—白里安公约》以及《联合国宪章》那样的法律工具（在本世纪），来限定国家借以合法地发动战争的理由或原因。

但是，国际社会在极力限制和遏制战争的同时，也试图让某些种类的战争在维持国际秩序中发挥积极的作用。第一，它把战争视为一种可能执行国际法的手段。鉴于国际社会中不存在一个中央权威或者世界政府，国际法只能由那些有能力并愿意以武力代表国际社会维护国际法地位的国家来执行。从狭义上说，让战争充当执行国际法的手段就意味着，领土主权受到损害的国家可以进行战争以自卫。从广义上说，它还指自身权利没有受到损害的第三国可以代表受害者进行战争，以及指那些不仅仅是为了维护领土主权，而且还为了维护更广泛的法律权利而进

行的战争。

第二，至少是自 18 世纪初以来，国际社会把战争视为维持均势的一种手段，均势指的是一种没有一个国家居主导地位 and 向他人发号施令的情势。人们一直认为，总体均势的维持对于国家体系生存至关重要，¹⁸³ 为此目的而进行的战争具有积极的作用。

第三，也是更令人质疑的是，人们可能指出，国际社会作为一个整体有时认为，如果战争的目的不是为了维持国际法律秩序或者均势，而是为了导致正义的变革，那么这样的战争就能够发挥积极的作用。众所周知，国际秩序缺少和平变革的机制，它依赖战争这个动力来实现正义的变革。国际社会在什么是必要的维持秩序的规则与制度这个问题上，总是存在着分歧。而在什么是正义的必要条件这个问题上，国际社会的分歧就更大。但是，国际社会在某些时候默认由武力所导致的变革，这反映了一种普遍的认识，即使用武力或武力威胁可以是正义的行为。

当 今 的 战 争

有的人认为，今天的战争已经不具有上面所说的作用，因为核武器的存在使得武力在国家间的关系中丧失了其政治作用。因此，人们普遍认为，从单个国家的角度来看，战争不再是政策另一种方式的继续，而是代表着政策的失败。在一些人看来，武力和武力威胁已经不再是决定国际体系的性质或结构之基本因素，而且今后如果所有国家都拥有核武器的话，那么它们无论如何也成为不了这种基本的决定性因素。他们还认为，国际社会不再把战争视为追求某种目的（比如执行国际法）的手段。罗林教授写道：“在过去，战争的威胁和可能性是维护法律的因素。现在战争已经不再具有这样的作用，因为人类也可能受到一场正义战争的伤害。”^① 显而易见，拥有核武器和其他先进军事技术的国家所发动的、毫无限制或约束的战争，不能充当对外政策的工具，至少根据现代欧洲的经验来理解战争这个词，战争是不能成为对外政策的工具的。这 ¹⁸⁴

^① B. R. A. Röling, *International Law in an Expanded World* (Amsterdam: Djambatan, 1960) p. 19.

样的战争必然导致敌方以及挑起战争的一方社会崩溃（如果不是毁灭的话）。然而，我们不能因此认为，战争和战争威胁已经不再具有任何的政治作用了。

首先，大多数的国际冲突并没有核大国的直接插手。世界上有大约140个国家，其中只有六个国家进行过核爆炸试验。战争和战争威胁在非核国家间的冲突中继续发挥着政治作用，1948年、1956年、1967年和1973年以色列同其邻国发生的战争，1947年—1948年、1965年和1971年的印度—巴基斯坦战争，以及其他很多战争，都表明了这一点。

在这些战争中，核武器在幕后极大地影响了事态的进程。在主权国家之间爆发军事冲突之后，一种恐惧的情绪便弥漫到整个世界，这种恐惧来自人们担心发生一场核战争的心理。这体现为，世界各国试图通过联合国或者地区性国际组织，来迅速地制止战争。但是，核武器在幕后的作用并非使得国家无法使用自己的军事力量，它只是改变了国家使用军事力量的环境——使得它们面对着一系列问题，其中包括：冒险发动战争或进行战争威胁有多大的好处？如何避免或者推迟大国的干涉行动？如何出其不意地采取行动，让大国面对既成事实，使得它们之间产生矛盾，或者设法应对大国停止武器供应的局面？

其次，在一个核大国直接卷入的一场国际冲突中，该核大国的对手可能是一个非核国家。美国对日本使用核武器，美国在1949年8月以前对苏联以及在1964年10月以前对中国进行核威胁等等，都属于这种情况。人们通常认为，在一场一个核大国和一个非核大国之间的冲突中，使用核武器要在政治和道义上付出代价，这种代价与所追求的目标是不相称的。任何一个核大国在面对来自世界舆论的巨大压力和负面影响（这种负面影响可能大于预期的军事收益）时，似乎不太可能决定使用核武器。由于面对核威胁的国家也了解这一点，所以这样的威胁是没有作用的。比如英国和印度尼西亚在1963年—1965年因苏加诺总统“对抗”马来西亚而发生冲突，英国政府相信核武器的使用不是一种政治上可行的政策选择，而且即使英国进行核威胁的话，印尼政府似乎也不会相信英国的核威胁具有可信性。但是，如果一个核大国在使用武力的情势中拥有重大的利害关系，那么这样的威胁可能就具有可信性。当美国和尚未拥有核武器的苏联进行对抗的时候，美国人认为，欧洲的独立对美国具有重大的利害关系，而且由于美国本身不会面临受到核攻击

的危险，所以美国的核威胁是可信的。当今五个核大国中的每个国家，都把自己的核武器瞄准其他一个或几个核国家，这是一个历史悲剧。然而，一些潜在的核国家——包括以色列、南非和澳大利亚——有时声称核力量的主要作用在于防备或制止在数量上占上风的非核大国的攻击。

第三，即使冲突的双方都拥有核武器，而且存在着相互毁灭的危险，当事方仍然具有在政治上利用核武器的可能性。这是一个关键的问题，因为它意味着，不管是在仅有几个国家拥有核武器的今天，还是在世界上的国家可能普遍拥有核武器的明天，武力在核时代都是有用的。

两个核大国处于冲突之中，这并不一定是一种相互威慑或僵持的局面。相互威慑需要具备几个条件，双方拥有核武器只是其中的一个条件。每一方必须拥有能够在遭受第一次核打击以后保存下来的一支核力量，而且能够使敌方的目标遭受足够大的破坏。每一方必须相信对方具有给自己造成损害的能力和意愿，而且这种损害是无法承受的。

核大国过去在相互对抗的时候，并没有陷于这样一种僵局之中。苏联在 1949 年到 1954 年间，不具备向美国投掷核武器的能力。中国从她第一次进行核爆炸的 1964 年到作者写作本书的时候，一直是一个没有对美国投掷核武器能力的核大国，而且即便在中国拥有洲际弹道导弹之后，专家们可能就中国的洲际弹道导弹能否在遭受美国第一次核打击后保存下来并且穿透美国的反导弹防御体系这个问题产生争论。对于英国在 1952 年以后所拥有的核力量以及法国在 1960 年以后所拥有的核力量能否对苏联产生令人可信的威慑作用这个问题，专家们一直存在着不同的认识。战略问题专家们普遍认为，只有 20 世纪 50 年代中期以后的美苏关系才属于核僵持的局面。不仅如此，核僵局不一定是稳定的，它可能受到技术发展的损害，因为技术的发展可能产生有效地保护城市和人口的手段，或者可能产生解除报复方武装的手段。核僵局的稳定性也可能受到政治和心理变化的损害，政治和心理方面的变化指的是，一方使用报复力量的意志发生变化，或者一方对另一方的意志和能力之认识发生变化。

美国和苏联现在保持着一种相互威慑的关系，而且这种关系基本上是稳定的（尽管在反弹道导弹、多弹头和单弹头导弹等威慑力量的计算上还存在微妙的因素），利用武力追求对外政策目标的行为受到了极大的限制。但是，从理论上说，未来的美苏关系还有其他两种出路。

第一，双方有限制地使用武力。敌方会对自己造成难以承受的伤害这种前景，可能会阻止两个相互对抗的核大国对对方使用任何武力，也可能只是防止它们陷于一场毫无限制或约束的冲突之中。在 20 世纪 50 年代，西方世界普遍认为，战略核大战的相互威慑作用是十分稳定的，这可能为超级大国进行有限的战争和确保战争不扩大创造了条件。美苏核僵局的出现，促使当时的人们对有限战争的可能性和确保战争不扩大的方式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并且做了相关的战争准备工作：各种形式的有限战略核交火（limited strategic nuclear exchange）；只限于战场或军事目标的核战争；常规战争；次常规战争或游击战。

迄今为止，美国和苏联一直避免直接介入战争；美苏由于担心冲突发展为无限制的核战争，所以努力避免采取直接的交火行动来验证有限战争的理论。我们只有把朝鲜战争、法属印度支那战争或越南战争视为超级大国通过“代理人”所进行的战争，才可以说美苏两国曾经进行过有限的战争。尽管如此，我们不能根据美苏之间的核僵局认为，这两个国家或者其他核大国今后不会直接发生相互间的军事冲突，包括进行有限核战争。

第二，相互争斗的核大国虽然陷于僵局，但是采取了在政治上运用武力的手段，即进行武力威胁。尽管争斗的每一方可能都拥有足够的、可以给对方造成难以承受的伤害之军事力量，但是双方所表现出来的使用手中军事力量的意志可能是不一样的。掌握较好的“边缘政策”或“危机管理”技巧的一方，可能显得比另外一方更愿意走向战争和更不愿意退却，从而获得外交上的胜利。美国在 1962 年古巴导弹危机中的所作所为就证明了这一点。

因此，传统意义上的战争的政治作用不仅不会由于核武器和其他军事技术的发展而消失，也不会因为核武器的扩散而不复存在。然而，在当今的国际政治中，战争的作用，至少是国家间战争或国际战争的作用，似乎比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前的战争，受到了更大的限制。通过战争可以实现的政治目标变得比过去要更少一些，而使用武力的代价则比过去要更大一些。

从各个国家的角度来看，战争依然是政策的一种工具，但是同 1945 年以前的战争相比，今天的战争要付出更大的代价，而且战争所能实现的目标变得更少。如果核武器在战争中被加以使用以及战争毫无

限制的话，那么战争的代价可能就包括发动战争的社会走向毁灭。即使不使用核武器，一个发达国家所进行的战争也同样会带来这样的毁灭性后果，导致政治、经济和社会的混乱。除非战争可以被严格限制在本国国境以外的地方进行，否则的话，这种难以承受的后果会使得发达国家几乎不可能把战争当作政策的一种工具。事实上，二战以后，发达国家只是参加了本国境外的战争，即便如此，这些战争在某些时候也导致了国内的强烈反响。比如，我们可以看看苏伊士运河战争对英国、印度支那战争和阿尔及利亚战争对法国、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对美国所造成的影响。

战争除了会给战争的发起国带来毁灭性后果和混乱之外，也会损害该国在世界政治中的地位。《联合国宪章》对除了单独或集体自卫之外的任何使用武力的行为所设置的障碍，其本身并非不可逾越，但是它表达了一种集体的忧虑，这对于阻止国家诉诸武力会产生威慑作用。

随着发动战争的代价增大，可以有效地通过战争得以实现的对外政策目标则显得变少了。在历史上，国家总是出于以下三个目标而介入战争。第一，国家进行战争是为了获取经济利益，这种利益可以用获得金币和银币的数量来衡量，或者表现为国家所获得的贸易或市场垄断、原料和投资机会。欧洲国家在重商主义时期所进行的贸易战争和殖民战争，可能是最为典型的例子。第二，国家进行战争是为了维护国家的安全，抵制或消除国家领土完整与独立所面临的外部威胁。那些大规模的预防性战争就是典型的例子，它们包括伯罗奔尼撒战争、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第一次世界大战或许也属于这类战争。如果今天美国和苏联之间发生大战的话，那么发动这场战争的动机应该是追求安全。第三，国家出于追求意识形态目标而发动战争，旨在扩大某种宗教或政治信仰的影响范围。伊斯兰教扩张战争、十字军东征、法国革命战争以及拿破仑战争等等，都追求意识形态目标，至少在一定程度上追求意识形态目标。

如今，人们普遍怀疑国家可以通过战争和领土征服来有效地获取经济利益。甚至是在距今不久的二战中，德国在东欧以及日本在东南亚进行领土扩张，至少其部分动机在于控制市场与原料来源。在1945年以后，似乎没有一个国家会出于这样的原因而企图进行领土扩张。德国和日本例子（而且不仅仅是这两个国家的例子）已经证明，促进经济发

展并不要求对外国领土实施政治控制，那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还拥有殖民地的国家现在已经都得出结论，企图控制他国领土的代价大于收益。

战争仍然被用于追求意识形态的目标，而且在 1945 年以后的时期里，战争被用来扩大共产主义的影响和解放处于殖民统治下的人民。然而，除了一国国内的人民已经由于一场意识形态冲突而处于相互对立状态这样的情势，我们很难找到有关国家以战争和利剑为手段在外国传播某种信仰的例子。以战争传播某种意识形态的行为，最典型地表现为干涉一国内部的冲突。苏联、中国、古巴、阿拉伯联合共和国以及阿尔及利亚等等，都曾努力在国外传播革命思想，支援和支持外国的革命运动，但是它们没有采取公开的人侵行动，以把革命思想强加给他国。

然而，我们不能因此急于得出结论说，对外国领土的军事征服不再能够带来经济利益或者扩展意识形态的影响范围，或者说我们不应急于断定，战争的这些功能将不会以任何形式重现。事实上，一些迹象表明，资源稀缺的事实或者对资源稀缺问题的认知，可能导致国家再次考虑使用武力以夺取原料，或者保持对原料来源的控制权。但是，当今国家除了出于追求安全的目标，都不愿意介入战争之中。当然，安全包括经济财产的安全，这样的目标便是二战以后英国愿意在马来西亚和新加坡使用武力的部分动机。安全也包括确保与自己信奉相同意识形态的外国政府不受威胁，美国 1965 年在越南和多米尼加使用武力，苏联 1956 年和 1969 年分别在匈牙利和捷克斯洛伐克使用武力，都有这样的动机。但在当今世界，似乎惟有安全方面的考虑才会导致一个发达工业国家的政府认为，发动战争是值得的。

从国际体系的角度来看，战争依然是决定国际体系结构的基本因素。然而，就核大国之间的关系来说，决定它们之间相互关系的并不是战争本身，而是战争威胁。大国之间的相互威慑排除了无限战争（unlimited war）成为解决相互争端的手段之可能性，这影响了战争在整个国际体系中的地位。1945 年以后国际体系所发生的三个变化特别值得注意。

第一，虽然美国和苏联的军队在东欧直接对峙了 30 多年，但是双方都没有使用武力来解决相互间的冲突。对于任何一方来说，无限战争都不能充当政策的工具；双方都认为有限战争的风险太大；改变现状的

企图和捍卫现状的努力，比如 1958—1961 年的柏林危机，带有很大的危险性。由于双方既不能诉诸武力，又无法通过外交手段解决主要的问题，结果导致现状得以维持 (no change)，即雷蒙·阿隆曾经说过的“历史发展进程减缓” (the slowing down of history)。^①

第二，尽管在核大国没有直接介入的其他地区，战争依然具有其传统的作用，假如核大国分别支持地区冲突中的一方，那么它们也会遵守相互关系的基本原则，努力对地区冲突加以控制。苏联和美国在 20 世纪 50 年代的远东冲突中分别对中国和台湾的行为加以约束，以及美国和苏联在 1967 年分别限制以色列和埃及的行动，都是此种行为模式的表现。只有在一个或者两个超级大国完全没有介入的冲突中，战争才能起到历史上的那种“通常的”导致冲突的结束有利于一个当事方的作用。

第三，阻碍主权国家之间发生战争的制约因素，促使主权国家内部发生战争或者暴力行为。相对于内战来说，作为决定国际体系结构的基本因素之国际战争的数量有所减少。过去 25 年中所发生的、重大的领土变更——欧洲帝国的解体——不是由国家间的暴力行为所导致的，而是国内冲突或者可能发生国内冲突的形势所造成的。对于许多国家（不管是新的，还是旧的）来说，领土主权所面临的主要威胁不是来自外部的暴力行为，而是边界内的分裂主义暴力行为。共产主义者和反共产主义者、新殖民主义者和激进民族主义者之间的意识形态斗争，更多地表现为国内暴力，而不是国际暴力。

目前引人注目的许多国家内部的冲突与国际体系密不可分。内战由于外国的干涉而走向国际化。国内暴力行为由于共同的鼓动、共同的组织或者模仿，从一个国家蔓延到另外一个国家。一些在某个国家致力于暴力行动的革命团体，成为世界政治中的暴力角色，它们通过绑架外交官或者劫持外国的民用航空器等方式，挑战主权国家对国际暴力的垄断权。内战在国际关系中影响的扩大，具有众多复杂的原因，其中一个原因是，严格意义上的战争或者国家间的战争之政治作用，在当今受到了限制。

^① Raymond Aron, *On War: Atomic Weapons and Global Diplomacy* (London: Secker & Warburg, 1958) ch. VI.

从国际社会的角度来看，战争依然具有双重性质：一方面，它是一种必须被加以限制和遏制的威胁；另一方面，它又是可以用来实现国际社会目标的工具。但是，有关战争会威胁国际社会的认识是今天的主流观念；只有在必须把战争限制在可以承受的范围之内这个前提之下，今天的人们才会同意把战争视为执行法律、维持均势和促进正义变革的手段。

除非出于自卫的原因，国际社会现在不愿意把战争当作执行法律的工具。格劳秀斯在论述战争的正当原因时，提出过有关战争的三个正当理由之著名论断：自卫、恢复财产所有权以及实施惩罚行为。直到如今，国家通过战争恢复财产所有权或者保护生活在国外的本国侨民之行为，如同欧洲国家在 19 世纪的所作所为，仍然经常能够在国际社会中获得支持，并被视为执行法律的行为。有关恢复财产所有权和惩罚违法者都是战争的合法目标之思想，如同本世纪两次世界大战的胜利国所坚持的立场一样，也一直能够获得国际上的支持。

均势依然是国家体系得以继续存在的一个前提条件，影响大国权力分配的有限战争有助于均势的维持。但是，当今总体均势的核心是美苏之间的相互核威慑关系，这种关系现在正处于朝一个三角关系（包括中国在内）方向发展的过程之中。在这种相互威慑关系中，无限战争现在没有什么积极的作用，它只能意味着国家体系的崩溃。

在目前世界上的三个主要国家集团中，有两个国家集团坚持认为，旨在从西方大国手中解放殖民地领土或者捍卫南非黑非洲人自决权利的战争是正义的，我们不能说国际社会已经不再承认战争具有促进正义变革的作用。1961 年印度夺取果阿、1962 年印度尼西亚对西伊里安进行渗透以及 1971 年印度代表孟加拉对巴基斯坦发动战争等等行为，都得到了国际社会的默许，这体现了一种广泛的（尽管不是普遍的）认识，即旨在促进变革的战争行为是正义的。

但在今天，有关必须限制战争行为的观念，压倒了有关战争可以为实现国际社会的某些目标发挥积极作用的观念。在 1945 年以后的时期里，国际社会在限制国家间的战争、维护国家体系方面，取得了一些成果——它们并不是通过遵守战争法规，而是通过遵守国家由于惧怕战争而制定的策略性的游戏规则而获得的。然而，随之而来的便是由非国家的政治单位所发动的越来越多的战争。国内集团成为追求暴力的世界角

色，它们挑战主权国家长期以来所垄断的使用国际暴力的权力，并且不受主权国家所遵从的规则之约束。1968年，联合国安理会谴责以色列对黎巴嫩发动攻击，以色列的攻击行为是为了报复以黎巴嫩为基地的巴勒斯坦游击队对在雅典的 EI Al 飞机所采取的暴力行径。安理会的这个举动对巴勒斯坦游击队没有任何的约束作用，它使得革命集团更加不受国际规则的制约。国际社会今后不能允许这些新型的战争永远不受国际社会规则的约束。

本章探讨如下几个问题：

- (1) 什么是大国？
- (2) 大国对国际秩序产生了什么样的作用？
- (3) 大国对当今的国际秩序能够产生什么样的作用？

大 国

当我们说到大国（或者今天所说的超级大国，我们将在后面对此加以分析）的时候，我们表达了三层意思。第一，我们指的是两个或者两个以上地位相差不多的国家，它们组成一个具有某种人会规则的俱乐部。也就是说，大国不止一个。如果我们把罗马帝国或者中华帝国视为大国，那么它们和我们现在所说的“大国”是不一样的，因为这两个政治实体在它们所影响的更为广阔的国际体系中的地位是独一无二的。在 20 世纪 60 年代，某些作者开始声称，美国的实力已经大大超过苏联的实力，成为世界政治中惟一的主导国家。^① 他们指出，所谓 1945 年以后国际体系的“两极”格局已经与现实不相符了，当今的国际体系更像罗马帝国模式。此后，美国的地位相对于苏联来说又大大地衰落了。不仅如此，美国即使在自己的全球影响力处于巅峰状态的时候，也没有做好接过罗马帝国衣钵的准备。但是，如果美国的确成为惟一的主导国家的话，那么我们就不能再把它称为一个大国或者超级大国了。

第二，这个俱乐部的成员在军事实力方面具有

^① 例如见 George Liska, *Imperial America. The Futernational Politics of Primacy*, Studies in Interational Affairs, no. 2 (Washington: Centre of Foreign Policy Research, Jehns Hopkins University, School of Advanced International Studies, 1967)。

一流的地位，也就是说，这些被称为大国的国家之军事实力是相差不多的，不存在着某个在军事实力上占据优势地位的国家。大国必须是军事强国，这似乎是个不言自明的道理。但是，日本首相佐藤先生在1970年否定了这种说法。他声称，日本将成为历史上第一个不依靠军事力量的大国，以往的大国都是凭借军事力量而成为大国的。^① 佐藤先生可以用下面的事实来证明自己的论点：当时的日本凭借自己的经济实力拥有了很大的政治影响力；把武力当作对外政策工具的做法受到了国际社会的制约。然而，我们没有理由相信，日本或者其他任何国家不采取措施使自己成为一流的军事强国（包括发展战略核武器），就可以成为一流的政治强国。

兰克在一篇题为《大国》的文章中，从自给自足或者不依靠盟友的角度来界定大国的军事地位。他说，如果一个国家能够抵制其他国家的威胁，甚至不怕所有其他国家联合起来对付自己，那么这个国家就是一个大国。^② 我们难以接受这样一个含糊不清的定义，但该定义有助于我们理解今天的美国和苏联所处的特殊地位。这两个国家都有自己的盟友，而且它们除非放弃许多对外政策目标，否则无法放弃这些盟友。但是，由于某些限定条件的存在，美国和苏联即使得不到盟友的支持，最终也可以击败所有的挑战者、维护自身的安全。

其中的第一个限定条件涉及核时代的特殊环境。美国和苏联都无法承受来自对方的核打击，而且可能也无法承受来自其他核大国的核打击。每个核大国都可以采取措施减少遭受核攻击的可能性，比如它可以保持一支威慑力量，努力同他国一起解决政治冲突以及在军备控制领域达成谅解。然而，它最终无法防止另外一个核大国发动攻击。从这个意义上说，今天没有一个国家可以单方面地确保自身安全。

另一个限定条件是，当今大量的中小国家成功地推行了不结盟或中

① 见佐藤荣作先生在联合国大会上的演讲（1970年10月），载于 *The Japan Times* (22 October 1970)；以及佐藤在日本国会上的讲话（1970年11月），载于 *The Japan Times* (26 November 1970)。

② 兰克写道：“如果说大国指的是这么一个国家，即使其他所有国家联合起来对付它，它也有能力战胜它们，那么腓特烈已经使普鲁士获得了这样的地位。”见 *The Great Powers*, translation in T. H. von laue, Ranke, *The Formative Years*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50), p. 203。

196 立主义政策。这些国家可以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不需要盟友便可以维护自身的安全。然而，它们之所以能够做到这一点，是因为在国际体系存在着总体均势这个条件，这种均势不是由这些中小国家所维持的，而是由其他国家所维持的。相比之下，大国抛弃盟友的能力则不需要依赖这个条件。

第三，其他国家承认大国拥有某些特殊权利与义务，或者大国的领导人和人民认为本国具有这样的权利与义务。^① 例如，大国宣称自己拥有或者被赋予这样一种权利，即在涉及整个国际体系的和平与安全的重大问题上发挥着决定性的作用。它们负有义务根据所承担的管理责任（managerial responsibilities）对自己的政策加以调整，而且其他国家也认为大国负有这个义务。虽然拿破仑时代的法国和纳粹德国是一流的军事强国，但是这两个国家的领导人和民众并没有认为本国拥有这些权利与义务，所以这样的国家不能被称为大国。

换句话说，大国的概念体现了国际社会的思想，即国际社会不同于国际体系，它是由一系列独立政治实体所组成的，这些独立的政治实体通过共同的规则和制度以及接触和互动而构成一个整体。大国是国际联盟行政院和联合国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拥有特殊的权利与义务。这并不说，大国之所以拥有这些特殊的权利与义务，是因为国际联盟行政院与联合国安理会的授权，而是因为大国的这种权利与义务得到了其他国家的承认。

二战以后，“大国”这个词被“超级大国”（super powers）这个含义不清的词所取代。福克斯教授在 1944 年首先使用了这个词，他把英国、美国和苏联称为超级大国。^② 实际上，这个词的出现表明，人们已经认识到在世界上出现了一种新型的国家，这样的国家比传统的欧洲大国更为强大，单靠自身的力量就可以在国际政治中扮演主要的管理角色。到 1945 年的时候，美国和苏联的实力大大超过英国、法国和德国，再用“大国”这个词来描述这些国家处于共同的地位，似乎已经不再合

^① 这便是赫伯特·巴特菲尔德一篇题为《大国》的文章之主题，该文发表于 *Diplomatic Investigations*。

^② W. T. R. Fox, *The Super Powers: The United States, Britain and the Soviet Union - Their Responsibility for Peace*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1944).

适了。看来我们应该继续用“大国”(great powers)这个词来称呼美国 197 和苏联,而把欧洲主要国家称为“二流强国”(middle powers)或者“二流强国”(secondary powers),或者把美国和苏联称为“超级大国”,它们比“大国”的地位要高一等。

“超级大国”这个新概念并没有给“大国”这个旧概念增加什么新的内容。美国和苏联在 1945 年以后的 1/4 个世纪中所扮演的角色,是从以前的欧洲大国那里继承下来的。“超级大国”这词为人们所使用,这仅仅意味着,只有美国和苏联这样的国家才是今天真正意义上的大国。随着美国和苏联的实力相对于中国、日本以及联合起来的欧洲国家来说开始衰落,这个词开始失去意义了。

把大国或超级大国界定为拥有战略核武器的国家,或许是错误的。尽管在当今,拥有军事核力量是成为超级大国或者大国的一个必要条件,但它并不是一个充足条件,英国和法国的例子就说明了这一点。不仅如此,早在美国和苏联建立起有效的战略核力量之前,甚至在苏联还没有拥有战略核力量的时候,美国和苏联就已经被确认为超级大国了。

那么,今天哪些国家属于大国呢?最多只有美国、苏联和中国可以算作大国:日本仅仅是一个潜在的大国;西欧还没有联合成为一个单一的国家,根本谈不上是一个大国。我们也应该认识到,中国的大国地位不如美国和苏联那么明显。

用大国的第一个标准即所处地位的相似性来衡量,美国、苏联和中国似乎是在世界政治中具有相似地位的大国,它们相互承认对方的大国地位,它们这种突出的地位也得到国际社会的普遍承认,尽管(正如第五章所指出的)上述各国外交地位的源泉是有所不同的。这三个大国的地位可以用其他国家对它们的外交和军事政策之关注程度来加以衡量。我们今天界定一国对外政策特征的方法,就是判断该国对美国、苏联以及中国的态度——正如在冷战时期,任何国家对外政策的特征都取决于该国对美国和苏联的态度。

198

从大国的第二个标准即拥有一流的军事力量来看,中国不应该被放在大国之列,因为它的战略核力量比较落后(不仅相对于美苏来说比较落后,而且相对于英国和法国来说也比较落后),而且她的常规军事力量的机动性也比较差。中国只有在建立起有效的、针对美国和苏联的核威慑力量之后,才能够被视为一个大国。不仅如此,中国缺少美国和苏

联那样的全球战略影响力 (the global strategic reach), 它依然还只是一个地区性大国。

这三个国家都符合大国的第三个标准吗? 美国的官方言论高度评价国际社会的思想, 以及有关大国在国际社会中拥有特殊权利与义务的思想, 国际社会中的大多数国家也把美国视为一个拥有这种特殊权利与义务的大国。

然而, 苏联的官方言论则宣扬苏联是世界革命的中心, 不断扩展的社会主义联邦必将吞噬国际社会的其余部分。但是, 如果我们分析苏联的行为, 而不是注意它的言论, 那么就会发现, 苏联实际上把自己视为一个享有特殊权利和承担特殊义务的大国。苏联在联合国、军备控制谈判中所扮演的角色, 以及对欧洲、亚洲和中东政治问题的解决所做出的贡献等等, 都表明苏联领导人以及整个国际社会都承认苏联是一个具有特殊权利和义务的大国。

中国的官方言论实际上明确否认中国已经是, 或者试图成为一个大国, 而是把中国视为第三世界穷国在反对“超级大国霸权主义”斗争中可以依靠的对象。然而, 中国和苏联一样, 其行为和言论是不相一致的。中国是核国家、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对外援助的提供国, 而且最重要的是, 她不顾小国朋友的利益, 愿意在平等的基础上与美国达成政治协议。这些都表明, 中国是大国俱乐部的成员, 而不是国际无产阶级的代言人。尽管如此, 中国言行不一的情况, 还是比苏联言行不一的情况更为明显一些, 中国和苏联不同, 前者在共产党获得政权之前从未参加过大国俱乐部。

因此, 如果说美国、苏联和中国都承认自己具有大国的权利和义务的话, 那么这种承认只是试探性的, 而非明确表述的。传统的大国观念, 如同含义更为广泛的国际社会的观念一样, 在当今的国际政治中缺少一个稳固的立足点。

大国的作用

大国之所以能够影响国际秩序, 只是因为构成国际体系的国家所拥有的权力是不平等的。如果国家在权力方面, 如同在法律上一样, 完全

处于平等地位，而且每个国家可以借助相同的力量提出自己的要求，那么除非采取结盟的手段（这可能包含不平等的因素），否则国际冲突是难以获得解决或者被加以消除的，或者说任何国家的要求都无法被加以接受或者被加以拒绝。

由于国家在权力方面基本上是不平等的，所以某些国际问题获得解决，某些国家（弱国）的要求实际上被置之不理，某些国家（强国）的要求得到满足。因为美国不是西方联盟中的一系列权力相等的国家之一，而是一个在西方联盟中享有领导地位或者主导地位的国家，所以该联盟内的某些冲突被限制在一定范围之内，或者无法变成自觉的政治行动。由于苏联在东欧享有霸主地位，并且愿意使用武力来捍卫自己的这种地位，所以该地区中的某些利益冲突获得解决或者受到遏制；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匈牙利、保加利亚以及罗马尼亚等国对苏联提出的要求可能无法得到满足，或者这些国家根本就不会提出这样的要求。我们知道，当这两个同盟集团就欧洲政治问题或者中欧军备平衡问题进行谈判的时候，美国和苏联的立场是至关重要的，而比利时或者保加利亚的观点则是无足轻重的，因此也给谈判以某种结构，否则谈判就无法提出。

换句话说，国家在权力上的不平等使得国际关系格局简单化，并确保某些国家说话算数，而其他国家则没有什么发言权，某些国际冲突占据国际政治舞台的中心位置，而其他国际冲突则处于国际政治舞台的边缘地带。于是，兰克把欧洲国际关系史归结为大国关系史（尽管这有点曲解历史），当代从事国际政治学术研究与实际工作的人都把大国关系视为错综复杂的世界政治的基本架构。

但是，大国除了利用自己的超群实力使得国际关系简单化之外，它们还可能推行有助于维持国际秩序的政策，而不是采取有损于国际秩序的政策。大国主要通过两个途径来维持国际秩序：处理好相互之间的关系；运用自己的超群实力地位，在一定程度上左右整个国际社会的事务。更具体地说，大国通过如下的方式处理相互之间的关系和维持国际秩序：（1）维持总体均势。（2）努力避免在相互关系中发生危机或者努力控制相互间业已发生了的危机。（3）努力限制或遏制相互之间的战争。（4）单方面利用自身在局部地区的主导地位。（5）相互尊重对方的势力范围。（6）根据大国一致或共管的理念，采取联合行动。

当然，这并不是对大国实际行为的描述，而只是阐明了大国可以在维持国际秩序中扮演的角色，而且大国有时确实发挥了这样的作用。事实上，大国和小国一样，经常采取有损国际秩序的行为：它们常常试图破坏总体均势，而不是维持总体均势；促成危机的爆发，而不是控制危机；努力在战场上赢得胜利，而不是对战争加以限制等等。

我们自然也不能把上述有关大国在维持国际秩序中所扮演的角色或者所具有的功能之表述，视为一系列建议或者处方。这样做实际上回避了国际秩序作为人类的一个目标所具有的价值或重要性这个问题，或者说它回避了国际秩序在人类所有目标中所处的地位这个问题。

这两个主要的作用或者功能在历史上是相互关联和密不可分的：大国为处理相互关系所采取的行为直接导致它们试图指导或管理整个国际社会的事务；大国利用自己在国际社会中的超群实力地位而采取的行为，成为它们有效地处理相互之间关系的前提。

(1) 维持总体均势

大国对国际秩序所产生的第一个和最基本的作用，就是处理相互之间的关系。大国的此种作用获得了整个国际社会最为广泛的认可，它是其他国家愿意承认大国拥有特殊权利和义务的前提条件。

大国处理相互间的关系行为首先而且最为重要的是牵涉到对总体均势的维持，从而为国家体系的持续生存创造了条件。本书前面已经讨论过总体均势的维持问题（见第五章）。我在这里只想指出，总体均势主要是大国之间的均势，而且均势的维持主要取决于大国采取包括合作在内的具有创意的措施。当前，这些措施包括大国可能为了维持相互威慑关系而采取的行动。

(2) 避免危机和控制危机

总体均势的维持，正如我们在前面所提到过的，并不能保证大国之间将保持和平的关系。而且，稳定的相互核威慑关系，绝非意味着大国之间的关系将处于核和平的状态之中。因此，大国为了维持国际秩序而处理相互关系的行为，也包括极力避免发生可能导致相互间战争的危

机，或者在危机爆发之后，对危机加以控制。我在这里所想到的是某种有别于所谓“危机处理”（crisis management）的东西。“危机处理”这个词在 1962 年古巴导弹危机以后变得十分时髦，它所指的是，肯尼迪总统对这场危机的处理，使得美国在外交上获得了巨大的胜利，与此同时，也避免了一场战争，而且人们根据对肯尼迪处理古巴导弹危机的方式之研究所总结出来的信条对今后也具有指导作用。相比之下，我所关注的是大国可能单独或联合采取的措施，其目的在于通过避免可能导致战争的危机，或者对爆发了危机加以控制，从而增进它们之间的共同利益。

迄今为止，有关这方面的论述是不能令人满意的。^① 人们对此有些误解，我们有必要消除这些误解。有的人误以为大国总是努力避免发生严重的危机，或者抑制已经发生了的危机。实际上，有的危机是大国故意制造出来的，或者大国有意使得危机处于战争边缘，因为大国所关心的是外交上的胜利。在核时代，大国可能比过去更清楚地意识到避免战争的重要性，而且目前避免战争是大国所关注的东西。然而，即便是在当今，大国危机政策的首要目标并不是避免危机或者控制危机，其军控 203 政策的首要目标也不是在军控谈判中与敌手进行合作。

不仅如此，如果我们以为危机，或者危机的加剧，对国际秩序并没有任何的建设性作用，那么这是错误的看法。假如某些大国在特定的时候不表现出坚定的意志，或者几个大国不共同显示强硬的决心以发出威胁，从而制造危机或加剧危机的紧张程度，那么不管是过去均势的维持，还是今天相互核威慑关系的维持，肯定都是无法实现的。

尽管如此，我们依然可以说，避免或控制危机的措施不仅是所谓的“大国关系的处理”中的重要内容，而且在大国关系中显然发挥了某些作用。美苏两国在双方主导世界事务的时代里，曾经单独或者联合采取行动，努力避免某些危机的发生，而且努力阻止已经发生了的危机进一步升级。美苏主导世界事务的时代正在走向终结。

它们单方面所采取的行动比联合采取的行动更容易为人们所认识。美国和苏联通过避免单方面地干涉对方的势力范围，即苏联在东欧的势

^① 但有两部著作除外，见 Oran Young, *The Politics of Force: Bargaining During International Crises*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68); and Coral Bell, *The Conventions of Crisis: A Study in Diplomatic Management*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1)。

力范围和美国在西欧以及加勒比海地区的势力范围，从而努力避免在其相互关系中出现危机。在美国看来，1962年的古巴导弹危机是一个很严重的事件，因为苏联没有尊重美国的势力范围。它们也努力防止双方的军队发生直接的对抗行动，这样的对抗行动在古巴导弹危机和几次柏林危机中都可能发生。

在它们同地区冲突中的一方结盟或者进行密切合作的情况下，美苏努力约束各自盟友或者伙伴的行为。在北约和华约在欧洲进行紧张对抗的时期里，美苏两国对各自盟友所采取的政策，就符合这种行为模式。在20世纪50年代，同中国结盟的苏联以及同台湾结盟的美国在东亚所推行的政策，也与这种行为模式相吻合。美苏对中东的政策亦如此，特别是在1967年的中东战争中，美国努力约束以色列的行为，而苏联则
204 极力限制其阿拉伯朋友的行为。它们在某些时候也促使对方约束自己的伙伴，比如在1958年的台湾海峡危机和1967年的中东危机中，美苏两国就是这么做的。

美国和苏联都极力避免直接干涉其势力范围以外的地方所发生的一系列危机，因为它们担心一方的干涉行为可能导致另一方也采取干涉行动。这样的例子包括1960年的刚果危机、1967年—1970年的尼日利亚内战、1971年的印巴战争。而且很显然，美国和苏联在直接的外交对抗中，常常有意采取谨慎和克制的行为，肯尼迪总统处理古巴导弹危机的方式就是一个十分典型的个案。有关联合采取行动以避免危机或控制危机的思想包含着多种可能性：卡斯滕·霍尔伯拉德把联合行动（joint actions）归纳为两种。一种是相同的，但并非协调好的联合行动。另外一种是完全相同的，并且在某种程度上得到协调的联合行动。最为极端的一种联合行动就是共同策划和采取外交或者军事行动。^① 在美苏的世界政治地位处于上升势头的时期里，这两个国家处理危机的行动就包括许多第一种类型的联合行动，第二种联合行动不多，例如两国在1967年的中东危机中采取一致的行动以约束以色列和埃及，而第三种联合行动根本上就没有发生过。

需要进一步进行分析的一个问题是，这些单方面采取的或者联合采

^① 见 Carsten Holbraad, *Super Powers and International Conflicts* (London: Macmillan, 1979) ch. 5.

取的克制措施，在何种程度上已经成为，或者可以成为一般的原则或规则呢？我们或许可以认为，在 20 世纪 50 年代和 60 年代，美国和苏联在相互之间的外交对抗中，制定了某些行动规则或者游戏规则，这些规则有助于这两个国家避免和控制那些有损于它们之间的和平关系的危机。比如，美苏的行为似乎表明，这两个国家遵守了一个规则，即不直接干涉对方的势力范围：（自从 1962 年古巴导弹危机以后）禁止飞越对方的领空；禁止在对方的领土内采取某些非常规的军事行为，比如不从事破坏活动、不秘密运送核武器、不向颠覆集团提供武器；（自从苏联从古巴撤走导弹和美国从土耳其撤走导弹之后）禁止在靠近对方的领土上部署进攻性武器等等。

两个超级大国的行为表明，这些规则确实是存在着的。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两国领导人意识到这些规则的存在。不仅如此，即使两国领导人都遵守信条或者原则，不采取规则所禁止的行为，这也并不意味着它们相互之间已经就此达成了协议。

如果说这些行动规则确实存在的话，那么我们很难阐明它们的内容。比如说禁止干涉对方势力范围这个规则，国家通过实际行为表明自己对这个规则的认可，但是它们没有用语言明确表达自己赞同该规则的态度。这样一来，我们就很难判断某个同现存规则不相符的行为，到底是属于违背规则的行为，还是属于试图修改规则的行为，或者它是规则本身已经发生变化的一个表现。

学者们对有关避免危机和控制危机的不成文规则所做的清晰的表述，可能有助于我们理解过去的历史，并且对我们认识大国关系的未来也具有实际的指导意义。然而，我们不仅要研究美苏占主导地位时期里有关避免危机和控制危机的情况，而且也要分析在一个由几个大国组成的体系中避免危机和控制危机的情况。核时代的特殊威胁促使我们意识到，避免危机和控制危机是大国处理相互关系的核心要素，而且我们不可以错误地认为，这样的危机不管是在过去还是现在都具有类似的紧迫性和威胁性。但是，避免和控制可能导致大国间战争的危机，一直是大国在维持国际秩序中所起的作用，它并不是核时代所独有的特征。

(3) 限制战争

206 大国处理好相互之间关系以维持国际秩序的第三种方式，就是采取措施以避免战争，或者对已经爆发了的战争加以限制。这同样可以视为大国一直所具有的维持国际秩序之作用，但是我们不能因此错误地认为，大国的这个作用不管是在过去的时代，还是现在的核时代，都具有同等的紧迫性和重要性。有关这个主题的著述很多，本书的其他地方也对此有所论述（见第八章）。我在这里只是简单地勾画出它的一些基本特征，以使得有关处理大国关系之论述更为充分。

有关避免大国间战争的措施包括维持均势以及避免或控制危险的危机（我们在前面已经对此有所论述），但还包括其他方面的内容。在当今的国际背景中，这样的措施包括：避免由于偶然因素或者判断错误而爆发的战争；减少大国之间对对方行为和言词的误解（这就是第六章所说的“摩擦”）；通过谈判解决或者遏制大国间的政治争端（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大国关系从对抗走向缓和）；通过策略性的和正式的军备控制协定限制军备竞赛；防止小国之间爆发可能把大国卷进去的战争，或者一旦战争爆发，就限制其地理范围，并且迅速促使战争停火；更为重要的是，为了实现上述目标，要处理好和左右小国之间以及小国同大国之间的关系。大国为避免相互间发生战争所做出的努力，同大国在整个国际社会事务的所具有的主导作用是分不开的。

207 在当今的国际背景中，限制大国间战争的措施包括：区分常规战争和核战争，或者说把战争限制在非核战争的范围内；确保大国之间在战争中保持着有效的沟通渠道，从而对战争加以限制，并且促使战争结束；保持有效地指挥和控制军队，减少无意扩大战争的危险。此种措施的表现形式可能是单方面的政策——比如提出有限战争的理论，以及发展和制订有助于限制战争的武器系统和战争计划。但是，它也可能表现为有关国家努力制定行动规则或者形成默契，在限制战争这个问题上进行合作，而且利用正式的法律规则约束战争的行为方式。

(4) 单方面行使地区主导权

大国也可以通过在特定地区或者特定国家群体中单方面地行使自己的主导权 (preponderance), 从而为国际秩序的维持做出自己的贡献。这种单方面行使主导权的地位有三种表现形式, 我把它们称之为“支配” (dominance)、“领导” (primacy) 以及“霸权” (hegemony)。

支配地位表现为一个大国经常对构成自己腹地的小国使用武力, 并且习惯性地蔑视有关国家主权、平等和独立地位的普遍的国际行为规范。英国从 1882 年轰炸亚历山大港到 1956 年从苏伊士运河撤退期间对埃及的政策 (以及后来对伊拉克和约旦的政策), 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另外一个例子是从 19 世纪末到 1933 年富兰克林·罗斯福提出“睦邻政策”期间美国对中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国家的政策。在这两个个案中, 大国的主导权表现为大国经常和不受约束地对地区国家的内部事务和对外关系进行军事干涉, 包括实施长期的军事占领, 并且无视这些国家的主权、平等和独立的权利。

支配属于这么一种关系, 虽然一个大国并没有对当地的国家实行帝国式的统治, 但是它把处于自己腹地内的小国或者准国家 (quasi-states) 视为国际社会中的二等成员。这种关系主要存在于欧洲主导世界政治的时期, 当时流行着一种观念, 即欧洲国家 (以及属于欧洲文明或基督教文明的国家) 同非欧洲国家的关系不同于欧洲国家之间的关系。我们在当代国际政治中找不到明显的支配地位的例子, 支配的确已经不再是大国行使主导权的可行方式了。 208

和支配地位相对应的是领导地位。如果一个大国在同一系列较小国家的关系中处于主导地位, 而且它之所以获得这种地位并不是因为自己使用武力或武力威胁, 它也没有经常性地蔑视有关主权、平等和独立的规范 (在所有的国际关系中都存在着某种程度的不尊重这些规范的行为), 那么我们就可以说, 这个大国享有领导地位。这个大国所享有的领导地位获得了那些较小的国家的自主承认, 而且这些较小的国家都承认该大国可以为实现共同的目标而发挥不可替代的、巨大的作用。这个大国在同小国发生争端的时候拥有很大的讨价还价能力, 但是它并不是因为采取胁迫手段或者蔑视基本的国际行为规范而获得这种能力。

有关国家享有领导地位的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从大英帝国自治领内的国家获得独立地位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这个时期，英国在同自治领内的国家的关系中所处的地位。在此期间，英联邦形成一个成员国在外交上进行密切合作的国家集团，英国在其中享有领导地位，而且它并不是靠采取胁迫手段或者蓄意蔑视其他国家主权来获得这种地位的。另外一个例子是当今美国在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中所处的地位。美国在北约中享有领导地位，这是因为西欧和加拿大在防务方面依赖美国，而美国在防务方面对它们并没有类似的依赖性，北约内的其他国家都承认美国的这种地位。一个国家在某个国家群体中享有领导地位，往往是因为该国家群体中的人民在某种程度上具有单一政治共同体的观念。对于在上面提到的那个时期内的英联邦，我们就很难从本质上说清楚，它到底是一个单一的国家，还是一个由多个国家所组成的国家群体，英联邦内的单一国家之观念体现为所有英联邦国家都拥有共同的国王。

209 介于支配和领导地位之间的是霸权地位。当一个大国对特定地区或特定国家群体内的较小国家行使霸权的时候，它会使用武力和武力威胁，但不是经常性和无所顾忌地，而只是有时和迫不得已地采取这样的行为。大国宁愿依赖直接使用武力或武力威胁之外的手段，而且只是在极端情势和进行政治冒险的时候才会使用武力或武力威胁。大国会侵犯小国的主权、平等和独立的权利，但是它不会蔑视这样的权利，它承认小国拥有这样的权利，还会借用某个特定的重要原则来为自己的行为寻找合法依据。正如格奥尔格·施瓦曾伯格所写道的，霸权主义是“彬彬有礼的帝国主义”。^①

苏联和东欧国家关系的特征就是霸权主义。苏联先后使用武力在1953年镇压民主德国政府的挑战者，在1956年推翻匈牙利政府，在1968年推翻捷克斯洛伐克政府。苏联对除南斯拉夫外的东欧国家实施军事占领，促使该地区在1944年—1948年间建立起了共产党政权。然而，苏联宁愿借助自己作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心以及华约国家抵制西方威胁的主要防御屏障之影响力，使东欧国家采取追随自己的政策。它允许在苏联东欧集团内部出现损害国家团结的分裂行为，而不会冒政治

^① 见 Georg Schwarzenberger, "Hegemonial Intervention," *Yearbook of World Affairs* (London: Stevens & Son, 1959)。

风险以武力阻止此种行为：众所周知，苏联没有试图使用武力阻止1948年的南斯拉夫以及后来的阿尔巴尼亚脱离苏东集团的行为，它也容易容忍罗马尼亚在对外政策上保持某种程度上的独立性。

苏联承认东欧国家享有主权、平等和独立的基本权利。然而，苏联通过1968年提出的、所谓的“勃列日涅夫主义”，以及在此之前提出的“社会主义国际主义”，对这些权利加以限制。它声称，任何社会主义国家所面临的、可能导致资本主义复辟的内部或外部威胁，不仅危害该国，而且危害整个社会主义大家庭。根据苏联的说法，捷克斯洛伐克所享有的主权权利，并不能被用来抵制苏联、波兰、东德和保加利亚在1968年对该国进行军事干涉和阻止其国内变革的行为。社会主义国家在国际法上所享有的基本权利，到底在多大的程度上受到“社会主义国际主义”的限制，这是一个道不清楚的问题。谁来判断一个国家是否面临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到底是由社会主义国家集体断定呢，还是由苏联独自断定呢？社会主义大家庭的范围有多大——比如说，它包括南斯拉夫或者古巴吗？以“社会主义合法性”来否定不干涉原则的“资产阶级合法性”，是否意味着对整个国际法的否定呢？然而，“勃列日涅夫主义”虽然限制了社会主义国家的主权权利，但是没有否定这种权利的存在。不仅如此，它也没有正式地把苏联视为一个在权利和义务上不同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国家。实际上，“勃列日涅夫主义”只是苏联维持自身主导地位的工具，从理论上说，它对苏联以及其他社会主义大家庭成员的权利施加了同等的限制。^①

美国和中美洲及加勒比海地区国家的关系（尽管不包括美国同南美洲国家的关系），大概也可以被视为霸权主义的一种表现形式。美国在1954年间接地对危地马拉使用武力；它在1961年所采取的猪湾入侵事件中，试图对古巴间接地使用武力；它在1962年的古巴导弹危机中明确发出入侵古巴的威胁；它在1965年入侵圣多明各。很显然，美国宁愿对该地区的国家施加经济上的压力，并且通过美洲国家组织（OAS）向它们施加外交上的压力。它十分清楚使用武力所要付出的政治代价，只愿意在极端的情势中选择使用武力。美国自从1962年古巴导弹危机

^① 有关“勃列日涅夫主义”的论述，见 Theodor Schweisfurth, "Moscow Doctrine as a Norm of International Law," *Aussen Politik*, vol. 22, I (1971)。

以后，至少允许了古巴这个敌对政权在西半球的存在，并没有对古巴使用武力。当然，在这个个案中，美国之所以没有使用武力，是因为怕同苏联发生冲突。

美国承认该地区国家的国际法权利。1948年在波哥大签署的《美洲国家组织宪章》，特别强调了不干涉外国内部事务的原则，谴责针对成员国的此种干涉行为，不管它是直接的干涉行为，还是间接的干涉行为，不管它是一个国家的行为，还是美洲国家组织的集体行为。美国试图通过援引有关美洲国家组织有责任采取行动以抵制侵略行为的条款，以便使自己可以不履行不干涉他国内政的义务。此外，美国有时还声称，共产主义势力在某个美洲国家内增长的事实，实际上构成了侵略性的干涉行为，这要求美国采取反对干涉的行为，以捍卫不干涉的原则。

当然，苏联在东欧所处的地位和美国在加勒比海地区所处的地位，既有共同之处，也有不同的地方。尽管反共意识形态一直是美国对外政策的一个工具，在拉丁美洲地区并不存在着执政的共产党之间的国际联系。两个地区的地缘政治或地缘战略格局有很大的差别：在东欧有一群相邻的大陆国家挡住苏联的西进道路，而在加勒比海地区只有几个半岛国家和岛国。从某种程度上说，加勒比海地区类似于东德、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和匈牙利等国所在的地区，苏联对后者实行较为严密的控制，而罗马尼亚、南斯拉夫以及保加利亚则属于受苏联控制较少的一个地区，它类似于处于美国势力范围内的南美洲。

但是，苏联在东欧所处的地位和美国在加勒比海地区所处的地位都属于霸权的例子。不仅如此，两国都以十分类似的方式，为自己在当地的军事干涉行为寻找合法的依据。两国都极力表明自己的干涉行动并不是单方面的，而是集体行动的一部分：苏联在1968年入侵捷克斯洛伐克的行动中有其华约盟国陪伴，美国在加勒比海地区的干涉行动，总是能够得到美洲国家组织的认可（尽管该组织是在美国已经对圣多明各进行干涉之后才认可美国的行为）。此外，虽然两国有时也使用意识形态的借口对自己的干涉行为进行辩护，但是总的来看，它们主要是借助和平与安全的规范，而非公正与正义的原则，为自己在世界范围内的干涉行为进行辩护。这就表明，它们承认在国际社会的实在法（positive law）与惯例中，秩序规范的地位要高于正义规范。

苏联和美国的霸权地位都导致了某种秩序。上述两个地区的国家，

除非获得霸权国家的同意，否则不敢相互使用武力，其政府也不会被推翻。领土争端——比如波兰和苏联之间、波兰和东德之间以及匈牙利和罗马尼亚之间的领土争端——受到了抑制，难以成为自觉的政治行为。这种由一个大国单方面要求他国服从某些规则的事态，被普遍认为是非正义的，但它仍然属于一种形式的秩序。

(5) 势力范围、利益范围或责任范围

大国不仅通过利用自己在世界上的特定地区或者特定国家群体中所享有的主导地位，而且通过达成有关建立势力范围、利益范围或者责任范围的协议，为国际秩序的维持做出自己的贡献。最为简单和最为常见的有关大国建立势力范围、利益范围或者责任范围协议的表现形式，就是大国相互确认各自的地区主导地位，避免相互之间发生冲突或者摩擦。

有关大国之间达成建立势力范围的协议之思想，大概可以追溯到允许卡斯提尔和葡萄牙对某些地方拥有排他性的征服权利之教皇训令，以及这两个强国出于同样的目的而在早些时候所签订的协定，比如 1479 年签订的有关非洲西海岸属于葡萄牙、加那利群岛属于卡斯提尔的条约。然而，“势力范围”这个词只是在 19 世纪下半叶才出现的：寇松在题为《边疆》的罗马乃斯讲义中指出，戈察科夫（Gortchakoff）在 1869 年致克拉伦顿（Clarendon）的一封信中声称，阿富汗处于俄国的势力范围之外，这是该词第一次被明确使用。^①

19 世纪末（尤其是 1885 年以后）的势力范围协议是最为典型的。M. F. 林德利把这样的协议分归纳为三种类型。^② 第一类是殖民国家之间的协议，它承认每个当事国在无主地（*territorium nullius*）或者非主权国家的民众所居住的地区享有排他性的权利。伴随欧洲国家在非洲和 213 大洋洲扩张而来的势力范围协议就属于这一类型。第二类是殖民国家之间达成的涉及第三国领土的协议，根据这样的协议，第三国的所有或部

^① Lord Curzon, *Frontiers*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07), p. 42.

^② M. F. Lindley, *The Acquisition and Government of Backward Territory in International Law* (London: Longmans, 1926).

分领土属于一个殖民国家所独自拥有的势力范围，订立此种协议通常是出于经济剥削的目的。欧洲国家在亚洲扩张的时候常常订立这样的协议，此种协议有时被称为旨在建立利益范围（而不是势力范围）的协定。这类协议的例子包括英国和法国在暹罗划分利益范围的协议、英国和俄国瓜分普鲁士的协议以及日本和其他国家达成的承认日本在朝鲜享有优先权益的协议。第三类是一个殖民国家同当地某个国家之间达成的协议，后者同意不向第三国割让领土或者提供特权。这样例子包括中国同各个殖民国家之间达成的协议，它们使得殖民国家在中国拥有排他性的经济利益范围。英国和西藏在 1904 年签订的协议也属于这一类型。

我们在思考有关势力范围协议的问题时，有必要做几点区分。首先，我们要把两个国家之间达成的、有关相互承认对方在某个地区占据主导地位这个事实的协议或者谅解，同两个国家相互承认对方在这个地区所拥有的权利之协议加以区分开来。美苏相互承认世界上的某些地区属于对方的势力范围这个事实是一回事，而它们认为这样的势力范围具有合法性则是另外一回事。不仅如此，势力范围在一个国家看来是一种权利，而在另外一个国家看来则只是一个事实。美国在“门罗主义”中声称自己拥有阻止欧洲国家干涉美洲的权利，而在欧洲国家看来，“门罗主义”并没有赋予美国此种权利，它只是阐明了美国的一个政策或者目标，它向欧洲国家提出警告，欧洲国家需要重视美国的警告。欧洲国家达成的有关瓜分非洲的协议，只表明缔约双方相互承认对方的权利，它们并没有使得有关当事方获得国际法上的一般权利。例如，1898 年的法绍达危机源于这么一个事实，即法国不承认英国根据

214 自己同德国以及意大利所达成的协议而拥有占据尼罗河上游的权利。

我们有的时候并不能那么清楚地区分一个关于事实的协议和一个关于权利的协议。当两个大国相互承认对方在某个特定地区享有主导权这个事实时，这并不意味着它们相互承认对方拥有法律或道义上的权利。但是，大国可能认为每一方都享有操作规则（operational rules）或者游戏规则所赋予的权利。双方可能都认识到，鉴于一个大国在某个特定地区享有主导权这个事实，其他大国对该地区采取干涉行为是危险的或者冒险的举动。此外，在大国之间可能会形成一个旨在避免危险冲撞的行为准则（code），虽然该准则或许并没有正式地包含在某个协议之中，但是双方都理解和遵循这个准则，各方的政策声明和行为都与该准则相

一致。这样的游戏规则在被遵守一段时间之后，会使得每一方能够知道对方在未来会采取什么样的行为，并且从某种意义上说，它会导致双方相互承认对方的权利。肯尼迪总统指责苏联在古巴部署进攻性武器的行为违反了“游戏规则”，并且采取了相应的反应措施，这就包含了他在道义上谴责苏联的内容，不管他所表述的这种道义上的愤怒情绪到底是真实的，还是虚假的。

第二，我们或许可以把一个当事方允许对方拥有某些有限和特殊权利的协议，同一个当事方允许对方拥有外交上所说的“行动自由”权的协议加以区分开来。典型的有关势力范围的正式条约只规定了特殊权利，比如在 1890 年英国和德国缔结的有关非洲的条约中，一方同意“不在另一方的范围内进行掠夺、缔结条约、接受主权权利或者成为保护国，也不得妨碍另一方扩展自己的影响。”^①“自由行动”（free hand）这个词最早是由英法所使用的，英国允许法国在摩洛哥自由行动，而法国则允许英国在埃及自由行动。“自由行动”意味着，一个大国完全不关心另外一个大国势力范围内的事情，但这种“不关心”（*desinteressement*）必须是对等的——虽然可能难以确定当事方是否从字面上理解“自由行动”，但是“自由行动”表明双方承认对方在某种限度内可以随心所欲，比如，在某些限定性的条件下，虽然当地的个人、集团和政治领袖并不具有主权国家的权利，但是他们还是享有某些其他权利的。尽管如此，有关相互承认对方享有有限和特殊权利的协议，有时会 215 导致某种政治后果，使得当事双方可以“自由行动”。寇松在 1907 年的时候就指出，利益范围会变成势力范围，势力范围会变成保护制度，而保护制度则会变成公然的领土兼并。

第三，我们应该区分积极的势力范围协议和消极的势力范围协议。欧洲扩张时期的势力范围条约是消极的，因为它们是一个大国试图排挤其他大国、让其他大国“不关心”自己在特定地区所具有的意图之手段。相反，当事方为了一项共同的事业而缔结的有关劳动分工的势力范围协议则是积极的，因为它划分了责任范围。

美国、苏联、英国和法国在二战结束前夕所达成的有关战后占领德国的协议，就是一个积极的势力范围协议，当然该协议也有消极的目

^① Ibid. p. 208.

的。该协议的宗旨是，有关国家共同承担占领战败国的领土、索取赔款、审判战争罪犯、防止纳粹复兴等等任务。每一个占领德国部分地区的国家都负有实施一个共同政策的义务。

当前，人们也在讨论一个更具深远影响的、积极的势力范围协定：二战后的国际秩序应该建立在把世界划分为三个或者四个责任范围的基础之上，由一个大国或者大国联盟维护一个责任范围内的和平，这个思想曾经受到过丘吉尔的赞同，它在沃尔特·李普曼所著的《美国的战争目标》（1944年）一书中得到了论述。李普曼设想出四个地区体系：大西洋体系，它由美国和英国管辖；俄国体系；中国体系；印度体系。在216 每一个体系中，一个大国的主导地位获得承认，每个小国接受所在地区的大国的保护，而且放弃同任何其他地区大国结盟的权利。针对有关这种构想是否会使得小国成为地区大国牺牲品这个问题，李普曼指出，每个大国推行“睦邻政策”，将使得小国的利益得到维护。^① 李普曼的构想实际上是想把当时美国与西半球的关系模式，特别是罗斯福推行“睦邻政策”时期的那种关系模式，推广到世界的其他地区。

当今在美苏之间是否存在有关势力范围的协议呢？毫无疑问，两国之间没有达成正式的有关势力范围的协议。在我看来，在当今的环境中达成这样的正式协议，可能有损于该协议的有效性。我们应当关注的是那些并没有包含在条约中的谅解，它们体现在对等的政策声明中，或者仅仅是体现在当事方的行为之中，这样的行为符合某个规则，尽管这个规则可能并没有得到双方的一致同意和阐述，甚至双方可能并没有充分意识到这个规则的存在。

两个超级大国相互承认对方在特定地区占据主导地位的事实，但是它们只是在游戏规则产生权利这个意义上，相互承认两国在各自势力范围内所享有的权利。如果美国在1956年干涉匈牙利，或者在1968年干涉捷克斯洛伐克，那么苏联并不会觉得自己根据同美国达成的谅解所拥有的法律或道义权利受到了侵害，而会认为自己根据一个没有道明的规则（它已经得到双方的认可）所拥有的权利受到了侵害，这个规则就是，大国不应该对敌对同盟内部的国际或国内冲突进行军事干涉。美国没有进行干涉的事实，使得苏联更加相信这样一个没有道明的规则的确

^① Walter Lippmann, *U. S. War Aims* (Boston: Little, Brown & Co., 1944).

是存在着的。在古巴导弹危机期间，肯尼迪总统认为苏联违背了双方达成的一个谅解，即一方不应该秘密地部署核武器，两个超级大国不应该有意隐瞒此种武器的部署。不管双方之间在危机之前是否达成这么一个谅解，美国坚持认为存在着这么一个规则以及对违反这一规则的苏联的行为做出强烈反应这么一个事实，就可能使得这样一个规则在危机之后 217 得以确立。

很显然，美国和苏联之间所达成的有关势力范围的协议，只是使得双方获得有限和特殊的权利，它们并不拥有“自由行动”的权利。美国承认自己干涉华约地区的行为，会违背有关大国共处的游戏规则。但是，美国并没有对这个地区的事务采取漠不关心的态度。美国谴责苏联侵犯了东欧国家根据普遍的国际法规范所拥有的权利，它在外交上支持东欧国家，并且发展与东欧国家的关系，比如尼克松总统在 1969 年对罗马尼亚进行了令人瞩目的访问。同样地，苏联也没有对处于美国势力范围内的国家之事务采取袖手旁观的态度。一个超级大国同另外一个超级势力范围内的较小国家之间所具有的这些联系，是后者拥有某种程度的行动自由空间之重要前提条件。

同样毫无疑问的是，美苏之间的势力范围协议基本上是消极的，而不是积极的。在这些协议中，一方试图把另外一方排除在自己的势力范围之外，协议的作用就是确认一方在某个地区的主导地位，并且避免双方迎头相撞或者最大限度地减轻相互间的冲突。美国和苏联在一系列地区采取了积极的合作态度，但是双方并没有达成协议，以划分各方为了完成一项共同的事业而承担某些义务的责任范围。前面所提到的有关战后占领德国的协定，就属于划分责任范围的协议，但是该协议在战后很快就名存实亡了。

寇松曾经指出，“历史上某些最为令人担忧的时刻”是由于对势力范围协议的解释含糊不清而出现的。^① 美苏势力范围协议的含糊不清和不甚准确的特点，源于这些协议所必须具有的心照不宣与非正式的性质。北约与华约所规定的义务使得两个超级大国必须保护特定的地区，它构成了美苏势力范围协议的基石。这两个同盟所起的一个作用，就是表明一个超级大国不允许另一个超级大国对自己的势力范围进行军事干

^① Curzon, *Frontiers*, p. 43.

218 涉的意志。其另外一个作用，就是集中联盟内较小国家的军事力量，并把它置于超级大国的领导之下。在当前的国际政治中，第一个作用或许比第二个作用更加重要。但即便在同盟的第二个作用中，游戏规则也具有不甚精确的性质。

这些势力范围协议的确立和修改，不是通过讨论和谈判，而是通过斗争和竞争：一个大国在一个地区确立自己的地位，正如苏联在阿拉伯世界确立自己的地位一样（特别是在1967年以后），如果这种地位没有受到另外一个大国的挑战，那么这就会产生一个确认这个大国在该地区拥有某些权利的行为规则。苏联在古巴导弹危机中，挑战美国在加勒比海地区的势力范围，成功地改变了该地区的行为规则，因为在苏联人看来（美国人知道这是苏联的看法），它迫使美国承诺不再入侵古巴，当然苏联也承诺（正如它在危机爆发以前所承诺的那样）自己也将不再在那里部署进攻性武器。假如苏联重新在那里部署进攻性武器（1970年10月因苏联的核潜艇出现在西恩富戈斯而引发的小规模危机就表明，这样的可能性似乎是存在着的），美国将认为苏联违反了协议，如果让苏联的行为得逞，那么这就意味着协议被加以修改了。

(6) 大国一致或者大国共管

人们可能认为，大国之所以能够为国际秩序的维持做出自己的贡献，并不是因为它们达成了有关把世界划分成势力范围、利益范围或责任范围的协议，而是因为它们联合起来，在整个国际体系中推行共同的政策。这体现在大国共管（condominium）、共同统治（co-imperium）或者一致（concert）的思想之中。^①“共管”意味着共同管治（比如英法对新赫布里底的共管），因此不能恰当地描述那种最好被视为大国管理事务（management）而非实施统治权（government）的现象。“共同统治”暗含着把国家按等级排列的意思，它也是一个会让人产生误解的词。“一致”或许是一个最为合适的词，正如“欧洲一致”描述了历史

^① 有关这些词的详细解释，见 Carsten Holbraad in “Condominium and Concert,” in *The Super Powers and World Order*, ed. Holbraad (Canberra: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Press, 1971)。

上重要的共同管理模式。

很多人在 20 世纪 60 年代初倡导美苏共管或者一致，比如约翰·斯特雷奇就主张，美苏联合起来控制“中枢”战略平衡和阻止核扩散。^①今天，那些担心美苏加强相互间合作关系的国家或人士（即中国、某些第三世界国家以及欧洲的戴高乐主义者）有时声称，目前已经存在着美苏共管的局面，它有损于其他国家的利益。

但事实上，今天美苏的谅解结构不能被视为美苏一致或美苏共管。毫无疑问，美国和苏联承认，双方不仅在抵制诸如核战争那样的抽象威胁上具有共同利益，而且在反对其他某些国家上也具有共同利益。它们在《不扩散条约》的框架内相互进行合作，反对潜在的核国家。《不扩散条约》1970 年生效，美苏是该条约的主要倡导国。它们在 20 世纪 60 年代的时候认为，双方在遏制中国这个问题上具有共同利益，并且出于这个目的采取了一些策略，最引人注目的就是两国在印度次大陆所采取的合作行动。但与此同时，每个超级大国也把中国的权力和独立性，视为可以用来制约另外一个超级大国行为的重要因素。自从 1945 年以来，两国心照不宣地采取合作行动以遏制德国的权力，尤其是反对联邦德国获取核武器或者以武力改变领土现状。华约的一项任务就是抵制联邦德国东扩，而北约则要确保联邦德国在一个多边框架内增强自己的实力，并且最大限度地消除其他国家对联邦德国的担忧。

然而，双方一直没有试图建立起“美苏一致”的局面。它们没有经常性地协调各自的行为，比如定期进行讨论，以确定共同的和特定的目标，制定旨在实现这些目标的共同战略，以及分担实施这个共同战略的责任。美苏也没有共同阐明某个关于世界秩序的理论或者意识形态，这样一个理论或者意识形态将使得美苏一致具有确定的方向和目标，过去的神圣同盟或者欧洲一致都有自己的理论基础。这样一种有关大国通过合作来维持秩序的理论，实际上已经被表述在《联合国宪章》的条款之中，但是两个超级大国迄今无意使之重新恢复活力。

如果说曾经有过“美苏一致”的局面可能得以确立的时期的话，那么这个时期已经随着文化大革命（1966—1976 年）后中国的兴起和美国的相关政策而结束了。美国一方面努力把中国拉入大国俱乐部，另一方面

^① 见 John Strachey, *On the Prevention of War* (London: Macmillan, 1962)。

努力维护和加强美苏缓和。在 20 世纪 70 年代,美国有所调整自己的政策,从与苏联建立起“敌手间的伙伴关系”(adversary partnership)以维持国际秩序,转变为主张建立一个由三个或者三个以上的大国所组成的体系。苏联没有进行类似的政策调整,如果在作者写作本书的时候可能出现大国一致局面的话,那么它至少是三个以上大国之间的一致局面。

当 今 的 大 国

事实上,当今的美国和苏联至少在某种程度上,发挥着前面所论述的六种作用,这有助于国际秩序的维持。但是在中国、第三世界国家以及二流强国中的某些人士看来,这是一个不公正的秩序;大国为处理相互间关系和决定国际关系发展的基本方向所采取的行为方式,使得它们拥有特权,如果说今天存在着一个秩序的话,那么这就是一个对两个超级大国特别有利的秩序。

很显然,大国所维持的国际秩序并不能让所有国家都感到公正。它们所采取的决定国际事务基本发展方向的措施,包括利用自己的地区主导地位、达成建立势力范围的协议以及协调对其他国家的政策等等,有助于维持权力分布的现状。它们用于处理相互关系的措施,包括维持均势、控制危机和限制战争,一方面有助于实现国际社会所普遍认可的目标(维护国家体系和避免核战争),另一方面也有助于巩固现存的权力格局。

然而,如果说大国主导的国际秩序并不能让所有国家都觉得公正的话,那么这并不意味着,这样的秩序是无法忍受的,或者将被认为是无法忍受的。我们应该搞清楚这么一个问题,即:是否可能出现一个让所有国家都觉得公正的、完美的国际秩序,或者我们能否否认任何一种国际秩序都必须有自己的看守人和保证人,而且这些看守人或者保证人的利益总是大于其他国家的利益呢?一个取代目前美苏或者美国、苏联和中国在其中拥有特殊利害关系的国际秩序之新的国际秩序,可能并不是一个能够让所有国家都享有公正权利的秩序,而只是一个由其他国家取代上述大国充当看守人和保证人的秩序。

事实上,大国所维持的国际秩序在整个国际社会中得到了广泛的支

持。然而,大国总是面临着如何使其他国家认可自己在国际体系中发挥特殊作用这个问题。大国在国际社会中发挥管理作用的前提是,在国家社会中有足够多的国家明确承认大国的这种作用,从而使得大国的行为具有合法性。我们有必要分析一下超级大国使自己的角色具有合法性的某些条件。

第一,大国不能使自己的特殊地位正式化和明确化。国际社会建立在否定国家按等级排列和主张国家平等的观念基础之上,同一类型的国际社会实体具有相同的基本主权权利和义务。明确规定大国的特权和义务(比如阐明霸权权利,或者霸权国在某个势力范围内所享有的权利,或者把大国共同维护全球和平的内容纳入实证的国际法中),无助于维持国际秩序,而会导致更多的危害国际秩序的矛盾。

第二,大国自己必须努力避免采取引人注目的破坏秩序的行为。国际社会可以接受一个并非让大家都觉得公正的秩序,因为所有国家都认为秩序最终是优先于正义的,而且一个能够确保秩序的体系将得到维护,尽管它并不能满足公正变革的强烈要求。但是,假如大国损害秩序和无视正义的要求,那么它们的地位将丧失合法性。

222

第三,大国必须满足世界上某些公正变革的要求。穷国的经济正义要求、非核国家的“核正义”要求、黑非洲国家有关在南非确立“种族正义”的要求等等,都应该在大国的政策框架内得到满足。大国如果不能满足这些要求,至少也要采取努力满足这些要求的措施,从而避免疏远国际社会中的一些重要国家。一个大国要想合法地扮演管理者的角色,就不能无视这些要求,也不能像小国那样采取对立的态度,大国的行动空间受到了“责任”的限制。

第四,在世界的某些地区,大国的政治地位受到二流强国的限制,大国可能努力把这些国家视为自己的伙伴,从而维持相关地区的均势。当前,英国、法国和联邦德国在欧洲和地中海地区都是主要的二流强国(前两个国家在非洲也是主要的二流强国),而日本则是维持亚太均势“必不可少的强国”。虽然这些二流强国对各个大国以及大国之间的合作持有不同的态度,而且不能采取一致的政策以阻止或者限制大国一致的倾向,但是这些国家相互联合的可能性,无疑对大国的傲慢态度产生了制约作用。大国使自己扮演的角色合法化的一个途径,就是拉拢主要的二流强国,把这些潜在的主要竞争对手当作自己在全球管理体系中的小伙伴。

第 三 部 分

通向世界秩序 的其他道路

第十章

当代国家体系的替代形式

我们必须开始探讨通向世界秩序的其他道路选择，并且思考这么一个问题：有哪些世界政治组合形式（forms of universal political organization）可能取代现存的国家体系呢？我们可以想出很多这样的替代形式。我在这里只把注意力放在几个比较重要的替代形式上面。

要想回答这么一个问题，我们必须搞清楚国家体系的基本属性，否则的话，我们就可能错误地把国家体系从一个特定发展阶段或者表现形式到另外一个特定发展阶段或者表现形式的变化，看做是国家体系为某个截然不同的东西所取代了。这里所说的国家体系之基本属性包括三个层面的含义：存在着一定数量的主权国家；主权国家之间存在着一定程度上的互动关系，并且在此基础上构成一个体系；主权国家在一定程度上接受共同的规则和秩序，并且在此基础上构成一个社会。

国家体系的替代形式

当今世界政治结构中的许多变革可能被认为带有根本性质，但实际上它们仅仅反映了国家体系从一个发展阶段到另一个发展阶段的过渡，并不意味着国家体系本身走向消亡了。

裁军的世界

第一种这样的变革，是产生一个“裁军的世界”（disarmed world），即根据美国和苏联所提出的、并为一系列裁军会议所认可的裁军计划，在全世界实

现“普遍和彻底的裁军”。^① 根据美国和苏联的裁军计划，经过分阶段逐步裁减军备的过程，主权国家最终除了保留用于维护国内安全的武装力量之外，将不再拥有军备。按照美国的计划，随着国家逐步裁减军备，世界权威（world authority）的力量将不断得到增强，世界上的武装力量最终可能被置于该权威的控制之下。

实现“普遍和彻底的裁军”之理想，意味着当今的国际政治结构发生了根本的变革，这要求我们从全新的角度来思考和认识整个国家间关系的基础。然而，这并不代表着国家体系的终结，因为它并没有导致主权国家的消亡、国家间互动关系的终止以及国际社会的衰亡。即使像美国的计划所设想的那样，随着“普遍和彻底的裁军”目标之实现，将出现一个拥有武装力量和政治影响力的世界权威，而且这个权威的出现足以损害国家对其领土和民众的最高管辖权，这也只是意味着国家体系的第一个基本属性不复存在而已。但是，这并不一定是裁军的世界所必然导致的结果。可能正如苏联的计划所设想的那样，在裁军的世界中，世界的中央权威本身并不统率军队，而且它依然受制于大国的否决权。

有关倡导一个实现普遍（涉及所有国家）和彻底（包括所有的武器和军队）裁军的世界之主张，有两种表现形式。它有的时候表现为一种“激进”（strong）的形式，即认为全面裁军将使得战争不再可能发生，因为国家即使想发动战争的话，它们也无法发动战争。它有的时候表现为一种“温和”（weak）的形式，即认为最大限度地裁减军备将使得爆发战争的可能性减少。^②

李维诺夫在国际联盟讨论裁军问题的时候所提出的全面裁军的思 227

① 见下面两个文件：the “Revised Soviet Draft Treaty on General and Complete Disarmament under Strict International Control” of 24 September 1962, and the United States’ “Outline of Basic Provision of a Treaty on General and Complete Disarmament in a Peaceful World” of 18 April 1962. 它们都是下面一本书中的附录文件：Sir Michael Wright, *Disarm and Verify* (London: Chatto & Windus, 1964)。

② 《军备竞赛的控制》（*The Control of the Arms Race*）一书的第2章对这种主张做了较为详尽的论述。

想，就属于“激进”的表现形式。^① 他声称，全面裁军与任何形式的部分裁军有着根本性的区别。一方面，全面裁军比任何形式的部分裁军更有意义，因为随着武器被彻底销毁和军队被完全解除武装，即使对那些想诉诸武力的国家来说，战争也根本无法成为政策的工具。另一方面，全面裁军比任何形式的部分裁军目标都更容易得以实现。有关部分裁军规定的一种表述是：“减缩各国军备至适足保卫国家安全及共同履行国际义务的最小程度”（《国际联盟盟约》第8条有关裁减军备的规定）。李维诺夫指出，全面裁军的目标之所以比部分裁军的目标更容易实现，这是因为，假如国家同意完全解除武装的话，那么它们就可以避开那些有关如何确定哪些武器和军队可以保留的“棘手问题”。

反对李维诺夫所说的“全面裁军”主张的人认为，所谓的“全面裁军”是不可能实现的目标，因为在人类社会中一直存在着有组织的暴力能力，这种能力不会因为条约的签订而被废除。所有所谓“全面裁军”的具体方案，都主张保留用于维护国内安全的武装力量，有的方案甚至还主张保留一支由世界权威所统率的军队以维持国际秩序。即便是在一个实现裁军的体系中，国家照样可以在原始社会的水平上进行战争。不仅如此，一个裁军体系中的国家有能力跨越此种战争水平——实现重新武装，念念不忘或者重新创造过去曾经被放弃的东西。裁军条约所能做的，只是对某些武器和军队加以限制，其结果是提高了条约所没有规定的那些武器与军队的战略重要性。所谓的“全面裁军”，实际上同各种形式的部分裁军并没有根本性的区别。

因此，李维诺夫有关“全面裁军”将使得战争不再可能爆发、部分裁军无法阻止战争的观点，无疑是缺乏说服力的。不仅如此，即使在最为彻底地实现裁军目标的体系中，总会有一些国家比其他国家拥有相对较多的战争能力，决定一国战争潜力大小的因素不仅仅是该国所拥有的“军备”，它还包括该国的经济、技术和人口资源以及战略地位、政治领导能力、军事经验、创造力、士气等等诸多因素。因此，“全面裁军”

^① 李维诺夫在1927年苏联代表首次出席日内瓦国际联盟裁军会议筹备委员会的一次会议上提出了这个主张，在1932年世界裁军会议上对此做了最为系统的论述。见 League of Nations, "Conference for the Reduction and Limitation of Armaments," *Verbatim Records of Plenary Meetings*, vol. I, p. 82。

同任何形式的部分裁军一样，其结果都会导致在“裁军的世界”中存在着军事实力上的差别。我们由此也可以看出，李维诺夫有关简单的“全面裁军”将使得国家可以避开谈判的难题之论点，也是缺乏说服力的。

有关实现普遍和彻底裁军的温和形式的主张，并没有遭受这样的批评。从逻辑上说，裁减武器装备和军队的数量，并使其在质量方面保持在原始社会的水平上，这完全是可能实现的目标，或者说同人类社会的性质不相矛盾。不仅如此，在人类社会中也可能存在一些有助于维持这种状况的习惯、制度、准则或者戒律。人们有理由相信，一个不再拥有精良的武器装备以及先进的军事组织形式和军事技术的世界，比当今那种国家拥有武装的世界似乎更有助于防止战争的爆发。具体来说，人们可能认为，假定其他方面的因素是相同的，那么在新的裁军世界中战争更不可能发生，这是因为，在这样一个世界中，不存在着大规模军事机器这个导致战争的因素；国家在军事上所拥有的战略调动能力较小，因而很少有其他的国家会处于某个国家的军事打击的范围之内；在这样的世界中，不存在可以被用来发动突然袭击的武器系统。人们也可能指出，假定其他方面的因素是相同的，即便爆发一场世界大战，这场大战所导致的灾难程度也是较轻的，因为它的进展较慢、代价较小，而且它所导致的物质损失和经济混乱的程度也是相对较轻的。^①

不管有关裁军世界的构想能否成为现实，它促使我们去思考这么一个问题，即：在当今的国家体系中，世界秩序能否达到一个更高的层次？然而，我们也必须认识到，单单设想一个国家的武装力量在数量和质量上被裁减到低水平的世界，并没有告诉我们如何在这样一个世界中维持秩序。有关裁军世界的设想最多只是一个很不完善的方案，它必须同有关社会生活基本目标赖以实现的规则和制度之解释（即本书第三章 229 的论点）结合起来。

首先，我们会面对着这么一个问题，即如何使世界上已经裁减军备的国家保持低水平的军备。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建立起核查制度，以便发现违背裁军协定的行为，也必须建立起制裁和报复制度，以制止这种违背协定的行为，或者在违背协定的行为产生之后，保护无辜的当事方。

^① 然而，“裁军世界”中的战争速度、代价和破坏性不仅仅取决于武器的规模或先进程度，还取决于士气和社会因素。

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在一个实现大规模武器裁减（包括彻底销毁核武器和其他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体系中，违反规则的国家相对于其他国家来说，将更容易获得军事上的主导地位。为了阻止这样的违反规则的行为，或者在出现此种行为之后确保无辜当事方的安全，我们似乎需要一个在军事力量上占据优势地位（包括拥有核武器）的世界权威。

然而，还有一个比上述问题更为重大的问题，即如何维持整个世界秩序。正如我们在前面所了解到的，在一个裁军的世界中，依然存在着从事有组织的暴力行为的能力，而且它在人类事务中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裁军的世界依然是由独立的主权国家所组成的，其中总是充满着政治冲突。国家内部秩序的维持依然有赖于政府掌握着占据优势地位的武装力量。国际秩序的维持依然有赖于规则和制度发挥作用，以控制或者遏制军事力量的使用——不管是通过维持均势、允许使用武力来强制执行法律、限制战争的方式、使用武力来促进政治冲突的解决，还是利用大国一致的主导作用。

实现一个裁军世界的思想，它除了给我们提出这些有关维持世界秩序的问题之外，也让我们思考有关如何实现公正变革的一些问题。如果裁军的世界比当今这个高度军事化的世界更为和平、更为安全的话，那么它可能也意味着，在这样一个世界中，不容易产生由武力所导致的公正变革，世界的公正变革依赖于和平变革制度。军事化程度较低的世界到底是更难以导致公正的变革，还是更容易实现公正的变革呢？关键的问题在于，单单是设想大规模的裁军，这并不能告诉我们如何才能实现这样的目标。

换句话说，有关如何在当今高度军事化的世界中维持世界秩序的这些问题，也很可能会在军事化程度较低的世界中出现。但这并非意味着前者比后者更为可取，而是说明有关建立一个裁军世界的构想本身，并没有指明一条通向世界秩序的道路。

国家团结一致的世界

另外一种可能成为现实的世界政治结构，便是主权国家在全球范围内相互进行合作，它是联合国或者其他类似的组织得以建立的基础，这些组织已经成为世界政治中的重要力量。我们或许可以把它理解为这么

一种事态：联合国成员国遵循《联合国宪章》、按照富有想象力的联合国创始人所设想的方式行为。它意味着，格劳秀斯主义者或者社会连带主义者的国际秩序学说得到了验证，根据该学说所提出的设想，虽然国家反对建立起一个世界政府，但是它们努力通过相互间的密切合作和严格遵守它们所接受的有关国际秩序的基本原则，寻求一个可以替代世界政府的东西。^① 它的基本假定是，世界上的大多数国家团结一致，或者有可能采取团结一致的行动，表达国家社会的集体意志，抵制那些挑战集体意志的行为。这样一种世界政治局面和当今的世界政治现实有着重大的区别，但它只是代表着国家体系的一个新的发展阶段，而不意味着国家体系为某种截然相反的东西所取代了。

格劳秀斯主义者或者社会连带主义者的学说，试图通过限制或者禁止国家以武力追求政治目的，以及提倡武力只能用于追求国际共同体的目标之思想，来建立起一个更有秩序的世界。也就是说，它试图使得国内社会的基本特征在国际社会中体现出来。格劳秀斯所构想的规则体系，旨在帮助战争中的正义一方获得胜利，因为正义方是代表整个共同体行为的。 231

正如我们在本书第二章中所提到过的，新格劳秀斯主义者的思想在20世纪体现在《国际联盟盟约》中，国联盟约禁止成员国不经过它所规定的某些程序而发动战争。它也体现在1928年的《巴黎公约》和《联合国宪章》中，前者禁止把战争当作国家政策的一个工具，后者禁止使用武力或武力威胁侵害任何国家的领土完整和政治独立。《国际联盟盟约》和《联合国宪章》一方面限制国家使用武力，另一方面又授权国家以国际联盟或联合国的名义使用武力或者武力威胁，以维护集体安全体系。集体安全原则意味着，国际秩序赖以存在的基础不应该是均势，而是国家联合起来并代表整个国际社会行事而产生的权力优势，它将阻止挑战体系的行为，或者对付那些已经出现的挑战体系的行为。

社会连带主义者的方案似乎提出了一个更好的维持世界秩序的方式，因为它试图使军队仅仅成为国际社会的工具，或者主要成为国际社会的工具。然而，它主要依赖于国家之间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团结一致，

^① 我在下面一篇文章中探讨了 this 学说：“The Grotian Conception of International Society,” in *Diplomatic Investigations*。

确认共同的目标，并且采取行动以实现共同的目标。在 20 世纪的现实环境中，国家之间并不存在着这样的一致性。在实践中应用格劳秀斯主义者或者社会连带主义者的方案，不仅会导致建构一个更好的世界秩序之努力付之东流，而且正如我们在本书第六章中所指出的，也会削弱或者损害传统的维持秩序的手段之作用。国际联盟分别在 1935 年和 1939 年针对意大利侵略埃塞俄比亚和苏联入侵芬兰所采取的行动，不仅未能维护集体安全原则，而且无助于阻止德国破坏均势的行为。联合国大会在 1950 年通过决议，确认美国及其盟友在朝鲜的所作所为是出于维护集体安全原则，这个举动不仅削弱（而不是加强）了联合国在世界政治中的作用，而且把这个事件视为执行法律的大国同违法者之间的一场斗争，从而损害了大国外交的作用。

虽然我们在 20 世纪应用社会连带主义方案的时机尚不成熟，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今后不可能出现有利于这种方案发挥作用的条件。整个国际关系的历史可以说支持这么一个观点，即主权国家从来就无法做到团结一致，无法让武力的使用服从于共同的目标。然而，这并不能证明国家今后无法做到团结一致。

众多核国家并存的世界

当代国家体系的性质可能发生的另外一个基本变革，就是出现一个众多核国家并存的世界。当然，这样的变革并非意味着国家体系为某个截然不同的东西所取代。这种当代国家体系的替代形式之所以引起人们的兴趣，主要是因为人们普遍认为，核扩散的进程可能最终导致一个众多核国家并存的世界，而不是因为人们认为它更有助于维持世界秩序，尽管核扩散的支持者有时认为，核扩散有助于维持世界秩序。

如果具备莫顿·卡普兰所说的“单位否决体系”和阿瑟·伯恩斯所说的“威慑体系”^①之条件，那么众多核国家并存的世界同当今的世界有着重大的区别。这意味着，不仅仅是许多国家，而且所有国家或者所有的国家集团都拥有核武器。（实际上我们比较容易设想一个每个国家都

^① 见 Kaplan, *System and Process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pp. 50 - 52; and Arthur Lee Burns, "From Balance to Deterrence," *World Politics*, IX, 4 July 1957.

处于某个集团的“核保护伞”之下的世界，而难以想象一个世界上所有的140多个国家都拥有核武器的情景。)这也意味着，所有的国家或者国家集团之间都存在着相互核威慑关系。换句话说，我们不仅必须假定每个国家或国家集团都拥有核武器，而且也必须假定每个国家或国家集团都能够对其他国家或国家集团造成“无法承受的损害”，但是它们不能防止自己遭受这样的损害。

因此，“单位否决”体系的基本特征是，每个国家或者国家集团都拥有阻止其他国家或国家集团有意或“理性地”发动无限核战争的能力，这就好比当今的美国和苏联在相互关系中拥有这样的否决权。值得指出的是，这种有关“单位否决体系”中国家行为之描述是不全面的，由此推导出来的结论也是具有局限性的。卡普兰只有通过提出与自己的模式无关的假定，才能够认为“单位否决体系”就是霍布斯所说的自然状态，在这种自然状态中，所有国家的利益都是相互抵触的；体系内的行为体只能存在于一个层次上；在这么一个体系中，同盟关系、盟友关系的变换或者平衡都是不存在的；像联合国这样的世界性行为体起不到任何作用；该体系将使得现存的事态得以永久地保存下去；国家之间总是保持着极度紧张的关系，无法做到团结一致和融为一体。^① 233

如果我们假定战略核武器是“单位否决体系”中的行为体所仅有的、用来实现自己目标的手段，那么每个行为体都拥有阻止其他任何一个行为体使用此种手段的否决权，这将会导致此种后果。但这是一个很奇特的假定。如果全球性的“单位否决体系”的特征体现在当今美苏相互否决体系中的话，那么每个行为体一方面能够阻止其他行为体使用战略核武器，另一方面也能够使用其他权力手段和影响手段（军事的、政治的和经济的），从而使得外交上的冲突与合作关系得以持续下去。因此，我们不应该假定，不同行为体在权力和影响力方面的差别将不复存在，同盟关系或者盟友关系的变化将不再具有什么作用，或者说这样的变化不会导致现状的改变；我们也不能从中得出结论说，这样的体系必然是霍布斯所说的自然状态，或者国家间的关系总是处于高度紧张的状态，像联合国那样的世界性行为体没有任何的作用。此种体系中的行为体虽然无法使用战略核力量，但是它们可能遏制（如果说不是解决）相

^① Ibid.

互间的政治争端。我们甚至也可以想象，已经在惩罚的恐惧中存在着数十年的国际体系可能最终会发现，该体系秩序的维持实际上同这种惩罚的恐惧毫无关系，这样一来，全球核威慑就会成为一个多余的东西，它
234 只是一个可以被抛弃的空壳而已。当然，这仅仅是猜测而已。我的意思是，这样的行为和卡普兰的推论一样，是同“单位否决体系”的假定相一致的。

我们是否有理由认为，众多核国家所组成的世界作为国家体系的一种形式，一定比当今的国家体系更有助于维持世界秩序呢？一种观点认为，核国家的数量越多，国际体系越能够实现和平与安全的目标，因为核国家数量增多将导致相互核威慑的局面，这有助于维持美苏之间的和平关系。这种观点夸大了美苏相互核威慑关系的稳定性，实际上，政治和技术变革会破坏这种稳定性，而且即使这种稳定性可以持续下去，它并不能避免核战争的爆发，只是使得核战争带有“非理性”的性质（见第五章）。不仅如此，这种观点错误地假定，核武器的扩散必将导致在其他国家间的冲突关系中也出现两个超级大国目前所保持的那种相互核威慑关系。换句话说，它错误地假定，核武器的扩散必将导致一个“单位否决体系”，但事实并非如此。

还有一个更具有说服力的观点，即：不管核武器的扩散是否使得世界更加安全，只要它使所有国家或国家集团都拥有核武器，那么这就将促进国际正义目标的实现。如果从各国具有获得核武器的同等权利这个意义上理解国际正义，那么只有实现彻底的核裁军，或者让所有国家或国家集团都拥有核武器，国际正义目标才能完全得到实现。任何区分核国家与非核国家的规制都会导致人们的批评和指责。值得指出的是，1968年《核不扩散条约》的赞成国家和反对国家之间争论的问题，或者更笼统地说，有核国家与无核国家之间争论的问题，并非是否应该在核国家与非核国家之间划一条分界线，而是这条分界条线应该划在什么地方，即如何确定哪些国家应该属于核俱乐部的成员，哪些国家应该被排挤在核俱乐部之外。世界上主要的“不安分”国家，即中国、法国和印度，虽然有的时候声称自己与外国发展核武器是正当的行为，但是从来
235 来不赞成普遍和彻底的核扩散，而且主要关心如何消除那些影响自己加入核俱乐部的障碍。在这方面，国际秩序和国际正义或者平等对待的目标是相互冲突的。

不论由众多核国家所组成的世界是否是当今国家体系之理想的替代形式，我们都必须把它视为一种可能成为现实的选择。有关由众多核国家所组成的世界之构想，同实现军备裁减的世界之构想一样，本身都是不全面的。由众多核国家所组成的世界能否有助于维持秩序和实现正义的目标，这除了取决于处于领先地位的军事技术和拥有此种技术的国家数目之外，还取决于其他一些因素。

在意识形态上具有同质性的世界

另外一个国家体系的替代形式，就是一个在意识形态上具有同质性的世界，它有别于当今那种在意识形态上具有异质性的国家体系。政治意识形态的鼓吹者们一再声称，如果它们自己的学说在整个国家体系中获得全面的胜利，那么这将消除或者减少导致战争和冲突的原因，并产生一个更有秩序的世界，而且还会带来其他方面的益处。支持宗教改革与反对宗教改革、支持英国和法国革命与反对英国和法国革命的理论家们，以及当今的共产主义辩护士与反共思想家们，都异口同声地宣称，即使他们是在鼓吹战争，也是为了追求和平的事业。

正如我们在前面已经指出的，这些意识形态革命家和反革命人士有时主张以世界社会取代国家体系（见本书第二章）。但是，它们有时也主张建立一个依然属于国家体系形式的世界，在这样一个世界中，所有国家都信奉相同的意识形态，从而维持相互之间的和谐关系。我们在这里将讨论这种观点。

康德拥护法国革命的意识形态，并因此提出了和平有赖于建立一个世界共和国或者世界国家（*civitas gentium*）的思想，但他后来在《永久和平》一书中对此感到绝望，并转而主张建立一个由“共和制”或者立宪制国家所组成的联盟，该联盟将摆脱战争，并且努力扩展到全世界。^①拿破仑以后的正统主义思想家从主权国家所组成的神圣同盟中，看到了维护世界和平与国内稳定的希望，组成神圣同盟的主权国家为虔诚的宗教理念和王朝的保守思想所团结在一起。马志尼则认为，未来的和平取决于民族主义在全世界获得胜利，由相互间没有利害冲突的人民

^① Kant, *Perpetual Peace*, pp. 19 - 20.

所组成的神圣同盟将有助于实现这个目标。美国总统威尔逊、英国民主管制联盟的成员以及俄国的布尔什维克党人等等都认为，民主力量或者民众力量控制对外政策，是国家之间保持和平与和谐关系的一个基本原因。

马克思认为，未来的和平有赖于资本主义和阶级斗争的消亡。马克思声称，国家只是阶级斗争的一个工具，而且他似乎把国家视为一种过渡性的现象（尽管这一论点不甚清楚）。他的理论似乎预言，随着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国家以及国家体系必将消亡。另一方面，马克思和恩格斯有时似乎也提到，在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胜利之后，独立的单位仍将在世界上继续存在下去。自从1917年以来，马列主义者致力于建立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联盟或者社会主义大家庭。在他们所处的时代中，仅有为数不多的几个国家爆发了无产阶级革命，而且在这些国家中，国家机器作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得以保留下来。在我看来，当今的马列主义者认为，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受“社会主义国际主义”原则所制约，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受“帝国主义”原则所制约，而社会主义国家同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则受“和平共处”原则所制约。

这种有关未来国家体系的构想，即通过使所有国家都信奉一个正确的意识形态来追求秩序与和谐的思想，不同于格劳秀斯主义者或者社会连带主义者的构想，因为在后者看来，在国家之间将继续存在着利益冲突，应该借助集体的优势力量来抑制这种冲突，而前者则认为，由于国家普遍信奉一个正确的意识形态，因此国家之间的利益冲突要么是不存在的，要么是不重要的。然而，这两种构想有时同时反映在同一个人或者一些人的思想中。比如，威尔逊总统对社会连带主义者的国际联盟思想充满了希望，但同时他也主张国际联盟应该是民主国家的联盟。又如，联合国的设计师们主要信奉社会连带主义者的思想，同时他们也认为正确的意识形态是和平的根源，这表现为，他们要求联合国的成员国都应该是“热爱和平”的国家。

我们有必要区分两种观念。一种观念认为，在意识形态上具有同质性的国家体系之所以更有秩序，这是因为它建立在信奉相同意识形态这个基础之上，不会导致意识形态上的冲突。另一种观念是，在意识形态具有同质性的国家体系之所以更有秩序，这是因为此种特定的意识形态

会减轻或者消除国家之间的利益冲突。后一种观念受到了某些人的强烈批评，无论所涉及的是何种意识形态。

在君主及其大臣控制对外政策、战争源于王朝间的冲突以及土地贵族统率常备军和从事战争的时期里，自由主义思想家或者资产阶级思想家提出一个似乎很有道理的论点，即国际冲突是由占主导地位的政治集团人为制造出来的，世界范围内的国内政治变革将导致一个各国之间的利益自然和谐的时代。在这种观念的影响下，潘恩提出战争的根源在于君主主权，科布登坚持认为商业是一剂万灵药，孔德则声称战争与工业社会是不相容的。

但是，随着国内变革导致君主和贵族失去对外政策的控制权以及中产阶级作用的上升，这个论点就失去说服力了。德国和法国的市民以及曼彻斯特的制造商们不怎么关心王朝间的不和与争斗，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自己没有导致国际冲突的动机。国家的行为动机是国家利益，而不再是王朝利益，民众的自尊心或民族主义感情取代王室的自尊心与感情，成为冲突和战争的原因。在20世纪初，列宁借助霍布森的思想提出一个似乎更有道理的论点，即金融资本家和工业资本家的争夺会导致国家间的紧张局势和战争，和平的希望在于发生一个导致无产阶级掌权的国内政治变革。 238

然而，正如资产阶级政府虽然没有某些导致封建阶级走向战争的动机，但是具有自己的导致战争的动机一样，由共产党领导和代表无产阶级利益的政府尽管没有过去资产阶级或资本主义政府的某些动机，也有自己的、导致国际冲突的动机。苏联、中国以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相互关系的历史经验，就否定了有关人民之间或工人阶级之间的利益自然和谐的观念。社会主义国家或无产阶级国家在处理相互关系的时候，表露出了在过去国家关系中所存在着的利益冲突。

社会中的一个特定阶层只有在自己尚未掌握政权的时候，才会表露出国际主义倾向。当政的社会成员总是极力在国际舞台上维护和扩展本国的权力。而在野的社会成员则不大关心国家的对外荣誉与利益，通常批评本国的对外政策，甚至同情本国的对手。声称正确的意识形态在全世界获得胜利将有助于维护世界和平的那些人，并没有注意到黑格尔在批评康德的时候所提出来的一个观点，即国家之间紧张关系和战争的根

源在于国家本身，而不在于国家的类型。^①

然而，我们可能认为建立在单一意识形态基础之上的国家体系，或许能够免受意识形态冲突之苦，它应该会比当今的国家体系更有秩序。雷蒙·阿隆指出，国家体系在历史上经历过意识形态相对单一的时期，比如宗教战争之间的间歇期，法国革命和拿破仑战争之间的间歇期，以及20世纪世界大战和冷战之间的间歇期，这些冲突事件都是意识形态冲突的高潮期。^② 我们或许可以同意阿隆的观点，即大规模战争的产生与239 与国家体系最大程度上的异质性相吻合并不是一个偶然的现象。这不仅是因为持续的意识形态冲突一直是这些大规模战争的一个根源，而且也由于这些战争本身会加剧意识形态冲突，比如每个交战国会同敌国内部的反对派结成同盟。

但是，这些意识形态相对单一的时期并非表现为意识形态上的一致性，而是表现为意识形态上的分歧得到容忍。表面上看，宗教战争、法国革命战争和拿破仑战争是以一方战胜另一方而告终，但实际上，它表现为双方在自身力量受到极大消耗之后，达成了允许不同的意识形态共存的妥协方案，20世纪意识形态冲突的结局可能也是这样。我们所说的在意识形态上具有同质性的国家体系之特征表现为，把国家团结在一起的纽带并不是那种允许不同政治、社会和经济制度共处的公式，而是维护一种政治、社会和经济制度的决心。换句话说，我们所说的此种国家体系，指的是一个世界性的神圣同盟，一种意识形态在整个国家体系中占据主导地位，这就好像在当今的美国同盟体系和社会主义大家庭这两个有限的范围内，都有一个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

这样一种体系会导致一个较高度上的国内秩序，因为任何一个主流政治、社会和经济制度的挑战者，不仅要直接面对遭遇挑战的国家，也要面对整个国家社会。在这种体系中，会产生像苏联为捍卫东欧社会主义制度和美国为阻止社会主义制度扩展到中美洲而采取的那种干涉行动，其目的是支持现存的政权。但是，该体系中的干涉行为有别于美苏

① *Hegel's Philosophy of Right*, trans. T. M. Knox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42) pt III.

② Raymond Aron, *Peace and War, A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London: Weidenfeld & Nicolson, 1962), pp. 99 - 104.

的干涉行为，它们不会受到其他国家的谴责或批评。这样的体系也会导致一个较高度上的国际秩序。虽然国家之间会因为物质利益冲突或者不安全感而发生冲突，但是它们之间不会在意识形态上相互对立。的确，维护现存政治、社会和经济制度的共同利益，会使得所有的国家具有缓和相互间利益冲突的强烈欲望。

然而，人们可能并不相信在世界政治中会出现国家信奉相同意识形态的情势，这种意识形态上的一致性，是上述那种国家体系替代形式得以建立或维持的前提条件。如果我们假定将来和过去一样，世界上的不同地区总是信奉着多种多样、不断变化的意识形态，那么试图根据意识形态一致性的原则而改造国家体系的行动，很可能是导致无秩序状态的根源。这会促使我们不得不遵循过去的原则，即秩序最好建立在容忍不同意识形态共存的基础之上，当今的国家体系就是建立在这个原则的基础之上的。

超越国家体系

如果一个世界政治秩序替代形式的产生不仅仅意味着国家体系从一个阶段或者状态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或者状态，而是超越了国家体系本身，那么这样的变革一定包含着国家体系的如下某个根本属性的消失：主权国家；主权国家之间的互动，这是国家构成一个体系的基础；主权国家在一定程度上所接受的共同规则和制度，这是国家构成国际社会的基础。

只有体系，没有社会

我们可以假定出现一种世界政治组合形式，它只具有国家体系的第一个和第二个属性，不具有第三个属性。也就是说，我们假定存在着一定数量的国家，它们组成了一个体系，但不构成一个国际社会。这样的事态意味着，国家体系消亡了，因为正如我们在前面所论述过的，国家体系既是一个国际社会，也是一个国际体系。国家以及国家在全球范围内的互动关系依然存在，但是国家之间已经缺少了共同的利益或价值

观，也不再具有基于共同利益和价值观的共同规则和制度。这些国家相互进行交流和谈判，但是它们的行为不受共同的外交制度所约束；它们相互之间订立协议，但是没有接受一个国际法律义务结构；它们之间的暴力冲突受到交战方所具备的战争能力的限制，而不受有关何时发动战争、战争如何进行以及谁来从事战争等规则的约束；均势的产生是偶然因素的结果，而不是有意识的维持均势的行为之产物；存在着一些比其他国家更具实力的强国，但是没有有一个公认的拥有特殊权利和义务的大国。

我们很难断定国家体系是否在将来的某个时候不再成为一个国际社会。可能某些国家接受共同的规则和制度，而其他国家则不接受共同的规则和制度：到底应该在多少国家独立于国际社会之外的时候，我们才可以说国际社会已经消亡了呢？某些规则可能继续被加以接受，而其他规则却不再被接受：到底哪些规则和制度是根本性的呢？我们可能难以确定规则和制度是否被接受：到底是表现为国家在口头上承认这些规则，还是表现为国家使自己的行为与规则保持一致，或者是表现为国家即使是在逃避规则约束的时候也愿意遵守规则呢？本书在前面已经论述过，在历史上出现过国际体系不是国家社会的个案（见第一和第二章）。

尽管如此，一个不是国际社会的国际体系可能包含着某些秩序的因素。虽然国家在相互交往中并没有共同的规则和制度，但是某些国家仍然可能维持着一定程度上的国内秩序。偶然性的均势或者相互核威慑关系、大国单方面强加的势力范围、对战争的限制（自我约束或对战争能力的限制）等等，也可能维持着一定程度上的国际秩序。但是，这种类型的国际体系是极其无秩序的，而且它实际上就属于霍布斯所说的自然状态。

只有国家，没有体系

我们也可以假定出现另外一种世界政治组合形式，它具有前面提到的第一个根本属性，而没有第二个根本属性。我们可以想象，在世界上依然存在着主权国家，但是它们相互之间没有接触或交往，或者说它们之间的互动很少，国家不是作为一个体系中的组成部分而行为的。国家可能在特定地区内进行相互交往和组成一个国家体系，但是不存在着一

个全球性的国家体系。世界上的国家可能相互了解对方的存在，甚至进行有限的接触和互动，但世界各个地区中的任何国家都不把其他国家视为自己需要加以考虑的重要因素。

我们可能难以确定，国家在全球范围内的互动关系到底应该减少到什么样的程度，我们才可以说这些国家不再构成一个体系了。如果国家在世界范围内保持着很高程度上的经济和社会互动关系，那么我们能否说存在着一个全球体系呢？我们能否仅仅根据某些社会被排除在全球体系之外，就断定全球体系已经不复存在呢？即便是在今天，在巴西丛林或者巴布亚新几内亚高地，依然存在着几乎不受我们所说的全球国家体系影响的社会。

再者，历史上有很多此种国家体系的替代形式。正如我们已经提到过的，在19世纪以前，并没有出现一个全球性的国家体系。这样的替代形式是否代表着通往世界秩序的一条更好的道路呢？

人们对此问题的回答经常是肯定的。一系列处于孤立或半孤立状态的国家或者其他类型的共同体，可能在各自的管辖范围内维持着某种可以容忍的社会秩序形式，从而存在着一种来源于这些共同体的秩序集合而成的世界秩序。与此同时，传统上产生于国家互动关系的无秩序根源将不复存在，因为国家之间没有互动，或者只是存在着最低限度的互动关系。

这便是卢梭世界观的要旨。卢梭所设想的世界，是由自给自足的小国所组成的，每个国家依靠共同体的普遍意志以维持国内秩序，通过最大限度地减少国家间的相互接触以维持国际秩序。^① 它也体现为乔治·华盛顿在自己的告别演说中为美国所提出的忠告：“我们处理对外关系的基本准则是，在扩大我们的贸易关系时，应尽可能地减少和外国发生政治上的联系。”^② 对华盛顿来说，这只是美国应当遵循的一个行为准则，当时的美国实际处于同可能威胁自己的强国在地理上孤立开来的状态之中。科布登后来用自己的名言，把华盛顿的这个思想变成了对所有

① 见“Rousseau on War and Peace,” in Stanley Hoffmann, *The State of War, Essays in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London: Pall Mall Press, 1965)。

② 理查德·科布登在《英国、爱尔兰和美洲》一文的开头提出了这句名言，见 *The Political Writings of Richard Cobden* (London: Cassel, 1886), p. 3。

243 国家都普遍适用的原则：“尽可能减少政府间的交往，尽可能增加世界上的民族之间的联系。”^①

科布登信奉最严格和最绝对的不干涉原则。他不仅反对干涉国际冲突，而且反对干涉国内冲突。他不仅反对以任何形式的意识形态理由（不管是他所赞同的，如自由主义和欧洲大陆的民族主义，还是他所反对的，如神圣同盟的干涉主义）进行干涉，而且反对以国家利益的理由（比如维持均势或者保护商业利益）进行干涉。他不赞同约翰·斯图亚特·穆勒对干涉行为所做的分类。穆勒认为，应当区分针对文明国家事务的干涉行为和针对未开化国家事务的干涉行为，分清针对他国事务的干涉行为和针对一个违背不干涉原则的国家、维护不干涉原则的干涉行为。^②他甚至反对以道德劝说的方式干涉别国的内部事务，并且不赞成在英国成立以干涉别国事务为目的的组织，如谴责美国奴隶制度的组织。然而，在科布登看来，最大限度地促进国家之间在经济和社会领域内的互动，与最大限度地减少国家之间在战略和政治领域内的联系，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他既然赞同政府在世界范围内追求经济自由放任主义政策，那么就必然认为，国家之间可以在战略和政治上的保持相互隔绝的同时，在经济上保持相互依存的关系。^③

建立在共同体绝对或相对地相互隔绝基础之上的世界政治组合形式，假如它可以成为现实的话，那么它必将具有某些弊端。如果说过去国家间的互动要付出某些代价（如国际无秩序、弱者受制于强者以及富国剥削穷国）的话，那么它也带来了某些益处（强国和富国援助弱国与穷国、国际劳动分工以及在知识领域内相互学习与提高）。极端的孤立主义的处方，甚至是科布登所主张的那种有限的孤立主义的处方，即政治和战略上的不干涉主义，意味着我们将会丧失全球范围内的人类互动所带来的机会，当然也可以避免这种互动所产生的危险。

^① Ibid., p. 216.

^② John Stuart Mill, "A Few Words on Non-Intervention," in *Dissertations and Discussions*, vol. III (London: Longmans, Green, & Co. 1867).

^③ 见 Cobden, "England, Ireland and America" and "Russia, 1836," in *Political Writings*.

世界政府

244

我们也可以假定今后会产生第三种世界政治组合形式，它不具有前面所提到的国家体系的第一个根本属性，即没有主权国家。这种世界政治组合形式产生的一个方式，就是出现一个世界政府。

我们可能想象，世界政府是因为征服行为而产生的，它是约翰·斯特雷奇所说的大国间“拳击锦标赛”的产物。在这个意义上说，它是一个由强大的征服国家所统治的世界帝国。^①或者我们也可能想象，世界政府是国家订立一个社会契约的结果，因此它是一个建立在某种形式的国家同意或者共识基础之上的世界共和国或者世界国家（cosmopolis）。在第二种情况中，我们或许可以想象，世界政府是突然产生的，它可能是由某种灾难如全球性战争或生态破坏（正如从康德到赫尔曼·卡恩许多未来学家所预言的）所导致的，或者我们也可以想象，世界政府是逐渐形成的，可能通过联合国不断增强自己的权力而产生。世界政府之所以产生，可能是由于国家自己同意放弃各自的主权，或者如同某些“功能主义者”所说的那样，是因为国家在非政治领域内的主权受到了侵蚀。

迄今还没有产生过一个世界政府，但在历史上，经常出现一个在那些被统治者所能够知道的世界中处于最高地位政府。在整个现代国家体系的历史中，一直存在着有关世界政府的观念：它或者表现为一种向后看的学说，即主张世界回到罗马帝国的统一体中去，或者表现为一种向前看的学说，即认为世界是必然向前发展的。在20世纪，人们针对两次世界大战，提出了两种相互对立的有关世界政府的学说。

主张建立世界政府的传统观点认为，维持国际秩序的最好办法同维持国内秩序的办法一样，就是建立起一个最高权威。这种学说通常主张维持一个最低程度的秩序，特别是避免战争的爆发，因为战争被视为国家体系不可避免的产物。但是，这种学说有时也主张维持一个最高程度 245 的秩序，比如今天信奉这种学说的人经常认为，世界政府可以使得每个人在经济上享有公正的权利，或者有助于正确地治理人类环境。

^① Strachey, *On the Prevention of War*.

反对建立世界政府的传统观点指出，世界政府虽然能够产生秩序，但是会损害自由权利，不仅会损害国家和民族的自由权利（正如反对建立世界君主国的大同盟思想家所声称的那样），也会限制个人的自由权利，因为一旦世界政府施行暴政，没有其他的政府可以给个人提供政治避难的权利。

因此，有关建立世界政府的学说之思想基础，似乎是秩序优先于国际或人类正义与自由。然而，人们可能会提出，国家体系比世界政府更有助于实现维持秩序的目标（本书第十二章将分析这个问题）。

新中世纪主义

我们还可以设想，今后会产生第四种世界政治组合形式，即主权国家可能走向消亡，取代主权国家的并不是一个世界政府，而是一个现代和世俗的、类似于中世纪西方基督教世界那样的世界政治组合形式。在中世纪西方基督教世界体系中，君主或国家都不是主权者。也就是说，君主或国家对特定领土和特定基督徒群体不享有最高的管辖权，它们必须同低于自己的诸侯和高于自己的教皇以及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共同分享权力。西方基督教世界的政治秩序是国家体系的一个替代形式，但它不是世界政府。

人们认为，中世纪基督教世界的所有权威最终都来自上帝，而且这种政治体系基本上是属于具有神权政治性质的东西。因此，设想世界会回到中世纪模式中去的看法，似乎有点异想天开，但是设想可能出现一个现代和世俗形式的中世纪模式，这并非是天方夜谭，这样一个现代和世俗的模式具有中世纪模式的基本特征，即它属于一个权力重叠和效忠对象多样化的体系。

我们知道，今天的主权国家要同“其他行为体”一起共同占据世界政治舞台，这正好像中世纪的国家与“其他团体（associations）”（这是中世纪主义者所用的词）共同占据世界政治舞台一样。假如现代国家要
246 同地区性和世界性的权威以及次国家（sub-state）或次民族（sub-national）的权威一起分享对本国民众的管辖权，以至于使得主权概念失去意义，那么一种新中世纪形式的世界政治秩序就可能产生了。

比如，我们可以想象，英国政府一方面必须同苏格兰、威尔士、韦

塞克斯以及其他地方的行政当局分享权力，另一方面又必须同设在布鲁塞尔的欧洲权威机构以及设在纽约和日内瓦的世界权威机构分享权力，以至于无法对联合王国的领土和人民行使自己的管辖权。我们或许也可以想象，苏格兰和威尔士的地方当局，同设在布鲁塞尔、纽约和日内瓦的那些权威机构一样，都是世界政治中的行为体，拥有世界法所规定的权利和义务，可以进行谈判，甚至可以统率武装力量。我们或许还可以想象，格拉斯哥居民的政治效忠对象是不明确的，他们必须在爱丁堡、伦敦、布鲁塞尔和纽约的权威机关中选择自己的政治效忠对象，因为那时的联合王国政府对他们并不享有现在所具有的那种最高管辖权了。假如这种事态成为世界的主流，那么一种新的中世纪秩序就产生了。

一些人之所以认为这种世界政治组合形式指明了一条比现在的国家体系更好的通往世界政治秩序的道路，这是因为它的那种权力重叠和效忠对象交叉的结构，可能一方面把各国人民团结在世界社会之中，另一方面又防止权力集中在一个世界政府的手中，从而避免主权国家体系中所经常面临的危险。另外一些人之所以怀疑新中世纪模式比国家体系更好，是因为人们无法证明新中世纪模式比现在的国家体系更有秩序。人们可能认为，这样一种形式的世界社会若能得以建立起来，它可以为社会生活基本目标的实现提供一个坚实的基础。但是，假如这种世界政治组合形式同过去的基督教世界相差不多的话，那么它与现代国家体系相比，其自身所包含的暴力与不安全因素更加无所不在和难以消除。

历史上从未有过先例的替代形式

247

最后，我们也必须考虑到一种可能得以产生的国家体系的替代形式，它与前面所提到的四种世界政治组合模式不同，在历史上从未有过先例。

当然，任何未来的世界政治组合形式都不可能与历史上出现过的形式完全相同，因为它具有某些自身特有的东西，不可能同过去的体系完全一样。我要说的并不是这种细微的差别，而是比较重大的差别。也就是说，未来可能出现一种世界政治组合形式，即使我们从全面比较的角度对它加以考察，它同前面所论述过的、历史上出现过的四种替代形式也没有什么相似之处。在可见的未来或者不可预知的未来，技术的进步

或退步，在道德和政治思想或者科学和哲学思想上发生的革命，以及军事、经济或生态上的灾难等等，都会从根本上改变我们对世界政治组合的认识。

我并不想猜测这些历史上从未有过先例的替代形式到底是什么样的。毫无疑问，我们无法把未来可能产生的世界政治组合形式仅仅限定为前面那么几种政治体系模式。由于这个原因，我们不能把一种世界政治组合形式的变化规律，套用于另外一种世界政治组合形式之中。我们预测不了无法预知的政治类型，而且事实上，人们在试图搞清楚历史上从未有过先例的政治类型的时候，总是依赖于历史经验。然而，我们在思考可能成为现实的国家体系的替代形式时，必须考虑到我们自己的想像力是有限的，我们超越历史经验的能力也是有限的。

今天，我们时常听到有人说，国家体系正在走向消亡，也就是说，它正在让位于或者将要让位于某种与之截然不同的世界政治组合形式。我们到底有哪些证据可以表明，从现在到本世纪末，国家体系可能会被上一章所讨论过的某种替代形式所取代呢？ 248

有体系，但没有社会

我们不难想象，国家体系作为一个国际体系而继续存在下去的同时，可能不再是一个国际社会。本书在前面已经提到过，虽然当代国家体系包含着社会的要素，但是这种社会的要素缺少牢固的基础（见第二章）。自从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以来，虽然人们希望国际法的发展和国际组织的增加有助于加强国际社会的作用，但是人们所具有的有关国家体系中的共同利益和共同价值观念之共识可能越来越少了。布尔什维克革命后的意识形态分野、非欧洲地区民族和国家对西方主导地位的挑战、国家体系向欧洲以外的地区或者西方以外的地区的扩展等等，造成了一个共识领域远远少于 1914 年的国际体系。人们很可能会推测，在未来的几十年中，现有的共识领域会继续面临这样的压力，最终导致共识领域大大减少，甚至全部消失。 249

我们没有必要一一列举国际社会可能崩溃或者消亡的原因。在 20 世纪 50 和 60 年代，共产党国家和反共国家之间在意识形态上的紧张关系占据着主导地位，今天这种紧张关系已经得到缓解，但依然具有重要影响。富裕的工业化国家同贫穷的农业国家之间的紧张关系，不仅没有缓解的迹象，而且还可能激化。由于对资源稀缺问题的认知而产生的利

益冲突，是国家间紧张关系的一个新的原因。我们也必须认识到，产生于19世纪末的共同规则和制度所面临的压力之大小，可能在很大的程度上取决于“偶然”因素，即：处理某个冲突的外交行为遭受失败；爆发一场大规模的核战争，即使核武器的使用范围只限于两个交战国家，它也可能突然从根本上改变国际政治舞台，迅速导致国家普遍不尊重国际社会的规则和制度。事实上，迄今为止的本世纪的国际历史，可以被看做是延长了的国家应付社会要素在国际关系中急剧减少的努力史，导致这种局面的原因是一场灾难性的“偶然事件”，即第一次世界大战。

然而，虽然我们 must 承认国际社会是“很可能”消亡的，但是我们也必须注意某些会使国际社会持久存在下去的因素。虽然国际社会在本世纪经受了极大的压力，但是它毕竟生存下来了，这或许是最值得人们注意的现象。在当今世界，有140多个在意识形态、文化或文明等方面差别巨大的国家，它们所具有的共识，大大少于1914年时那些数量较少的国家（它们在意识形态上具有相对的一致性，而且主要是欧洲国家），但是规则和制度的框架一直延续至今，并且遏制了本世纪的大分裂。

因此，主要源于欧洲经验的国际法体系一直受到来自非欧洲国家，特别是亚洲和非洲新兴国家的挑战，它们指责国际法体系建立在维护欧洲国家特殊利益的基础之上，是欧洲国家维持其主导地位的工具。然而，虽然新兴国家一直努力寻求变革，比如否定殖民主权的合法性，声称新兴国家对本国自然资源拥有主权，呼吁把财富从富国转移到穷国，主张减少新兴国家对原先宗主国所承担的继承义务等等，并且在某种程度上获得了成功，但是它们还是接受了现存国家体系的基本结构和原则。^①

国家之间外交关系的机制受到了共产党国家和反共国家之间意识形态斗争的冲击，这导致在冷战时期，在两个阵营之间实际上不存在着领事关系，只存在着外交关系。但即便是在这场斗争的高潮阶段，两个阵营的国家之间依然保持着某种程度上的外交关系，外交形式和外交程序也得到了遵守。同样地，大量非欧洲国家突然加入国家社会并在其中占

^① 有关这点，见 S. Prakash Sinha, *New Nations and the Law of Nations* (Leyden: Si-jthoff, 1967)。

据多数地位，这虽然对主流的外交风格和方法产生了影响，但是并没有阻止新兴国家接受国家社会的现存制度。

对于维持均势是否必要，或者应该如何维持均势这样的问题，在国际社会中并没有形成普遍的共识。但是，毫无疑问，在当今国际社会中存在着总体均势，其基础是美苏相互核威慑关系，而且这样的均势局面不完全是偶发的，从某个程度上说，它是苏联和美国所刻意追求的目标，美苏两国对双方共同利益的认识在其中起了一定的作用。

与过去的国际联盟一样，联合国同样未能通过促进国家间的团结和实施集体安全原则来指明另外一条通往世界秩序的道路。但是，它作为一个最为重要的、全球性的国际组织，依然存在于当今的世界中，成为当代国际体系中存在着共同利益和共同价值观念的一个象征。今后，国际关系中的国际社会要素完全可能减少，乃至消失，这可能是当前某些发展趋势的自然结果，但我们没有理由认定这是不可避免地要发生的事情。

有国家，但没有体系

251

上一章所提到的可能取代国家体系的第二个世界政治组合形式表现为，国家可能依然存在，但是它们不再构成一个全球性的国家体系，因为它们相互之间完全隔绝，或者说它们相互之间很少往来，以至于无法作为一个整体中的组成部分而行动。这样的事态是对 19 世纪以前的情势的回归，那时在世界上的不同地区存在着国家、国家体系以及其他的地区政治组合形式，但不存在着一个全球性的国家体系。

如果说体系的要素会从当今世界政治格局中消失的话，那么这只能是我们目前所拥有的科学、工业和技术文明走向崩溃的后果。显而易见，在过去的两个世纪中，工业和技术的进步导致了地球上不同地方间增加了经济、社会 and 战略的互动。这些发展趋势发生逆转并非是不可想象的：能源稀缺，国家追求自给自足的能源政策，人们对经济发展这个政策目标产生怀疑，反科学的哲学思想影响增大等等，都在促使上述发展趋势发生逆转。然而，还不能说这些趋势会导致一种秩序，它可能促使国家不再构成一个体系，而是组成一系列卢梭所设想的那种相互隔绝

的共同体。

当然，我们也可以看到在当今世界政治中存在着更为强劲的地区主义的发展趋势，这不仅表现在有关维护和平与安全的组织上，也表现在国家对经济事务的管理上。我们可以想象，人们可能改变过去那种认为全球性国际组织优于地区性国际组织的思想倾向。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的时候，战胜国拒绝接受丘吉尔等人提出的地区主义方案，而是支持有关建立联合国及其专门机构的设想。今后，“局部的和平”(Peace in Parts, 引用最近出版的一本书的书名)可能是人们在思考国际组织如何发挥维护和平与安全的作用时所主要关注的问题；贸易、货币和开发援助计划等等事项可能主要由地区性组织，而非全球性组织来加以处理；联合国以及其他全球性国际组织可能走向衰落，甚至完全消亡。^① 人们对有关世界近期发展趋势的一个认识是，世界可能被划分为几个大国的责任范围：252 美国、西欧国家集团、苏联、中国以及日本将各自负责管理世界某一个地区的事务，而在这些大国之间只有松散形式的合作关系。

这种以及其他有关地区化程度进一步加深的世界体系之设想，远未达到宣称全球性国家体系已经消亡的那种思想水平。全球性国家体系的根本特征，并不是在世界上存在着一个全球性的国际组织，而是在国家之间存在着全球性的互动关系。不管前者将来是否依然存在，后者似乎都会继续存在下去；有关未来世界的构想如果不考虑全球范围内的社会、经济、外交和战略互动关系的话，那么它必然是不现实的。全球核大战所导致的灾难性变革（使得人类生活处于一个很低的经济和技术发展水平），能源的枯竭以及随之而来的全球交通和通讯的中断，或者人类价值观念的革命（使得人类回到比较简单和地区色彩较浓的生活方式）等等，都可能导致国家不再构成一个国家体系。

世界政府

没有证据表明，主权国家在本世纪将会愿意从属于一个建立在普遍

^① 见 Joseph Nye, *Peace in Parts: Integration and Conflict in Regional Organizations* (Boston: Little, Brown & Co., 1971)。

意志基础之上的世界政府。有关通过国家间的社会契约建立起一个世界政府的思想，是建立在这么一种认识基础之上的，即建立世界政府的必要性将会创造出世界政府得以建立起来的条件。也就是说，如果必须借助世界政府来给世界政治带来秩序的话，那么世界政府就一定会产生。然而，现代国际政治告诉我们的事实是，国家从来就没有承认建立世界政府的必要性。政府之间甚至无法就相互承认对方的生存权利和放弃使用武力解决争端的权利而达成协议，它们几乎根本不可能同意把自己的安全和其他重要的利益托付给一个世界权威来照管。如果说过去是这样的话，那么今天以及可见的将来是否也是如此呢？同过去相比，今天主要国家集团间的共识领域显然是较少的，而且许多国家为自己已经摆脱殖民统治和取得独立而得意洋洋。有人认为，某种灾难，比如一场全球性的核大战，或者一场世界性经济危机，或者生态破坏，将会导致一个世界政府的建立。康德就声称，国家在历经苦难之后，会愿意采取理性的行为。根据这种思想，国家在经历灾难之后的行为将会变得更加“理性”。但是，我们无法知道国家在发生灾难之后到底是会变得更加理性，还是会变得更加不理性。

有关国家通过订立契约而建立起一个世界政府的思想包含着一个矛盾。康德等人提出要建立世界政府的主要依据是，主权国家处于霍布斯所说的自然状态之中，它们需要使自己从属于一个共同的政府，从而摆脱自然状态。然而，假如国家真的处于霍布斯所说的自然状态之中，那么它们根本就不可能订立一个旨在摆脱自然状态的契约。这是因为，没有武力作后盾的协议只是一纸空文而已，不仅旨在建立一个世界政府的协议是这样的，而且其他的协议也是这样的。康德的设想有一个问题，它所提出的有关改善国际关系状况的方案，同它所描述的国际关系的实际状况是互相脱节的。它认为在国际无政府状态继续存在的背景下所采取的行动是毫无意义的，但同时又声称，在国际无政府状态下可以实现国家订立国际社会契约这个宏伟的目标。世界政府的倡导者要想证明自己的方案是可行的、可取的，只有承认国际关系并非处于霍布斯所说的自然状态之中，没有武力作后盾的协议并非一纸空文，它们可能导致主权国家政府进行相互合作。然而，承认这一点必然削弱有关终结国际无政府状态的论点。

从历史上看，通过征服行动建立世界政府的可能性，似乎比通过订

立协议建立世界政府的可能性要大得多。毕竟正是通过征服——正如“拳击锦标赛”的结局——某些君主国才使得自己成为最早的现代民族国家。正是征服行动导致过去的世界帝国得以建立起来。现代国家体系曾经有几次差点由于征服行动而变成一个拥有最高政府的世界帝国。

然而，在 20 世纪末，通过征服行动建立世界政府的可能性似乎很小。有三个因素阻止国家通过征服行动建立世界政府。第一个因素是核僵局，它大大增强了中心均势或美苏均势的稳定性，而且也使得其他大国之间的均势更加稳定。任何一个掌握核报复力量的国家都拥有一张王牌，不管该国所拥有的其他方面的军事力量是否优于自己的敌手，它都可以遏止破坏这种均势的企图。第二个因素是 20 世纪 70 年代形成的复杂均势或者多边均势，它也增加了总体均势的稳定性。考虑到美国、苏联、中国，以及或许日本和西欧国家联盟，可能在本世纪末享有军事上的自给自足地位，其他大国不太可能获得主导地位 and 让别的国家默许其建立起一个帝国体系。第三个因素是世界民众的政治觉醒（political activation），这特别体现在（但不是惟一的表现）民族主义上。由于抵制某个民族或者种族占据支配地位的力量会被动员起来，因此我们很难设想一个帝国体系或者等级体系会被建立起来，即使这样一个体系被建立起来，它也是短命的，正如希特勒在欧洲所建立的新秩序。我们已经处在帝国瓦解的时代，今后产生一个世界君主国（universal monarchy）的可能性是微乎其微的。

新中世纪主义

我们是否有证据表明国家体系可能让位于中世纪基督教世界那样的一个权力重叠或者分散的体系呢？

毫无疑问，主权国家并不是世界政治中惟一的重要行为体或角色。但是，单单是世界政治中存在着非国家行为体这种现象，并不能说明世界正在朝着一种新的中世纪主义方向发展。关键的问题在于，这些“其他的团体”（中世纪主义者的用词）对国家主权，或者对国家领土和公民的最高管辖权的侵蚀，是否会使得国家的最高管辖权名存实亡，并且导致主权概念失去意义。当代世界政治的五个特征，似乎证明了在当今

世界中存在着这么一个发展趋势。

(1) 国家的地区一体化

第一个特征是,一些国家努力把自己整合到更大的单位之中。欧洲经济共同体的成员国并没有放弃自己的领土主权,但是它们在一体化的过程中已经走过了一段路程,至少在一些人看来,这个一体化过程最终会导致欧洲经济共同体成员国丧失主权。在经济一体化上所取得的实际成果方面,没有任何一个地区组织可以同欧洲经济共同体相提并论,但是经互会、非洲统一组织、美洲国家组织、中美洲共同市场以及东南亚国家联盟都受到了欧洲经济共同体这个榜样的影响。

在有关“欧洲”运动的言论中总是包含着一个论点,即欧洲一体化会对国际秩序产生独特和有益的影响,这不仅是因为它会导致一个“安全共同体”或者和平区在欧洲出现,也由于它会向全世界表明,一个国家群体可能自愿“淹没”自己的主权。^①

这种观点有一个问题,即:假如欧洲国家一体化过程导致一个单一的欧洲国家的建立(而且假如其他受欧洲榜样影响的地区也出现同样的后果),其结果将使得主权国家的数目减少,但主权国家制度仍会原封不动地保存下来。

我们或许可以认为,由此产生的这样一个单一的欧洲国家尽管还是属于一个主权国家,它至少已经不再是一个民族国家了,失去了过去曾经导致民族国家间冲突的民族主义动力和野心。我们可以预见,同把主权交给自己的那些国家相比,这个单一的欧洲国家至少将会更加遵守法律和受到约束;作为一个主权国家,它介入“权力政治”(从把权力作为目的而不只是手段这个意义上说)的倾向受到了抑制。

256

这样的观点无视这样一个事实,即欧洲一体化运动不仅反映了一些欧洲人“超越权力政治”的愿望,也体现了另外一些欧洲人想在美国、苏联和中国等大陆国家所主导的世界中,创建一个可以让欧洲人更有效地介入“权力政治”的单位之动机。它也忽视了欧洲联邦主义者的一个

^① 比如见 Lord Gladwyn, "World Order and the Nation - State: A Regional Approach," in *Conditions of World Order*, ed. Stanley Hoffmann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1970)。

正确认识，即欧洲联邦国家的产生，同欧洲特性或认同观念的形成是密不可分的，后者是前者的前提条件，法国人、德国人和其他欧洲国家的人，除了要效忠自己的国家之外，还要效忠一个“新的祖国”。从更深层次上说，有关创建一个不再是民族国家的国家可以摆脱“权力政治”之观点无视一个事实，即民族国家只是在国家体系一个特定发展阶段中所存在着的现象，国家体系的历史清楚地告诉我们，处于国家体系的王朝统治或者专制主义统治发展阶段的国家，虽然并不是民族国家，但是在它们的相互关系中也充满着“权力政治”的因素。

我们如果要寻找欧洲一体化正在导致国家体系发生质变的证据，那么最好不要去关注人们所想象的一体化过程的终极结果，即产生一个欧洲超国家，它只是一个被放大的主权国家，而应该关注一体化的进程。这个一体化的进程可能会发展到这么一个阶段，那时并没有产生一个单一的欧洲国家，人们难以从理论上解释和从现实中判断主权到底是属于各个国家的政府，还是属于“共同体”的机构。关键的问题在于，“共同体”内的各个国家政府是否有退出该共同体的权利与能力（从它们拥有武装力量和得到民众的效忠这个意义上说）。这种主权归属不明确的情势，可能是向“新中世纪主义”迈进的一小步，在“新中世纪主义”情势中，主权概念已经消失了。但是，这样一种事态（假如它存在于欧洲）并不意味着，全球性的国家体系已经被超越了，它只是表明，在这个特定的区域（正如早期德意志的国家体系）中，存在着一个同主流规范不相吻合的混合型实体。

（2）国家的解体

在某些国家努力把自己融合到地区单位的同时，世界上还出现了另外一个发展趋势，就是在现存国家内部出现了解体的迹象，这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尤其引人注目。不单单是那些正致力于创建民族认同观念和增强民族凝聚力（这在过去根本不存在或者其根基不牢固）的“新兴”国家受到了冲击，其中一个国家（巴基斯坦）因分裂主义运动而被肢解，而且一个历史较长的“新兴国家”（南斯拉夫）和历史悠久的民族国家（比如英国、法国、西班牙、比利时和加拿大）最近也都显露出了国家解体的发展倾向。

我们不难想像，在威尔士人、巴斯克人、魁北克人、佛兰芒人以及其他人的要求中，存在着国家体系的质的变化。毫无疑问，在这些分裂集团中间，有的只是要求地方自治，并不想挑战所在国家的主权。不仅如此，还有一些人虽然希望压迫自己的国家走向解体，但是他们这样做的目的只是为了建立一个属于自己的主权国家。假如这些解体倾向的结果是如那加兰、比夫拉、厄立特里亚、威尔士、魁北克以及克罗地亚一样获得主权地位（比如孟加拉国的建立），那么世界上的主权国家将会增多，但它对主权国家制度所产生的影响远不及建立一个欧洲合众国。

就国家的一体化来说，只有当一体化进程处于中间发展阶段的时候，国家的解体才具有理论上的重要意义。如果这些新的单位发展到具有主权国家地位的地步，他们不仅得到普遍的认可，而且拥有自己的军队和获得民众的效忠，从而否定现存国家的主权，同时又近乎声称自己拥有这样的主权，那么这可能导致主权制度本身走向消亡。

我们不可忽视这种可能性，正如我们不可忽视地区超国家制度会损害国家主权一样。政治现实主义者断然否定这种可能性，这样的做法未免太轻率了。欧洲一体化的倡导者以及魁北克人和巴斯克人那样的群体（让我们把它们称之为“分裂主义者”）主张建立新的主权国家的一个原因，就在于他们受到已有观念和习惯的束缚。国家体系所具有的强劲生命力，把那些旨在建立新政治共同体的运动限定在一定的发展范围之内，人们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把这种制约因素定性为好的或者不好的。或许现在已经到了人们提出新的世界政治组合概念的时候了，根据这样的概念，威尔士、联合王国以及欧洲共同体一方面具有某种世界性的政治地位，另一方面又不享有绝对的主权。但与此同时，今后的分裂主义运动，同过去那些导致欧洲帝国瓦解的分裂主义运动一样，只会使得主权国家制度更加稳固，而不会否定主权国家制度。

(3) 恢复私人使用国际暴力的权利

另外一个可以视为国家体系走向消亡并为世俗形式的中世纪秩序所取代的迹象是，非国家的集团在国际舞台上使用暴力，并且声称自己拥有使用国际暴力的权利。

我们已经提到过，现代国家体系的一个基本特征就是，主权国家总

是极力垄断在国际政治中使用武力的权利。同中世纪基督教世界的情形相反，在现代国家体系中，只有一个公共权威可以合法地使用武力，而这个公共权威就是主权国家。

人们可能指出，国家对合法使用国际暴力的垄断权，受到了联合国那样的国际组织的侵害，比如在朝鲜战争和刚果危机中，联合国就声称自己在国际舞台上拥有使用武力的权利。然而，在这些个案中，有关的国际组织被认为只是一个国家集团的代理人而已，这个国家集团的成员相互进行合作，以行使自己固有的使用武力的权利。传统的国家对使用武力的垄断权还受到一个更为严重的挑战，即非主权国家的、很难说是属于公共权威的政治集团在使用暴力。比如，以阿拉伯国家为基地的巴勒斯坦游击队袭击一个外国的领土，而且攻击该国在第三国的人员与财产，或者把第三国的公民当作人质。又如，乌拉圭的民族解放军以及许多国家类似的革命组织，不仅对政府使用暴力，企图推翻当地政府，而且还使用暴力绑架第三国的外交官或平民，以向本国政府施加压力。

比这些非国家集团行使国际暴力的行为更令人关注的一个事实是，国际社会中的很大一部分成员支持这些集团享有使用暴力的权利。国际社会一直无法采取一致的行动，抵制政治集团对国家合法使用暴力垄断权的挑战，而国家社会在反对私人从事的传统海盗行为上一直是团结一致的。由于未能采取团结一致的行为，国际上打击劫持航空器和绑架外交官的努力遭受了失败。1972年，联合国大会未能通过一项由美国提出的有关反对“国际恐怖主义”的提案。^① 大多数社会主义国家和第三世界国家不但不谴责非国家集团使用国际暴力，而且还主张那些为争取民族自决权、反对殖民统治、反对外族统治或者反对“种族主义”政权统治而进行武装斗争的集团，也应该受到战争法规的保护。^②

如果这些倾向得以进一步发展下去的话，国家将丧失合法使用暴力的垄断权，中世纪那样的情势会再次出现，到那时，即使个人还不能合法地使用暴力，许多类型的公共权威都可以合法地使用暴力。然而，这种私人使用国际暴力的行为并非是新生事物，同过去同类行为相比，它

^① 见 *Keating's Contemporary Archives* (February 12 - 18, 1973), p. 25, 725。

^② 见 International Committee of the Red Cross, *Draft Additional Protocols to the Geneva Conventions of August 12, 1949* (Geneva, 1973)。

的惟一独特之处在于，它是在全球范围内发生着的。反政府集团的暴力行为经常是跨越边界的。在革命组织劫持外国飞机及其乘客之前，发生 260 类似集团劫持外国船只的事件，比如在 1877 年，秘鲁反叛分子夺取了“华斯卡尔”号（Huascar）装甲舰并用它在海上拦截两艘英国船只，从这两艘英国船只上劫持走两名秘鲁政府官员。反叛集团绑架第三国公民的事件在过去也发生过，比如在 1904 年，摩洛哥强盗埃雷斯利在丹吉尔绑架两位美国公民，企图通过美国和其他国家政府向摩洛哥苏丹施加压力。^① 主流的法律学说一直主张，惟有国家才能够在世界政治中使用武力，但它并没有准确地反映现实。

我们也必须注意到这么一个情况，即当今声称自己享有介入国际暴力权利的那些非国家集团，它们所追求的目标是建立新的国家，或者控制现存的国家，而且国际社会中的很大一部分成员之所以同情这些集团，正是因为它们赞同这些集团所追求的上述目标，而无意损害国家在世界政治体系中（相对于其他集团来说）所拥有的特权地位。

(4) 跨国组织

采取跨越国界的暴力行动来追求自我目标的非政府集团，可以被看做是威胁国家体系生存的更广泛现象中的一种特定类型：即跨国组织。这种组织的行为是跨越国家边界的，有时甚至是全球性的。它寻求尽可能多地摆脱国家边界的束缚，在不同的社会或者社会阶层之间搭起联系的桥梁。这样的跨国组织包括：跨国公司，比如通用汽车公司或联合利华公司；政治运动，比如共产党或三大洲团结组织（Tricontinental Solidarity Organization）；非政府间的国际组织，比如国际科学或专业协会；宗教团体，比如罗马天主教会；政府间的跨国性机构，比如世界银行。^②

亨廷顿根据组织的控制权、工作人员的国民构成及其活动的地理范

① 我在下面一篇文章中论述过这些事例以及有关私人使用国际暴力的问题：“Civil Violence and International Order,” *Adelphi Papers*, no. 83 (1971)。

② 见 Samuel P. Huntington, “Transnational Organisations in World Politics,” *World Politics*, vol. xxx, no. 3 (April 1973)。

261 围等等把这些跨国组织加以分类，这是值得我们注意的观点。在他看来，大多数大的跨国公司都处于国家的控制之下（由于美国在管理上的领先地位，它们大多把总部设在美国）；它们的职员来自多个国家；它们的活动范围是跨越国界的。也就是说，它们“在两个或两个以上国家领土上从事重要的、集中指导的行动”。^① 按照亨廷顿的定义，跨国组织就是那些活动范围跨越国界的组织。这样一来，美国空军虽然受一个国家的控制，其人员也来自一个国家，但是也可以算作是一个跨国组织，世界银行处于国际控制之下，其人员来自多个国家，也属于跨国组织。

人们经常认为，这些跨国组织，或者它们中的某些跨国组织，由于它们绕开了国家体系，并且直接推动全球社会或全球经济的形成，所以正在促使国家体系走向消亡。人们特别提到了跨国公司的作用，认为跨国公司数量的增多、规模的扩大以及在世界生产总值中所占有比重的增加等等，就意味着“以全球为中心的技术”不可避免地要战胜“以族群为中心的政治”。

跨国公司并非世界政治中的新现象。今天，没有一家公司在影响力方面可以比得上英国的东印度公司，东印度公司拥有自己的军队和领土。近年来，跨国公司之所以在世界上引人注目，就是因为它们的庞大规模（它们所拥有的资金往往大于所在国拥有的资金）、经营活动的全球性质（不考虑边界）以及逃避主权国家控制的能力。跨国公司在 20 世纪 50 和 60 年代的发展，使得乔治·鲍尔等人提出，跨国公司是世界政治中的一支强大和新兴的建设性力量，是以全球为中心的技术即将并且应当压倒以族群为中心的政治的标志。但是，民族主义者，特别是拉丁美洲和加拿大的民族主义者，还包括《美国的挑战》（*Le Défi Américain*）的作者 J. - J. 塞尔万-施勒伯，也谴责跨国公司。他们认为，跨国公司是美帝国主义者的工具，或者它们在某些时候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工具。^②

然而，我们还不清楚跨国组织是否正在侵害国家体系。首先，主权

^① Ibid. p. 336.

^② 见 George Ball, "The Promise of the 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 *Fortune*, vol. 75, no. 6 (1 June 1967); and J. - J. Servan - Schreiber, *Le Défi Américain* (Paris, 1968).

国家具有相当大的对付跨国公司的能力：它们可以根本不允许跨国公司 262 在本国从事经营活动（直到如今，所有共产党国家实际上始终排斥跨国公司），或者限制跨国公司的行为（比如第三世界国家以及澳大利亚、加拿大和西欧国家，日益倾向于采取这样的做法）。在跨国公司大举入侵的最初十年中，西欧和第三世界的主权国家在面对跨国公司的要求或者诱惑时，显得无能为力。但是随着人们对跨国公司经济影响力具有更多的认识，以及在国际上展开有关跨国公司的辩论，主权国家显示出了自己的应对能力，它们在大多数情况下可以获得本国民众的大力支持，可以自我决定是否，或者在什么条件下允许跨国公司在本国领土内从事活动。正如罗伯特·吉尔平所指出的，我们没有理由认为，在“以全球为中心的”技术或其他技术，同“以族群为中心的”政治或其他形式的政治发生冲突的时候，政治只能做出让步。^①

其次，跨国公司进入一个国家并非意味着必然削弱所在国的权力，或者阻碍该国实现自己的目标。亨廷顿认为，有关民族国家将要走向消亡的预言，是“建立在有关权力和主权的零和假定基础之上的，也就是说，随着跨国组织权力上升而来的，必然是民族国家的权力下降。然而，实际情况并非如此……跨国组织数量的增多、作用的增大和活动范围的扩展，将使得跨国公司更加努力地进入国家领土之内，同时也提高了处于国家政府绝对控制之中的资源之价值。”^②

国家与跨国公司签订协定，的确可以被视为国家行使自主权的行为，而不表明国家的主权受到了侵害。许多国家出于吸引资金、增加就业机会和引进技术的考虑，很愿意让跨国公司进入自己的国家，它们之所以这么做，显然不是因为它们在面对“以全球为中心的技术”时显得 263 无能为力，而是自愿选择这样的做法。

最后，跨国公司只有在国家为它们提供了最基本的和平与安全的条件之下，才能够从事自己的经营活动。主权国家控制着世界上绝大多数的武装力量，获得了大多数民众的拥护，它们相互之间的冲突与合作行为，决定着世界的政治结构。在这些方面，跨国公司根本无法挑战国家

① Robert Gilpin, "The Politics of Transnational Economic Relations," in *Transnational Relations and World Politics*, ed. Joseph Nye and Robert Keohan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2).

② Huntington, "Transnational Organizations in World Politics," p. 363.

的地位。从这个意义上说，跨国公司的活动范围，甚至是跨国公司生存与否的命运，都取决于国家所做出的决定。

(5) 世界的技术融合

有时，这样的论述令人感到满意，正在走向消亡的世界体系是世界技术融合的结果，跨国公司和行使国际暴力的非国家集团只是其特殊表现，世界技术融合必将导致“地球飞船”或“地球村”政治的产生，国家体系只是其中的一个组成部分。

但显而易见，尽管“地球缩小”会增加社会之间的相互了解和交往，它本身并不会导致观念的统一。布热津斯基对此做了精辟的论述：

我们这个时代的悖论是，人类社会正同时朝着更加融合和更加分散的两个方向发展……一方面，人类之间的联系越来越紧密，另一方面不同社会之间的差异在扩大。在这种背景之下，地理上的邻近性不仅没有促进相互融合，而且导致了相互间的紧张关系，这种紧张关系是由有关全球性拥挤现象的一种新观念所引起的。^①

布热津斯基进一步指出，麦克卢汉有关“地球村”的思想忽视了个人的稳定性、个人之间的密切关系以及构成原始村落生活要素共同的价值观念和传统，冯劳提出的“全球都市”（global city）的概念更有助于我们认识世界。“全球都市”指的是一个“神经质的、焦虑不安的以及既紧密又分散的相互依存关系网络，其特征是互动而不是亲密。”^②

264 “地球的缩小”是导致具有不同意识形态信仰、国土规模、文化或文明以及处于不同经济发展阶段的社会之间产生新的紧张关系的根源；交流的如此增多是否增进全球的而不是地区的或国家的视角和制度，这还很难说。促使商品、人员和思想在世界上流动的手段之技术进步，不仅促进了全球一体化，也促进了地区、国家和地方的一体化。例如，众所周知，本世纪工业化国家的对外贸易在其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重

① Z. Brzezinski, *Between Two Ages* (New York: Viking Press, 1970) p. 3.

② Ibid. p. 19.

有所下降。^① 交通和通讯手段的发展虽然增加了这些国家在国际贸易上的选择余地,但也增加了它们在国内贸易上的选择余地,使得它们更多地趋向于发展国内贸易。如果说贸易、移民、旅行以及思想交流正在给整个世界带来更多的机会的话,那么这种交往实际上只限于西方世界内部、欧洲内部、拉丁美洲内部或者安第斯集团内部这些较为狭窄的范围之内。澳大利亚经常被认为是典型的“距离暴政”的受害者,“全球技术融合”可能使该国尤为受益。但是,我们尚不清楚,澳大利亚与世界的一体化,或者澳大利亚国内的各个地区的融合,是否是交通和通讯技术在过去几百年的发展所起的作用。^② 技术进步产生了包括全球的、地区的、国家的或次国家的多种选择方案,决定哪种方案会被加以采纳的因素,并不是技术本身,而是各种出于政治和经济原因的考虑。

国家的地区一体化、国家的解体倾向、私人国际暴力行为的增多、跨国组织的作用以及世界的技术融合给地区和全球一体化所带来的机会等对传统的世界政治理论来说,就简直如同国家间关系一样都是棘手的客观实际。然而,该理论总是不得不面对一些非常规的或者不规则的现象:1871年以前的德意志帝国——它由一些从理论上主权受到限制的国家所组成;1929年以前的梵蒂冈——一个没有领土的国家;海盗——不为国家保护,而且被所有国家视为人类的共同敌人;1919年到1939年间的英联邦——它由一系列在相互关系中不适用主权原则的 265 国家所组成;跨越国界的宗教信仰或非宗教信仰、族群或民族、阶级或政治联盟——跨越了传统的国内事务与国际事务之间的界限;东印度公司——具有从事战争和征服行动的权利;北非的海盗——对这种理论来说,就如同今天的巴勒斯坦游击队一样棘手。

传统理论之所以一直占据支配地位,并不是因为他本身可以解释世界政治中的所有复杂问题,而是由于它同其他理论(比如有关建立一个世界帝国体系或世界社会的理论)相比,提供了一个相对较为准确的指南。今后那些非常规或不规则的现象可能特别令人关注,以至于产生另

① Karl W. Deutsch and Alexander Eckstein, "National Industrialisation and the Declining Share of the International Economic Sector 1890 - 1959," *World Politics*, vol. XIII (January 1961).

② 见 Geoffrey Blainey, *The Tyranny of Distance: How Distance Shaped Australia's History* (Melbourne: Sun Books, 1966)。

外一个能够更好地解释现实情况并占据支配地位的理论。假如我们前面所讨论过的某些“新中世纪主义”趋势得以进一步深入发展的话,那么今后很可能会出现这么一种情势。然而,我们不能因此得出结论,“非国家的集团”对国家主权的侵蚀,将导致国家体系为另外一种体系所取代。

我们在这里必须回答本章一开始所提出的问题,我们的回答是,没有明确的证据表明,国家体系在今后几十年内可能被前面所分析的任何一种替代方案所取代。也许有人会反驳说,这样一个大胆的结论具有自我实现的性质,它源于人们把有关当今世界发展趋向的描述同对策建议截然分开。不管怎么说,我们已经看到了某些发展趋向,特别是存在着产生“新中世纪”形式的世界秩序的可能性,这些发展趋向有碍于国家体系的生存,而且它们如果得以进一步发展下去的话,那么这将可能危及国家体系的生存。这些趋向的进一步发展,是否会导致国家体系让位于一种替代方案呢?我们已经提到过,国家体系一直具有生命力的一个原因,就在于同该体系相关的观念和规范性原则发挥着制约作用:追求新的超国家形式之地区一体化倡导者,主张处于少数地位的共同体获得新形式的自主地位之分离主义者,以及从事国际暴力行为的革命运动等等,都在思想上受到了国家体系理论的束缚,而且它们在大多数情况下都捍卫国家体系,充当国家体系中的行为体。我们是否有必要像格劳秀斯和其他人那样,提出具有思想上的一致性和目的性的、挑战过去政治秩序的新观念和新的规范原则,从而把自己的思想和行动从这样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呢?这也就是理查德·福尔克看问题的视角。他认为自《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以来的占据主导地位的世界政治组合形式正处于重大的变革过程中,其发展方向是“增加中心的指导作用”和“增加非领土国家行为体的作用”,从而使中世纪时期的某些特征得以重现。福尔克教授的一个基本观点是,研究这个问题的学者可以发挥积极的作用,以推动变革进程。他认为这是很有意义的。^①而在我看来,在研究世界秩序中把描述和对策混为一谈的做法,比将二者截然分开的做法更加有

^① 下面一篇文章最为清晰地论述了这个问题: Richard A. Falk, "A New Paradigm for International Legal Studies," *Yale Law Journal*, vol. 84 (1975)。本书第六、十二和十三章也论及了福尔克教授的观点。

害。如果我们认可并且推动那些挑战国家体系的发展趋向,尽管它可能会使得这样的趋向得以进一步发展下去,但仅此而已;不管我们对它们采取什么样的态度,现实中的某些东西都将继续存在下去。我们也不能回避这样的问题,即:“中心的指导作用增加”这样一个发展趋向是否确实存在,而且如果这种趋向确实存在的话,它到底是有利于世界秩序的维持,还是不利于世界秩序的维持呢?

世界政治体系

如果说前面的分析会让我们否定国家体系正在走向消亡的观点的话,那么它也会促使我们注意国家体系在目前的发展阶段中所具有的基本特征。这就是,目前存在着一个比过去范围更广的世界政治体系,国家体系只是其中的一个组成部分而已。

我们可以把世界政治体系理解为一个世界性的互动网络,它不仅包括国家,也包括在国家“之上”或在国家“之下”的政治行为体。那种仅仅关注国家体系的世界政治理论,可能承认每个国家同它所参加的国际组织进行着交往,而且同自己管辖范围内的、影响其自身政策的政治组织发生着关系。根据这样的观点,国际组织是国家政策的体现,国家内部的集团是影响一国政策的因素之一。

267

但是,现实要比这复杂得多。一国内部的政治集团不仅仅是通过影响本国的对外政策来影响世界政治的。首先,它们可能同其他国家的政治集团发生关系(不管是联合关系还是敌对关系);企业、工会、政党、专业团体、教会等等都在一定程度上处于超越国与国关系的跨国关系网络之中。其次,它们可能同外国政府发生关系。比如,跨国公司同所在国政府签订协议,政治团体在外国大使馆前举行游行示威活动,或者一国的革命团体支持自己在另外一个国家的意识形态同路人,以推翻该国的政府。第三,它们可能直接同国际组织发生关系。比如,非政府组织在联合国的一个专门机构中获得代表权,或者在联合国、欧洲经济共同体或非洲统一组织中支持或者反对本国政府。

约瑟夫·奈和罗伯特·基欧汉把这种关系称为“跨国互动”(transnational interactions),即“当至少有一个行为体不是政府或国际组织的代

理人时，有形无形的事项跨越国家边界的运动。”^① 他们声称，正统的国际关系研究受到“以国家为中心的”范式之束缚，它虽然承认存在着跨越国界的现象，但是把这种现象简单地视为主体的背景的一部分，我们现在应该用“世界政治”的范式取代“以国家为中心的”范式，让这些现象同国家间的关系一样走到前台。他们认为，跨国关系在过去没有得到系统的研究，这种状况必须加以改变。这样的看法是很有道理的。世界政治研究应该关注整个全球政治过程，而不能只是从国家间关系的角度狭隘地理解世界政治。世界政治的分析视角有自己的优点，因为它跨越了国际关系研究和国内政治研究之间的界限，把注意力放在全球政治体系上，而国际体系和国内政治体系都是全球政治体系的组成部分。

268 然而，如果说我们应该采纳“世界政治”范式的话，那么我们也必须摒弃与此相关的某些观点。^② 首先，我们不应该错误地认为，一个既包含国家又包含其他行为体的政治体系是一种崭新的或最近才出现的现象。国家体系一直就是一个范围更广的互动体系中的组成部分，在这个互动体系中，非国家集团相互之间，以及它们同外国政府、国际组织或超国家组织、所在国家的政府之间是有交往的。事实上，在16世纪以及17世纪初，天主教和新教团体之间的跨国联系，以及它们同外国政府、超国家组织（比如教皇国和神圣罗马帝国）之间的跨国联系，相对于基督教世界国家间的关系来说是如此重要，以至于当时尚未产生一种把欧洲政治等同于国家体系政治的理论。19世纪和20世纪的世界政治体系开始具有了遍及全球或者全世界的特征，只是从这个意义上说，这是一个崭新的或者最近才出现的现象。当然，国家体系本身只是在这一时期才具有了世界性。

第二，我们难以证明今天的跨国关系（用奈和基欧汉所定义的这个词）相对于国家间关系来说，是否比过去的跨国关系扮演着更加重要的角色。

① Nye and Keohane, *Transnational Relations and World Politics*.

② 奈和基欧汉并没有全盘接受这些观点，他们对自己潜在的批评者做了很多妥协，使得他们所提出的理论观点是很温和的。但是，他们赞成我所批评的五个观点中的第二个观点，即跨国互动关系在今天的世界政治中比过去要重要得多。见 *Transnational Relations and World Politics*。

雷蒙·阿隆是这样来描述存在于 1914 年并且在 1946 年—1953 年的冷战中“彻底分裂”的那种“跨国社会”的：

在 1914 年以前，整个欧洲的经济往来是自由放任的，金本位和货币可兑换制度比法律制度更有效地维护了欧洲的安全。工人政党组成了一个国际工人协会。希腊的奥林匹克传统重新得到发扬光大。尽管基督教教会呈现出多样性，各国的宗教信仰和道义理念，甚至是政治信念，基本上是相同的。法国人不难把德国当作自己的居住地，德国人也可以决定居住在法国。这种情况类似于公元 5 世纪的希腊社会，它表明国家间的秩序（不管是在战时，还是在平时时期）虽然处于跨国社会的背景之中，但是具有相对的独立性（autonomy）。光靠个人之间的相互交往和相互了解以及商品与思想的交流，不足以使得和平在主权单位之间的关系中占据支配地位。^①

269

奈和基欧汉认为，当今国家间的关系不具有阿隆所说的独立性，同 1914 年的情形相比，它们受到了“跨国社会”的较大影响。毫无疑问，自从 1914 年以来，国家对经济和社会生活、个人政治理念或宗教信仰的干涉有所增多，并因此使得国与国的关系具有较多经济、社会 and 意识形态的内容。但是，这到底是意味着国家以外的行为体在世界政治中的重要性得到增强，还是说明国家体系的触角已经延伸到世界政治的各个角落，从而剥夺了商业公司和银行家、劳工组织、体育运动队、教会和移民过去所享有的作为独立行为体的地位呢？

不管我们认为非国家行为体在当今世界政治的地位同 1914 年相比，到底是提高了，还是下降了，它们今后所具有的地位不大可能达到 16 和 17 世纪那样的水平，在 16 和 17 世纪，尚未完全消失的中世纪形式的跨国关系依然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正如奈和基欧汉所说的，跨国关系的作用尚未得到人们的系统研究。已经开始的这方面研究工作主要是以当代世界为研究对象，这可能使得有关跨国关系在早期国家体系中的地位这个问题更加为学者们所忽视。

^① Aron, *Peace and War*, p. 105.

第三，那些强化世界政治体系的因素本身并不能导致一个一体化的世界社会。我们所理解的世界社会不单单是指所有人类共同体之间的互动程度，而且还包括共同规则和制度赖以建立起来的共同利益和价值观念。从这个意义上说，世界社会的概念不等同于全球社会互动关系的总和，正如我们所说的国际社会不等同于国际体系概念一样。

今天无疑存在着一个十分重要和崭新的影响跨国关系的因素：全球交通和通信技术的发展，通过传输信息和图片以及创造旅行和直接交流的机会，使得人类共同体不同部分之间的相互了解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然而，我们必须指出，这并不会使得所有社会之间的相互了解达到“全面”的程度。许多政府利用自己的权威阻止外国电台和电视节目进入本国，不让本国公民享有自由旅行的权利。所有国家的政府都有机会控制和阻碍本国民众的对外界的认识 and 同外界的交流，即使具备了解其他社会的最有利的条件，一个社会对另外一个社会的认识总是具有选择性和片面性。不仅如此，即使对其他社会的了解达到了“全面的”程度，这种“全面的”了解在有助于消除事实上不存在的、想象中的利益冲突或意识形态冲突的同时，也会揭露了事实上存在着的利益冲突或意识形态冲突。

而且毫无疑问，今天所有社会在追求人类基本目标的时候，它们之间保持着很高程度上的相互依存或者相互敏感的关系。然而，我们也必须承认，“相互依存”已经变成一个很时髦的词汇，它被用来说明主导国家和从属国家之间的关系具有合理性，在这样一种关系中，敏感性主要是单向的，而不是双向的。国家提出发展相互依存关系（比如在北约盟国之间，在经合组织成员国之间，在原料生产国与消费国之间）的主张包含着重要的政治目的，这就是说，相互依存的倡导国常常担心自己的决策同另外一个国家的决策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不被加以承认，或者它要求这种相互依存关系应当被加以承认，但并不说明这些国家相信它们的决策事实上存在着相互依存的关系。

不仅如此，即便一个社会的决策同另外一个社会的决策的确具有相互依存的关系，并且它被意识到，这本身并不会导致共同利益观念的产生，更不可能导致共同价值观念的形成。国家以及其他行为体相互之间对对方在战略、经济或生态方面的决策很敏感的事实，可能为每个行为体加以利用，以实现自己的目的，而且这种对对方的决策很敏感的事实

本身,并不能决定在行为体之间将产生合作行为,还是出现冲突行为。

第四,我们必须注意到,在当代世界政治体系中,跨国关系似乎已经对国家体系产生了严重的侵蚀作用,但是这种事态的发展是很不平衡的。跨国关系在某些地区政治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比如跨国关系通过欧洲经济共同体的制度在该共同体中所起的作用,跨国关系通过共产国际和共产党在社会主义大家庭中所起的作用,或者跨国关系通过阿拉伯民族主义的因素而在阿拉伯国家中所起的作用。然而,如果说这种关系已经或者即将导致跨越国界的社会一体化的话,那么这样的一体化仅仅是地区性的,它不一定会促进全球范围的社会一体化。

另外一方面,某些跨国关系不仅具有地区性的重要意义,也具有全球性的重要意义,但它们的作用不在于促进整个世界社会的一体化,而在于促进一个主导文化内部的一体化,它在增强主导文化内部的相互关系的同时,也拉开了这个主导文化同那些非我族类的社会之间的距离。与此相类似的是,跨国公司、大的基金会以及科学和专业团体等等,都以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特别是美国)为基地,它们会促进某种形式的一体化进程,把那些发达国家的社会同贫穷国家的精英集团连为一体,但也会拉开发达国家同贫穷国家、贫穷国家内部的现代化精英集团同普通民众之间在社会或文化上的距离。^① 我们难以找到有关跨国关系会促进全世界社会一体化平衡发展的证据。

第五,世界政治体系的存在绝不意味着国家体系的终结。国家体系一直总是在一个范围更为广泛的政治互动体系中运行的,而且在当今世界政治体系中,国家体系依然占据着最为重要的地位。

^① 有关对该观点的具有说服力的表述,见 Osvaldo Sunkel, "Development, Underdevelopment, Dependence, Marginality and Spatial Imbalances - Towards a Global Approach," a paper presented to the Conferencia del Pacifico, Vina del Mar, Chile (1970)。

人们有时认为，不管国家体系是否正在走向消亡，它在今天已经过时了，因为它已经没有什么作用了。也就是说，它已经无助于地球上的人类实现其基本目的或目标。根据这种观点，不管国家体系过去是否提供了一个有效的维持世界秩序的手段，它不管是在现在，还是在将来，都无法指明一条可行的通往世界秩序的道路。由此可见，即使我们同意上一章的论点，即没有足够的证据表明国家体系正在让位于另外一种世界政治组合形式，我们也应该认识到，我们需要采取其他某种方式以实现维持世界秩序的目标，并且为此而努力。比如，最近出版的多卷本著作《国际法律秩序的未来》的编者西里尔·E·布莱克和理查德·A·福尔克就提出这样的观点。福尔克在其所著的《这个处于危险境地的星球》一书中也对此做了更富激情的论述。^①

那些持这种观点的人倾向于提出如下一个或者多个命题：

(1) 国家体系已经不能够保障世界和平与安全（即使它在过去的确做到这一点），或者更笼统地说，它已经无助于维持一个最低限度的世界秩序。这是反对“国际无政府状态”的传统论点，当今世界所面临的核战争危险增强了其说服力。

(2) 国家体系即便有利于维持最低限度的和平与安全，它也无助于实现世界上的国家之间或国家内部的经济与社会公正这一更为宏大的目标，如今一个在政治上已经觉醒的世界正在努力追求这个目标。

(3) 国家体系阻碍了人类实现自己与环境和谐

^① 见 Cyril E. Black and Richard A. Falk (eds), *The Future of the International Legal Order*, vol. I (1969); and Richard A. Falk, *This Endangered Planet: Prospects and Proposals for Human Survival*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71)。

共处的生态目标：人口控制、粮食生产和分配、资源管理和保护等相互联系的问题，只有通过全球性的分析视角和人类团结一致的观念，才可以有效地得到解决，而人类被划分在不同国家的现实，有碍于这种视角和观念的产生。

和平与安全

那些认为国家体系已经过时的人首先引用了一个传统的论点，即国家体系的存在使得战争不可避免。他们声称，这样一种情势或许在过去是可以被容忍的，而现在是不能再被容忍了。在国家体系的历史上一再发生战争，导致了无穷无尽的苦难与悲剧，但是这并没有造成人类的毁灭，文明社会生活一直延续下来了，经济、科学和艺术也在向前发展。但是，根据这种观点，核武器以及其他大规模毁灭性武器迟早会导致文明社会生活的终结，甚至可能导致整个人类的毁灭。因此，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必须以某种不会导致战争的世界政治组合形式取代国家体系。

我们很难否认战争是国家体系所特有的弊端。当然，国家体系并非必然导致战争。在国家体系的历史上，也有过一些两个国家之间或者一个国家集团内部长期保持和平关系和不以武力解决争端的例子，卡尔·多伊奇把这样的两个国家和国家集团称为“多元安全共同体”。^① 这样的例子包括美国和加拿大的关系、英国和美国的关系、斯堪的纳维亚国家之间的关系以及过去英联邦国家之间的关系。实际上，我们可以设想今后会产生一种国家体系，它属于一个世界性的“多元安全共同体”，在这样一个多元安全共同体中，讲英语的国家群体以及斯堪的纳维亚国家群体所形成的那种国家间的关系，变成了带有普遍性的国家间的关系。这样的国家体系并非不可能产生，而且这样的构想可能被认为会给世界带来希望。然而，我们目前没有理由相信，这样的构想会在本世纪成为现实。

^① 见 Karl W. Deutsch et al., *Political Community in the North Atlantic Area*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57)。

在国家体系中，没有一场战争是不可避免的，高超的外交技巧和好的运气往往可以防止一场国际危机演变为一场战争。但是，从每隔一段时间战争就很可能在国家体系的某个地方爆发这个意义上说，战争总体上是不可避免的。由于世界上存在拥有军队和在政治上相互独立的主权国家，所以不管是在过去，还是在今天，我们都没有理由相信，在可预见的将来会产生普遍和持久的和平。

我们也不可否认，人类社会今天比过去更加难以容忍一种以战争为自己特有痼疾的世界政治组合形式。战争在过去有时导致整个社会陷于瘫痪境地，甚至导致整个社会走向毁灭，但是没有造成全球性的毁灭和混乱，而现代军事技术则会带来全球性的毁灭和混乱。而且在 20 世纪以前，也没有出现过全世界的共同体之间在经济和生态上相互依存的局面，正是这种相互依存的局面使得世界上的共同体更加难以承受全球性战争所带来的毁灭与混乱的后果。

然而，我们不能因此认为，国家体系无助于维持一个最低限度的世界秩序。首先，我们要把国家体系的弊端同其他世界政治组合形式的弊端加以比较。我们不能简单地断定人与人之间的暴力冲突就是因为国家体系的存在而产生的，而应该思考这样的暴力冲突是否由某些更为深层次的、同样存在于其他任何一种政治结构中的原因所造成的。这些深层次的原因包括：人们用于解决相互之间争端的暴力手段之存在，以及人们在重要的问题上宁愿使用暴力手段而不愿接受失败的倾向。

人们之所以认为世界政府的建立将使得战争不再发生，只是因为他们把广义的战争与狭义的战争相混淆了。广义的战争是指政治单位之间有组织的暴力行为，而狭义的战争则是指国际战争或者国家之间的暴力行为（见第八章）。伴随世界政府的垮台而来的战争，同国家内部的内战一样，其暴力程度或者毁灭性，并不因为它们不属于狭义的战争而有所减轻。

当然，我们可以设想存在着一个世界政府，它至少会阻止大规模的国内或者内部暴力行为，因为它具有一系列和平解决冲突的制度化程序，允许发生大家普遍认为具有合法性的变革。如同某些现代西方国家内部的情形一样，在这样一个世界政府的统治之下，世界可以保持着一个高度稳定的政治局面，而且其内部的暴力冲突相对较少，大规模暴力行为可能在很长时期内得以避免。但是，既然我们可以设想其他世界政

治组合形式具有这些理想主义特征,那么我们同样也可以从理性主义的角度来看待国家体系,认为在国家体系中同样可以形成建立“多元安全共同体”的条件。

同样地,在“新中世纪主义”秩序中,战争(这里指主权国家之间有组织的暴力行为)是不会发生的,因为主权国家是不存在的。但是,这并不能确保“新中世纪主义”秩序一定比现代国家体系更为和平与安全。我们在前面已经指出过,西方基督教世界的世界政治秩序,比后来的世界政治秩序包含着更多的暴力和不安全的因素(见第十章)。此外,我们也可以设想会产生一个“新中世纪主义”政治秩序,它所包含的和平解决冲突的制度化程序,比现代国家体系现有的类似程序更为有效,从而会导致一个前所未有的世界秩序。但是,既然我们可以设想出一个具有这些理想主义特征的“新中世纪主义”秩序,那么我们也同样可以认为,国家体系有可能发展成一个更有效的、维持世界和平与安全的体系。

这样来比较各种理想的方案,是一种武断和毫无意义的做法。我们可以预计,在本世纪余下的时间里,在世界政治体系中依然会存在着暴力的手段和使用暴力的倾向,因此我们不应该赋予任何世界政治组合形式以理想主义特征。一个更有意义的问题是,在这样一个世界政治体系中,建立世界政府或者其他世界政治组合形式,是否比维护国家体系更有助于实现维持最低限度的世界秩序之目标呢?

276

其次,那些认为国家体系已经过时的人忽视了一个事实,即国家体系在维护处于严重分裂状态中的人类共同体之秩序时,发挥着积极的作用。国家体系之所以产生,就在于人们认识到,在宗教以及教皇和神圣罗马帝国的权威成为导致严重的分裂而非产生共识的问题时,接受欧洲分裂为多个独立的国家以及国家相互共处的局面,比试图建立一个以广泛的共识为基础的另外一种体系的做法,更有助于实现维持秩序的目标。

政府垄断合法使用武力的权利固然有助于维护秩序,但也会导致社会集团相互之间为争夺政府的控制权而发生冲突。政府权威可能被用来否定个人或者集团使用武力的权利,政权机构也会成为政治冲突中的争夺目标,从而增加这种冲突的激烈程度。在典型的现代民族国家中,如果冲突表现为多个竞争力量争夺一个政府的控制权,而不是表现为多个

政府之间的争夺，那么秩序就最容易得到维持。然而，在民族国家中，往往也会出现与此相反的情况。也就是说，主权国家政府并存的对秩序所构成的威胁，常常小于那种企图把敌对共同体合并在一个国家中的行为对秩序所构成的威胁。1947年的印巴分治和1971年巴基斯坦的分裂都表明了这一点。

我们可以用这样的方式来看待世界共同体中的秩序问题。多个主权国家共同组成一个体系，这无疑会产生一些传统的威胁，但我们有必要比较一下，到底是这样的威胁大，还是那种试图把截然不同的共同体合并在一个单一政府框架内的行为所造成的威胁大。我们或许可以认为，前一种做法比后一种做法更有助于维持当今的世界秩序。^①

第三，我们在得出国家体系无法维持最低限度的世界秩序之结论前，应当考虑到一种可能性，即国家将继续对核武器以及其他大规模毁灭性武器采取谨慎和克制的态度。

除了美国曾经对日本实施过核轰炸之外，迄今为止，核武器尚未被
277 用于战争之中。拥有核武器的国家不仅不互相使用核武器，而且避免相互之间发生直接的军事冲突，核国家直接发生军事冲突的一个例外就是苏联和中国在1969年发生的边界冲突。美国和苏联都认识到双方拥有避免核冲突的共同利益，并且制定了相关的指导原则或者行动规则，以帮助它们避免危机或者对已经发生了的危机加以控制。它们也签署了一系列军备控制协定，其中最早的一项协定是1963年的《部分核禁试条约》，这些协定对两国的军备竞赛施加了某些重要的限制，而且也体现了两国对共同威胁的认识。

我们没有理由认为，两个主要核国家今后一定会继续执行这些克制性政策，或者说其他核国家（现实的与潜在的）也会采取同样的政策。我们不难想象，今后有可能出现如下的情势：苏联和美国不再采取克制政策；中国和其他核国家拒绝加入克制规范体系；在世界上产生新的核国家，它们同老的核国家相比，不太愿意采取克制与合作的行为；非国家集团获得核武器；核国家未能让当今的体系得以巩固与延续。

我们必须认识到，如果这个克制规范体系不能得以维持和延续的

^① 我在下面一篇文章中对此做过论述：“Society and Anarchy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 *Diplomatic Investigations*。

话，那么我们就不能够通过国家体系，来维持最低限度的和平与安全，或者维持最低限度的世界秩序。然而，我们有理由相信，这个克制规范体系将会得以维持和延续，而且这也是世界应当追求的重要目标。假如正像上一章所说的，国家体系（不管是否过时）在可预见的将来会继续存在下去，那么促进这个克制规范体系的发展，将有助于国家体系发挥作用，从而实现维持一个最低限度的世界秩序之目标。

经济和社会公正

除了提出国家体系不能给世界带来和平与安全这个传统的论调之外，偶尔也有人声称国家体系也不能给世界社会或世界共同体带来经济和社会公正。

显而易见，当今人类社会的一个特征就是，在国家或民族之间、个人之间以及集团之间中存在着经济与社会不公正的严重现象。我们已经提到过，目前的国家体系与世界正义或者全球正义思想是不相容的，它只是有选择地和不甚明确地肯定个人正义或者人类正义思想，虽然它基本上并不敌视国际正义或者国家间正义的思想，但是维持该体系的方式同这样的思想是完全相互抵触的（见第四章）。²⁷⁸

当然，在世界上存在着不公正的现象，存在着容忍或鼓励不公正现象的世界政治组合形式，这并不是什么新鲜和奇怪的事情。历史上，这样的事实被认为是理所当然和不值得一提的。^① 在19世纪以前，世界上并不存在着一个真正遍及整个世界的政治体系以促进经济和社会公正理想的实现，人们只是在局部地区追求这些目标。然而，19世纪和20世纪那种具有世界性的政治体系导致了全球相互依存的局面和全球意识，经济和社会公正的理念开始在全球范围内被付之实践。最引人注目的是，马克思提出了国际无产阶级革命的学说，把追求经济和社会目标视为最为重要与紧迫的任务，并且主张在处于萌芽状态中的世界社会或

^① 巴格瓦蒂写道：“人们从二战以前的文学作品和社会及政治著述中，几乎找不到有关这种‘缺陷’的系统的、一贯的和持续的讨论，”见 *Economics and World Order From the 1970s to the 1990s* (London: Macmillan, 1972), p. 6。

者世界共同体中，而不是在局部地区，追求这样的目标。

世界社会或世界共同体的特征表现为，存在着一个全人类的共同利益与价值观念，它有别于那种仅仅产生全球相互依存局面和全球意识的世界政治体系。世界社会或世界共同体可能尚处于胚胎之中，但是人们普遍认为，它将会成为现实（第十一章讨论了它成为现实的条件）。不仅如此，所有聪明和敏锐的人，不管他们是否意识到阻碍这样一个世界社会或世界共同体得以产生的绊脚石，确实都必须承认这个目标是值得追求的，并且需要为此付出自己的努力。假如国家体系的确是经济和社会公正目标得以实现的障碍，即使在过去它并不是判断这种世界政治组合形式是否起作用或有效一个衡量标准，今天我们必须对此加以关注。

279 人们可能认为，国家体系通过两个方式妨碍经济和社会公正目标的实现。国家体系由于阻碍了人员、货币和商品在地球表面上的自由流动，或者阻碍它们根据全球经济发展计划而进行流动，从而制约了世界经济的增长。与此同时，由于每个国家只关心特定人类群体的利益，所以国家体系导致一个结果，即无法根据某种世界共同利益的观念，在国家、民族和个人中间对经济和社会利益进行公平的分配。

人们在国际或国家间关系的层面上追求经济和社会公正目标的行为表现为，有些国家致力于实现把资源从富国转移到穷国的目标。人们有时认为，此种行为旨在“缩小富国与穷国之间的差距”，有时也认为，这是为了促使所有国家的发展水平达到最基本的福利标准。然而，这样的差距并没有被缩小，而且它在可预见的将来也不可能缩小。^① 人们也可能提出，只要国家体系继续存在下去，国家和民族间的经济和社会公正就不可能成为现实。鉴于富国主要关心本国人民的经济利益与社会利益，我们可以认为，富国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自己的有关官方援助、外国私人投资、贸易或移民的政策，以便“缩小差距”，或者追求最基本的全球生活标准或福利标准。

人们或许会认为，只要国家体系继续存在下去，我们就更不大可能在个人或人类的层面上实现经济和社会公正的目标。比国家之间的经济公正更为重要的是个人之间的经济和社会公正，即人类的利益完全均等，或者在全球范围内消除贫困和社会剥夺现象。这个目标的实现，不

^① 有关这一点，见前引书，pp. 5-9。

仅有赖于把资源从富国转移到穷国，也有赖于在这些国家的民众中间公平地分配资源及其相关利益。提供某些“开发援助”的富裕国家和国际机构，可能会提出一些向穷国转移资源的条件。但是，由于它们对自身利益的关注程度大于对人类正义目标的关注，所以它们所提出的条件可能并不能确保受援国政府公正地分配利益。不仅如此，由于受援国政府享有主权，提供“开发援助”的富裕国家和国际机构提出限制性条件的能力是有限的，它们即便想努力促进人类正义目标的实现，也无法决定受援国政府的所有经济与社会政策。 280

可能有人指出，在国家体系继续存在的条件下，世界或者普世范围内的经济与社会公正目标，是根本无法得到实现的。假如所有国家都是根据世界共同利益的理念来制定自己的经济和社会政策的话，那么国家就已经放弃了自己对经济和社会事物的控制权，完全成为一个听命于世界政府的机构。我们很难相信国家会这么做，除非它们确实在政治上服从于这样的一个世界政府，因而不组成一个国家体系。

这些有关追求经济和社会正义目标的论点，同我们前面所论及的有关追求和平与安全目标的论点一样，有着相同的问题。首先，人类社会中的经济和社会不公正现象有着比国家体系的存在更为深层次的原因，它们在其他类型的世界政治秩序中也会发挥作用。如果与国家体系相对照，我们假设世界政府或者新中世纪秩序不仅可以给全世界带来和平与安全，而且还可以在地球范围内实现经济和社会公正的目标，那么对比之下国家体系自然就是机能不良的了。然而，我们有什么理由做此假设，而不是说世界政府或者其他类型替代世界秩序将会是专横的和不公正的，同时也必然分崩离析成为全球性的内乱呢？

世界政府的倡导者们认定世界政府体现了自己的道义观念和政治意愿，认为这样一个世界权威机构推广了自己的价值观念，它足以消除当今影响这些道义和政治目标得以实现的障碍。但是，他们回避了一个问题，即同国家体系相对立的世界政府也照样受到导致当今世界不公正现象的因素的制约，并不能摆脱这些因素的影响。国际、人类或世界层面上的经济和社会公正目标的实现，取决于人们对这些目标的认识达到较高程度上的一致性。然而，产生和维持这么一种一致性的观念，这不仅是国家体系所面临的任务，也是其他任何一种世界政治组合形式所面临的 281

第二，我们所讨论过的观点忽视了国家体系的一个积极作用，即防止发生更为严重的社会和经济不公正现象。世界政府的倡导者或者主张加强全球制度的人士，都来自最富裕和最强大的国家，而社会主义大家庭中的国家以及第三世界国家则最为坚定地主张维护国家主权。这一点都不奇怪，本书的下面一章还将对此做进一步的分析。

在比较贫穷和弱小的国家看来，世界政府的建立可能并不会导致有利于它们的经济资源的再分配，而会强化现存的资源分配格局。它们认为，国家主权制度可以防止较强的国家控制它们现有的经济资源。较为贫穷和弱小的民族只有通过反对殖民强国、建立主权国家以及保护主权国家免遭所谓的“新殖民主义”强国的侵害或渗透，才能够在某种程度上实现国际正义的目标，甚至在某些情况下争取实现人类正义的目标。

国家体系所具有的这种积极作用，不只是有利于较为贫穷和弱小的国家。当今世界的民族和个人之所以享有经济和社会公正的地位，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国家和政府为经济生活的管理以及经济与社会利益的分配与维护，采取了相关的措施。国家主权制度不仅阻碍了那些可能促进比现存经济和社会更公正的外部干涉行为，同时也限制了那些威胁或损害282 现有经济和社会成果的外部干涉行为。

第三，我们前面所讨论过的观点忽视了一种可能性，即在国家体系中可能产生很强的有关经济和社会公正目标的共识；虽然各国均为主权国家，但是这些国家在确定自身目标的时候，都日益受到人类团结一致的观念或者世界社会观念的制约。我们没有理由设想这将成为现实，而且正如前面所提到过的，我们今后可能会看到国家间的共识领域不是在扩大，而是在缩小（见第十一章）。但是，世界共同利益的观念可能得以继续存在和发展下去。

人 与 环 境

如今人们经常认为，不管是对于实现和平与安全以及经济和社会公正的目标，还是对于实现人类与自己所处的环境和睦共处的目标来说，国家体系都已经过时了。

有人因此认为，人类今天面临着来自人口和经济增长的威胁，面临

着人口和经济增长对稀缺资源（如土地、能源、粮食和原料）所造成的压力，自然环境也因此承受着巨大的压力和超量的负荷。这些威胁被认为是相互关联的，而且必须同时加以解决。为了应对这些问题，全人类需要团结一致和制订全球性规划，但这总是要受到主权国家的阻碍。理查德·福尔克在论述“地球所面临的四个威胁”（即“战争制度”、“人口压力”、“资源短缺”和“环境压力”）的时候指出，我们不能孤立地看待这些问题。他写道：“从根本上说，所有的威胁都是环境破坏的派生物，而环境破坏则是一套有缺陷的政治制度的必然产物。”^①

很显然，假如所有人都像一艘宇宙飞船中的宇航员一样，愿意相互进行合作以追求共同的目标，那么人类所面临的这些威胁将比较容易得到消除。然而，在这些威胁产生之后，国家采取了各不相同的和相互矛盾的人口政策；它们对经济增长的目标采取了截然不同的态度；粮食、能源和其他原料成为国际冲突中的武器；一些国家污染了他国的空气和水源；有关公海及其资源是人类共同财富的传统惯例正在受到侵蚀。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尚不清楚超越国家体系是否足以应对环境所面临的这些相互关联的威胁。 283

首先，妨碍制定和实施共同的全球环境行动计划的因素，并不是国家体系的存在，而是人类在生态领域内的分歧与冲突的事实。就人类环境以及和平与经济公正的目标来说，我们必须认识到，人类冲突具有比任何形式的世界政治秩序都更深层次的原因。从长远的角度来看，所有的人为了避免一个世界性的“公共用地悲剧”，可能必须学会在决定家庭规模、能源和其他资源的消费以及环境污染等方面上限制自己的行动自由，一个不能施加此种限制的国家体系可能是机能不良的。^② 然而，一个世界国家、“新中世纪秩序”或者其他任何形式的世界政治秩序如果不能对这些自由权利加以限制，也会面临同样的命运。

其次，我们前面所讨论过的观点，忽视了一个事实，即国家体系可能在应对环境和生态威胁上做出贡献。正如我们在前面所提到过的，国

^① *This Endangered Planet*, p. 98.

^② 加瑞特·哈丁 (Garrett Harding) 在《科学》(1968年12月13日) 中提出“公共用地悲剧” (“the tragedy of the Commons”) 的思想。它指的是在英国由于过度放牧所导致的公共牧场的毁坏。

家体系使得不断处于纷争和冲突中的人类共同体可以维持一个最低限度的秩序。独立政治共同体相互承认对方的独立生存权和遵守某些共处的规则，使得某种程度上的秩序得以维持下去，否则的话，世界就不可能有秩序。如果没有这样一个最低限度的秩序，人类共同面临的环境问题就很难得到解决。

毫无疑问，在当前，限制人口增长，控制经济发展（包括抑制“过度发展”和消除“不发达”状况），或者限制资源的消费和公正地分配资源，主要依赖于国家采取行动。如果像福尔克和其他一些人所说的那样，解决环境问题已经成为一项迫在眉睫的任务，那么我们就应该认为，我们只有依靠同当今世界的政治制度截然相反的政治制度，才能够采取有效的应对行动。正如谢尔德斯和奥特在一篇颇有见地的文章中所指出的，在当前，只有国家政府拥有足够的信息、经验和资源，可以有效地采取应对这些问题的行动。^①

第三，那种认为国家体系机能不良的观点没有认识到一种可能性，即在国家体系中可能形成一个较强的、有关应对环境问题的、团结一致的观念。从长远的角度来看，单靠国家层次上的行动不足以解决环境问题，国家体系以及其他任何形式的世界政治秩序要想在这方面发挥自己的作用，将有赖于产生一个比现有观念更为强烈的人类团结一致的观念。然而，我们不应当认为，国家体系只是阻止这种观念得以产生，而不是促使这种思想得以形成的手段。当今的国家体系提供了一种人类政治组合结构，它建立在共同利益与共同价值观念的基础之上，它可能并不足以应对世界秩序所面临的长期挑战，但却是当今人类团结一致的主要体现，国家体系的维持和发展，是一个具有更大凝聚力的世界社会得以形成的前提条件。

国家体系与世界秩序

假如国家体系不能够维持和增强有关共同利益、共同规则和共同制

^① Linda P. Shields and Marvin C. Ott, "The Environmental Crisis: International and Supranational Approaches,"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vol. IV, no. 6 (November 1974).

度的观念（在过去，这些观念有助于缓解国家间的冲突），那么它真的证明是机能不良的。如果国际体系退化到霍布斯所说的自然状态中去，那么它将无助于世界秩序的维持。不仅如此，如果国家体系要想作为一个具有生命力的国际结构而得以继续存在下去的话，那么该体系赖以生存的共识领域不仅必须得以保持，而且还要得以扩展。如果人们在和平、正义和环境治理等问题上缺少基本的共识，任何其他一种世界政治组合形式同样也将失去生命力。超越国家体系的做法不足以，也不一定会导致这种共识的形成。

我们有时会听到有人讲述这么一个故事。一个在苏格兰某个地方迷路的人问一个农夫，他应该走哪条路才能到爱丁堡去。那个农夫回答说：“哦，先生，假如我是您的话，我就不会从这里开始走！”有关国家体系并不是通往世界秩序的最佳起点的学说就蕴含着某些类似的意思。今天我们所面对的现实是，国家体系是在世界中占据主导地位的世界政治组合形式，我们必须在这个体系之内开始追求达成共识的目标。

如果国家体系在可预见的将来继续存在下去，而且不一定过时或是机能不良，那么我们最好应该对它加以什么样的改革或者修正，以便更有效地维护世界秩序呢？我们将在本章中论述几个可能的答案。

大国一致：“基辛格模式”

一种答案是大国一致的模式。这被称为“基辛格模式”，而且实际上美国比其他任何一个大国都更趋向于支持此种模式。苏联虽然在现实中出于某些目的而同美国进行合作，但是发表了有关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相互斗争的言论，并且在理论和实践上反对建立一个包括中国在内的大国协作体系。中国截然否认自己是一个大国，并把自己视为第三世界国家反对“超级大国霸权主义”斗争的倡导者。然而，美国很自然地趋向于大国一致的理念。一方面，它致力于捍卫现存的国际秩序。另一方面，它认识到自己的权力地位已经衰落，需要同新的大国进行合作。

这种大国一致的模式旨在建立起一个“和平结构”。当然，该结构所维护的是大国之间的和平，而不是整个世界的和平。它关注国际经济公正的目标，但只是主张在现存的权力框架内，通过“国际开发援助”的措施来追求这个目标，基本上不关心如何在全人类或者全世界的层面上实现经济公正。它只是在口头上关注人类环境问题。

我们在前面提到过，在当今世界上事实存在着三个大国以及其他准大国或潜在大国之间的均势关系，但这种均势关系在很多重要方面不同于上个世纪欧洲的大国均势，尤其是在今天不存在着 19 世纪

那种大国为了维持均势而普遍进行相互协作的协调一致体系（见第五章）。我们也曾经提到过，当大国构建起一个相互协作体系之后，它们可以通过处理相互间的关系，以及利用自己在国际社会某些地区中的主导地位，来维持国际秩序（见第九章）。在美苏关系中已经存在着某些相互协作体系的因素。我们如果想创立起大国一致的局面，那么就需要加强美苏协作体系，并且把中国纳入该体系之中；不仅如此，假如日本、欧洲经济共同体以及其他行为体也成为大国的话，那么它们也应该被纳入该体系之中。

我们不得不承认，大国间的合作至少是国家体系中的世界秩序得以维持的重要条件之一。大国是客观存在着的，不可能因为人们的主观意愿而消失：整个世界政治体系到底处于和平、安全的状态，还是处于战争、不安全的状态，这主要是由这些大国内部的统治集团所决定的。只要大国继续处于这么一种地位，那么大国之间的和谐关系总是比大国之间的纷争更有助于世界秩序的维持。从这个意义上说，过去大国所采取的以协商取代对抗的措施虽然不甚彻底，但的确具有建设性。

批评“超级大国霸权主义”的人士有时声称，大国之间的合作行为只是服务于大国自身的利益，而不是服务于整个国际社会的利益。实际情况并非如此。美国、苏联和中国卷入核战争，或者上述任何两个国家之间的核战争，不管是对于交战方来说，还是对于二流强国或者小国来说，无疑都是一场灾难，如果大国采取措施以减少核战争的威胁，那么它们就充当着全人类利益的捍卫者。 288

毫无疑问，充当全世界受托人的观念在促使大国采取某些合作行为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可能是微不足道的，它甚至根本就没有起到什么作用。我们或许只需要从大国维护自己狭隘利益的角度，来解释缓和得以产生的原因。

很显然，大国采取合作行为的目的，不仅仅是为了实现避免无限核战争这个全人类的共同利益，它们还追求自身的利益：维持政治现状，共同对付那些可能损害大国主导地位的潜在挑战者，以及维护它们在各自势力范围内的优势地位。否则的话，大国就不可能采取合作的行为。

同样清楚的是，即使大国采取合作的行为完全是为了追求避免无限核战争这个全人类的共同利益，这样做的结果仍然会导致大国牺牲他人的利益，去追求自己的利益。美国、苏联和中国可能通过采取下列行

为，减少相互间发生战争的可能性：互不干涉对方的势力范围；抛弃可能使自己卷入冲突的盟友和仆从国；联合起来向那些有能力破坏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的国家施加压力。

由于这些原因，世界上的中小国家从大国合作中不仅可能受益，而且可能受害。这些国家从自身利益考虑出发，理应对正在形成中的大国一致局面保持一个警惕的态度。但这并不能否定一个事实，即避免核大战既符合所有较小国家的利益，也符合可能挑起这种战争的大国的利益。

然而，如果说大国为了维持核和平而采取的合作行为，是国家体系
289 中的世界秩序得以维持下去的必要条件的话，那么它并不是一个充足条件。大国一致的模式，即便实际上并没有试图压制弱小国家和人民的变革要求，但确实忽视了这样的要求。正如我们在前面已经说过的，国家体系只有证明自己能够维持和扩大有关共同利益和价值观念的共识领域，才能够继续成为通往世界秩序的有效途径。今天，如果不考虑亚非拉国家和人民有关消灭殖民主义和白人至上论者政权、重新分配财富和资源，以及终结它们大多数国家对富国的依附或从属关系等公正变革的要求的话，那么这样的共识是不可能形成的。

毫无疑问，大国一致，尤其是把中国包括在内的大国一致，并不一定完全忽视这样的要求，大国现在甚至采取某些象征性的举动，努力迎合这样的要求。显然，大国一致只有通过使自己的作用合法化和获得国际社会的广泛支持，才可能具有生命力；我们在前面已经提到过，大国一致通过大国不明确阐明自己的作用，以避免采取明显的无序或掠夺性的行为，努力满足变革的要求，以及为某一特殊目的笼络主要二流国家的支持（见第九章），就可能做到这一点。同样清楚的是，单就世界上存有心怀不满或愤愤不平的国家集团这个事实本身，并不足以对国际规制构成致命危害；在所有政治体系中都存在着某些心怀不满或者愤愤不平的成员，它们觉得自己未能得到足够多的好处，但这并非意味着这些体系的基础是不牢固的。

然而，我们也难以相信，“弱势国家”（have-not）的不满情绪可以因为象征性的姿态而得以减轻，或者说它不会损害任何一种无力从根本上实现财富、资源和权力再分配的国际规制。不可否认的是，除了中国之外，“弱势国家”或无产阶级国家尚不具备强大的军事力量，即便

是中国也无力在军事上挑战以美国和苏联为核心的世界权力结构。当今“强势国家”和“弱势国家”之间的冲突，不同于20世纪30年代英法这两个国际联盟与国际合法性的倡导国与德、意、日这三个持修正论的国家之间的斗争。在那个时候，“弱势国家”代表着世界上的两个主要军事集团之一，“强势国家”只有两种选择，要么迎合“弱势国家”的要求以实现和平的变革，要么走向战争。

但是，今天的“弱势国家”在国际社会中处于多数的地位。不仅如此，它们代表着世界上的大多数人，构成世界社会的主体成员，正如我们在前面所说过的，虽然它们尚未成为人们所关注的对象，但是已经被很多人所意识到的。这些国家相互之间的分歧很大，而且它们不可能组成某个轴心或集团；但是它们当中的某些国家会出于特定目的，比如反对南非的种族主义，解决贸易、援助和发展问题，或者以石油为武器来追求经济和政治目标等，而有效地联合起来。

“弱势国家”的军事实力、有效地实现联合的能力以及采取策略手段对抗大国的意志等，今后都可能得到增强。但即便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一个无法回应“弱势国家”之要求的国际规制，甚至在“强势国家”当中也会失去自己的道义权威，无法导致世界秩序所要求的那种共识之形成。

全球中央集权主义：激进的救世主义模式

另外一个答案是对全球事务进行集中化管理的模式，它不是基于大国之间的合作，而是建立在全人类共同体的共同意志或者共同目标观念的基础之上。这种模式源于正在形成中的“宇宙飞船地球”的思想。全球集权主义的模式同大国一致的模式一样，都产生于西方世界，但后者的主要倡导者是官方人士或“当权者阶层”，而前者的主要倡导者则为激进知识分子或持不同政见的知识分子。

这些激进知识分子钟情于集中化管理的模式，因为这种模式超越了国家体系，但与此同时，他们又承认国家体系在可预见的将来依然会存在下去，因而主张在国家体系继续存在的情况下，最大限度地实现集中化的管理。在这一点上，他们不同于大国一致的倡导者。但是，激进知

识分子所追求的集中化管理模式，不只是体现了大国的共同利益，也体现了全人类的共同利益至高无上的理念——他们承认这种模式尚未成为现实，但是我们要努力使之成为现实。

理查德·福尔克是他们中的一个主要代表人物。让我们来看看福尔克在其著作《这个处于危险境地的星球》中所阐述的论点。福尔克在该书第一章《新的世界秩序体系构想》中，提出了他所期望的体系应该追求的目标。其中不仅包括维持一个最低限度的秩序这个传统的目的，比如最大限度地减少国内和国际暴力行为，而且还包括了有关建立起一个最理想的秩序之全面构想：地球上所有的人相互团结，所有的生物和睦共处；保护环境，包括限制人口的增长、资源的利用以及废弃物的排放；所有社会和人民都有权享受最基本的福利待遇；维护人类的尊严，包括维护个人的信仰自由与人身自由的权利，以及维护群体的集会和保持文化传统的权利，这是至关重要的任务；根据“多样性本身是生活丰富多彩的组成部分”的原则，保持世界在语言、信仰和政治意识形态上的多样性与多元化；所有国家政府和非国家行为体都应该享有普遍的参与权，确保世界各个地区都得到关注，以及避免产生被疏远的情绪。

为了促进这些目标的实现，福尔克主张建立起一个政治结构，其内容包括强化现有的中央制度，比如联合国和国际法院；完善联合国的专门机构以及其他“功能性”组织，并且大大增强它们的作用，以满足环境管理的要求；促使在“主要的世界行为体”中形成非正式的合作格局，这样的行为体包括世界上五个人口最多的国家，以及地区、文化和族群集团的代表；把跨国和多国行为体变成“为建立新的世界秩序体系而进行游说的压力集团”；建立起地区性和次地区性组织，推动国际关
292 系超越民族国家间关系的界限，并且探索一条集中管理世界事务的道路；改变社会内部的观念，培养一种更具有世界眼光的思维方式；次国家的族群与宗教运动应当努力摆脱国家的控制或者在国家内部获得自治地位，从而削弱现存国家的权力。

为了建立起这样一个政治结构，福尔克通过提出“保护生态环境紧急宣言”，主张建立“生存大学”、“维持和平行动者协会”、世界政党，以及呼吁确保文明世界的精英生存下来，以重建世界的“复兴方舟”，

等等，勾画了一个“世界秩序行动主义”纲领或者“促进人类觉醒”纲领。^①

激进的全球集权主义者的主张，同大国一致倡导者的主张一样，有合理的地方，因为他们都认识到，为了维持一个最低限度的世界秩序，在主要大国之间需要有某种合作的框架。另外，与大国一致的模式不同的是，全球集权主义者认识到，仅仅靠大国之间达成共识是不够的，“弱势国家”的激进变革要求也应该得到满足。他们主张，整个国际社会应该达成共识，而不只是在国际社会占据统治地位或主导地位的成员产生共识，我们应该追求比和平与安全更为广泛的目标。

福尔克的主张有一个问题，即他在提出追求更大范围的共识这个目标时，没有阐明什么是第三世界国家的真实要求，而且也没有说明这样的要求在多大程度上可以与其他主要国家集团的利益相调和。相反，他把自己的主张建立在全世界的人都会转而追求他本人所欣赏的那些包罗万象的目标之基础上，事实上，光靠他本人及其同路人的说服和劝告的力量，是无法让全世界的人都转变观念的。

我们已经提到过，目前有关全球中央集权管理的主张几乎完全来自西方国家，而第三世界国家和社会主义大家庭的国家则是国家主权的坚定捍卫者（见第十二章）。三个主要国家集团中的两个相对弱小的国家集团，特别是第三世界国家，根据以下认识来决定自己的立场，即目前在世界实现更大程度上的权力集中，可能不仅不会导致财富、资源和权力发生有利它们自己的再分配，反而会强化现有的财富、资源和权力的分配格局。激进的全球主义者，同所有中央权威的倡导者一样，都认为中央权威体现了他们自己的价值观念。然而，中央权威所体现的或许更可能是当前处于主导地位的大国之价值观念，这些大国本身就可以使得中央权威成为现实。

在这个问题上，印度作家拉兹尼·科塔里对激进的全球集权主义者所做的批评是值得我们注意的，我们将在后面对他的观点做更为详细分析。科塔里写道，他和他的印度同行们“讨厌西方世界那些过着优裕的生活但愤世嫉俗的人士所发出的论调，这些论调从一个大陆传到另外一

^① Falk, *This Endangered Planet*, ch. VII.

个大陆，旨在改变整个世界，这是白人负担论的最新版本。”^①他指出，激进的单一世界主义者同保守主义者一样，属于“借助现代大众传媒、通讯和会议手段来制造神话的人士，他们的目标是捍卫西方世界在政治和思想上的主导地位。”^②

既然当今国际社会中的财富、资源和权力分配不公正的状况今后不会发生变化，那么基于全球共识的中央集权化的全球政治结构是不太可能成为现实的。如果要使这种变革最终成为现实，那么目前的财富、生活资料 and 权力的分配格局就应该发生有利于第三世界国家和人民的变化。

不管怎么说，一个体现了福尔克以及其他激进主义者所信奉的救世主义价值观念的中央集权主义全球结构，似乎不太可能被建立起来。激进主义者声称要努力避免绘制发展蓝图或者提出“静止的乌托邦”计划，但实际上他们正是这么做的。他们提到世界正面临着一个前所未有的危险情势，但是他们告诉我们的只是这么一个事实，即世界政治现实同他们所欣赏的和平与正义目标并不相吻合，而过去和现在的世界政治性质都是一样的。他们指出，我们必须一切从头开始，设计一个新的世界秩序。但实际上，我们是处于一个发展过程之中，而不是处于一个发展过程的起点，根本不可能做到“一切从头开始”。他们提出的有关“促进人类觉醒”的计划是很天真的，好像以前从未被人们所尝试过似的，而且他们提出的有关“宇宙飞船地球”之论点也包含着主观臆断的成分。另外，他们认为，如果不实现根本性变革的话，灾难将降临我们的头上，此种论调是过于悲观的，他们应该知道，根本性变革是不可能发生的。

地区主义：第三世界模式

改革国家体系的另外一个途径是，让介于国家和全球性组织之间的

^① Rajni Kothari, *Footsteps into the Future: Diagnosis of the Present World and a Design for an Alternative* (New Delhi: Orient Longman, 1974), p. 10.

^② Ibid. p. 7.

地区性组织发挥更大的作用。持这种主张的人声称,一方面,地区性组织至少可以发挥全球性组织在维持和平与安全、实现经济公正和环境管理方面所起的某些作用,另一方面,它们不会像全球性组织那样遭到人们的指责,比如,人们批评全球性国际组织可能导致大国主导国家体系,它们注定要失败,因为国家体系作为一个整体难以产生共识,而且全球性国际组织不允许地区独立性和多样性的存在。

约瑟夫·奈在《局部的和平》一书中,把最近出现的有关地区性组织的发展会促使世界秩序更为和平的观点归纳为五种。第一种观点认为,地区性组织可以防止权力集中在两个超级大国的手中,从而避免所谓的“两极体系”的危险(这是人们在谈论欧洲地区主义运动的时候经常表述的一个论点)。第二种观点声称,地区性组织可以把名义上具有主权地位的弱小国家联合起来,抑制外来干涉和冲突的动机(这是恩克鲁玛提出的有关非洲地区主义的论点)。第三种观点主张,地区性组织通过建立起超越国家、限制或削弱国家主权的制度,可以减轻主权国家体系所面临的传统威胁(我们在第十一章中论述“新中世纪主义”兴起的时候,曾经提及这种论点)。第四种观点指出,地区性组织可以把国家纳入一个紧密的经济、社会和文化关系网络之中,阻止本地区内的国家走向战争(这是地区主义者从功能主义者的世界秩序观中所继承下来的论点,它通常被用来解释欧洲经济共同体产生的原因)。第五种观点认为,地区性组织特别有助于控制成员国之间的冲突,这一方面是由于它们可以把本地区同国际冲突隔离开来,另一方面是因为它们在理解本地区冲突的根源和解决冲突的条件时,比与本地区相距较远的全球性组织更有优势(比如人们通常认为,东南亚国家联盟在解决本地区冲突问题上就具有较大的作用)。^①

地区主义作为通往世界秩序的一条道路,并不总是同摆脱或者减轻大国支配的意图联系在一起的。相反,按照地区原则对世界政治加以重新组合,有时被看做是把世界划分为大国的势力范围或者责任范围之企图(见第九章)。然而,1945年以后世界的特点是美国和苏联占据着优势地位,人们普遍认为,两国之间的冲突构成世界和平与安全的主要威胁,而两国之间的合作则是阻碍世界实现政治和经济公正变革的主要因

^① Nye, *Peace in Parts*, ch. 1.

素，地区主义通常有助于限制或抵制超级大国的影响。所以，奈所说五种“地区主义和平论”产生于这么一个时代，这并不是偶然的现象。

让我们看看拉兹尼·科塔里在《迈向未来的脚步》一书中所做的阐述。该书提出了按照地区原则对世界政治加以重新组合的建议，这同第三世界国家所倡导的抵制超级大国主宰世界的主张有着密切的联系。科塔里著作的基本论点是，无论是个人还是国家和民族都需要自主地位。他指出，过度发展和消费观念妨碍富裕国家中的人民获得自主地位，而落后的发展水平、有组织的剥削现象以及“结构性的暴力行为”，则阻碍贫穷国家中的人民获得自主地位，而且“那种导致人类成为地球的累赘、工作成为一种多余的东西以及机器成为最重要的生活资料之人类组织方式”，都阻碍了富国和穷国获得自主地位。^①

科塔里提出在全球范围追求自主地位的政策建议时，他主要关心的是第三世界国家如何获得自主地位这个问题。他认为，原先为殖民地的贫穷国家应该巩固自己的独立地位。他还宣称，一个由自主的民族国家所组成的世界不应该只是被视为一种现实，而应该被看成是一种“理想的现实”。他的目标是未来的国家获得更为真实的自主地位，而今天世界上的国家被划分为超级大国、中等国家和边缘国家。

科塔里不仅反对建立世界政府，而且反对全球权力集中。因此，他批评主张大国一致或者大国领导的“基辛格模式”，也否定美国激进全球主义者的论点。他主张扩散核技术，建立起一个紧密团结的第三世界集团，并向西方国家施加压力（比如1973年阿拉伯国家的石油禁运政策），以便增强第三世界的相对权力和影响。

为了实现一个能够确保第三世界国家和当前生活在大国阴影之下的其他国家享有更大的自主地位的世界秩序形式，科塔里主张建立起一个由20到25个地区联邦组成的体系。决定这些地区联邦范围大小的依据，是地理上的相邻性以及资源和经济上的互补性，它们的规模和权力并不相同，但是会构成一个由世界上相对平等的单位所组成的体系。按照他的这种设想，大国的规模应该被缩减：俄罗斯地区联邦只包括苏联和蒙古；中国地区联邦包括北京政府认为属于中国一部分的西藏和台湾；美国地区联邦只有美利坚合众国一个国家——加拿大同格陵兰一起

^① Kothari, *Footsteps into the Future*, p. xx.

组成一个独立的地区联邦，而墨西哥则属于中美洲地区联邦。南亚属于印度地区联邦，而且科塔里暗示，南亚最终可能同东南亚地区联为一体。南太平洋地区联邦包括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太平洋岛屿国家。其他地区包括北欧、中东欧、欧洲经济共同体、阿拉伯世界、东部非洲、西部非洲、南部非洲、加勒比海地区、南美洲安第斯山区、拉普拉塔河流域以及巴西。

正如我们在前面已经提到过的，科塔里认为中央集权主义权威的建立将会巩固现存的、不公正的政治和经济秩序，这是一个颇具说服力的论点。即便我们认为中央集权主义权威最终应该被建立起来，这么做也需要满足一个前提条件，即世界共同体中的主要成员就建立一个什么样的权威及其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政策达成共识。但是，在权力的分布格局发生有利于第三世界国家的变化之前，这样的共识是不可能形成的。在科塔里看来，只有第三世界国家相互团结起来和动用自身的资源来挑战占据优势地位的权威，这种权力分布格局才可能发生变化。

即便我们可以假定（本书前面提到过，我们不可以这么假定），现在就可以建立起一个体现西方激进主义价值观念的世界权威，这样一个世界权威也不可能促使第三世界国家对现存体系采取合作的态度。第三世界国家之所以疏远西方国家，这并不是由于西方国家缺少高尚的品格，而是因为它们在权力上占据绝对优势地位，正如科塔里所指出的，第三世界国家所期望的不仅仅是财富、资源或生活资料的再分配，还有权力（包括军事权力，迄今为止，第三世界国家基本上被剥夺了这方面的权力）的再分配。

我们可以对科塔里的主张提出三点批评。第一，除非地区性组织的结构是建立在某种全球性框架之内，否则它们是难以维持世界秩序的。这些地区性组织或者科塔里所说的地区“联邦”本身可能就是大国，而且世界秩序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或者说主要依赖于这些大国之间的关系。如果我们要回答地区大国之间的关系如何服务于维持秩序的目标这个问题，那么我们自然就要回过头去看看本书第二部分所阐述的在无政府社会中保障秩序的传统手段。

科塔里不仅提出要在地区层面上建立起世界政治组织，而且提出要在全球层面上建立起世界政治组织。他特别主张把经济和社会理事会变成联合国最重要的机构，创立由各国议会所组成的世界议会组织

(World Parliamentary Assembly), 加强专门机构的作用, 甚至把让一支武装力量交由“世界机构”(“world body”, 他没有指明“世界机构”的具体含义) 统率。^① 这些显然都是乌托邦式的主张; 科塔里并没有告诉我们如何在现存的世界政治力量当中建立起一个全球性的秩序框架。他批评那种把和平与安全建立在大国合作基础之上的“均势”方法, 认为均势是靠不住的和不稳定的, 它使得世界上的大多数人处于依附地位。但是, 他自己所设想的由地区联邦所组成的世界, 将是一个由众多相互冲突的权力中心所组成的世界, 除非创立起一个可以应对这些实际情况的全球性合作框架, 否则维持一个最低限度的世界秩序之目标是不可能实现的。

第二, 科塔里有关地区联邦的某些论述是不能令人满意的。他没有解释世界政治中的哪些因素将导致地区联邦得以产生。他几乎没有论及地区联邦内部的一体化过程, 也没有注意到一个地区在摆脱外部大国影响之后将会遇到的问题, 即较小的国家会为本地区的主导国家所控制。这便是为什么巴基斯坦、尼泊尔和孟加拉国都不会愿意把自己同印度一起放在南亚地区联邦的原因。同样地, 巴布亚—新几内亚、斐济、新西兰和其他较小的太平洋岛国也不会愿意同澳大利亚一起组成一个地区联邦。

在科塔里所描述的许多地区, 较小的国家最害怕的对象是较大的邻国, 而不是外部大国, 外部大国被视为是可以用来阻止较大的邻国在本地区确立主导地位的筹码。从这个角度来看, 印度试图阻止大国插手印度次大陆和印度洋的动机, 与美国通过宣布“门罗主义”、把欧洲大国排挤出美洲的意图是一样的。这是硬币的一面。硬币的另一面是, 印度试图利用自己在本地区所具有的主导地位, 按照自己的方式解决本地区的问题。从理论上说, 如果在科塔里所描述的各个地区中可以产生出很强烈的共同体观念, 从而使得较小国家的居民能够从超越国家间关系的视角来看待本地区事务, 那么难题就迎刃而解了。但科塔里本人并没有论及这个问题。

第三, 科塔里博士一方面试图为整个人类的未来发展指明一条道路, 另一方面又试图为印度和第三世界提供一个政策指南在二者的取向

^① Ibid. p. 141.

上，他的态度有些举棋不定。表面上看，他在书中关注整个人类的未来，并且表达了人类一起解决共同面临的问题之立场。然而，他的许多建议都是涉及印度和其他第三世界国家未来发展道路的，都是针对相对有限的听众的。他写道：“真正需要增强地区凝聚力的并不是整个世界，而是占世界 2/3 多数以及贫穷、分裂的国家。另外 1/3 的国家已经被很好地组合在一起，它们无论在任何时候，无论面临着什么样的权力冲突和历史积怨，都可以在经济和政治上保持团结一致。”^①

有关未来世界秩序的所有主张都要解决一个难题，即确定谁是自己的听众。虽然从表面上看这些主张通常是针对所有人的，但实际上它们一般是指针对特定人群的。人类并不是一个单一的政治实体或者行为体，所以有关人类前途的主张不可避免地是针对具有政治能力的特定人类群体的。从这个角度来看，科塔里选择一个具有某些具体的共同利益和行动能力的国家群体作为自己的听众，这种方法是可取的。然而，这也说明，生活在一个缺少共识以及共识领域可能正在减少的时代里，我们很难提出旨在解决全球性问题的普世性方案。

革命：马克思主义模式

还有一条对国家体系加以改革的道路，就是发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消除国家内部以及国家间的人剥削人现象。马克思和恩格斯显然认为世界革命将最终导致国家和国家体系走向消亡，他们因此主张超越国家体系，而不是对国家体系加以改革（见第十章）。但是，当今的马克思主义者和新马克思主义者，基本上是主张发动被压迫阶级的起义以实现国内的正义目标，发动被压迫民族的起义以实现国家间关系中的正义目标。他们并不主张消灭国家或者民族本身，只是把国家和民族的消亡视为可能在遥远的将来会得以实现的目标。我们不可能在这一节里详尽地论述包含上述主张的整个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然而，为了考察当今有关改革国家体系的主张，我们有必要了解马克思主义者的观点。

马克思主义者的革命主张，并不一定同本书一开始所界定的国际秩

^① Ibid. p. 156.

序相抵触。公正的变革无疑威胁了现存的世界政治和经济结构，从而对秩序或者支撑社会生活基本目标的行为格局构成了威胁。但是，随之而来的是一个新的政治和经济结构的建立和秩序的恢复；革命的目标是以一个支撑新的价值观念体系的秩序，取代一个支撑旧的价值观念体系的秩序，革命的主张只是必然同旧的价值观念相抵触，但并不同秩序本身相抵触。

不仅如此，我们在前面已经提出，当前的国际秩序必须建立在增加国家社会内部的共识这个基础之上，而如果资源和权力的分布格局不发生有利于在世界上占据多数地位（从国家和人口的数量上看）的第三世界贫穷和弱小国家的变革，那么增加国家社会内部的共识目标就将是不可能得以实现的目标。革命的模式可能提供了一条导致资源和权力分布格局发生变革的道路。

然而，马克思主义者的革命模式并没有回答本书所探讨的问题，即如何维持和增强独立政治共同体之间的秩序。它只是提出，我们通过废除资本主义和剥削阶级，便可以确立起秩序。但是，在当今的世界中，不仅存在着资本主义国家，而且还存在着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国家之间所发生的冲突，同其他类型的国家之间所发生的冲突并没有什么两样。无产阶级革命虽然可能具有积极的意义，但是并不会埋葬国家体系，而国家体系中拥有权力和追求自身目标的独立政治共同体相互之间必然发生冲突。当今的世界面临着如何维持国际秩序这个问题，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结果，也可能导致世界同样面临着如何维持国际秩序这样的问题。革命的模式并没有回答如何维持国家间关系中的秩序问题，实际上它忽视了这个问题的。不管革命的模式是否提供一条实现国际社会公正变革的道路，它并没能让我们放弃有关维持秩序的一系列观念，这些观念便是本书所论述的主要内容。

国际社会的前景

我们从上述分析中，可以就国家体系在什么条件下可以继续为世界秩序的维持提供有效的方法这个问题，得出如下几个初步的结论。首先，国家体系只有在该体系中的国际社会要素继续存在下去并得到加强

的情况下，才能有效地确保世界秩序得到维持。这首先取决于保持和扩大有关共同利益和共同价值观念的共识，这种共识是共同规则和制度的基础。

这种共识必须包括大国之间的共同利益观念，这种观念足以使得大国为维持最低限度的世界秩序而进行合作，特别是避免核战争的爆发。然而，大国之间所达成的共识，由于它没有考虑那些在世界上占据多数地位的亚非拉贫穷和弱小国家的要求，所以是不可能具有持久生命力的。

除非世界的财富、资源和其他生活资料的分布格局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否则这些公正变革的要求是不可能得到满足的；我们也应该认识到，“弱势”国家有关公正变革主张的背后，包含着希望权力（包括军事权力）的分布格局也发生根本性变化的要求。我们只有在这种分布格局发生根本性变化之后，而不是在此之前，才可能采取促进全球权力进一步集中的步骤；科塔里博士所提出的加强地区性组织的主张，可能有助于促成这种分布格局的根本性变化。

革命或许是导致某些国家发生公正变革的惟一途径，而且它可能有助于促使弱小国家联合起来和动用自己的政治资源，从而推动国际分布格局的变革进程。然而，革命本身并不能使我们摆脱维持独立国家间的秩序这个传统的问题。

最后，国际社会的前途同其当前所赖以运行的基础、世界性文化的前途是密不可分的。本书第一章曾经提到过，历史上的所有国际社会都是建立在一个共同文化的基础之上。一方面，存在着一个共同知识文化的某些因素——比如共同的语言、共同的哲学观或认识观，共同的文学或艺术传统——这有助于增进国际社会成员国间的沟通。另一方面，存在着共同价值观念的某些因素——比如共同的宗教或共同的道义准则——这有助于强化将我们所讨论的国家通过一种共同责任感团结起来的共同利益观念。

我们在思考这种共同文化在国际社会中所起的作用时，有必要区分两种共同文化。一种是本书第七章所论述的外交文化——国家正式代表所共同具有的理念和价值观。另外一种在国际政治文化，它指的是组成国家体系的社会对国家体系的态度之知识和道德文化。很显然，18世纪和19世纪的欧洲国际社会建立在一个外交文化的基础之上，而国际

政治文化尚未成为当今国际社会的基础。

303 我们或许可以说，在当今国际社会中，至少存在着一个外交文化或者精英文化，存在着构成现代共同知识文化的某些因素：某些共同的语言，主要是英语；某些源于现代世界中、国家普遍奉行的有关经济发展的共同观念，以及它们在现代技术发展过程中所掌握的相同技术。然而，这种共同的知识文化只是存在于精英阶层，它在许多社会中尚无坚实的基础，而且今天所存在的共同的外交文化，并没有得到那种有利于国家体系运行的国际政治文化的支持。不仅如此，即便是在外交层面上，人们也难以确定国家是否遵循着一个共同的道德文化或者一整套共同的价值观念，它有别于共同的知识文化。

国际社会的未来可能取决于一个世界性文化能否得以保持和发展，这种世界性文化不仅包括共同的理念，也包括共同的价值观念，它根植于所有社会及其精英的头脑中，可以使得当今的国际社会具有过去地理范围较小和文化上较为单一的社会所具有的那种观念基础。但这并不是说某个世界性文化将在整个世界占据主导地位和淹没文化间的差异，也不是说这样的事态发展是值得欢迎的。我们也必须承认，今天处于萌芽状态的世界性文化，同这个文化所要支撑的国际社会一样，有利于西方的主流文化。同世界性的国际社会一样，世界文化可能需要更多地吸收非西方的成分，这样它才能具有真正的世界性，并且成为一个世界性的国际社会所赖以生存的基础。

第十四章

结论

作者在本书的开头就提出，写作此书的目的并不是想提出应该如何维持世界政治秩序的“解决方案”，或者探讨我们未来所应该采取的政策。但很显然，本书的观点是很明确的，而且书中似乎包含着一些没有道明的建议，读者或许可以从中体会到这一点。我在这里将简单地阐述本书的思路，并且解释为什么读者不应该把本书看做是一本提出一整套主张或者建议的著作。

本书含蓄地维护国家体系，特别是维护国家体系中的那个被称为国际社会的要素。本书的第一部分论述了国际社会的思想，并由此分析世界政治秩序的含义、世界政治秩序的产生以及维持世界政治秩序的方式。本书的第二部分从国家社会的传统规则与制度保持着持续的生命力这个角度，来解释当代国家体系中的秩序是如何得以维持的这个问题。本书第三部分的基本观点是，虽然从理论上说存在着各种各样的替代国家体系的方案，但是只要国家体系中的国际社会要素能够继续存在下去并且得到加强，那么我们就没有充分的证据表明国家体系会走向消亡，或者说国家体系无助于实现人类的基本目标。今天的国际社会正处于衰落过程之中，但世界政治秩序的维持将有助于阻止这个衰落过程，而不会加速这个过程。

然而，我们如果因此赞赏现存的国家社会及其规则和制度，那么则会忽视本书始终强调的其他一些论点。首先，本书认为，国际社会只是世界政治中的一个要素，在世界政治舞台中，除了这个社会要素之外，还有战争或冲突的要素，以及人类共同体的要素，我们必须把国际社会的要素同其他另外两个因素结合起来，来考察人们所说的国际社会的规则和制度的作用。

第二，本书坚持认为，世界秩序或者全人类大

社会的秩序，不仅比国际秩序或者国家间的秩序范围更大，而且前者比后者更为重要、更为基本，在道义上具有优先的地位。人们一直是结合世界秩序的目标来评价国家体系的。本书第三部分的结论是，有关国家体系正在走向消亡或者无助于实现世界秩序目标的论点，是不能令人信服的。但是我们需要不断审视这个结论。

第三，本书指出，世界政治秩序同正义的目标——国际正义、人类正义和世界正义——是相冲突的，虽然人们通常认为秩序应该优先于正义，但是我们不能因此认为秩序的目标在任何时候都应该优先于正义的目标。本书认为，有关世界政治秩序的研究，比如本书作者所做的这项研究，应该为有关正义问题的研究所补充。本书对人类目标所做的考察是不完整的，在此基础上提出建议是不可取的。

努力寻求可以称为“解决方案”或者“具体建议”的结论的做法，是当今世界政治研究中的一个不诚实的因素。当今的世界政治研究应该是一种智力活动，而不是一种实践活动。提出这些结论原因更多的是因为对这些结论存在着需求，满足这一需求是有利可图的，而不是说这些结论存在着任何坚实的基础。事实上，尽管人们很想知道世界政治的未来走向以及了解自己应该采取什么行动，我们也只能在黑暗中进行摸索。承认自己处于黑暗之中，总比假装自己能够看到光明要好。

索引

(按汉语拼音排序。页码为原书页码, 即本书边码)

- 阿克顿勋爵 (Acton, Lord) 106
- 阿奎那, 托马斯 (Aquinas, St Thomas), 托马斯主义传统 (Thomist tradition) 29
- 阿隆, 雷蒙 (Aron, Raymond) viii, 10, 190, 238, 268
- 埃文斯 - 普里查德 (Evans - Pritchard, E. E.) 61
- 安西隆 (Ancillon, J. P. F.) 12, 32
- 奥本海 (Oppenheim, L.) 104, 139
- 奥古斯丁 (Augustine of Hippo, St) 4
- 奥斯汀, 约翰 (Austin, John) 124, 125
- 奥特, 马尔文 (Ott, Marvin C.) 284
- 巴格瓦蒂 (Bhagwati) 319
- 巴黎条约 (1856) (Paris, Treaty of, 1856) 14, 32
- 巴特菲尔德, 赫伯特 (Butterfield, Herbert) 312
- 巴特勒爵士, 杰弗里 (Butler, Sir Geoffrey) 161
- 鲍尔, 乔治 (Ball, George) 261
- 北大西洋公约组织 (NATO, North Atlantic Treaty Organization) 167, 170, 208, 217 - 218, 219, 270
- 边沁, 杰里米 (Bentham, Jeremy) 34, 130
- 宾刻舒克, 科内利斯·冯 (Bynkershoek, Cornelis van) 32, 34
- 伯恩斯 (Burns, A. L.) 232, 309
- 伯克, 埃德蒙 (Burke, Edmund) 32, 99, 100, 103
- 勃列日涅夫主义 (Brezhnev Doctrine) 209, 210
- 博尔丁, 肯尼思 (Boulding, Kenneth) 84
- 博福里, 安德列 (Beaufre, André) 118
- 布丹, 让 (Bodin, Jean) 30
- 布莱克, 西里尔 (Black, Cyril E.) 272
- 布莱克, 尤金 (Black, Eugene R.) 315
- 布赖尔利 (Brierly, J. L.) 142
- 布朗利, 伊恩 (Brownlie, Ian) 148
- 布热津斯基 (Brzezinski, Z.) 263
- 超级大国 (super powers), 见大国 (see great powers)

成吉思汗 (Chingis Khan) 41 - 42

大国 (great powers)

大国的定义 (description of) 3, 36, 48, 194 - 197

大国一致 (concert of) 36, 218 - 220, 286 - 289

决定国际关系的结构 (as structuring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200

权利与义务 (rights and duties of) 196, 222

通过大国避免和限制战争 (avoidance and limitation of war by) 206 - 207

同邻国的支配和被支配关系 (relations of dominance with neighboring states)
207 - 212

与国际秩序的维持 (and promotion of international order) 200 - 201, 220 - 221,
287 - 289

与核武器 (and nuclear weapons) 197

与均势 (and balance of power) 108 - 112, 201

与势力范围 (and spheres of influence) 212 - 218, 252

与正义 (and justice) 89, 220 - 222

与中等强国的关系 (relations with middle powers) 222

作为超级大国 (as super powers) 196 - 197

德国 (Germany)

遏制德国 (containment of) 219

与违背国际法的行为 (and violations of international law) 132 - 133

战后的分裂 (postwar division of) 215

作为一个中等强国 (as a middle power) 222

作为一个主导国家 (as a dominant power) 16, 99

迪金森, 戈兹沃西·洛斯 (Dickinson, Goldsworthy Lowes) 44

第三世界, 亚非国家 (Third World, Afro - Asian states)

第三世界国家认为正义优先于秩序 (priority of justice over order amongst) 74, 85

对大国的抨击 (criticism of great powers) 220

对第三世界的经济援助 (economic aid to) 84, 290, 301

对国际法的挑战 (challenges to international law) 133, 149

其要求 (demands of) 289 - 290, 292 - 293, 297, 303 - 304

与地区主义主张 (and regionalist proposals) 295 - 299

与国际法 (and international law) 133, 149

与国际恐怖主义 (and international terrorism) 259

与经济公正 (and economic justice) 281, 296 - 297, 303 - 304

与马克思主义观点 (and Marxist views) 300

- 作为国家主权的捍卫者 (as upholding state sovereignty) 281, 292 - 293
- 东南亚国家联盟 (Association of South East Asian Nations, ASEAN) 295
- 多伊奇, 卡尔 (Deutsch, Karl) 273
- 恩克鲁玛, 克瓦米 (Nkrumah, Kwame) 294
- 恩格斯, 弗里德里希 (Engels, Friedrich) 236, 299
- 法国 (France)
- 革命的理想 (revolutionary ideals of) 235
 - 与核武器 (and nuclear weapons) 234
 - 作为欧洲的主导国家 (as dominant European power) 16, 97, 100, 102, 162
 - 作为一个中等强国 (as a middle power) 222
- 法泰尔, 埃默里奇 (Vattel, Emmerich de) 32 - 37, 44, 97, 99, 104, 310
- 菲利莫尔, 托马斯 (Phillimore, Robert) 36
- 芬伦 (Fénelon, F.) 106
- 冯·贾斯蒂 (Von Justi, J. H.)
- 冯·劳厄 (Von Laue, I. H.)
- 弗里德曼, 沃尔夫冈 (Friedmann, Wolfgang) 141
- 福尔克, 理查德 (Falk, Richard A.) xiii, 142 - 143, 144, 154, 266, 272, 282, 284
- 福克斯 (Fox, W. T. R.) 196
- 福特斯, 迈耶 (Fortes, Meyer) 61
- 格劳秀斯, 雨果 (Grotius, Hugo) 27 - 30, 34, 37, 43, 104, 191, 231, 266, 310
- 格劳秀斯主义者, 国际主义者, 社会连带主义者 (Grotian, internationalist, solidarist)
- 关于国际关系的论点 (view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viii, 23, 25 - 26, 37 - 38, 148 - 149, 230 - 232, 236, 310
- 根茨, 弗里德里希·冯 (Gentz, Friedrich von) 12, 32, 100, 103
- 古巴 (Cuba)
- 1962 年的危机 (missile crisis in 1962) 202 - 205, 214, 216, 218
 - 同苏联以及美国的关系 (relations with Soviet Union, U. S.) 210
- 国际法 (international law) ix, xii, 49, 64
- 东欧国家在国际法中的地位 (eastern European states in) 210
 - 公认的国际法准则 (accepted principles of) 66, 67, 133 - 134
 - 国际法的强制执行 (enforcement of) 126 - 128, 181, 182
 - 国际法的渊源 (sources of) 141 - 145, 151 - 154
 - 国际法的主体 (subjects of) 139 - 140, 146 - 147
 - 国际法学家 (international lawyers) 144, 152

- 扩展到经济和技术领域 (expansion into economic and technical fields) 140 - 141, 147
- 其定义 (definitions of) 122 - 130, 154 - 155
- 世纪的国际法思想 (and 20th - century concepts of) 37 - 38, 139 - 145
- 所面临的挑战 (challenges to) 249
- 违背国际法的行为 (violations of) 132 - 133
- 与 16 到 18 世纪的理论家 (and 16th - 18th - century theorists) 28 - 30
- 与 18 到 19 世纪的理论家 (and 18th - 19th - century theorists) 31 - 32, 34 - 35
- 与均势 (and the balance of power) 104, 138 - 139
- 与联合国 (and the U. N.) 143
- 与人权 (and human rights) 79 - 80, 146 - 147
- 与外交制度 (and diplomatic institutions) 150
- 与正义 (and justice) 88 - 89, 139
- 与秩序 (and order) 131 - 132, 134 - 139, 145, 147 - 150, 154 - 155
- 国际法院 (International Court of Justice) 37, 141 - 142, 143, 291
- 国际关系中的跨国因素 (transnational factor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xi, xii, 36, 39, 49
- 国际关系中的理念与价值观 (ideas and value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x, xii, xvii, 6, 21, 93, 252, 304 - 305
- 国际关系中的意识形态 (ideology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109, 188, 235 - 240
- 国际关系中的秩序 (order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 马克思主义秩序观 (Marxist views on) 300, 302 - 303
- 其定义 (definition of) xv, 8, 16 - 19, 21
- 世界秩序 (world order) 21, 22
- 同国家体系相容 (compatibility with states system) 273 - 277
- 同原始社会中的秩序相比较 (compared with that in stateless societies) 59 - 62
- 相关规则 (rules making for) viii, 64 - 69, 204 - 205
- 以国家体系的替代形式来维持国际关系秩序 (alternatives to states system in preservation of) 225 - 247, 274 - 275
- 与裁军的世界 (and a disarmed world) 229
- 与大国 (and great powers) 199 - 201, 207, 212, 218, 220 - 221
- 与地区性组织 (and regional organizations) 255 - 257, 294 - 299
- 与国际法 (and international law) 131, 134 - 138
- 与国内暴力 (and civil violence) 190 - 191, 192 - 193, 258
- 与核扩散 (and nuclear proliferation) 234 - 235

- 与世界的技术融合 (and technological unification of world) 264
- 与世界政府 (and world government) 244 - 245
- 与外交 (and diplomacy) 163 - 177
- 与危机管理 (and crisis management) 202 - 205
- 与战争和暴力 (and war and violence) 181 - 183, 192, 206, 237 - 238
- 与正义 (and justice) 83 - 94, 245, 300, 308
- 作为一种价值 (as a value) xvi, 4, 21, 93 - 94, 201
- 国际联盟 (League of Nations) vii - viii, 49, 138, 290
 - 大国的承认 (recognition of great powers) 196
 - 国际联盟的裁军建议 (disarmament proposals in) 227
 - 国际联盟盟约 (Covenant of) 38, 66, 182, 231
 - 其反对意大利和苏联的行动 (actions against Italy and Soviet Union) 231
 - 社会连带主义思想的体现 (expression of solidarist views) 237
- 国际社会, 国家社会 (international society, society of states) vii, viii, ix, xii
 - 到 19 世纪的欧洲国际社会 (European international society in 18th - 19th centuries)
 - 32, 36 - 37, 101, 110 - 111, 218, 219, 304
 - 到 19 世纪的相关理论 (18th - 19th - century theories of) 31 - 36
 - 非社会关系的例子 (examples of non - societal relations) 41 - 43
 - 规则的缺少 (absence of rule in) 44 - 49
 - 国际社会中的意识形态 (ideology in) 235 - 240
 - 国际社会中的制度 (institutions in) 71 - 73
 - 其定义 (description of) 13 - 15, 225
 - 其规则 (rules in) 13, 28 - 29, 33 - 35, 37 - 38, 64, 65, 70 - 73, 112, 142
 - 其基本目标 (primary goals of) 8, 16
 - 其局限性 (limitations of) 49 - 50
 - 其衰落 (weakening of) 248 - 250
 - 其现实 (reality of) 23, 38 - 44
 - 强化国际社会的必要性 (need for strengthening) 303 - 305, 307
 - 世纪的相关理论 (20th - century theories of) 36 - 40
 - 同原始社会相比较 (comparison with stateless societies) 59 - 61
 - 文化和道义基础 (cultural and moral bases of) 13, 15, 32 - 33, 37, 61, 81, 110, 176, 305
 - 相关的思想传统 (traditions of thought about) 23 - 26
 - 与大国 (and great powers) 196 - 199, 201 - 202, 221
 - 与非国家暴力 (and non - state violence) 259

- 与国际法 (and international law) 137
- 与外交 (and diplomacy) 160, 166, 304 - 305
- 与自然法理论家 (and natural law theorists) 27, 28 - 31
- 与战争 (and war) 181 - 182, 192 - 193
- 国际体系, 国家体系 (international system, system of states) VIII, X, XII
 - 当前的状况 (current situation in) 248, 272
 - 对秩序的维持所做的贡献 (contribution to order) 276
 - 其定义 (description of) 9 - 13, 225, 252
 - 其未来 (future of) 226, 240 - 241, 252, 265 - 266, 284 - 285
 - 其中的地区性组织 (regional organization in) 294
 - 其中的反常现象 (anomalies in) 264 - 265
 - 其中的均势 (balance of power in) 101 - 102
 - 其中的意识形态 (ideology in) 236 - 240
 - 其中的战争 (war in) 181, 190, 273 - 275
 - 受到的批评 (criticisms of) 272 - 273
 - 相关的例子 (examples of) 43 - 45
 - 与经济和社会公正 (and economic and social justice) 278 - 282
 - 与生态环境的控制 (and ecological control) 284, 291
 - 与世界政治体系 (and world political system) 266 - 271
 - 走向集权化, “全球中央集权化” (centralization of, in “global centralization”) 290 - 294
- 国际主义者的国际关系观, 见格劳秀斯的国际关系观 (internationalist view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see Grotian view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 不干涉原则 (principle of non - intervention) 243
- 国际关系中的干涉行为 (intervention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 同意禁止干涉 (acceptance of prohibition of) 67
- 与大国 (and great powers) 211 - 213
- 国际组织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XVI - XVII
 - 地区性组织 (regional organizations) III, 255, 294 - 299
 - 世界政治体系中的国际组织 (in world political system) 266 - 271
 - 世界政治组合, 世界政府 (universal political organization, world government) 244 - 245, 252 - 254, 274 - 275
 - 外交谈判中的国际组织 (in diplomatic negotiations) 157 - 158
 - 与武力的使用 (and use of armed force by) 149, 226, 251
 - 重叠的组织 (overlapping organizations) 245 - 246

作为国际法的主体 (as subjects of international law) 140 - 141

国家 (states)

被整合到更大的单位之中 (and integration into larger units) 255 - 256

不存在着凌驾于国家之上的政府 (absence of government over) 44 - 49

从属于世界政府 (subordination to world government) 252

地区性国家集团 (regional groupings of) 294 - 295

国家的废除 (abolition of) 24 - 25

国家的自主地位 (autonomy of) 295 - 296

国家间的合作 (co-operation between) VIII, IX, 16 - 19, 25 - 26, 67

国家可能存在于全球性国家体系产生之前 (possibility of existence without global system of) 242 - 242, 251

国家内部的规则 (rules within states) 55 - 57

结构功能主义理论无法对国家加以解释 (inapplicability of structural - functional explanation to) 71 - 73

其定义 (description of) 8 - 10

其发展 (development of) 28, 32 - 33

其解体 (disintegration of) 256 - 257

其利益 (interests of) 63 - 64

其内部暴力 (violence within) 190 - 193, 258 - 260

同其他政治共同体的区别 (contrasted with other political communities) 9

与经济公正 (and economic justice) 86, 281 - 282

与均势 (and balance of power) 100 - 101, 106 - 107

与跨国组织 (and transnational organization) 261 - 263

与全球技术融合 (and technological global unification) 263 - 264

与人权 (and human rights) 86

与生态威胁 (and ecological threats) 283 - 284, 293 - 294

与外交 (and diplomacy) 156 - 157

只限于国家所从事的战争 (war restricted to) 178 - 179, 258

主导国家 (dominant states) 10 - 11, 16

作为国际法的主体 (as subjects of international law) 124, 140, 146

作为国际社会中的单位 (as units of international society) 65 - 71

作为国家政策工具的战争 (war as instrument of policy of) 180 - 184, 189

作为民族国家 (as nation states) 78, 256

国内层次与全球层次上的社会 (society, within states and global)

其规则 (rules of) 6 - 7, 52 - 54, 61 - 62

- 其基本目标 (primary goals of) 4 - 6, 19, 51 - 52, 278
- 其技术融合 (technological unification of) 263 - 264
- 其价值观 (values of) 6, 7, 64, 81, 278
- 其利益 (interests of) 63 - 64
- 全球共同体的形成 (development of global community) 22, 290 - 293
- 社会中的经济与社会公正 (economic and social justice in) 278 - 280
- 社会中的政府 (government in) 55 - 57
- 社会中的自然状态 (state of nature in) 44 - 46
- 原始社会 (stateless societies) 57 - 60
- 哈丁, 加瑞特 (Hardin, Garrett) 319
- 哈特 (Hart, H. L. A.) XIII, 127 - 130, 309
- 和平与安全 (peace and security)
- “安全共同体”之间的和平与安全 (between “security communities” 273 - 274
- 霍布斯主义者眼中的和平与安全 (in Hobbesian view) 23
- 与国际法 (and international law) 137
- 与核威慑 (and nuclear deterrence) 119, 121
- 作为一个基本的目标 (as a primary goal) 17 - 18, 102
- 核不扩散条约 (1968) (Nuclear Non - Proliferation Treaty, 1968) 219, 234
- 核威慑 (nuclear deterrence) 108, 112 - 121, 185 - 186, 190, 232 - 234
- 核武器 (nuclear weapons)
- 促进“危机处理” (encouraging “crisis management”) 202, 204
- 对国际社会的影响 (effect on international society) 48
- 对人类的威胁 (threat to humanity) 81, 273, 277, 301
- 对战争的影响 (effect on war) 183
- 废除核武器 (abolition of) 229
- 核扩散 (spread of) 115, 232 - 235
- 加大对战争的限制 (encouraging limitation of wars) 206, 219, 277
- 与大国 (and great powers) 195 - 197, 202
- 与均势 (and balance of power) 119 - 121
- 黑格尔 (Hegel, G. W. F.) 24, 238
- 亨廷顿, 塞缪尔 (Huntington, Samuel P.) 260, 262
- 华沙条约 (Warsaw Pact) 209, 211, 217 - 218, 219
- 华盛顿, 乔治 (Washington, George) 242
- 怀特, 马丁 (Wight, Martin) XIII, 10 - 11, 33, 145, 309
- 霍布森 (Hobson, J. A.) 237

- 霍布斯, 托马斯 (Hobbs, Thomas) 3, 26, 44 - 47, 124, 127
- 霍布斯主义者, 现实主义者, 马基雅维利主义者 (Hobbesian, realist, Machiavel-
lian)
- 关于国际关系的论点 (view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vii, xi, 135, 253
- 霍布斯主义者的定义 (description of) 23 - 24
- 世纪的霍布斯主义者 (in 20th century) 36, 39, 40, 44 - 46, 241
- 与全面核扩散 (and universal possession of nuclear weapons) 233
- 霍尔伯拉德, 卡斯滕 (Holbraad, Carsten) 204, 316
- 基督教国际社会 (Christian international society) 26 - 27, 31, 32, 42
- 基欧汉, 罗伯特 (Keohane, Robert) 267, 268, 269
- 基辛格, 亨利: 国际关系“基辛格模式” (Kissinger, Henry “Kissinger model” of in-
ternational relations) 286, 296
- 吉尔克, 奥托 (Gierke, Otto) 26
- 吉尔平, 罗伯特 (Gilpin, Robert) 262
- 加尔通, 约翰 (Galtung, Johan) 167
- 教皇, 教皇国 (Pope, Papacy) 9, 16, 26, 30, 42, 268, 276
- 杰塞普, 菲利普 (Jessup, Philip) 140
- 金泰利, 艾伯里克 (Gentili, Alberico) 27, 29, 30, 35
- 军备控制 (arms control)
- 军备控制协定 (agreements on) 206
- 另见裁军 (*see also* disarmament)
- 世界对军备控制的关注 (interest of world in) 81, 82
- 与核武器 (and nuclear weapons) 277, 301
- 与全面裁军 (and general disarmament) 226 - 227
- 均势 (balance of power) vii, ix, 49
- 当今的均势 (contemporary existence of) 250, 254
- 对均势的批评 (criticism of) 18, 102 - 107
- 简单均势和复杂均势 (simple and complex balances) 97 - 98
- 均势的定义 (description of) 97 - 102
- 均势概念的发展 (development of concept) 31, 35 - 36, 165
- 与大国 (and the great powers) 108 - 112, 201, 287
- 与国际法 (and international law) 104, 138 - 139
- 与相互核威慑 (and mutual nuclear deterrence) 116 - 118, 254
- 与战争 (and war) 104 - 105, 181, 182 - 183, 192
- 与正义 (and justice) 87 - 88

- 总体均势和局部均势 (general and local balances) 98
- 卡恩, 赫尔曼 (Kahn, Herman) 244
- 卡里尔雷斯, 弗朗索瓦 (Callières, Francois de) 35, 162 - 163, 165, 168, 175
- 卡普兰, 莫顿 (Kaplan, Morton A.) 11, 116, 232 - 233, 234, 309
- 凯尔森, 汉斯 (Kelsen, Hans) 124 - 127
- 凯洛格 - 白里安 (巴黎) 公约 (1928) [Kellog - Briand (Paris) Pact] (1928) 38, 182, 231
- 康德, 伊曼纽尔 (Kant, Immanuel) 106, 238, 244, 253, 310
- 康德的国际政治观 (Kantian view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vii
- 其定义 (description of) 23 - 25, 235
- 与国际法 (and international law) 146 - 147
- 与正义 (and justice) 81 - 87, 90
- 在 20 世纪的影响 (in 20th - century) 36, 39 - 40
- 科贝特, 帕西 (Corbett, Percy) 140
- 科布登, 理查德 (Cobden, Richard) 105, 237, 242 - 243
- 科塔里, 拉兹尼 (Kothari, Rajni) 293, 295 - 299, 304
- 克劳塞维茨, 卡尔·冯 (Clausewitz, Carl von) 48, 180
- 孔德, 奥古斯特 (Comte, Auguste) 237
- 寇松勋爵 (Curzon, Lord) 212, 214, 217
- 跨国法 (transnational law) 260 - 263, 267 - 271
- 兰克, 利奥波德·冯 (Ranke, Leopold von) 36, 195, 200, 316
- 劳特派特, 赫希 (Lauterpacht, Hersch) 142
- 冷战 (Cold War) viii, xi, 97
- 尽管冷战, 国际社会依然存在 (continuance of international society despite) 41, 171
- 冷战时期的跨国联系 (transnational links despite) 268
- 冷战时期的外交 (diplomacy during) 171 - 172, 198, 250
- 李普曼, 沃尔特 (Lippmann, Walter) 215 - 216
- 李维诺夫, 马克西姆 (Litvinov, Maxim) 227 - 228, 317
- 理想主义国际关系观 (idealist view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见康德主义国际关系观 (see Kantian view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 联合国 (United Nations) viii - ix, 37, 49
- 大国的再思考 (recognition of great powers) 196
- 加强、过渡到世界政府的可能性 (possibilities of strengthening, of transforming to world government) 230, 244, 291

- 联合国大会 (General Assembly of) 142 - 143
- 体现社会连带主义者的观点 (expressing solidarist views) 237
- 宪章 (Charter of) 18, 38, 74, 80, 85, 89, 148 - 149, 188, 220, 231
- 象征性作用 (symbolic functions of) 176, 250
- 有关核武器扩散 (and spread of nuclear weapons) 233
- 有关生存 (and survival of) 250, 251
- 有关外交 159
- 与反殖民主义 (and anti-colonialism 301)
- 与国际法 (and international law) 143
- 与国际恐怖主义 (and international terrorism) 259
- 与加强国际意志或法律 (and enforcement of international will or law) 231, 258
- 作为国际关系中的行为体 (as actor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16, 157
- 列宁 (Lenin, V. I.) 237
- 林德利 (Lindley, M. F.) 212
- 卢梭, 让-雅克 (Rousseau, Jean-Jacques) 12, 100, 242, 251
- 鲁奇, 马里 (Ruge, Mari) 167
- 罗汉, 亨利 Rohan, Henri, duc de) 31, 163
- 罗林 (Röling, B. V. A.) 141, 145, 183
- 罗斯福, 富兰克林 (Roosevelt, Franklin D.) 105
- 罗素, 贝特兰 (Russell, Betrand) 157
- 洛克, 约翰 (Locke, John) 46
- 洛里默, 詹姆斯 (Lorimer, James) 36
- 洛桑协定 (1923) (Lausanne, Treaty of, 1923) 14
- 马基雅维利, 尼可洛 (Machiavelli, Niccolo) 24, 26
- 马克思, 卡尔 (Marx, Karl) 77, 236, 278, 299
- 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观 (Marxist views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53, 236, 299 - 303
- 马斯特斯, 罗杰 (Masters, Roger) 59, 311
- 马志尼, 圭瑟普 (Mazzini, Guiseppe) 236
- 马兹瑞, 阿里 (Mazrui, Ali) 74, 83, 85, 88, 94
- 麦科比, 西蒙 (Maccoby, Simon) 161
- 麦克杜格尔, 迈尔斯 (McDougal, Myres S.) 122, 154
- 麦克卢汉, 马歇尔 (McLuhan, Marshall) 263
- 麦克纳马拉, 罗伯特 (McNamara, Robert) 115, 118
- 梅特兰 (Maitland, F. W.) 57
- 梅因爵士, 亨利 (Maine, Sir Henry) 57, 61

美国 (United States)

- 避免危机 (avoidance of crises 203 - 205, 237
- 裁军计划 (and disarmament proposals) 226
- 对外交体系的评论 (and criticisms of diplomatic system) 168, 1962
- 含蓄地接受苏维埃的势力范围 (implicit acceptance Soviet sphere of influence) 216 - 218
- 1962 年古巴导弹危机 [and Cuban missile crisis (1962)] 187, 202 - 205, 216, 218
- 与大国一致 (and concert of powers) 286
- 与国际法 (and international law) 133, 140
- 与国际关系中的意识形态 (and ideology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239
- 与核威慑 (and nuclear deterrence) 113 - 119, 184 - 187, 286
- 与权力均衡 (and balance of power) 97 - 98, 106
- 与苏联的合作 (and co-operation with Soviet Union) vii, 41, 219
- 在北约中的主导作用 (primacy in NATO) 208
- 在中美洲的霸权 (hegemony in Central America) 207, 210 - 212
- 主体文化 (dominant culture) 271
- 作为一个超级大国 (as a super power) 196 - 197, 295
- 作为一个大国 (as a great power 97, 108 - 110, 194 - 198, 286
- 美洲国家组织 (O. A. S., Organization of American States) 210 - 211, 255
- 摩根索, 汉斯 (Morgenthau, Hans) vii
- 莫厄特 (Mowat, R. B.) 176
- 穆勒, 约翰·斯图亚特 (Mill, John Stuart) 243
- 内特尔布拉德 (Nettelbladt) 12
- 奈, 约瑟夫 (Nye, Joseph) 267, 268, 269, 294
- 尼科尔森, 哈罗德 (Nicolson, Harold) 156, 166, 169, 175
- 纽伦堡和东京战争罪行法庭 (Nuremberg and Tokyo War Crimes Tribunals) 37, 80, 140, 146
- 纽姆林, 拉格纳尔 (Numelin, Ragnar) 158, 160
- 欧洲经济共同体 (European Economic Community)
 - 对秩序的维持所做的贡献 (and contribution to order) 295
 - 作为一个潜在的大国 (as a potential great power) 287
 - 作为一个地区性组织 (as a regional organization) 170, 255 - 256, 267, 271
- 潘恩, 托马斯 (Paine, Thomas) 237
- 培根, 弗朗西斯 (Bacon, Francis) 26
- 普芬道夫, 塞缪尔 (Pufendorf, Samuel) 12, 27

- 丘吉尔, 温斯顿 (Churchill, Winston) 215, 251
- 人权 (human rights)
- 与国际法 (and international law) 146 - 147
 - 与国际正义 (and international justice) 85 - 86
 - 与国家政治 (and politics of states) 86 - 87
 - 与义务 (and duties) 79 - 81
- 日本 (Japan) 13, 37
- 作为一个潜在的大国 (as a potential great power) 98, 108 - 110, 195, 197, 222, 287
- 萨道义爵士, 欧内斯特 (Satow, Sir Ernest) 156 - 157, 168
- 塞尔万 - 施勒伯 (Servan - Schreiber, J. - J.) 261
- 社会连带主义国际关系观 (solidarist view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 见格劳秀斯主义国际关系观 (see Grotian view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 神圣罗马帝国及其皇帝 (Holy Roman Empire, Emperor) 9, 16, 26, 30, 159, 245, 268, 276
- 生态和环境问题 (ecological, environmental problems)
- 国际法中生态和环境问题 (in international law) 140
 - 世界对此问题的关注 (interest of world in) 81, 82
 - 是否在国家体系中无法获得解决 (whether insoluble in states system) 273, 282 - 284
 - 外交中生态和环境问题 (in diplomacy) 170
 - 为世界政府所控制的可能性 (possibilities of control by world government) 245, 291 - 292
- 国际关系中的经济因素 (economic factor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X, Xi
- 地区性经济组织 (regional economic associations) 251, 255
 - 经济援助和正义 (economic aid and justice) 84, 86 - 87, 278 - 282
 - 与“跨国社会” (and “transnational society”) 268 - 269
 - 与国际法 (and international law) 140
 - 与均势 (and balance of power) 108 - 109
 - 与跨国公司 (and 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s) 261 - 263
 - 与跨国组织, 取代外交 (and transnational organizations, as replacement for diplomacy) 167 - 168, 170
 - 与战争 (and war) 188 - 189
 - 与最低限度的政治控制 (existence with minimal political control) 242
- 施瓦曾伯格, 乔治 (Schwarzenberger, Georg) 209

世界人权宣言 (Universal Declaration of Human Rights) 37, 80, 140

世界政府 (world government) 244 - 245, 252 - 254, 275, 280 - 281

另见国际组织, 联合国 (*see also*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United Nations)

世界政治体系 (world political system)

国家社会与世界政治体系的关系 (relation of society of states to) 308

历史上的世界政治体系比较 (historical comparisons of) 268 - 269

其定义 (description of) 19 - 21, 266 - 267

世界政治体系中的非国家集团 (non - state groups in) 267 - 269

世界政治体系中的沟通 (communication in) 269 - 270

世界政治体系中的相互依存 (interdependence in) 270

世界政治体系中的正义 (justice in) 278

世界政治体系中的秩序 (order in) 22, 308

与国家体系的区别 (differentiation from system of states) 20 - 21

与世界社会 (and world society) 269 - 270, 290

势力范围 (spheres of influence)

本尼迪克特·斯宾诺莎 (Spinoza, Benedict de) 47

对势力范围的默认 (implicit recognition of) 17, 213 - 217

防止势力范围内的争端 (prevention of disputes within) 199

有关势力范围协定的历史 (history of agreements on) 212 - 213

与“责任范围” (and “spheres of responsibility”) 215 - 216

主导、领导和霸权范围的划分 (division into dominance, primacy and hegemony)
207 - 212

斯特雷奇, 约翰 (Strachey, John) 219, 244

斯通, 朱利叶斯 (Stone, Julius) 86, 87

苏联 (Soviet Union)

处于均势中的苏联 (in balance of power) 98 - 99, 106, 112

入侵芬兰 (invasion of Finland) 138, 231

外交与大国一致的批评者 (critic of diplomacy, concert of powers) 169, 286

与裁军建议 (and disarmament proposals) 226 - 227

与东欧的关系 (relations with eastern Europe) 199 - 200, 209 - 212, 216

与国际法 (and international law) 133

与国际危机的避免 (and avoidance of international crises) 203 - 205, 277

与美国达成有关势力范围的心照不宣的协议 (implicit agreement with U. S. on
spheres of influence) 216 - 218

与美国的合作 (co - operation with U. S.) Ⅲ, 41, 219

- 与意识形态 (and ideology) 238 - 239
- 作为一个超级大国 (as a super power) 196 - 197, 295
- 作为一个大国 (as a great power) 97, 108 - 110, 195 - 198
- 苏亚雷斯, 弗朗西斯科 (Suarez, Francisco) 27, 28, 30, 34
- 汤因比, 阿诺德 (Toynbee, Arnold) 100
- 土耳其, 奥斯曼帝国 (Turkey, Ottoman empire) 13 - 14, 28, 32, 37, 205
- 外交 (diplomacy)
 - 冷战对外交的影响 (effect of Cold War on) 250
 - 其性质的变化 (changing nature of) 166 - 172, 250
 - 外交的定义 (description of) 156 - 163, 304
 - 外交的发展 (development of) 30, 35
 - 为技术管理所取代 (replacement by technical management) 170 - 171
 - 与国际社会 (and international society) 160, 169 - 170, 176 - 177
 - 与民主政府 (and democratic governments) 169
 - 与情报收集 (and information gathering) 164 - 165, 174
 - 与谈判 (and negotiations) 164, 173 - 174
- 外交官的作用 (role of diplomatists) 162 - 163, 165 - 168, 172 - 177
- 外交在 20 世纪的衰落 (20th - century denigration of) vii, 38
- 象征作用 (symbolic function of) 166, 176 - 177
- 威尔逊, 伍德罗 (Wilson, Woodrow) vii, 38, 236, 237
- 威斯特伐利亚和约 (1648) (Westphalia, Peace of, 1648) 17, 31, 39, 266
- 韦斯特莱克, 约翰 (Westlake, John) 33
- 维多利亚, 弗朗西斯科 (Victoria, Francisco de) 27, 28, 42
- 维也纳会议 (1815) (Vienna, Congress, 1815) 17, 35, 36, 160
- 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 (1961) (Vienna Convention on Diplomatic Relations, 1961) 157, 160, 171
- 沃尔兹, 肯尼思 (Waltz, Kenneth) vii, viii
- 乌得勒支条约 (1713) (Utrecht, treaty of, 1713) 35, 102
- 希尔伦 (Heeren, A. H. L.) 12, 32, 100
- 希尔兹, 琳达 (Schields, Linda P.) 284
- 希金斯, 罗莎琳 (Higgins, Rosalyn) 143, 153
- 现实主义国际关系观, 见霍布斯主义国际关系观 (realist view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see Hobbesian view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 新中世纪主义 (new mediaevalism) 245, 254 - 255, 266, 275
- 休谟, 大卫 (Hume, David) 5, 101, 312

- 亚里士多德 (Aristotle) 77, 313
- 伊斯兰教国际关系观 (Islamic view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42 - 43
- 英国 (Britain)
- 可能产生权威重叠的局面 (possible overlapping authorities in) 246, 258
 - 同美国的关系 (relations with U. S.) 167
 - 与核武器 (and nuclear weapons) 185, 186
 - 在英联邦中的领导地位 (primacy in Commonwealth) 208
 - 在中东地区的主导地位 (dominance in Middle East) 207
 - 作为中等强国 (as middle power) 222
- 英国伊丽莎白一世 (Elizabeth I, of England) 161
- 有关战争行为的日内瓦公约 (Geneva Conventions, on conduct of war) 41
- 詹克斯, 威尔弗雷德 (Jenks, C. Wilfred) 140, 143
- 战争 (war) VIII, IX, 49
- 裁军对战争的限制 (limitation by disarmament) 226 - 228
 - 大国对战争的制约 (limitation by great powers) 206 - 207, 288
 - 到 19 世纪理论家的战争观 (in 18th - 19th - century theorists) 34
 - 对国际关系理论的影响 (effect on theories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39, 40
 - 对国际社会的影响 (effect on international society) 41, 18118
 - 核武器对战争的影响 (effect of nuclear weapons on) 183 - 188, 273 - 274
 - 霍布斯主义战争观 (in Hobbesian view) 23
 - 其定义 (definition of) 178, 274 - 275
 - “侵略”战争 (“aggressive war”) 38
 - 与国际法 (and international law) 29, 148 - 149
 - 与正义 (and justice) 88, 183, 191
 - 战争被视为非法行为 (outlawing of) 231
 - 战争的规则 (rules of) 29, 66, 179 - 180, 182
 - 战争的国内后果 (domestic consequences of) 188
 - 战争的原因 (reasons for) 188, 237 - 239
 - 战争罪行 (war crimes) 80, 85 - 86
 - 战争作用的变化 (changes in role of) 190 - 192
 - 自然法传统中的战争 (in natural law tradition) 29
 - 作为国家政策的工具 (as instrument of state policy) 181 - 182
- 正义 (justice) X, XVI
- 裁军世界中的正义 (in a disarmed world) 229 - 230
 - 个人之间的正义 (between individuals) 79 - 81, 278

- 国家之间的正义 (between states) 78 - 79, 87 - 89, 278
- 经济公正 (economic justice) 85, 278 - 282, 302
- 马克思主义正义观 (Marxist views of) 299 - 303
- 其定义 (definition of) 73 - 78
- 人类正义与全球正义 (human and cosmopolitan) 84 - 87
- 与大国 (and great powers) 89, 220 - 222
- 与地区主义 (and regionalism) 296 - 297
- 与国际法 (and international law) 89, 139
- 与核扩散 (and spread of nuclear weapons) 234 - 235
- 与世界政府 (and world government) 245
- 与秩序 (and order) 83 - 94, 212, 300, 308
- 正义战争, 正义战争学说 (just war, doctrine of) 18, 29, 34, 38, 88, 183, 191 - 192
- 殖民主义 (colonialism)
 - 共产党国家 (communist states)
 - 国际社会一致谴责殖民主义 (international consensus condemning) 142, 250, 259
 - 另见马克思, 马克思主义 (see also Marx, Marxism)
 - 有关国际关系的论点 (views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36, 235 - 236, 300 - 302
 - 与 19 世纪的“势力范围”协定 (and 19th - century “spheres of influence” agreements) 213
 - 与国际冲突 (and international conflict) 238
 - 与外交 (and diplomacy) 171
 - 中国的观点 (Chinese views on) 300 - 301
- 中国 (China)
 - 同苏联以及美国的关系 (relations with Soviet Union and U. S.) 219, 220
 - 以及欧洲国家体系 (and European states system) 13, 37
 - 有关马克思主义革命的观点 (views on Marxist revolution) 300 - 302
 - 与核威慑 (and nuclear deterrence) 115 - 116, 118, 234
 - 与外交 (and diplomacy) 172
 - 作为第三世界的旗手 (as champion of Third World) 286
 - 作为一个大国 (as a great power) 98, 108 - 110, 197 - 199
- 中立 (neutrality) 34, 38, 196
- 周恩来 (Chou En Lai) 300
- 主权 (sovereignty) 17, 29 - 30, 35, 246
- 自然法 (natural law) 6, 19, 26 - 32, 79, 142

译 后 记

西方国际关系理论著作很多，其中绝大多数是美国学者的作品，绝大部分理论流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是美国人。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美国在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中一直占据着主导地位。这是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改革开放后，中国学者对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给予了极大的关注，一批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经典著作被翻译成中文出版，其中绝大部分仍然是美国学者所撰写的，其他国家学者的作品很少。事实上，在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中，欧洲学者的著述也占据着很重要的地位，理应受到足够的关注。其中英国学派是一个比较有特色的国际关系理论流派。上世纪90年代以来，英国学派的思想日益为国际学术界所重视，该学派的主要代表著作纷纷再版。近年来，中国学者也开始注意做一些有关英国学派作品的评介工作。

把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经典著作之一、英国学派主要代表人物赫德利·布尔的《无政府社会——世界政治秩序研究》一书翻译成中文，无疑是一件很有意义的工作。同时，也是我遇到的一个重大的学术挑战。要把这样一部久负盛名的经典著作翻译成中文，我作为译者不能不承受着很大的压力。从着手翻译到交稿，我前后大约花费了一年半。对我来说，这是一个艰苦耐的劳作过程，也是一段在精神上遭受折磨的经历。当然，赫德利·布尔在这本书中所体现的深奥的学术思想、简洁明快的文风，也使得翻译工作成为一种精神享受。

虽然我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来翻译这部著作，但由于水平所限，译文中难免有不甚准确的地方。译者期待着读者的批评和指正！

在翻译过程中，我得到了一些朋友的热心帮助。于铁军博士通读了译稿的第二稿，并及时更正了其中的某些错误。李安山教授和高毅教授

帮助翻译了书中的一段法语引文。译者在此向他们表示感谢！世界知识出版社的姚东桥副总编、袁路明编审为这本译著的出版做了很多工作，译者也在此向她们表示感谢！

张小明

2003年10月于北大燕东园

The Anarchical Society:
A Study of Order in World Politics



无政府社会——世界政治秩序研究
第二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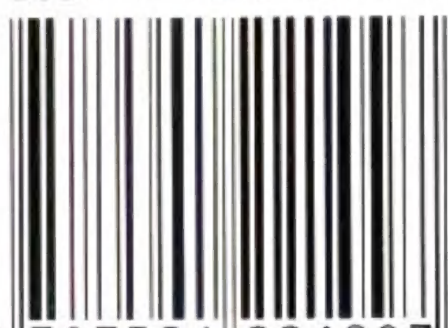
英国著名学者赫德利·布尔撰写的《无政府社会——世界政治秩序研究》是国际关系研究领域的一部经典著作，也是被称为“英国学派”的西方国际关系理论流派之最负盛名的代表作。

本书从国家组成国际社会这个基本观点出发，分析了世界秩序或国际秩序如何得以维持这个重大的理论问题。该书作者认为，均势、国际法、外交、战争和大国等国际社会的制度，同国际秩序的维持有着密切的关系。

美国知名学者、哈佛大学教授斯坦利·霍夫曼为该书第二版作序，对布尔的这本书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并认为该书所体现的国际关系研究的英国方式同美国的主流方式有着重大区别。

阅读这本书有助于我们了解“英国学派”。

ISBN 7-5012-2109-X



9 787501 221097 >

ISBN 7-5012-2109-X/D · 408

定价：28.00 元